

陈独秀問題参考資料

林茂生編輯

• 1 9 6 4 •

說 明

为了配合《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题讲座，编者搜集了陈独秀在各个时期发表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编印成册，作为批判陈独秀的材料。

本书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的基础上修订的。此次修订，删略了批判性的文章，新补充了文章若干篇；在附录中，对陈独秀发表过的著译、演讲、通信等等及其采用过的字、号、笔名，曾作了一定的考证，其中有許多通信原来并无标题，为了编排和查阅的方便，编者按其内容分别加上了标题。

对于陈独秀问题的批判，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和毛主席著作中有关部分，是我们首先必须掌握的理論武器和思想武器。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矛盾論》、《青年运动的方向》、《整顿党的作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篇文章中的有关部分，直接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其叛变革命的行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应该是我們研究这个问题时的指针和依据。其次，《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决议案》、《中共中央复陈独秀的信》（即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份陈独秀先后给中央的两封信的答复——编者）、《中央复陈独秀关于广州暴动问题的信》、《反对党内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及反对派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十月十五日通过）、《中共中央复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的第一

封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批判陈独秀对中东路問題的机会主义錯誤》(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对陈独秀关于中东路問題的第二封信的答复)、《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等中央文件,对陈独秀等右傾机会主义謬論与行为历史地作了批駁与处理,应该是我們研究这个問題时重要的指导性的文件,必須反复閱讀并深刻領会这些文件的精神实质。

本书在編輯过程中,曾得到校内外許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指正,使編者得能順利完成任务,謹致以衷心的感謝。但由于編者能力水平的限制,錯誤和缺点一定不少,希望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教。

編 者 一九六四年二月

目 录

独 秀：自觉心与爱国心·····	1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7
陈独秀：敬告青年·····	10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針·····	16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22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現代生活·····	26
陈独秀：文学革命論·····	33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問題·····	37
只 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40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书·····	42
只 眼：我的国内和平的意見·····	44
只 眼：立宪政治与政党·····	58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	59
独 秀：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69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70
陈独秀：馬尔塞斯人口論与中国人口問題·····	76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	86
陈独秀：談政治·····	88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討論·····	97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評 ·····	121
独 秀：造国論 ·····	135
陈独秀：資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資产阶级 ·····	138
陈独秀：中国农民問題 ·····	144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151
独 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161
陈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165
独 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169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171
独 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178
独 秀：革命与武力	181
独 秀：革命与民众	185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189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	191
一、1929年7月28日的信	191
二、1929年8月5日的信	193
三、1929年8月11日的信	209
陈独秀供词（摘录）	217
陈独秀：中国的一日	219
仲 ； 给陈其昌等的信	220
陈独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222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228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230
陈独秀：民族野心	232
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	236
独 秀：抗战一年	239
陈独秀：论游击队	242
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	244
附一：托洛斯基给李福林的信	247
附二：刘仁静、李季的声明（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248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三封信	256
陈独秀：给连根的信	260
陈独秀：给Y的信	263

陈独秀：給 S和H的信	264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見	266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輪廓	270
陈独秀：再論世界大势	277
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283
陈独秀：給Y的信	288
附 录：	
一、陈独秀著譯、演讲、通信等目录	289
二、陈独秀曾用过的字、号、笔名	342
三、解放前后有关評論陈独秀的資料目录及索引	342

自覺心與愛國心

獨 秀

範圍天下人心者。情與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轍。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俠滄奔。殺身守志。不計利害者之所為也。暱于智者。辨理析疑。權衡名實。若理學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萬物之理。而其蔽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者。莫如屈平。憤世憂國。至于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達世諦。騎牛而逝。斯于二者各用其極矣。

今之中國。人心散亂。感情智識。兩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視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謂之無愛國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復不知此。是謂之無自覺心。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恒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二者俱无。國必不國。嗚呼。國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此歐人之常談。由日本傳之中國者也。中國語言。亦有所謂忠君愛國之說。惟中國人之視國家也。與社稷齊觀。斯其釋愛國也。與忠君同義。蓋以此國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艱難締造之大業。傳之子孫。所謂得天下是也。若乎人民。惟為締造者供者犧牲。无絲毫自由權利與幸福焉。此歐洲各國憲政未興以前之政體。而吾華自古訖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人民權利。載在憲章。犬馬民衆。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歐人之視國家。既與邦人大異。則其所謂愛國心者。與華語名同而實不同。欲以愛國詔國人者。不可不首明此義也。

國家之義既明。則謂吾華人無愛國心也可。謂吾華人未嘗有愛

国者亦可。即謂吾華人未嘗建設國家。亦無不可。何以云然。吾華未嘗有共謀福利之團體。若近世歐美人之所謂國家也。土地人民主權者。成立國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吾國伊古以來。號為建設國家者。凡數十次。皆未嘗為吾人謀福利。且為戕害吾人福利之蠱賊。吾人數千年以來所積貯之財產。所造作之事物。悉為此數十次建設國家者破壞無余。凡百施政。皆以謀一姓之興亡。非計及國民之憂樂。即有聖君賢相。發政施仁。亦為其福祚攸長之計。決非以國民之幸福與權利為準的也。若而國家。實無立國之必要。更無愛國之可言。過曬感情。侈言愛國。而其智識首不足理解國家為何物者。其愛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譚。愛國心雖為立國之要素。而用適其度。智識尚焉。其智維何。自覺心是也。

愛國心。情之屬也。自覺心。智之屬也。愛國者何。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罔與殆其蔽一也。

不知國家之目的要愛之者。若德奧日本之國民是也。德奧日本。非所謂立憲國家乎。其國民之愛國心。非天下所共譽者乎。然德人為其君所欺。棄畢相之計。結怨強俄。且欲與英吉利爭海上之雄。致有今日之劇戰。流血被野。哀音相聞。或竝命孤城。或碎身絕域。美其名曰為德意志民族而戰也。實為主張帝王神權之凱撒之野心而戰耳。德帝之恒言曰。世界威權。天有上帝。地有凱撒。大書特書于士卒之冠曰。為皇帝為祖國而出征。為皇帝其本懷。為祖國只誑語耳。奧之于塞。侵陵已久。今以其君之子故。不惜亡國破軍。以圖一逞。即幸而勝。亦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耳。于國人有何福利也。若塞耳維亞。若比利時。乃為他人侵犯其自主而戰者也。若奧地利。若德意志。乃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者也。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戰者。愛國主義也。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戰者。帝國主義也。愛國主義。自衛主義也。以國民之福利為目的者也。若塞比是矣。帝國主義

者。侵略主义。君若相利用国民之虚荣心以增其威权为目的者也。若德奥是矣。日本维新以来。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侮矣。若犹张皇亦师。日不暇给。竭内以饰外。赋重而民疲。吾恐其国日强。其民胥冻餒以死。强国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夫帝国主义。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人道之洪水猛兽也。此物不僵。宪政终毁。行见君主民奴之制复兴。而斯民之憔悴于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

……土耳其宪政初行。国基未固。不自量度。与意争衡。一战而败。军复国削。今复左德抗俄。列强治外之权。欲一旦悍然夺之。吾恐其国难之将作矣。俄之败于日也。越国万里。且非倾国之师。日本国力。岂堪久战。介美行成。诚非得已。而其国民愤置当涂。不自审矣。墨西哥名为共和。实则其民昏乱。无建设国家之力。梟雄争权于朝。地主肆虐于野。民不堪命久矣。使其翻然自觉。附美为联。其人民自由幸福。必远胜于今日。必欲独立。恐其革命相循。而以兵得政以政虐民之风不易革也。吾国自开港以来。情见势絀。甲午庚子之役。皆以不达情势。辱国丧师。元气大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詎有幸理。然当国者襲故相以夷制夷之計。揖盜自損。同一自損。敌之甲得乙失。我何擇焉。而书生之見。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凡此諸国所行。岂无一二壯烈之为。吾人所敬。惟不自觉其国之情势。客气乘之。爱国适以誤国。謀国者不可不审也。

假令前說为不謬。吾国将来之时局。可得而論定矣。自爱国心之理論言之。世界未躋于大同。御侮善群。以葆其类。誰得而非之。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簡。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論也。自觉心。分別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論。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別之事实。鮮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

吾人亟需之智識。予說之不获已也。

吾國閉關日久。人民又不預政事。內外情勢。遂非所知。虽一世名流。每持謬說。若夫怀抱樂觀之見。輕論當世之事。以為泱泱大國。物阜民稠。人謀不乖。外患立止。是何所見之疏也。中國而欲為獨立國家。稅則法權。必不可因仍今日之制。然斯事匪細。非戰備畢修。曷其有濟。欲修戰備。理財尚焉。論時局而計及財政。誠中國存亡之第一關頭也。中國經常歲入。約銀三萬萬元。新舊外債約有銀二十萬萬元。利息平均以五厘計之。每年不下一萬萬元。應還本金。年約五千萬萬元。本利合計。年約一萬五千萬萬元。已占歲入之半。此事寧非大異。國非不可舉債。若中國之外債。則與他國異趣。中國之外債。乃以國稅鐵路為抵償。列強据此以定瓜分之局者也。此事不能自了。無論君主共和。維新復古。瓜分亡國之局。終無由脫。自今日始。外不舉債。內不摸金。上下相和。歲計倍益。年減外債若干。期以十稔。務使不為財政之累。然後十年教養。廿年治軍。四十年之後。敵國外患。庶几可寧。若其不揣事情。期于速效。徒欲朘削貧敝之民。殘民耀武。以為富強。不啻垂死病夫。飲鴆以求淫樂也。其或激于事變。過涉悲觀。忧瓜分之危。怀亡國之痛。以為神州不振。將下等于印度朝鮮之列。此其人用心良苦。而所見則甚愚也。究中國之國勢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分割陰謀。成之已久。特未實施者。其形式耳。夫徒欲保此形式。蓋無益而難能也。時政乖違。齊民共喻。以今之政。處今之世。法日廢耳。吏日貪耳。兵日亂耳。匪日众耳。財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潰耳。政紀至此。夫復何言。或云此固不治。鋤而去之。國難自已。此言甚壯。此計亦不得以為非。惟恐國人志行。不甚相遠。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誠。則以利祿毀人如故也。敵視異己如故也。耀兵殘民如故也。漠視法治如故也。紊亂財政如故也。奮私無紀。殆更有甚焉。以此為政。國何以堪。又或謂。吾民德薄能鮮。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寧一。此亦書生之見也。姑無論國體變更。非國人所同愿。滿清末造。政績昭然。其親貴旧勛。焉有容納當塗部曲革命黨

人之雅量。欲以此广輿論之涂。兴代議之制。不其难乎。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設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議之制則一也。代議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設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計。亦犹瞽者无見。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觀之。能否建設国家于二十世紀。夫非浮夸自大。誠不能无所怀疑。然則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賢者亦难遏其势。且乎情論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詳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債一日不止。濫用国家威权。斂錢杀人。杀人斂錢。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鋒鏑。党同伐异。誅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見。卫虐民之殘体。在彼輩視之。非愚即狂。实則国人如此設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殘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罰而莫可贖耶。或謂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殘民之禍。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誠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視彼乱国之子遺。尙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聳国民力爭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鮮。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諷戒吾民者乎。夷考其实。其言又何啻夢囈也。夫貪吏展牙于都邑。盜賊接踵于國中。法令从心。冤獄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鮮人之所无。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去吾顛連无告之狀。殆不可道里計。不暇远征。且觀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

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
化。夷。場。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
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嗚。呼。国。家。国。家。尔。行。
尔。法。吾。人。誠。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
此。自。觉。也。

（选自《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出版）

法蘭西人与近世文明

陈 独 秀

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譯为文明，开化，教化，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古今，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謂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語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殘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揚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絕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遺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謂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細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貢獻，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說，一曰生物进化論，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設于君主与貴族特权之上，視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人之君主与貴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 [Lafayette 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 之“人权宣言” 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s 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夢之觉，若醉之醒，曉然于人权之可貴，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貴族，列国宪章，賴以成立。薛紐伯有言曰：“古之法律，貴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階級，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財產之私不平等而

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語見薛氏所著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之“結論”第四一五頁。由斯以談，人類之得以為人，不至永淪奴籍者，非法蘭西人之賜而誰耶？

宗教之功，勝殘勸善，未嘗無益於人群；然其迷信神權，蔽塞人智，是所短也。歐人篤信創造世界萬物之耶和華，不容有所短長，一若中國之隆重綱常名教也。自英之達爾文，持生物進化之說，謂人類非由神造，其後遞相推演，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格言，昭垂於人類，人類爭顯智靈，以人勝天，以學理構成原則，自造其禍福，自導其知行，神聖不易之宗風，任命听天之隋性，吐棄無遺，而歐羅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進。世多稱生物學為十九世紀文明之特征，然追本溯源，達爾文生物進化之說，實本諸法蘭西人拉馬爾克 (Lamarck)。拉氏之“動物哲學”，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學論究物種之進化，與人類之由來，實空前大著也。其說謂生物最古之祖先，為最下級之單純有機體；此單純有機體，乃由無機物自然發生，以順應與遺傳，為生物進化之二大作用。其後五十年，傾動世界之達爾文進化論，蓋繼拉氏而起者也。法蘭西人之有大功于人類也又若此！

近世文明之發生也，歐羅巴舊社會之制度，破壞無余，所存者私有財產制耳。此制雖傳之自古，自競爭人權之說興，機械資本之用廣，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變而為社會之不平等；君主貴族之壓制，一變而為資本家之壓制；此近世文明之缺點，無容諱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與壓制，繼政治革命而謀社會革命者，社會主義是也。可謂之反對近世文明之歐羅巴最近文明。其說始于法蘭西革命時，有巴布夫 (Babeuf) 者，主張廢棄所有權，行財產共有制。(La commune des biens) 其說未為當世所重。十九世紀之初，此主義復盛興于法蘭西。聖西孟，(Saint-Simon) 及傅里耶，(Fonrier) 其最著稱者也。彼等所主張者，以國家或社會，為財產所有主，人各從其才能以事事，各稱其勞力以獲報酬，排斥違背人道之私有權，而建設一新社會也。其後數十年，德意志之拉薩爾 (Lassalle) 及馬克斯，(Karl Marx) 承法人之師說，發揮而光大之，資本與

勞力之爭愈烈，社會革命之聲愈高。歐洲社會，岌岌不可終日。財產私有制雖不克因之遽廢，然各國之執政及富豪，恍然于貧富之度過差，決非社會之福；于是謀資本勞力之調和，保護工人，限制兼併，所謂社會政策是也。晚近經濟學說，莫不以生產分配，相提并論。繼此以往，貧民生計，或以昭蘇。此人類之幸福，受賜于法蘭西人者又其一也。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創造此文明之恩人方與軍國主義之德意志人相戰，其勝負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學，雖為吾人所尊崇，仍屬近代文明之產物；表示其特別之文明有功人類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對法蘭西人所愛之平等自由博愛而已。文明若德意志，其人之理想，決非東洋諸國可比。其文豪大哲，社會黨人，豈无一愛平等自由博愛，為世矜式者？特其多數人之心理，愛自由愛平等之心，為愛強國強種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蘭西人之嗜平等博愛自由；根于天性，成為風俗也。英俄之攻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蘭西人，其執戈而為平等博愛自由戰者，蓋十人而八九也。即戰而敗，其創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昔法敗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勝而驕，彼法蘭西人歷世創造之天才，實視汝因襲之文明而戰勝也。”吾人當三復斯言。

（原載《新青年》1卷1號，1915年9月15日出版，

轉选自“獨秀文存”卷〔一〕）

敬告青年

陈独秀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語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 英美人相勗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儼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寢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寢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顧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頑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

潑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絕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現象，于人身則必死，于社會則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之所能濟，是在一二敏于自覺勇于奮鬥之青年，發揮人間固有之智能，抉擇人間種種之思想，——孰為新鮮活潑而适于今世之爭存，孰為陳腐朽敗而不容留置于腦里，——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牽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抉擇，謹陳六義，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自處之義務。奴隸云者，古之昏弱對於強暴之橫奪，而失其自由權利者之稱也。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德國大哲尼采（Nietzsche）別道德為二類：有獨立心而勇敢者曰貴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誰遜而服從者曰奴隸道德（Morality of slave）。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丰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以其是非榮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為本位，則個人獨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惡行為，勢不能訴之自身意志而課以功過，謂之奴隸，誰曰不宜？立德立功，首當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ergson)之《制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篇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古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哲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升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嗚呼！巴比倫人往矣，其文明尙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駸駸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生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祿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淪，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

无擇也。人心穢濁，不以此輩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斬。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遯恶社会，作退避安閑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騎，入汝室矣；将高臥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隱遁詩人。〕不若其为哥倫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誼。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謂絕国，今視之若在戶庭。举凡一国之經濟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牽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廢存亡，視其国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証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維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篤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觀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兩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鎖国閉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勢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視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驅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則之精神，漸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違。于世而执特別历史国情之說，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鎖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識。国民而无世界智識，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語云：“閉戶造车，出門未必合轍。”今之造车者，不但閉戶，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轍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虛文的

自約翰弥尔(J. S. 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

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向，万馬奔馳，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虛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現時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藝生活英文曰Life，德文曰Leben，法文曰Lavie。問題，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鮮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虛文之夢，势将觉悟无遺。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虛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兩代而来，——周礼崇尚虛文，汉則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所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馳。倘不改絃而更張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誦《孝經》以退黃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糞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誑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遺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想像者何？既超脫客觀之現象，复抛弃主觀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証，不可以人間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則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淺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像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日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学法則，以定其得失从違；其效将使人間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脫蒙昧时代，羞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襲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說，惑世誣民；

地气风水之談，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擇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貨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給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識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傳染，更无聞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剋寒热阴阳之說，襲古方以投药餌，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像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說；其說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試遍索宇宙間，誠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識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維科学。夫以科学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証实，較之想像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誠緩；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終无寸进也。宇宙間之事理无穹，科学領土內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闊。青年勉乎哉！

（原載《新青年》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出版。

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今日之教育方針

陈 独 秀

居今日之中国而談教育，无賢不肖将共非之。上方百計仆此以为弭乱之計，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賢者叹为空談，不肖者詈为多事，吾則以为皆非也。多事之說，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則教育之所以急需，正为此輩而設。空談之說，亦志行薄弱，随俗进退者之用心，吾无取也。何以言之？盖教育有广狹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以授受；自广义言之，凡偉人大哲之所遺傳，书籍报章之所論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以执政之摧殘学校，遂謂无教育之可言，执政倘焚书坑儒，将更謂識字之迂闊乎？以如斯志行薄弱之人主持教育，虽学校遍乎域中，岁費增至亿万，兴国作民之事，必无望也！反乎此者，虽执政尽廢全国学校，而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撓，填海移山，行見教育精神，終有救国新民之一日。发空談之长叹，煽消极之恶风，其罪殆与摧殘教育之执政相等。即以狭义之教育言之，二三年来，学校破坏，誠可痛心；然就此才遺，非絕无振作精神之余地；乃必欲委心任运，因循敷衍，致此殘敗之余，亦归殘敗，青年学子，用以自放，絕无进取向上之心，嗚呼！是誰之罪歟？吾以为已破坏之学校，罪在执政；未破坏之学校，其腐敗墮落等于破坏者，得罪在教育家！

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別为三：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針，一曰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对象者，即受教育者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性质也；教育之方針者，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也；教育之方法者，应若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針也。三者之中，以教

育之方針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不此是图，其他設施，悉无意識。

第所謂教育方針者，中外古今，举无一致。欧洲中世，教育之权，操之僧侶，其所持教育方針，乃以养成近似神子（即耶穌）之人物；近世政教分离，国民普通教育，恒屬於国家之經營，施教方針，于焉大异。斯巴达Sparta古代希臘Laconia州之首府。人之教育，期以好勇善斗，此所謂軍国民教育主义也。此主义已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德意志及日本虽以軍国主义聞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其国民教育方針，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廢。以其戕賊人間个性之自由，失設教之正鵠也。法兰西哲学者盧梭，以人生本乎自治，为立教之則，此哲家之偏見，未可施諸国民普通教育者也。德意志之哲学者赫尔巴特（Herbart）近世教育家之泰斗也。其說以品行之陶冶，为教育之极則，十九世紀言教育者，多以赫氏为宗。所謂赫尔巴特派教育学与康德派哲学，殆如并世之双峰；然晚近学者多非之，至称为彫刻师而非教育家，盖以其徒事表象之庄严，陷于漠視体育与心灵二大缺点也。現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軍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錢万能主义之国也。稽此列强教育之成功，均有以矜式宇內者。吾国今日之教育方針，将何所取法呼？

窃以理无絕對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廢。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間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謀教育之方針，計惟去短擇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詞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覽列强之大势，內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經濟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責任之艰巨。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針，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

乎。依此方針，說其義于左方：

(一) 现实主义

人生之真相，果如何乎？此哲學上之大問題也。欲解決此問題，似尚非今世人智之所能。征諸百家已成之說，神秘宗教，訴之理性，決其立言之不誠，定命之說，不得初因，難言後果。印度諸師悉以現象世界為妄覺，以梵天真如為本体；惟一切有部之說微異斯旨。惟征之近世科學，官能妄覺，現象無常，其說不誤。然覺官有妄，而物體自真；現象無常，而實質常住。森羅萬象，瞬刻變遷，此無常之象也。原子種性，相續不滅，此常之象也。原子種性不滅，則世界無盡；世界無盡，則眾生無盡，眾生無盡，則歷史無盡。爾我一身，不過人間生命一部分之過程，勿見此身無常，遂謂世間一切無常；爾之種性及歷史，乃與此現在實有之世界相永續也。以現象之變遷，疑真常之存在，于物質世界之外，假定梵天真如以為本体，薄現實而趨空觀，厭倦偷安，人治退化，印度民族之衰微，古教宗風，不能無罪也。耶穌之教，以為人造于神，復歸于神，善者予以死後之生命，惡者奪之，以人生為神之事業。其說雖誕，然謂天國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禍尚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學大興，人治與教宗并立，群知古說迷信，不足解決人生問題矣。

總之，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說，恒覺其難通；徵之科學，差謂其近是。近世科學家之解析人生也；個人之于世界，猶細胞之于人身，新陳代謝，死生相續，理無可逃；惟物質遺之子孫，（原子不滅）精神傳之歷史；（種性不滅）個體之生命無連續，全體之生命無斷滅；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厭生，復不畏死；知吾身現實之生存，為人類永久生命可貴之一隙，非常非暫，益非幻非空；現實世界之內有事功，現實世界之外無希望。唯其尊現實也，則人治興焉，迷信斬焉；此近世歐洲之時代精神也。此精神磅礴無所不至；見之倫理道德者，為樂利主義；見之政治者，為最大多數幸福主義；見之哲學者，曰經驗論，曰唯物論；見之宗教者，曰無神論；見之文學美術者，曰寫實主

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古之所谓理想的道德的黄金时代，已无价值之可言。德意志诗人海雷（Heine生于一七九七年，卒于一八五六年）有言曰：“海之帝国属于英吉利，陆之帝国属于法兰西，空之帝国属于德意志。”斯言也，意在諷劝其国人，一变其理想主义为现实主义也。现实主义，誠今世貧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針矣。

（二）惟民主义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統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連絡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著卜。是以世界优越之民族，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更进为国家团体。近世欧洲文明进于中古者，国家主义，亦一特异之征也。第国家主义既盛，渐趋过当，遂不免侵害人民之权利。是以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則。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欧洲各国，俄罗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躪宪章，反抗民意者也。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絕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賜也。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張；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见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終毀。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

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内容維何？欧美政治学者詮釋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輯內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詞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僕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則将与民为邦本之說，背道而馳。若

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若期期唯共和国体是争，非根本之计也。

（三）职业主义

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此社会学者经济学者所同认也。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一人失其生产力，则社会失其一部分之安宁幸福。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

征之吾国经济现象，果如何乎？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者也。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僕从，漫无限制；此政治之害于经济者也。并此数因，全国之人，习为游惰；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餬口，为害于閭閻。生寡食众，用急为舒。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

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

（四）兽性主义

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突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

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頑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

抗自然也；曰，信賴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順性率真，不飾偽自文也。哲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燭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

余每見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搏鷄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纖腰，嫵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張之貫徹也？他日而为軍人，焉能戮力疆場，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穹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穹百艺，排万难，冒万險，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倘不以劣敗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見虛文自蔽也！

（原載《新青年》1卷2号，1915年11月15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陈 独 秀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为东西兩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請言其大者：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爭，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賢，使民不爭，以任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黷武穹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墮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諸民族一貫之精神。斯說也，吾无以易之。

若西洋諸民族，好战健斗，根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鮮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鮮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鮮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維亚，以小抗大，以鮮血爭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終不淪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顏面，高談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訖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响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謀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載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謂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純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論言之：人間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間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間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謂性灵，所謂意思，所謂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詩》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則归之宗，不足則資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經，国家組織，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貫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談，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組織，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罰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慘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轉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 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之重視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淺見者每譏其俗薄而不憚煩也。父子昆季之間，称貸責償，錙銖必較，違之者不惜訴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違法損利之事。

或謂西俗夫婦非以愛情結合豔稱于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愛情为一事，夫婦又为一事。戀愛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婦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純然愛情关系也。約婚之初，各要求其財產而不以为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財產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婦，一旦反目，直訟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絕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則親子昆季夫婦，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間，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損益。亲不責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視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夫婦生活之外无有余貲者，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英国貴妇人乃以愛犬不愛小兒見稱于世，良以重視个人自身之利益，而絕无血統家族之观念；故夫婦問題与产子問題，不啻風馬牛相去万里也。若夫东洋民族，夫婦問題，恒由产子問題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輕个人，而家庭經濟遂陷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緣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別居，絕經濟之关系；所謂吾之家庭（My family）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則必曰吾父之家庭；（My father's family）用語严別，誤必遺譏。东俗則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納妇，一門之內，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傳为佳話。虛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婦群居，內多詭譎；依賴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則黑幕潛張，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間，率

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譏。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簡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茲？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遺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貸，視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門，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輕去乡里，視戚友若盜賊。社会經濟，因以大乱。

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飾虛文任用感情之故。淺見者自表面論之，每称以虛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之者多外飾厚情，內恒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終；受之者习为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結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賴，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計，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漁。以小人始，以君子終；社会經濟，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吾則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原載《新青年》1卷4号，1915年12月15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孔子之道与現代生活

陈 独 秀

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羨，独康門諸賢，洞察积弱之原，为貴古賤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譁然非之，詈为离經畔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輝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論之代表也。吾輩后生小子，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辯护，乡里耆儒，以此指吾輩为康党，为孔教罪人，側目而远之。

戊戌庚子之际，社会之視康党为异端，为匪徒也，（其时張勳等心目中康有为，必較今日之唐紹仪尤为仇惡也。）与辛亥前之視革命党相等。張之洞之《劝学篇》，即为康党而发也。張氏亦只知歆羨坚甲利兵之一人，而于西洋文明大原之自由平等民权諸說，反复申駁，謂持此說者为“自墮污泥”，（《劝学篇》中語。）意在指斥康梁，而以息邪說正人心之韓愈孟軻自命也。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今日思之，抑何可笑，一至于斯！

不图当日所謂离經畔道之名教罪人康有为，今亦变而与夫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其或自以为韓愈孟軻，他人讀其文章，竟可杂諸《翼教丛篇》《劝学篇》中，而莫辨真偽。康先生欲为韓愈孟軻乎？然此荣誉当代卫道功臣叶德輝先生。叶先生見道甚早，今犹日夜太息痛恨邪說之兴，兴于康有为，而莫可息；人心之坏，坏于康有为，而莫可正；居恒欲手刃其人，以为畔道离經者戒。康先生聞之，能勿汗流浹背沾衣耶？

或謂“叶康皆圣人之徒，能予人以自新；康既悔过自首，叶必嘉

其今是而赦其昨非。”此說然否，吾无所容心焉。蓋康先生今日應否悔過，尊從孔教問題，乃其個人信仰之自由，吾人可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吾人所欲議論者，乃律以現代生活狀態，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從之價值是也。

自古聖哲之立說，宗教屬出世法，其根本教義，不易隨世間差別相而變遷，故其支配人心也較久。其他世法諸宗，則不得不以社會組織生活狀態之變遷為興廢。一種學說，可產生一種社會；一種社會，亦產生一種學說。影響複雜，隨時變遷。其變遷愈複雜而期間愈速者，其進化之程度乃愈高。其欲獨尊一說，以為空間上人人必由之道，時間上萬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論上決為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實上惟於較長期間不進化之社會見之耳。若夫文明進化之社會，其學說之興廢，恒時時視其社會之生活狀態為變遷。故歐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為其古代聖人亞里斯多德所拘囚，且並不為其近代聖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狀態有異于前也。

即以不進化之社會言之，其間亦不無微變。例如吾輩不滿于康先生，而康先生曾亦不滿于張之洞與李鴻章，而張之洞李鴻章亦曾不滿于清廷反對鐵路與海軍之諸頑固也。宇宙間精神物質，無時不在變遷即進化之途。道德彝倫，又焉能外？“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史例具在，不可謂誣。此亦可以阿斯特瓦爾特之說証之：一種學說，一種生活狀態，用之既久，其精力低行至于水平，非舉其機械改善而更新之，未有不失其效力也。此“道與世更”之原理，非稽之古今中外而莫能破者乎？

試更以演繹之法，推論孔子之道，實証其适用于現代與否，其斷論可得而知之矣。康先生前致總統總理書，以孔教與婆佛耶回并論，且主張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是明明以孔教為宗教之教，而欲尊為國家矣。今觀其與教育范總長書，（見《國是報》）乃曰：“孔子之經，與佛耶之經有異：佛經皆出世清淨之談，耶經只尊天養魂之說，其于人道舉動云為，人倫日用，家國天下，多不涉及；故學校之不讀經無損也。若孔子之經，則于人身之舉動云為，人倫日用，家

国天下，无不紆悉周匝；故讀其經者，則于人倫日用，举动云为，家
国天下，皆有德有礼，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故曰：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若不讀經，則于人之一
身，举动云为，人倫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是又明明不以
孔教为出世养魂之宗教而謂为人倫日用之世法矣。

余以康先生此說誠得儒教之真，不似前之宗教說厚誣孔子也。
惟是依道与世更之原理，世法道德必随社会之变迁为兴廢，反不若
出世远人之宗教，不随人事变迁之較垂久远。（康先生与范書，极称西洋
尊教誦經之盛，不知正以其为出世远人之宗教則尔也，今亦已稍稍杀矣。）康先
生意在尊孔以为日用人倫之道，必較宗教之迂远，足以动国人之信
心，而不知效果将适得其反。盖孔教不适現代日用生活之缺点，因
此完全暴露，較以孔教为宗教者尤为失敗也。

現代生活，以經濟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經濟学生
产之大則，其影响遂及于倫理学。故現代倫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
立，与經濟学上之个人財產独立，互相証明，其說遂至不可搖动；而
社会风紀，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綱常立教。为人子为
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財產。父兄畜其子
弟，（父兄养成年之子弟，伤为父兄之財產也小，伤为子弟者之独立人格及經
济能力也大。儒教慈孝悌并称，当然終身相养而不以为怪。）子弟养其父兄。（人类相爱
互助之誼，何独忍情于父兄？况养亲报恩，乃情理之常。惟以倫理見解，不論父兄之善
惡，子弟之貧富，一概强以孝养之义务不可也。）《坊記》曰：“父母在，不敢有
其身，不敢私其財。”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康先生与范書，引“鰥
寡孤独有所养”，“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无加諸人”等語，謂
为个人独立之义，孔子早已有之。此言真如夢囈！夫不欲人我相加，
虽为群己間平等自由之精义，然有孝悌之說以相消，則自由平等只
用之社会，而不能行之家庭。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財產之个
人独立更不相涉。鰥寡孤独有所养之說，适与个人独立之义相違。
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倫理經濟二者而言，尤以經濟上个人独立
主义为之根本也。

現代立憲國家，無論君主共和，皆有政黨。其投身政黨生活者，莫不發揮個人獨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從之義，——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婦人從父與夫，并從其子。——豈能自擇其黨，以為左右袒耶？

婦人參政運動，亦現代文明婦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婦人者，伏于人者也；”“內言不出于閭；”“女不言外”之義，婦人參政，豈非奇談？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篤念旧好，或尚獨身清潔之生涯，無所謂守節也。婦人再醮，決不為社會所輕。（美國今大總統威爾遜之夫人，即再醮者。夫婦學行，皆為國人所稱。）中國禮教，有“夫死不嫁”（見《郊特牲》。）之義。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為失節，為奇辱。禮又于寡婦夜哭有戒。（見《坊記》）友寡婦之子有戒。（見《坊記》及《曲禮》。）國人遂以家庭名譽之故，強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節，至淒慘之生涯，年年歲歲，使許多年富為之婦女，身體精神俱呈異態者，乃孔子禮教之賜也！

今日文明社會，男女交際，率以為常。論者猶以為女性溫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經主人介紹，接席并舞，不以為非。孔子之道則曰：“男女不雜座；”曰“嫂叔不通向；”曰“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均見《曲禮》。）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曰“七年（即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同食；”（均見《內則》。）曰“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均見《坊記》。）是等禮法，非獨與西洋社會生活狀態絕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國？

西洋婦女獨立自營之生活，自律師醫生以至店員女工，無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則曰：“男女授受不親；”（見《坊記》。）“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見《內則》。）“婦人，從人者也。”是蓋以夫為婦綱，為婦者當然被養于夫，不必有獨立生活也。

婦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無義。西洋親之與子，多不同居；其媳更無孝養翁姑之義務。而孔子之道則曰：“戒之敬之，夙

夜毋違命；”（見《士昏禮》。）“婦順者，順于舅姑；”（見《昏義》。）“婦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古人夫妻情好甚篤，若不悅于其亲而出之，致遺終身之憾者甚多。例如陸游即是也。）“凡婦，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均見《內則》。）此惡姑虐媳之悲劇所以不絕于中國之社會也！

西俗于成年之子，不甚責善，一任諸國法與社會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則曰：“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國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諺也。

西洋喪葬之儀甚簡，略類中國墨子之道。儒家主張厚葬。喪禮之繁，尤害時廢業，不可為訓。例如“寢苦枕塊，非喪事不言”之禮，試問今之尊孔諸公居喪時，除以“苦塊昏迷”妄語欺人外，曾有一實行者乎？

以上所舉孔子之道，吾愿尊孔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征之事實能否行之社會；即能行之，是否增進社會福利國家實力，而免于野蛮黑暗之譏評耶？吾人為現代尚推求理性之文明人類，非古代盲從傳說之野蛮人類，烏可以耳代腦，徒以几時震驚孔夫子之大名，遂真以為萬世師表，而莫可議其非也！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于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會道德與生活，莫大于禮；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時代精神之鐵証也耶？

康先生所謂孔子之經，于人身之舉動云為，人倫日用，家國天下，無不纖悉周匝，吾知其纖悉周匝者，即在數千年前宗法時代封建時代，亦只行于公卿士大夫之人倫日用，而不行之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數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時代國家時代乎？立國于今日民政民權發張之世界，而惟注意于少數貴族之舉動云為，人倫日用，可乎

不可？稍有知識之尊孔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斷！

康先生与范书曰：“中国人，上者或博极群书，下者或手执一业，要其所以心造自得，以为持身涉世修己治人之道，盖无不从少年讀《論》《孟》来也。”斯言也，吾大承认之。惟正以社会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鎔，乃所以有今日之現象。今欲一仍其旧乎？抑或改进以求适现代之爭存乎？稍有知識之尊孔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斷！

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說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則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黃巢張獻忠之慘杀，今未聞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贊成帝制孔教之湯薌銘龙济光張勳倪嗣冲而已。古之宮廷穢乱，史不絕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入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季公卿，尚公然蓄嫖男寵，今皆无之。溺女蛮风，今亦漸息。此非人心风俗較厚于古乎？

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黃花岡七十二士，同日为国就义，扶老助弱，举止从容。至今思之，令人垂泪！中国前史，有此美談乎？袁氏称帝，馮段諸公，竟不以私交廢公义；唐蔡岑陆，均功成不居。此事在欧美日本为寻常，而为中国古代軍人所罕有。国民党人，苦战余生，以尊重約法之故，首先主張癸丑年与为政敌之黎元洪继任为天下倡。此非共和范为民德之效耶？

淺人所目为今日风俗人心之最坏者，莫过于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經，女不守节。然是等謂之不尊孔則可，謂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組織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謂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試揩尔目，用尔腦，細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現代生活果作何态，訴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斷，勿依違，

勿調和——依違調和为真理发見之最大障碍！

（原載《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2月1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文學革命論

陳 獨 秀

今日庄严燦爛之歐洲，何自而來乎？曰，革命之賜也。歐語所謂革命者，為革敵更新之義，與中土所謂朝代鼎革，絕不相類；故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

吾苟儉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雖經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嘗稍減。其原因之小部分，則為三次革命，皆虎頭蛇尾，未能充分以鮮血洗淨旧汙；其大部分，則為盤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倫理道德文學藝術諸端，莫不黑幕層張，垢汚深積，并此虎頭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會，不生若何變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總因，乃在吾人疾視革命，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問題，方喧呶于國中，此倫理道德革命之先聲也。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艰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國風》多里巷猥辭，《楚辭》盛用土語方物，非不斐然可觀。承其流者，兩漢賦家，頌聲大作，彫琢阿諛，詞多而意寡，此貴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晉以下之五言，抒情寫事，一變前代板滯

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謂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簡意晦，社会現象，非所取材，是犹貴族之风，未足以語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語，故駢文家頗主張駢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說。（亡友王无生即主張此說之一人）不知古書傳鈔不易，韵与对偶，以利傳誦而已。后之作者，烏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細事陈启，亦尚駢丽。演至有唐，遂成駢体。詩之有律，文之有駢，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彫琢的阿諛的鋪張的空泛的貴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視八股試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謂为文学之末运矣！韓柳崛起，一洗前人纖巧堆垛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貴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韓，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樞。俗論謂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論，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滿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脫貴族气派，寻其內容，远不若唐代諸小說家之丰富，其結果乃造成一新貴族文学。

二曰，誤于“文以載道”之謬見。文学本非为載道而設，而自昌黎以迄曾國藩所謂載道之文，不过鈔襲孔孟以来极肤淺极空泛之門面語而已。余尝謂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謂“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觀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說，乃近代文学之燦然可觀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瑣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輩，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馬东籬，若施耐菴，若曹雪芹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識。若夫七子之詩，刻意模古，直謂之抄襲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慕，或无病而呻，滿紙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

大作，搖頭擺尾，說來說去，不知道說些甚么。此等文學，作者既非創造才，胸中又無物，其伎倆惟在仿古欺人，直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

今日吾國文學，悉承前代之敝：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所謂“駢體文”者，思綺堂與隨園之四六也；所謂“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無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寫世，所謂代表時代之文豪者，不獨全國無其人，而且舉世無此想。文學之文，既不足觀，應用之文，益復怪誕，碑銘墓志，極量稱揚，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恒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苦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迈歧黃，”即曰“著手成春。”穹鄉僻壤極小之豆腐店，其春聯恒作“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此等國民應用之文學之丑陋，皆阿諛的虛偽的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階之厲耳。

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種文學耶？曰：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艰澀，自以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其形体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穹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種文學公同之缺點也。此種文學，蓋與吾阿諛誇張虛偽迂闊之國民性，互為因果。今欲革命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使吾人不張目以觀世界社會文學之趨勢，及時代之精神，日夜埋頭故紙堆中，所目注心營者，不越帝王，權貴，鬼怪，神仙，與夫個人之穹通利達，以此而求革新文學，革新政治，是縛手足而敵孟賁也。

歐洲文化，受賜于政治科學者固多，受賜于文學者亦不少。予愛盧梭巴士特之法蘭西，予尤愛虞哥左喇之法蘭西；予愛康德赫克爾之德意志，予尤愛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愛培根达尔文之英

吉利，予尤愛狄鏗士王爾德之英吉利。吾國文學界豪傑之士，有自負為中國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鏗士，王爾德者乎？有不顧迂儒之毀譽，明目張胆以與十八妖魔宣戰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為之前驅！

（原載《新青年》2卷6號，1917年2月1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今日中国之政治問題

陈 独 秀

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为然。有人說，我輩青年，重在修养学識，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談甚么政治呢？有人說：本志曾宣言志在輔導青年，不議时政，現在何必談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話却都說錯了。我以为談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談的多半是政治中瑣碎行政問題，与我輩青年所談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場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之国民，一切政治問題，行政問題，都应该談談。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問題，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問題，往往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装聾推啞呢？

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种根本問題，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远紛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第一 当排斥武力政治

以理論言，单独武力，决不能建設现代的国家。以事实言，袁世凱張勳相继以武力政策，都归失敗；不但其自己失敗，国家也因之到了破产地位；倘有继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現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顧忌，尙复成何世界！此种武力政治倘不廢除，不但共和是个虛名，就是复辟立君也沒有办法；不但宪政不能实行，就是专制皇帝，

也沒有臉坐在金鑾殿上發號施令。所以我們中國要想政象清寧，當首先排斥武力政治，無論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勸他們把這有用的武力，用着對外，不許用着對內；必定這一層辦得到，然後才配開口說到什麼政治問題。否則將是無論北洋武人執政也好，西南武人執政也好，終久是個“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有什麼政治法律可談呢？（日本楠瀬中將說道：“中國目前最要者，與其謂為南北妥協，寧在改革督軍政治；若不改革，即聘百顧問，亦終難改善國政。”這話可算說得切中要害。）

第二 當拋棄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的思想

現在世界各國中，像德意志雖說是以普魯士為中心勢力統一聯邦，像日本雖說是以薩長軍閥為中心勢力統一三島，但是德意志各聯邦，也不是事事仰普魯士的鼻息；德日各政黨盤踞之國會，都有絕大的威權，也非普魯士及薩長軍人可以任意指揮，隨便破壞的；況且近年以來，普魯士及薩長軍閥的威權，也都有日漸收縮之勢了。試問我們中國那一黨人那一派人，配說有普魯士或薩長軍閥的助勞和實力呢？袁世凱以數十年的辛苦經營，尚且不能以一黨勢力統一國家；其餘各黨各派的内容，都是四分五裂，本身尚不能統一，如何當作統一全國的中心勢力呢？這種迷夢倘不打破，各派人都想拿自己之勢力來統一中國，而各派都統一不成；即使一時成功，也斷斷不能持久；互想統一，互奪政權，爭奪不休，必至外國人來統一而後已。所以我始終主張北洋國民進步三黨平分政權的辦法，又贊成一黨組織內閣的夢想。我們中國人無論何黨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讓敵黨執政的雅量，實在缺乏的很。老實說一句：一碗飯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獨吃，勢必大家爭奪，將飯碗打破，一個人也吃不成！

第三 當決定守舊或革新的國是

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的。這兩樣孰好孰歹，是另外一個問題，現在

不必議論；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計守旧，一切都應該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費金錢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學問。若是决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話来搗乱。譬如既然想改用立宪共和制度，就應該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的精神；什么大权政治，什么天神，什么圣王，都應該抛弃。若觉得神权君权为无上治术，那共和立宪，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間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針，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說，万万不足相信的。因为新旧兩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兩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样不成。中国目下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采唱尊君的孔教，夢想大权政治，反对民权；一方面設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唱非科学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說；一方面提唱西洋实验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丹田，靜坐，运气的卫生；我国民的神經顛倒錯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我敢說：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終久不可挽回！

国家現象，往往随學說为轉移。我們中国，已經被历代悖謬的學說敗坏得不成样子了。目下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暗云密布，也都有几种悖謬學說在那里作祟。慢說一班老腐敗了，就是头脑不清的青年，也往往为悖謬學說所惑；我所以放胆一言，以促我青年之猛醒！

（原載《新青年》，5卷1号。1918年7月15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只 眼

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这是逃不出的事实，人人都承认了。但是欧美方面，将来是如何改变，暂且不去論他。单讲我們东洋民族，对于世界这样的大变动应有何种觉悟，何种要求，才能够适应这样大变的潮流，共图人类的幸福呢？

鄙人以为我們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兩件大事。

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視顏色人种的偏見。

本年正月八日，美国威尔遜总统，在国会宣布的条件第十四条，就是确定約章，組織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又九月二十八日，自由公債开幕时，威总统演說“組織国际联合会基本問題”中，有几句道：“一国或数国之武力，得以自由操纵他国人民之命运乎？”“强国得任意凌辱弱国，而侵夺其人民之利益而为己国用乎？”“吾人当視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譯文全照蔣夢麟君所譯的《威尔遜参战演說》）

照威尔遜总统的說話，当然沒有人种的偏見。这回平和會議，我們东洋各国列席的委員，應該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視”的意見，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約，便自然从根消灭了。較之取消限制移民，取消領事裁判权，改正协約关税等，枝枝节节的提議，大方的多，扼要的多。此案若是不能通过，要想永久的平和，岂不是做夢嗎？天下事不平則鳴，恐怕大战爭

又在眼前。

對內的覺悟和要求，是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

用兵力侵略土地鎮壓人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縱然不說大同主義，不說弭兵主義，照德國戰敗的情形看起來，就算將來戰爭仍不能免，也不是軍國主義軍閥執政的國家能得最終勝利了。因為軍國主義的國家，人民出血汗負擔的賦稅，大部分用在海陸軍。一班在職的軍人，不能做工生產。海陸軍年年擴充起來，豈不要弄得民窮財盡嗎？況那班軍閥，無論如何賢良有功，他那種武斷政治，總是別種階級人民自由發展的障礙，終久要惹起社會的不平。這不就是德國戰敗的原因嗎？

至於那毫無知識，毫無功能，專門干預政治，破壞國法，馬賊式的惡巧式的軍閥，那弊病更是不消說的了。一國的教育實業倘能夠充分發達，就是勝利的根本，並不在乎要有多數常備兵。（美國就是榜樣）因為國民有了教育，海陸軍人可以臨時征集的。

戰時最要緊的是軍器和糧餉，這兩樣非有多數的科學家和實業家，如何辦得了呢？那一樣是軍人自家的本領呢？所以有人說，現代的戰爭，不是軍人戰爭，簡直是科學和經濟的戰爭。

照此看來，戰時還不能單倚仗着軍人，平時為什麼要養着這班無用而且害人的軍人，好叫那班軍閥們耀武揚威的拿勢力來欺壓平民呢？

現時東洋各國的當局，像中國的徐總統，像日本的原內閣，都從文人出身，總算是東洋和平的一綫光明，也就是東洋各國國民的真正親善種子。大家要明白東洋永久的和平，必須以國民的親善為基礎。因為國民的親善，才算真親善；有真親善，才有真和平。單單軍閥的親善，不但是假親善而且是破壞和平的種子。

此時要隄防的，正是他們軍閥在那里秘密親善，來干些鬼鬼祟祟的勾當。只要有一方面軍閥出頭推翻文治主義的當局，那時國民的親善，東洋的和平，便成画餅了。

（原載《每周評論》，第2號，1918年12月
29日出版。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①

陈 独 秀

本志經過三年，發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却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實在是慚愧得很；對於吾國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

社會上非難本志的人，約分二種：一是愛護本志的，一是反對本志的。第一種人對於本志的主張，原有幾分贊成；惟看見本志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認的廢物，便不必細說理由，措詞又未裝出紳士的腔調，恐怕本志因此在社会上減了信用。像這種反對，本志同人，是應該感謝他們的好意。

這第二種人對於本志的主張，是根本上立在反對的地位了。他們所非難本志的，无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

^① 原題為《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編者

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為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為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葉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却不肯發表意思和他辯駁，這又是什么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

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此時正是我們中國用德先生的意思廢了君主第八年的開始，所以我要寫出本志得罪社會的原由，布告天下。

（原載《新青年》，6卷1號，1919年1月15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我的國內和平意見

只 眼

（一）先決問題

國內政治問題，或者是希望根本解決，造成永久的和平。或者是希望用和平方法，調解目前的政局。這兩種的主張雖然不同，而放下戰爭的方法，用和平會議的方法來解決時局，算是全國一致了。

既然是全國一致贊成的和平會議，無論他組織的方法如何謬誤，在政治史上總是一樁大事。我很尊重他，又很希望他，所以在各種問題之外，提出這先決問題。因為這種問題若不首先決定，這和平會議便沒有成立的理由，和成功的價值。

第一先決問題，就是北方不要固執“中央威信觀念”，南方不要固執“單純的絕對的護法觀念”。在政治學辭典上，我們查不出“威”字的解說，這是不必討論的了。說起這“信”字，却是政府存在的重要條件。像那曾經政府公布的約法和他種法律，無論好歹，未經取消以前，都應該有效。又像那政府發出的紙幣，寫在紙面上是壹圓，收入的時候，也應該算壹圓。這才是政府的信用，應該保存的。如今那班督軍們，不聽政府命令，不守法律，自由行動。紙幣壹圓用出，五六角收入。中央威信已經掃地，單單的為議和平統一起見，對於南方的要求，就要拿中央威信來拒絕，這不是活見鬼嗎？再說到南方的護法主義，法律是國家存立的要素，那有反對護法道理。但護法不是單純抽象的理論，無論什么事都可以拿他當作帽子來加上壓人的。要說絕對護法，應該在具體的內容上，加以分析的實際的批評，才是道理。若是單用抽象的護法調頭，當作壓倒一切的萬能利器。那督軍團也時常拿“國法”“法律”來吓人，能算他們是護法

嗎？而且國家成立和發達的要素，法律之外，還有政治。法律以外的政治作用，固然是不宜輕試的危險物。法律以內的政治作用，却是不可輕視的。在新國家組織未備時代，占重要的位置。（我們不反對南京臨時約法，正是這個理由。）所以我勸南方護法諸公，不要拿抽象的護法招牌，來壓倒一切。要從具體的事實上，想想自己所做所為，有無再要他人來護法的地方。再想想除了法律問題以外，有無關係國家存亡的政治問題，比護法更加要緊？又再想想現在既不能達到“武力解決”的目的，那“政治解決”的方法，是否應當採用？所以以為南方對於“單純的絕對的護法觀念”，應有幾分覺悟。況且世上一切爭端，到了雙方都承認議和，便雙方都到了半降服的命運，雙面都默認了有讓步的條件。若是雙方都執要完全貫徹自己的主張，還是要武力解決，這和平會議便沒有成立的理由。

第二先決問題，就是此次和平會議，應當把解決國家的重要根本問題，造成比較的永久和平為目的。不應當專在兩方利害衝突的問題上着眼。兩方的代表，應當打破代表南北當局的觀念，應當發揮代表多數輿論的精神。若是因為發揮這種正大的精神，就是南方代表附和北方代表，北方代表附和南方代表，都不算失職。諸位代表先生們，若是把國家觀念拋在九霄雲外，把自己的身體和靈魂，都囚在“南北代表”四字以內，那一寸目光，轉來轉去，不離兩方當局的利害。（就是總統副總統巡閱使督軍善後軍費等）諸位中我雖有些朋友，也顧不得送上一個徽號，叫做“南北當局的差官”，不能算是和平會議的代表。這會議也只好叫做“分贓會議”不配說是“和平會議”，像這種分贓會議，在政治史上有絲毫價值嗎？

（二）廢督問題

廢督軍的辦法，無論本國人或外國人，除了和他飯碗有關係的朋友，可以說無人不贊成。我對於這個問題，不但是普通贊成，更是特別贊成。普通的贊成，不過把廢督看作軍制上行政上的問題。我却把廢督看作政治上國家存亡的重大問題，在一切政治法律問題

之上。因为督軍制度若不廢去，無論中央地方無論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談。試問袁世凱死后，約法国会不都恢复了嗎？后来怎么样呢？而且武人干涉政治，不但共和宪政不能实行，就是君主政治也不能成立。那唐代末年的藩鎮，不正是榜样嗎？

現在有一班拥护督軍的朋友，看見主張廢督的声势很大，面子上不好反对，便轉一个弯，假借那“軍民分治”的招牌来搪塞。大家要曉得“軍民分治”，乃是数年以来流行的政界一个极不通的名詞。要拿他来代替現在的督軍制度，正是拿半斤来换八兩了。这是什么緣故呢？

第一在理論上“軍治”二字不能成立。国家的海陆軍，都是为对外的国防而設。至于对内，非因特別事变发生，是不能时常使用的。所以軍人除了治軍以外，不治別的什么。那軍人除治軍以外还要治民的“軍治”制度，古今中外，只有三种。一是封建时代的国家，一是革命时代的临时組織，一是統治殖民地的制度。除这三种之外，“軍治”制度，万万沒有存在的理由和事实。現在的中国，当然不是封建时代。督軍制度，固然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产生物。但是現在革命时代已过，此种临时組織，当然是宪法时代所断然不容存在的了。至于現在欧美日本各国統治殖民地的制度，像那印度总督，香港总督，安南总督，爪哇总督，菲律宾总督，台湾总督，朝鮮总督等，固然都是“軍治”制度。但是他們这种制度，乃是战胜民族，对于被征服的殖民地的法子。我們若是采用这种制度，試問誰是战胜的民族？清室已經退位，难道在清朝做过官带过兵的，就是战胜的民族嗎？誰是被征服的民族？各省是誰的殖民地？我們被征服的小百姓固然程度不高，你們自居战胜的偉人闊老們，也要拿把鏡子，照照自己又是怎样一副嘴臉！

第二在事实上，“軍民分治”四字不能成立。地方行政，有了省长的民政，便无需督軍的軍治的，有了督軍的軍治，那省长的民政，便是軍治的附屬品，断然不能独立自主。試問現在各省的省长，有

一个不是受督軍指揮的秘书长政务厅长嗎？有一个算得是独立自主的行政长官嗎？省长既不能离开督軍，独立主办他的民治，这分治二字，是怎样說法呢？又有人說，若是实行督軍专管軍事，省长专管民事，这不是軍民分治嗎？我以为这也是似是而非的話。軍政长官若是专管軍事，不問地方上的民事，那只能叫做第几师的师长第几旅的旅长，断不能叫做某省的督軍。师旅长所管是不分省界对外的国防軍隊，省长所管是划分省界的民政，这两样本来性质大不相同，只可叫做軍民分“职”，不能叫做軍民分“治”。照以上的理論和事实，断然不能拿軍民分治的謬論，来保存这妨碍国家統一地方发展的督軍制度了。

又有人說，廢督的理由，固然充足。怎奈現在各督軍的勢力很大，事实上恐怕做不到。我以为却不尽然。这也可分为理論事实兩方面的討論。在理論上說起来，处置国事不像处置家事，應該大刀闊斧的，只問应做不应做，不問能做不能做。况且南北兩方的当局，若是沒有能力解决这个問題，还有臉爭着做 总統 做总 理 組織政府嗎？

全国的国民，若是沒有能力解决这个問題，还指望在世界上組織一个共和立宪的国家嗎？

在事实上說起来，南方各督軍，既然以护法自命，这种不合法治的制度，总應該不主張保存的了。北方各督軍像李純陈光远王占元鮑貴卿諸君，平时都很明白，总也能为大局牺牲个人的位置。至于安徽倪督軍陝西陈督軍湖南張督軍，他們錢也刮够了，恶也作滿了，借这机会回家享福，总算他們的运气好，也未必定要不到黃河心不死。况且这次取消督軍，是制度上的改革，不是同个人过不去，也未必就会激成变故。若是他們定要把持权利，不顧大局。我們国民也应出点血汗，救出这軍政統治之下被征服民族的地位。若是我們国民沒有自救的力量，就用最后手段来請外国干涉，也未始不可。因为这种出于国民自动外国好意的干涉，虽然失点虛面子，却受了实在的利益。若是恐怕損失主权，宁可容忍这妨害国家发达的

督軍存在，不情愿叫外国干涉。我断定将来兵日多，民日穷，政治越弄越糟，那实在的最大的损失主权之运命，（就是亡国）不久便要落在我們富于虛榮、爱国心的国民头上！

我希望和平會議，劈头第一件就提出这廢督問題。此事倘能办到，不但在政治史上开一新紀元，就是这次會議里不易解决的閩陝問題、各实力派地盘問題、罪魁問題、裁兵問題，都因此容易解决了。我更希望最賢明的云南唐督軍，江苏李督軍，出来极力提倡，以身作則，免得将来外国干涉，那就造福国家不淺啊！

廢督的問題倘能决定，还有和这問題相联，應該注意的事：

一是如今不是駐防时代，各省的巡閱使护軍使鎮守使，應該和督軍一同裁撤。北京的將軍府，没什么职权，若是为安插裁撤的督軍計，暂时存留倒未始不可。否則也要撤。

二是廢督后各省的軍隊，都應該改归中央政府的陸軍部直轄，按数目字的順序編定各师各旅的名称，万万不可分屬各省。像那振武軍安武軍毅軍榮字軍等特別名目，更当一概取消。至于那不能編入正式軍隊的兵，只好遣散。这时陸軍部的职权頗重，应当擇那党派彩色稍淡的人做总长，才不启各省各派軍人的猜疑。

三是廢督后的軍制，應該以师为单位，軍长軍司令部，多是战争中临时組織，平时无設置的必要。就是因为敷衍几个資望較高的軍人，不得不設立軍长。也只能按着数目字的次序，叫做第一軍第二軍等，直隶中央政府。万万不可合几个行政区域，划分軍区，設立軍区长。若是划分軍区設立軍区长，不叫做第几軍軍长。这便是恢复前清总督制度，这便是改每省一个小督軍为数省一个大督軍，这便是明白承认軍人对于地方有管轄区域，这更是增加軍人的大权，种下藩鎮割据的祸根。近几年“划分軍区”和“軍民分治”都是很流行的时髦名詞，其实都大錯而特錯。

四是师司令部或軍司令部，均不可設在省城及商埠。

五是各师旅的軍餉，通由陸軍部直接发給，不可向省长取用。

六是已裁的督軍不可改为省长。就是不得已改为省长，也不可

将他原有陆军改为警备队。倘用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廢督等于不廢。

七是交通部应当通飭各处电报局，以后除了紧急的軍事，凡是軍人发議論的通电，無論是非，一概不准傳達，我們新聞記者，就是見了这种电报，也不該登在报上替他們傳達。

（三）裁兵問題

照我們的理想，是反对战争，是完全去兵的主义。現在让一步說，就算战争一时仍不能免，兵是不能全去。但是中国此时的軍隊不但兵数太多軍費太大，我們国民担任不起。而且这全国无教育的兵队，那个配說是国防的正式軍隊，能够和外国打战呢？国民拿出无数的血汗錢，来养这不能打战、不能为国防，而且扰乱安宁秩序的軍隊，到是图什么呢？所以就地方安宁秩序說起来，就国民担負說起来，就国民生产力說起来，就整頓真正能为国防的軍隊說起来，都不能不將現有的軍隊全数裁去。至于正式的国防軍隊，只好日后另起炉灶、眼面前不必談起。但是裁兵的理由，人人都曉得的。至于裁兵的办法，我却有几条意見，現在說出来和大家討論討論。

一、全国兵队同时裁去，这是事实上断然做不到的事。如此必用分期裁減的方法。此时全国兵数約在百万内外。半年裁一次，一次裁十万，五年可以裁尽。

二、裁兵的次序，第一二期應該先裁此次南北开战以后新招的兵。像那国防軍振武新軍續招的軍，更是不用說的了。第三四期應該裁的就是未曾編成正式的軍隊，像那定武軍安武軍營字軍毅軍等是也。第五六要裁并的，乃是服装器械不完全的正式軍隊。第七八期就裁并那教育不完全的軍隊。最后就裁并那軍官們軍事教育不完全的軍隊。这时賸下的，或者可以加入新征募的編为正式陸軍。

三、五年期內应当在中央政府常設一裁兵委員會。南北派出人数相等的委員，協商兩方平均应裁的兵数，免得歧輕歧重，大家怀疑。

四、被裁的兵官，應該有相当的年俸。被裁的兵，應該有相当的遣散費。

五、移到边地开垦，开工厂令他們做工，送到外国做工，这些法子都比給費遣散好。

六、被裁的兵，万万不可改为警察或民团。

七、有地方自治会的議決，可以办民团，軍械調遣都由地方官监督。那省长和县知事的警备队，万万不可以存在。至于地方上的治安，小事有警察，大事有民团，再大的事有正式軍隊，用不着什么警备队。

八、全国的兵工厂，應該統归中央政府的陸軍部管理，不得分隶地方。

九、未裁的兵，都應該改归中央政府管轄，从新按照部章編制。不可分屬地方，加以某省的某师某旅某軍各种名目。

十、五年裁尽后，倘然仍有軍备的必要，那时精选有适当軍事学的軍官，从新創設常备陸軍，也不算迟。至于那兵的来路，我很贊成前清末年半征半募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并非是强迫兵役，而可以得曾受教育的兵士。至于兵数，最多不能出二十师。因为服装器械教育完全的軍隊，那費用比現在的告化子軍隊要多好几倍。二十师果然都是精兵，便和日本此时的兵力相等。至于对内，若是交通发达，便不必多养兵。

若是不能裁兵，不但国民的生計不了，这武人的特殊势力，更无法取消。这种特殊势力倘不能根本取消，去了袁世凱，又来了段祺瑞。去了段祺瑞，又来了陆荣廷。去了陆荣廷，以后还有无数的袁世凱段祺瑞陆荣廷，凭借这为虎作倀的丘八爷，造成特殊势力，来扰乱政治。若是抛弃輿論的潜势力，借重武人的特殊势力，無論違法护法都是对人問題，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共和宪政的根本障碍。

（四）国防軍問題

在表面上看起来，国防軍也是国内一种軍隊，应当裁去与否，

可以和他种军队一样，归在裁兵問題內一同討論。但是那里面复杂的情形，关系內政外交都十分重大。在和平會議，断不能不当作一个特別問題，提出来研究的。

在內政上說起来，全国的海陆軍，都是为国防用的，都应该归陆海軍部节制。現在的国防軍，单归一派人专利。而且不受陆軍部的节制，和从前段祺瑞所反对的袁世凱的模范团，是一模一样。像这种有特別权利的国防軍，不但南方不肯承认。就同是北洋的他种军队，也未必甘心容忍这种“只此一家并无分鋪”的办法。而且此次南北战争，固然因为护法。其所以造成护法战争的原因，乃是段祺瑞用武力破坏国法压迫南方的政策。現在段氏的政策既然不行，要让徐东海来用文治主义調和南北，以謀統一。那段氏当然要因为誤用政策，負責而去，不干預政权才对。若是用換湯不換藥的法子，由內閣一变而为参战处，再变而为国防軍，大权独攬，雄視北方，中央政权，隱为操纵。在南方看起来，未免和当初战争目的太不相合。若是照这样議和下来，恐怕国防的效力和南方人政治活动的生机，都仍旧放在断头台上。南北和平統一希望，难保不因此决裂。在北方看起来，陆軍部国防軍都在一系势力支配之下，不但別系的人不能安心，就是徐东海的政权，也恐怕朝不保夕。这都是国防軍若不取消，在內政上必然发生的恶果。

在外交上說起来，原来这国防軍，就是参战軍的改名。参战軍想受日本兵器兵費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軍事協定的約束。說起軍事協定，国民可为寒心。这件事原来是中日兩國軍閥野心的結托，假参战为名，一方是打算握大陆的兵权，一方是打算做国中的霸主。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苦的就是我們四万万被卖的人民。幸而欧战停止，参战軍未能扩充，兩国的軍閥，还没有十分如愿。然而这国防軍仍然是軍事協定的余毒，所以顧王兩使要宣布那軍事協定的秘密，兩國軍閥都慌做一团。試問若没有什么秘密不可告人的事，就是宣布又怕什么。这件事并不是我信口开河，請看本月初十的日本东京《朝日新聞》曾說道：

“中日間現存的秘密條約和秘密決定，倘經中國委員在巴黎媾和會議提出，這都是前內閣援段主義的余殃。中日親善上又筑一極大的溝渠，實在不勝遺憾。中國北京軍閥派段張倪徐等，不察世界大勢，還想提用前內閣時代所締結參戰借款的余額一千七百萬兩。此款曾用段徐兩氏個人名義，存在興業銀行。又想照兵器供給的契約，屢屢要求交付兵器。居間的田中陸軍大臣，很覺左右為難。……由參戰借款和兵器所編成的國防軍，實在就是倪嗣冲部下的苦力。現在世界大勢，漸漸平和。即西伯利亞方面，也都平靜。此時若養成他們一派的家兵，不但是南北和平的大障礙。即他們自身，也要內失國人的信用，外失列國政治家的同情，那結果一定不好。……日本曾聲明本諸和平主義，應當廢止中日軍事協約的參戰借款和兵器供給。這話在政府里面，漸見有力，不久當可照辦。無論他們如何要求，都要拒絕的。”

照這篇《朝日新聞》的論說看起來，國防軍和日本關係之深，大家就該明白了。這國防軍因為用了中日軍事協約的參戰借款和兵器，所以用人行政都不大自由。所以國防督辦處和經理局教練處，都不得不用許多日本人執那重要的職務。所以日本原內閣要停發興業銀行的存款給國防軍，田中陸軍大臣便極力反對。（見本月十五日《晨報》的東京通信。）有人說，中國的國防軍，簡直是日本參陸兩部的主張所，這話是何等可怕！我想一國的軍事重要機關，竟落在外人手里，無論何人不能說不算危險。若是列強照利益均等主義，都爭來干涉，那時成了國際問題，這外交又如何辦法呢？

這國防軍倘不取消，在內政上在外交上都是破壞和平的危險物。和平會議的南北代表諸君，如果真想為國民謀和平幸福，就應該竭力打消這破壞和平的危險物。我也知道這件事是兩國軍閥的結論，力量不小。不但代表諸君不敢得罪他們，就是兩國政府的當局，也都无可奈何。如此我們已有奉勸兩國的軍閥，看看世界大勢，不要太高興。若是定要兩國的國民起來根本解決，關到俄德兩國的

現狀，沒有你們什么好处。我們更要奉劝段氏，他本来是位老实很有人望的軍人，何苦始終为人利用，留下子孙万代誤国的恶名！

（五）国会問題

和平會議里的国会問題和宪法問題，都是法律問題。討論这等問題之先，要簡單說点我对于法律的見解。我虽不藐視法律，也断然不迷信法律。我觉得这組織复杂的人类社会，除了国家制度以外，有許多用不着法律的地方。就是国家制度之下，那法律的用处和好处固然很多。而法律黑幕底下所藏的罪恶，也不算少。但是就国家制度和作用或人类社会他种結合看起来，若是沒有法律来拘束人类行为的表面，那种爭乱狀況，恐其比現在法律底下所藏的罪恶还要可怕。所以我以为在社会里面，固然不能說法律万能。而社会的表面，却不能不尊重法律的假面。倘撕毁了这假面，我們利己損人的本性，更难以制止了。

假定这种見解，若不十分荒謬，这南北爭持的国会問題，便容易解决了。解决的方法，就是北方應該用法律改变法律，不可完全拿一方面的实事实，来破坏法律的假面。南方也應該只要保存法律的假面，不必完全拿一方面的理論，来束縛事实，造成破坏法律假面的时势。若是連法律的假面都不要，那便是专制，便是野蛮。若是以法律的假面为不足，定要死守刻板的法律，那便是司法界的法律，不是立法界和行政界的法律。兩方面倘然都有这种觉悟，那国会問題，不就容易解决了嗎？

新国会沒有法律的根据，当然不能存在。若用特殊势力改变法律叫他存在，那么甲种特殊势力可以改变法律，同时乙丙丁各种特殊势力都可以改变法律。今日特殊势力可以改变法律，异日連續无穷的特殊势力都可以改变法律。撕破法律假面的国家，当然有这种紊乱的政象。若想保法律的假面，若想免紊乱的政象，若想謀永久的和平，这新国会断然不能不牺牲的。因为民主国法律假面的作用，和君主国皇帝的假面一样，若撕去不用，便无法統一这用强力

相爭的政局。

旧国会虽被非法解散，其精神上的生命，依然存在。現在反对旧国会存在的，也有几种理由，分別評論如下：

最普遍流行的議論，是說按照法理，旧国会固然应当恢复。怎奈北派軍閥絕對不贊成，事实上如何能恢复呢？我以为就是抛弃法理单說事实也不能說旧国会絕對不可恢复。因为北派軍閥反对恢复国会固是事实，南派軍閥主張恢复国会也是事实。兩個事实相消，一方面的事实，便不能当做充足理由了。

其次的說国会一經解散，和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我以为非法解散与合法的解散不同。集合体的国会和有机体的生物不同。人死不可复生，因为自然界的生物沒有复生的可能性。国会虽解散，不能說人为的集合体沒有恢复的可能性。

又其次的說議員已滿法定期限，还要繼續补足那未能行使职权的日期，各国无此前例。我以为这种見解，对于众議員虽有点理由，对于最近改选三分之一的參議員，却是如何說法呢？

在消极方面看起来，这几种反对旧国会存在的理由，我都以为不大充足。但在积极方面，倘能够不撕破法律的假面，而可以消灭旧国会，我也未尝不贊成。現在再将各种处置旧国会的方法，分別評論如下：

主張最多最时髦的，就是新旧国会同时消灭，再用旧法召集新国会。我以为这話大大的不对。如今且不說照約法国会非法解散当然无效的話。現在不是革命开国时代可以先有政府后有国会，試問用旧法新招的时候，倘不撕破法律的假面，这召集国会的合法政府如何产生呢？

有人主張由和平會議修改国会組織法，然后由新法召集国会。这話更說远了。照这样办法，不但召集国会的政府无法产生，而且用非法机关变更法律，恐怕說不过去罢。

有人主張由和平會議承认一临时政府，由这临时政府用旧法召集新国会。我要請問和平會議这种特权，是何人所予？从何处得

来？若照这样撕破法律假面的办法，自然是容易解决。

又有人主張把新旧国会合并起来，选举总统制造宪法，然后再按宪法召集新国会。我以为这种主張，更是奇怪，在理論上新国会无法律的根据，且凭空增加議員額数，旧法便完全破坏。在事实上这两种国会議員，如何能合在一处行使职权呢？

又有人主張新国会不必解散，惟在旧議員中或旧議員外加选西南几省議員，就算正式国会。这仍是保存新国会的办法，虽然是比较現在各省議員的人数完全，而破坏法律假面的缺点，仍然如故。

以上各种主張都行不过去，除了由和平會議承认旧国会繼續存在，没有办法。因为旧国会在法律上本来存在，但只除去政治上不能行使职权的障碍，便能在中央政府自由集合，无須召集。我們并非爱惜旧国会，不过爱惜法律的假面，主張用法律改变法律，不贊成用非法手段，輕輕将他消灭，种下国家无穷的禍根罢了。

我們一方面固然希望反对旧国会的人，不要拿一方面的事实破坏法律假面。一方面也希望議員諸君，因为要保存法律的生命，不妨权且让事实的势力在法律假面底下活动。因此我以为旧国会固应当恢复。但是恢复之后，議員諸君也应该有几項公认的条件：

一、在广州續补的議員，不經過合法的手續，恐怕不能有效。

二、恢复后专办选举总统議决宪法二事，此外法律問題政治問題，都让下次国会討論。

三、总统問題，只好迁就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势力，不可用理論来改变已成的事实。

四、关于宪法上次爭論未決的問題，研究国民兩系，應該有互相让步的精神，好叫宪法早日成立。

五、參議院存廢問題，應該用法律改变法律的手段，由国会本身解决。原来兩院議員都从同一階級的人民中重复选出（欧洲和日本的兩院制，多半是貴族非貴族的區別。美洲上院是代表联邦。中国既非联邦，又无貴族，实无兩院之必要。或者參議院由有产階級选出，另用普通选举法，由无产階級选出众議員，倒是和緩社会革

命一种法子。但是这种制度，欧美各国尙未能行，中国人听了更要害怕，所以現在也不必提起。）所以參議院实沒有存在的必要。若由国会本身解决，改兩院制为一院制。轉瞬众院期滿，再据宪法召集新国会，那历年糾紛难解的国会問題，不就根本解决了嗎？

若不照我們这样主張，一方面定要撕破法律的假面，抵死不肯恢复旧国会。一方面不但要保存法律的假面，并且不承认法律假面底下的事实势力。漫說这都是办不到的事体，就是眼前勉强办到，成就了暂时的小和平，恐怕要酿成将来大不和平，請和平會議南北代表諸君十分注意！

（六）宪法問題

現在和平會議里所謂宪法問題，乃是制宪問題，不是討論宪法的內容。我們倘有絲毫尊重法律的觀念，前次宪法會議二讀会通过的宪法，当然有效，这制宪問題，本来不應該发生的。万分想不到我們只顧自己的主觀不顧法律客觀的中国人，对于大部分已成的宪法，忽然不算，竟提出另外制宪問題。

我第一請問的，就是全国公认的正式国会所組織的宪法會議二讀会所通过的宪法，有什么理由可以根本取消？若說有不滿人意的地方，你們要曉得世界上就再过一万万年，也沒有完全滿人意的事，何況我們幼稚时代的立法事业。若是因为不滿人意，就要根本取消，便永远沒有公布宪法的日子。况且你們所謂不滿人意的地方，尽可用合法的手續，一部分一部分的漸漸改造，也断沒有輕輕的将全案一笔勾消，另起炉灶的道理。为那几条无用的宪法，也不知關了多少閑气，才好容易通过了二讀会。如今又要廢掉从头再来一回，何以慰国民和友邦对于中华民国宪法成立的热望？

第二样要請問的，若廢去已成的基础，另由新国会制宪，这新国会的本身有沒有法律的根据？若在国会以外另創制宪机关，是否違法？

国会議宪的权柄，根据約法。非由国会用制宪的手續修改約

法，当然不能在国会以外另設制宪的机关。約法誠然不滿人意，他成立的手續誠然不完备。但是当时沒有第二个合法的立法机关，自从开国以来，又沒有第二种根本法。未經合法的手續修改以前，这約法当然完全有效。若随意說他无效，試問民国八年以来，根据約法所发生的对外条約对内法令有效无效呢？我想除了袁皇帝的余孽以外，沒有人能說約法无效的。約法既然有效，旧国会便无法解散，国会制宪的权柄，也无法取消。

有一班人主張宪法应当由国民自己制定，不能委之国会。因为国会有政党作用，他們議定的宪法，是合于多数党的意思，不合于全国国民的意思。这话却似是而非；試問国民制議，是国民直接行动呢？还是用代表的方法呢？若是主張国民直接行动，我却十分贊成，这种办法若当真实行起来，恐怕他們要吓死。若是仍旧选举代表来組織一个制宪机关，却仍免不掉政党作用，和国会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分別？

（选自《每周評論》，第7—11、18期，1919年2月2日
至4月20日出版）

立宪政治与政党

只 眼

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紀总算是个頂时髦的名詞，在二十世紀的人看起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無論在君主国民主国，都不能够将人民的信仰、集会、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权完全保住，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夺政权的武器。現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馬上都要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詞了，我們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飯要紧。

（选自《每周評論》，第25期，1919年6月8日出版）

实行民治的基础

陈 独 秀

“地方自治与同业联合两种小組織”

民治是什么？难道就是北京《民治日报》所说的民治？杜威博士分民治主义的原素为四种：

（一）政治的民治主义 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之类。

（二）民权的民治主义 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

（三）社会的民治主义 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階級，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

（四）生計的民治主义 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計，鏟平貧富的階級之类。

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經濟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漸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漸擴張，不但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無論政治，社会，道德，經濟，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間一切生活，几乎沒有一处不豎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所以杜威博士列举民治主义的原素，不限于政治一方面。

我們現在所盼望的实行民治，自然也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而且我个人的意思：觉得“社会生活向上”是我們的目的，政治，道德，經濟的进步，不过是达到这目的的各种工具；政治虽是重要的工具，

总不算得是目的；我敢說若要改良政治，別忘了政治是一种工具，別拿工具当目的，才可以改良出来适合我們目的的工具；我敢說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閑文。因此我們所主張的民治，是照着杜威博士所举的四种原素，把政治和社会經濟兩方面的民治主义，当做达到我們目的——社会生活向上——的兩大工具。

在这兩種工具当中，又是應該置重社会經濟方面的；我以为关于社会經濟的設施，应当占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会經濟的問題不解决，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經濟簡直是政治的基础。

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义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張，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至于他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釋，觉得还有点不彻底；我們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論，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說都是生活必須品；宪法我們也是要，代議制也不能尽廢；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議制表現民意”，恐怕我們生活必須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們所有。我們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釋：是由人民直接議定宪法，用宪法規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規定执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階級，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說：就是消极的不要被动的官治，积极的实行自动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

我們中国社会經濟的民治，自然还没有人十分注意；就是政治的民治，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政治的民治主义”这七个好看的字，大家至今看了还不大順眼。但是我决不因此灰心短气，因为有三个緣故：一是中国創造共和的岁月，比起欧美来还是太淺，陈年老病那有著手成春的道理。二是中国社会史上的現象，真算得与众不同；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除

了訴訟和納稅以外，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这种极放任不和政府生关系的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練，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嬰，养老，施診，施藥，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像这些各种联合，虽然和我們理想的民治隔得还远，却不能說中国人的民治制度，沒有历史上的基础。三是中国人工商业不进化和国家观念不发达，从坏的方面說起来，我們因此物质文明不进步，因此国民沒有一致团结力；从好的方面說起来，我們却因此沒有造成像欧洲那样的資產階級和軍国主义；而且自古以来，就有許行的“并耕”，孔子的“均无貧”种种高远理想；“限田”的討論，是我們历史上很熱鬧的問題；“自食其力”，是无人不知的格言；因此可以証明我們的国民性里面，确实含着許多社会經濟的民治主义的成分。我因为有这些理由，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經濟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短气，所以我不抱悲觀。

現在政象不佳，沒有实行民治主义的緣故，也有好几层：一是改建共和未久。二是我們从前把建設共和看得太容易，革命以前宣傳民治主义的工夫太做少了。三是共和軍全由軍人主动，一般国民自居在第三者地位。四是拥护共和的进步国民兩党人，都不懂得民治主义的真相，都以为政府万能，把全副精神用在宪法問題，国会問題，內閣問題，省制問題，全国的水利交通問題，至于民治的基础——人民的自治与联合——反无人来过問。五是少数提倡地方自治的人，虽不迷信中央政府，却仍旧迷信大規模的省自治和县自治，其实这种自治，只算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政府的分治，是划分行政区域和地方长官权限的問題，仍旧是官治，和民治的真正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截然是兩件事。我們現在要实行民治主义，首先要注重民治的坚实基础，必須把上面說的二，三，四，五，这几层毛病通同除去，多干实事，少出风头，把大偉人大政治家大政客大运动家大爱国者的架子收将起来，低下头在那小規模的极不威风的坚实的民治基础——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

治与联合——上做工夫；不然，无论北洋軍人执政也罢，西南軍人执政也罢，交通系得势也罢，北方的安福部得势也罢，南方的安福部（就是政学会）得势也罢，进步党的內閣也罢，国民党的內閣也罢，旧官僚的內閣也罢，我可以断定中国的民治，仍旧是北京《民治日报》的民治，不是杜威博士所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的民治。

我不是說不要宪法，不要国会，不要好內閣，不要好省制，不要改良全国的水利和交通；也不是反对省自治，县自治；我以为这些事业，必須建筑在民治的基础上，才会充分发展；大規模的民治制度，必須建筑在小組織的民治的基础上，才会实现；基础不坚固的建筑，像那沙上层楼，自然容易崩潰；沒有坚固基础的民治，即或表面上裝飾得如何堂皇，实质上毕竟是官治，是假民治，真正的民治决不会实现，各种事业也不会充分发展。

社会經濟的民治主义，那一国都还没有实行；政治的民治主义，英美兩國比較其余的国家，总算是发达的了。他們所以发达的由来，乃是經許多岁月，由許多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团体和各种同业联合，合攏起来，才能够發揮今天这样大規模的民治主义；好像一个生物体，不是一把散沙，也不是一块整物，乃无数細胞組織，器官組織，合攏起来，才能够成就全体的作用。他們的民治主义，不是由中央政府頒布一部宪法几条法令，就会馬上涌現出来的，乃是他們全体人民一小部分一小部分自己創造出来的。所以杜威博士在他《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說道：“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便造成一个小村，由許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許多邑成一州，再由許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又說道：“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历史上的进化是由一村一村联合起来的。美国的百姓是为找自由而来的，所以他們当初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組成联邦。”

我們現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經濟兩方面，是应当在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

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創造这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就是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这种联合自治的精神：就是要人人直接的，不是用代表間接的；是要实际去做公共生活需要的事务，不是挂起招牌就算完事。这种联合自治的形式：就是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兩種組織。

現在有許多人的心理，以为时局如此紛乱，政府那里顧得到地方自治的問題；而且地方自治的法案，还未經正式国会詳細規定出来，我們怎样着手？至于同业联合的組織法，政府国会都还未曾想到，更是无从組織。我想这种見解是大錯而特錯，是有兩個根本上的錯誤：第一个錯誤，是以为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都要政府提倡，才能够实现。我以为这种从上面提倡的自治联合，就是能够实现，也只是被动的官式的假民治，我們不要；我們所要的，是从底下創造发达起来的，人民自动的真民治。第二个錯誤，是以为法律能够产生事实，事实不能够产生法律。我的見解恰恰和他正相反对，我以为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社会上先有一种已成的事实，政府承认他的“当然”就是法律，学者說明他的“所以然”就是学說。一切法律和学說，大概都从已成的事实产生出来的。譬如英美兩国的自治制度，都是先由他們的人民創造出来这种事实，后来才由政府編成法典，学者演成学說；并不是先由政府頒布法典，学者創出学說，他們人民才去照办的。所以我觉得时局紛乱不紛乱，政府提倡不提倡，国会有沒有議決法案，都和我們人民組織地方自治同业联合不生关系。

我所說的同业联合，和那由店东組織的各业公所及欧洲古时同业协会(Guild)不同，和欧洲此时由工人組織的职工联合(旧譯工联Trade Union)及其他各种劳动組合也不同；因为此时中国工商界，像那上海天津汉口几个大工厂和各处鐵路矿山的督办总办，都是闊老官；当然不能和职工們平起平坐；其余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員，工界的老板伙計，地位都相差不远，純粹資本作用和劳力沒有发生显然的冲突以前，凡是亲身从事业务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

关于地方自治和同业联合的种种学说，制度，非常之多；至于详细的办法，一时更说不尽；我现在单只就中国社会状态的需要而且可以实行的，举出几条原则，免得失了直接的实际的精神，就会发生笼统，涣散，空洞，利用，盘踞，腐败，种种不可救药的老毛病。

最小范围的组织

乡间的地方自治，从一村一镇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一乡的自治；城市的地方自治，要按着街道马路或是警察的分区，分做许多小自治区域，先从这小区域着手，不可急急去办那城自治市自治。同业联合是要拿一个地方的一种职业做范围，譬如一个码头的水手，船户，搬运夫，一个矿山的矿工，一条铁路的职工，一个城市的学校教职员，新闻记者，律师，医生，木匠，瓦匠，车夫，轿夫，铁工，纺织工，漆工，裁缝，剃头匠，排印工人，邮差，脚夫等，各办各的同业联合；商业的店东管事和店员，在小城市里便归在一个联合，在大城市里，譬如上海地方，就按行业或马路分办各的同业联合；万万不可急于组织那笼统空洞的什么“工会”，广大无边的什么“上海商界联合会”什么“全国工人联合会”。凡是笼统空洞没有小组织做基础的大组织，等于没有组织；这种没有组织的大组织，消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多数人冷淡，涣散，放弃责任；积极方面的恶结果，就是造成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

人人都有直接议决权

这种小组织的地方团体和同业团体，人数都必然不多，团体内的成年男女，都可以到会直接议决事务，无须采用代表制度。若是一个团体的事务，各个分子都有直接参与的权利，他所生的效果：在消极方面，可以免得少数人利用，把持，腐败；在积极方面，可以养成多数人的组织能力，可以引起大家向公共的利害上着想，向公共的事业上尽力，可以免得大家冷淡旁观团体涣散。中国现在的地方自治办不好，就是因为大家让少数的绅董盘踞在那里作恶；同业

联合沒有好效果，就是因为現在各业公所的組織，只是店东管事独霸的机关，与多数的职工店員无涉。我所以主張小組組織，就是因为小組組織的人少，便于全体直接参与，一扫从前紳董，店东，工头，少数人把持的积弊，又可以磨練多数人办事的能力。若有人疑心多数的教育程度不够，还是用代表制度的好；我便拿杜威博士《美国之民治的发展》讲演上的話来回答：“民治主义何以好呢？因为他自身就是一种教育，就是教育的利器；叫人要知道政治的事不是大人先生的事，就是小百姓也都可以过問的。人民不問政事，便把政治的才能糟塌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民治政治叫人去投票，叫人知道对于政治有很大的責任，然后自然能养成一种政治人才；美国的浩雷斯曼說：‘我們的主張不是說人生下来就配干預政治，不过总要叫他配干預才是。’这就是民治主义的教育。从前美国的选举也有财产教育男女的限制，現在才把这些限制去了；去了限制之后，从沒听人說过那个人不会选举，可見得政治的才能是学得，不是生来的。”若有人疑心女子不便加入，我以为男女应该有同等权利的理论，姑且不提；单就事实上說，女子加入的坏处，我一时想不出；我却想出許多女子加入的好处，女子的和平，穩靜，精細，有秩序，顧名譽，富于同情心等，可以使团体凝結的性质，都比男子好；他們第一美点，就是不利用团体去夤緣官做。

执行董事不宜專权久任

执行团体議決事务的董事，由团体全員投票选举；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都不应当有教育财产男女地位的限制。董事的人数宜多，任期宜短，不能連任；每半年改选三分之一，滿期退任的次第，抽签預定。無論大会或是董事会，都只設临时主席，取合議制，不設会长总董。这都是防备少数人盘踞必不可缺的制度。

注重团体自身生活的实际需要

地方自治应该注重的是：教育（小学校及閱书报社），选举（国

会省县議會及城乡自治会)，道路，公共卫生；乡村的地方，加上积谷，水利，害虫，三件事。同业联合應該注重的是：教育（补习夜学，閱书报社，通俗讲演），儲蓄，公共卫生，相互救济（疾病，老，死，失业，等事），消費公社，职业介紹，公共娱乐，劳工待遇，等事。上海工业界現在有許多同业的联合会发生，我們十分欢迎；但是我們也有十分担心的兩個疑問：（一）是否仅仅为了外交的感触？还是另有团体本身生活上实际需要的觉悟？（二）是否店东管事們在那里包办？上海各馬路的商界联合会，頗和我主張的小組織相同；但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一）到会的會員都只有各店代表一百多人，不但不是全体，並沒有过半数。（二）这些代表恐怕多半是店东管事，沒有店員的分。（三）本身的組織和实际生活需要的問題，都沒有談起，請了許多事外的人来演說，发些救国裕商的空套議論，这是做什么！我盼望社会上理想高明的人，不要以为我所注重的实际生活需要討价过低，說我主張不彻底；我相信照中国現社会的狀況，只有这种小組織，注重这种实际生活的需要，乃是民治主义坚实的基础，乃是政治經濟彻底改造必經的門路。我盼望官場中神經过敏的人，不要提起地方自治，馬上就联想到破坏統一；不要提起同业联合，馬上就联想到社会革命。我主張的这种小組織，实在平易可行，实在是共和国家政治經濟的实际需要，实在說不上什么破坏統一，什么社会革命；这种小組織的地方自治，固然和你們政权无涉，于你們官兴多碍；就是这种小組織的同业联合，所注重的实际需要，也都是在現社会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动，并非什么过激的办法；不但比不上法国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m)那样彻底，就是比英国的工联(Trade Union)还要和平簡陋得多。

断絕軍人官僚政客的关系

軍人，官僚，政客，是中国的三害，无论北洋軍人，老官僚，新官僚，旧交通系，新交通系，安福系，己未系，政学系，可以总批他“明搶暗夺誤国殃民”八个大字；一定要說那个好那个歹，都是一偏之

見，缺少閱歷。自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中國一線光明的希望，就是許多明有良心的人，想衝出這三害的重圍，另造一種新世界；這新世界的指南針，就是喚醒老百姓，都提起腳來同走“實行民治”這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的基礎上最後要留意的，就是別讓三害鬼混進來，伸出他背上的那只骯髒黑手，把我們的一線光明遮住了。蠅營狗苟的新官僚（就是政客先生），慣會看風頭，乘機竊取起來，更是眼明腿快，我們要格外嚴防，別讓他利用我們潔白的勞動工人和青年學生，來辦什麼政黨什麼勞動黨，做他當總長的敲門磚；最好是各種小組織的事務所，都貼上“小心扒竊”，好叫大眾留神。我所主張小組織，固然重在民治要有堅實的基礎，也是故意擺出矮戶低簷的景象，好叫這班闊人恐怕碰壞了紗帽翅，不來光顧才好。

* * *

這篇文章剛做好寄到上海付印，就看見張東蓀先生新做的《頭目制度與包辦制度的打破》那篇文章，（見《解放與改造》的一卷五號）說得很透徹，可以補我這篇文章的遺漏，讀者務必要參看。我所主張的小組織好叫人人有直接參與權，似乎是打破一切寡頭制度（頭目包辦制度自然包含在內）的根本方法；這種思想倘然能夠成為事實，成為習慣，不但現在經濟方面的惡制度可以掃除，就是將來較大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大組織，自然也不會有寡頭專制的事發生，真民治主義才會實現。我所主張的同業聯合，也含着有“兩元的社會組織”的性質。但是我心中所想的未必和《聯合會日刊》所說的盡同，而且我不願意採用“兩元”的名詞；因為本來我們所痛苦的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分裂生活，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我們渴望純粹資本作用——離開勞力的資本作用——漸漸消滅，不至於造成階級爭鬥；怎奈我們現在所處的不結合而分裂的——勞資，國界，男女，等——社會，不慈善而爭鬥的人心，天天正在那里惡作劇。（現在美國勞資兩元組織的產業公議，就是一個例。）我心中所想說的話，不願說出，恐怕有人誤作調和政策，為一方面所利用，失了我的本意。此話說來太

长,而且不是本篇的論旨,改日再談罢。

(原載《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独 秀

俄国Lenin一派的Bolsheviki的由来，乃是从前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在瑞典都城Stockholm开秘密会议的时候，因为要不要和Bourgeoisie（工商社会）谋妥协的问题，党中分为两派，Lenin一班人不主张妥协的竟占了多数，因此叫做Bolsheviki，英文叫做major group（多数派），乃是对于少数派（英文叫做 lesser group）Mensheviki的名称，并非是什么过激不过激的意思。日本人硬叫Bolsheviki做过激派，和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他，都是说他扰乱世界和平；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暂且不去论他；痛恨Bolsheviki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利权，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我们暂且也不去论他；那第一叫我们觉悟叫我们注意的有两件事：（一）反对Bolsheviki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蒙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二）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主张，和Bolsheviki相同，都是马克思派，都想建设劳农政府。）的德国的现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又在那里讨论扩充海軍預算等。扰乱世界和平，自然是极大的罪恶，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换一方面说：Bolshevikism的内容，和他们如果得志思想上有无变迁，能不能叫世界和平，固然没有人能够断定；但是现在反对他们的人，还仍旧抱着军国侵略主义，去不掉个人的一阶级的一国家的利己思想，（日本压迫朝鲜，想强占青岛的土地和山东的经济利权，就是一个显例。）如何能够造成世界和平呢？

（选自《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出版）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 独 秀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现在在我们社会里很流行；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倘然不明白他的内容，会不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这都是我们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的事呵！

要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

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我们要改去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现在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各国政治

家資本家固然利用科学做了許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本身底罪恶；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們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險。哲学虽不是抄集各种科学結果所能成的东西，但是不用科学的方法下手研究、說明的哲学，不知道是什么一种怪物！杜威博士在北京現在演讲底《現代的三个哲学家》：一个是美国詹姆士，一个是法国柏格森，一个是英国罗素，都是代表現代思想的哲学家，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設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設在数学上面，沒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用思想的时候，守科学方法才是思想，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詩人底想像或愚人底妄想，想像、妄想和思想大不相同。哲学是关于思想的學問，离开科学談哲学，所以現在有一班青年，把周秦諸子，儒佛耶回，康德黑格儿橫拉在一起說一陣昏話，便自命为哲学大家，这不是怪物是什么？西洋文化我們固然不能滿意，但是东方文化我們更是領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們但有一毫一忽羞惡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許有几位別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傾向他；也許有些圓通的人拿这話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們只听得懂这些話；也許有些人故意这样說来迎合一般朽人底心理；但是主張新文化运动底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囁語所誤。“科学无用了”“西洋人傾向东方文化了”这两个妄想倘然合在一处，是新文化运动一个很大的危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沒有他。人类底行为动作，完全是因为外部的刺激，内部发生反应。有时外部虽有刺激，内部究竟反应不反应，反应取什么方法，知識固然可以居間指导，真正反应进行底司令，最大的部分还是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利导本能上的感情冲动，叫他濃厚、摯真、高尚，知識上的理性，德义都不及美术音乐宗教底力量大。知識和本能倘不相并发达，不能算人間性完全发达。所以詹姆士不反对宗教，凡是在社会上有实际需要的实际主义者都不应反对。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們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較好的宗教来供給这需要，来

代替那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羅素也不反對宗教，他預言將來須有一新宗教。我以為新宗教沒有堅固的起信基礎，除去舊宗教底傳說的附會的非科學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有人嫌宗教是他力；請問擴充我們知識底學說，利導我們情感底美術、音樂，那一樣免了他力？又有人以為宗教只有相對價值，沒有絕對的價值，請問世界上什麼東西有絕對價值？現在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人，既不注意美術、音樂，又要反對宗教，不知道要把人類生活弄成一種什麼機械的狀況，這是完全不曾了解我們生活活動的本源，這是一樁大錯，我就是首先認錯的一個人。

我們不滿意於舊道德，是因為孝弟底範圍太狹了。說什麼愛有等差，施及親始，未免太猾頭了。就是達到他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的理想世界，那時社會的紛爭恐怕更加利害；所以現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擴充到全社會的友愛。現在有一班青年却誤解了這個意思，他並沒有將愛情擴充到社會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幟，拋棄了他的慈愛的，可憐的老母；這種人豈不是誤解了新文化運動的意思？因為新文化運動是主張教人把愛情擴充，不主張教人把愛情縮小。

通俗易解是新文學底一種要素，不是全體要素。現在歡迎白話文的人，大半只因為他通俗易解；主張白話文的人，也有許多只注意通俗易解。文學、美術、音樂，都是人類最高心情底表現，白話文若是只以通俗易解為止境，不注意文學的價值，那便只能算是通俗文，不配說是新文學，這也是新文化運動中一件容易誤解的事。

歐美各國學校里、社會里、家庭里，充滿了美術和音樂底趣味，自不待言；就是日本社會及個人的音樂、美術及各種運動、娛樂，也不像我們中國人底生活這樣乾燥無味。有人反對婦女進廟燒香，青年人逛新世界，我却不以為然；因為他們去燒香去逛新世界，總比打麻雀好。吳稚暉先生說：“中國有三大勢力，一是孔夫子，一是關老爺，一是麻先生。”我以為麻先生底勢力比孔關兩位還大，不但信仰他的人比信仰孔關的人多，而且是真心信仰，不像信仰孔關還多

半是裝飾門面。平时长幼尊卑男女底界限很严，只有麻先生底力量可以叫他們鬼混做一团。

他們如此信仰这位麻先生虽然是邪气，我也不反对；因为他們去打麻雀，还比吸鴉片烟好一点。鴉片烟、麻雀牌何以有这般力量叫我們墮落到現時的地步？这不是偶然的事，不是一个简单的容易解决的問題，不是空言劝止人不要吸烟打牌可以有效的。那吸烟打牌的人，也有他們的一面理由；因为我們中国人社会及家庭的音乐、美术及各种运动娱乐一样沒有，若不去吸烟打牌，资本家岂不要閑死，劳动者岂不要悶死？所以有人反对郑曼陀底时女画，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新年里店家打十番鑼鼓，我以为可以不必；有人反对大舞台、天蟾舞台底皮簧戏曲，我以为也可以不必。表現人类最高心情底美术、音乐，到了郑曼陀底时女画、十番鑼鼓、皮簧戏曲这部田地，我們固然應該为西洋人也要来傾向的东方文化一哭；但是倘若并这几样也沒有，我們民族的文化里連美术、音乐底种子都絕了，岂不更加可悲！所以蔡子民先生曾說道：“新文化运动莫忘了美育”。前几天我的朋友張申甫給我的一封信里也說道：“宗教本是发宣人类的不可說的最高的情感（罗素謂之“精神” Spirit）的，将来恐怕非有一种新宗教不可。但美术也是发宣人类最高的情感的（罗丹說：“美是人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之表示，美术就是寻求这个美的。”，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宗教是偏于本能的，美术是偏于知識的，所以美术可以代宗教，而合于近代的心理。現在中国沒有美术真不得了，这才真是最致命的伤。社会沒有美术，所以社会是干枯的；种种东西都沒有美术的趣味，所以种种东西都是干枯的；又何从引起人的最高情感？中国这个地方若缺知識，还可以向西方去借；但若缺美术，那便非由这个地方的人自己創造不可。”

关于各种新文化运动中底誤解及缺点，上面已略略說过；另外还有應該注意的三件事：

一、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团体的活动。美公使說中国人沒有組織力，我以为缺乏公共心才沒有組織力。忌妬独占的私欲心，人类都

差不多，西洋人不比中国人特別好些；但是因為他們有維持團體的公共心牽制，所以才有点組織能力，不像中国人这样渙散。中国人最缺乏公共心，純然是私欲心用事，所以遍政界、商界、工界、學界、沒有十人以上不衝突、三五年不渙散的團體。最近學生運動里也發生了無數的內訌，和南北各派政爭遙遙相映。新文化運動倘然不能發揮公共心，不能組織團體的活動，不能造成新集合力，終久是一場失敗，或是效力極小。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共心，全是因為家族主義太發達的緣故。有人說是個人主義妨礙了公共心，這却不對。半聾半瞎的八十衰翁，還要拼着老命做官發財，買田置地，簡直是替兒孫做牛馬，個人主義決不是這樣。那賣國貪贓的民賊，也不盡為自己的享樂，有許多竟是省吃儉用的守財奴。所以我以為戕賊中国人公共心的不是個人主義，中国人底個人權利和社會公益，都做了家庭底犧牲品。“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兩句話描寫中国人家庭主義獨盛沒有絲毫公共心，真算十足了。

二、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於舊文化不滿足，對於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於東方文化不滿足，對於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余地。我們儘可前無古人，却不可後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三、新文化運動要影響到別的运动上面。新文化運動影響到軍事上，最好能令戰爭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運動底朋友不是敵人。新文化運動影響到產業上，應該令勞動者覺悟他們自己的地位，令資本家要把勞動者當做同類的“人”看待，不要當做機器、牛馬、奴隸看待。新文化運動影響到政治上，是要創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現實政治底羈絆。譬如中國底現實政治，什麼護法，什麼統一，都是一班沒有飯吃的無聊政客在那里造謠生事，和人民生活，政治理想都無關係，不過是各派的政客拥着各派的軍人爭權奪利，好像狗爭骨頭一般罷了。他們的爭奪是狗的运动。新文化運動是人

的运动；我們只應該拿人的运动来轟散那狗的运动，不應該拋弃我們人的运动去加入他們狗的运动！

（选自《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出版）

馬尔塞斯人口論与中国人口問題

陈 独 秀

(一)

我向来有两种信念：一是相信进化无穹期，古往今来只有在一定时代是补偏救弊的賢哲，時間上沒有“万世师表”的圣人，也沒有“推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一是相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只有一方面的真理，对于社会各有一种救济的学說，空間上沒有包医百病的良方。我对于馬尔塞斯的人口論，就是这种見解，不但馬尔塞斯的人口論是这样，就是近代别的著名学說，像达尔文自然淘汰說，弥尔自由論，布魯东私有财产論，馬克斯唯物史觀，克魯泡特金互助論，也都是这样。除了牽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沒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說这三件东西。在鼓吹一种理想实际运动的时候，这种妄想，迷信，自然很有力量，价值；但是在我們学术思想进步上，在我們討論社会問題上，却有很大的障碍。这本是我个人的一种愚見，是由种种事实上所得一种归納的論断，并且想用这种論断演繹到評判各种学說，研究各种問題的态度上去。

(二)

馬尔塞斯人口論的內容，简单总括起来，就是：(1)自然界一切生物(人类也包含在內)底增殖，常有超过食物范围以上的傾向。(2)这种不断的傾向底結果，生物常苦于食物不足，自然界所以发生种种悲慘，人类社会底貧困罪恶不能絕迹也就为了这个緣故。(3)因此人类社会要想断絕这个禍根，凡是沒有贍养家屬資力的

人，不得不遏制性欲，守独身主义，来防止人口过多的自然力。

后来新馬尔塞斯派，对于前列的(2)(3)兩項大加修正。这修正派的人，以为人类底貧困和罪恶，不仅是人口过多的結果；社会組織的缺陷，的确也是一种原因。他們又以为拿制欲和独身主义来限制人口，未免太酷，不如实行預防受胎的法子；因为預防受胎比制欲合乎自然，而且不損身体底健康。

后来無論贊成馬尔塞斯底学說或是反对的人，对于修正派底意見，反对的却少得多了。但是他們对于馬尔塞斯底(2)(3)兩項意見，虽然加了多少修正，却对于他的根本学說，还是不曾动摇。因为馬尔塞斯主張底大前提，是在前列的(1)項，馬尔塞斯得了永久不朽的大名，迷信他的学說当做万古不动的一大真理，也就在(1)項；因此人口論底研究，便不得不集中于(1)項了。

(三)

人口底增殖率，果然是照馬尔塞斯底推算，每二十五年必定增加一倍嗎？

生物底生殖力，自然都很偉大，即以一切动物中生殖力最低的象而論，他一生百年間，平均生殖六子，这六子果然都能生存蕃殖，从最初的一对夫妇起，經過七百四五十年，应有一千九百万匹子孙；生殖力最高的微生物，有几种一晝夜可以生殖一万倍以上。若照馬尔塞斯底主張，单就生物生殖力底理論，便可以推断生物在事实上計年增加底倍数，那么单是生殖力最低的象一項，也已經充滿地球了。

生物底生殖力和蕃殖力，本来不是一件事；人类也和他种生物一样，事实上蕃殖增加底倍数，决不能拿理論上的生殖力用数学式来武断推算的。人类底生殖力固然偉大，克魯泡特金所謂自然的破坏力(寒冷，大雪，暴风雨，旱灾，水灾等)，亦复偉大，战争的，瘟疫的破坏力更是不用說的了。据中国底历史，三千年間，人口增加不过二十倍；再加上調查不精密，国土古今广狹不同，合并异族的人

口增加等原因，实际增加当然还没有二十倍，可见马尔塞斯底人口增殖率，未免离事实太远了。在馬氏他自己也知道在历史的事实上因有自然的限制，人口增加率不是这样快，所以他说：“人口若 unlimited，是按几何的比例增加。”（《人口論》第一版十一十四頁）后来迷信馬氏学說的人，只注意下半句，忘記了上半句，因此比馬尔塞斯更要武断一点。

在馬氏著书之时，机器初兴，失业的人多，一时现出人口过剩的假象；馬氏不在这多人失业上研究救济方法，却想用限制人口来根本解决，已經和石条压平駝背的法子同样可笑；自从他死后一直到現今，欧洲大陆各国，不但没有人口过多的现象，而且都有人口不足的恐慌，这真是馬氏警告，豫言当时所想不到的了。如今大战后更是不用說的了，就在战前，即以法德两国而論，如何使人口增加，不是两国几十年来政治家和学者苦心研究的问题嗎？法国因为人口减少，Bertillon 有三百年后降为三等国，五百年后种族灭亡的警告。“法国人口增加奖励协会”（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曾提出奖励人口增加議案十二条。議會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議案。德国自从一九〇〇年以来，产儿力非常低減，因此国論沸腾，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书多至二百十六种；Juliuswolf教授等所組織的“德国人口政策学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Bevölkerungspolitik），他們的政策：（1）产儿底限制；（2）产儿底障碍，如花柳病豫防，女工保护，产妇保护等；（3）保护現生的小儿。此等现象，岂不正和馬尔塞斯底警告，豫言相反嗎？

（四）

生物底增殖，果然和食物底增殖不能保平均的速度嗎？文化进步的社会，果然不能按照人口增殖，速度，扩张食物底范围，增加食物增殖底速度嗎？

多数的生物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另一方面又是食物底供

給者；倘这种生物，自己吃别的生物而生存，同时别的生物又吃他而生存；因此可以说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同时也就是食物底增殖速度增加。例如猛类魚吃普通魚而生存，普通魚吃小魚及甲壳虫而生存，他們在一方面是食物底需求者，同时在他方面不又是食物底供給者嗎？

即以最进步的人类而論，一方面吃别的生物而生存，一方面也算是别的生物底食物，像那最大的猛兽和最小的微菌，不都是吃人的生物嗎？前一項現在或者可以说漸漸减少，后一項無論医学卫生如何进步，将来能否絕迹，还是一个疑問。

人类底人口递增固然是事实，食物随着递增也不是空想。在文化进化的社会，除了宗教上，私有财产上，非生活品的工业上等障碍；又加上科学底发达和生产技术底进步，那时食物增加底速度，恐怕不是现在时代的人想像得到的，何以能断定他只能照算术的比例增加呢？

人口增殖率当然不能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供給人类吃的生物，他們的生殖力，每二十五年却可以增加数十倍或数百倍。倘用科学来选择，培养，和人力保护，不叫别的生物侵占，增殖底速度更要大大的无限增加。例如有許多我們現在不吃的生物，若是利用科学来选择，消毒，我們食物底范围便自然扩张了；我們現在所吃的生物，若是用科学来培养和人力来保护：像养魚隔离法，（产卵期內和他魚隔离，防止卵为他魚所吃。）农业上蚕业上驅除害虫法，家畜防疫法，牧场防兽法，都严密实行起来，食物增殖底速度，自然沒有不意外增加底道理。

私有财产廢止的好处：（1）社会資本在真能集中；（2）全社会資本完全用在生产方面，不会停滯；（3）人人都有劳动生产底机会；（4）可以节省用在拥护私有财产（国内，国际，）大部分的劳力資本，到生活品的生产事业上去。在这时候，自然可以实现“无曠土无游民”的理想，再加上农业化学天天进步，农产物增加底速度，自然非常偉大了。

姑且让一步說，这都是未来的空想；就以現在的經濟制度，現代的科学程度而論，自从馬尔塞斯死后現在八十五年間，因为資本集中，机器广行，交通发达，殖民地开拓这四个緣故，欧洲經濟狀況生了絕大的变化，和馬尔塞斯时代迥不相同；一方面农产物輸入多量，毫沒有收获漸减底恐慌；一方面工业物却有收获漸增底效果，生产过剩底恐慌，居然成了經濟学上一个原則。因为有生产过剩的恐慌，所以他們寻找銷場的希望比寻找殖民地的希望，更要热烈得万倍。他們用极强大的海陆軍保护殖民地还不过是一种手段，扩充銷場，拥护商业，才真是他們的根本目的。所以近代的国际战争，往往拿出极大的牺牲，所爭得的并不是一块土地，不过是几項有利的通商条約。

再让一步說，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資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結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話固然不錯，但無論分配如何不均，也必定在勉强維持社会生存以上，資本家才能够拿过剩的名义輸出国外；像現在俄奧兩國产业界底情况，無論有如何大力的資本家，也不能够把維持国内底生存尚嫌不足的生产物，用过剩的名义輸出国外。在一种生产过剩急找銷場的国家，若是沒有資本私有制度，平均分配起来，当然有維持生存以上的余裕了。因此就是这种非实际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可以証明社会上貧困的現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証明馬尔塞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論，确有不驗的地方，不驗的时代。况且棉紗，米谷，更是生活品中第一不可少的东西，决沒有絕對不足还可以輸出的道理，近代中国日本美国人口都非常增加，而棉紗，米谷，反是大宗輸出品，这岂不正和馬尔塞斯底預料相反嗎？

(五)

科学发达，生产技术也进步，人类食物底范围，自然有无限扩大底可能性；但是对于土地这一层，有一以为土地底丰腴力有一定

的限度，因此对于这一定丰度的土地上所加劳动底生产力，也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这就叫做“收获递减法则”。这种法则都是马尔塞斯人口论底一个有力的帮助，因为这个法则若是真理，在人类食物范围扩大上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法则就是说：一块土地底收获分量，决不能随劳力分量比例增加。例如第一年十人耕种一块土地，有百分的收获；第二年加十人耕种，收获分量虽有增加，决不能照人数增加的比例增加一倍。照人数比起来，反有劳力递加收获递减的现象，如下表：

	一年度	二年度	三年度	四年度	五年度
劳力人数	10	20	30	40	50
收获总量	100	180	240	280	300
最后增加的劳力所收获	80	60	40	20	

第一，我們要曉得我們的食物不全靠农产物；第二，我們要曉得化学发达可以人工增加不須耕种的食物；第三，我們要曉得将来农业化学发达，收获底增加还可以在人数增加的比例以上；第四，我們要曉得此时地球上未开垦的荒地还多得很，假定收获递减法则是真理，人口有加无减也是事实，这种真人滿的恐慌，也不知道在多少年以后；若是把眼前的社会問題放下不理，預先忧虑那多少年以后的事；那么，有人說地球将来也要毀坏的，我們应该怎么預防呢？

(六)

有人把經濟思想分为二大系統：一是富底哲学，說明富底性质及原因；一是貧底哲学，說明貧底性质及原因；斯密亞丹屬於前者，馬爾塞斯屬於后者。人类底貧困不单是食物一样，乃是衣，食，住，知識，娱乐，一切等等不足者对于足者比較的现象。不但沒有衣食住是貧困，吃素菜的比吃肉的是貧困，着布衣的比着綢緞的是貧困，住茅屋的比住大屋的是貧困，着短衣的比着长衣外套的是貧困，沒有鐘表用的比有鐘表用的是貧困，步行的比坐馬車汽車的是

貧困，无錢結婚的比妻妾成群的是貧困，无力量讀書的比学者是貧困，倘在均产社会里，权利均等，机会均等，沒有足不足底比較，个人貧困底現象便不会发生了。个人比較的貧底現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資料，大部分是因为財產私有分配不均，一階級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階級人底不足；若拿有余补不足，岂不立刻成人“均无貧”的社会嗎？到了均产社会时代，若公共觉得生活資料不足，那时才可以拿人口过剩算貧底一种原因，也不是全原因；因为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勞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也都是造成生活資料不足底一种原因。馬尔塞斯說明貧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經不大周到了；他說明貧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勞力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貧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他这种貧底哲学，恐怕还不及斯密亚丹富底哲学稍有根据。

馬氏生在盛唱均产人权的时代，不肯盲从时論，对于Godwin及Condorcet加以有系統的攻击，我們不能不佩服他有胆識。发明了貧底一种原因，——即人口过剩——我們不能不承认他在社会經濟学上有很大的貢獻。但是他过于偏重他发明的这一种原因，和別的发明家持論家陷于同样的偏見。不但如此，假令人口过剩是造成貧困的唯一原因，此外沒有別的原因，非限制人口不能救济，也沒有理由專門要限制下层貧民，上流富裕階級就有孳生的权利，他們的这权利是从那里来的？又何至主張貧民沒有生存权，又何至說沒有父母財產的人沒有吃飯的权利，好比宴会里未請的宾客沒有入座的权利一样呢？（《人口論》第二版五三一頁）Place說馬尔塞斯否決无事的窮人有吃飯的权利，却許无事的富人有权这种权利。像馬氏这种掩护資本家底偏見，不免要发生学者良心問題。

貧民多子，自然是社会上一种悲慘的現象，我們應該設法救济的；但是救济的方法，不能够像限制人口那样簡單。第一要問貧民是怎么會貧的？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罪恶？第二要問貧民底子女何以沒有公共教育底机关，是不是社会制度底缺点？若丟开这两个問

題，專門限制貧民人口，这种劫貧济富的办法，就不說什么生存权和人道主义，社会上必招兩項实际的損失：(1)貧民底子孙中往往有許多偉大的人物，倘限制貧民多子，社会上岂不是要受絕大的損失么？(2)富人底子弟多游惰，貧民底子弟多勤劳，倘專門限制貧民多子，社会上游惰的分子漸漸增加，勤劳的分子漸漸減少，岂不是可怕的么？

优种論虽有点和个人自由，人权平等冲突，比人口論似乎还好些。因为优种論所要淘汰的，在他的观察总是社会上恶劣分子，还没有貧富底分別。

(七)

說到中国人口問題，有一班糊涂人常常以我們中国人口众多自豪，实在是夢話。第一，我們要曉得我們中国一百万人口左右的都市，不过上海武汉(合武昌汉口汉阳而言)广州北京四处，拿人口和土地比例起来，是不是人口众多，还是一个問題。第二，我們要曉得无知識无能力无职业游惰偷生的人口越多，社会越发不得了，单是人多不一定就可以自豪。单是我們人口数目比別国多不算是真人多，必須我們人口和土地的比例比別国多，才真是人口众多。单是人口众多也不能自豪，必須是有知識和生产能力强的人多，才可以自豪。

但是中国人口問題，也不是馬尔塞斯底学說可以解决的。中国不生产而消費的人过多，人口增加似乎是超过了生活資料之上，这也是到处发生生活困难底一种原因，但这种原因，不是专靠限制人口可以解决的，因为中国人口过多底現象，不是和土地比例的人口过多，乃是不生产而消費的游惰人口过多；生活資料不足，不是生活資料增加底可能性赶不上人口增加，是增加生活資料底方法赶不上人口增加。照現在增加生活資料底方法和“游惰神圣”的社会制度，若不改造，就照現在的人口减去一半，恐怕仍然免不掉貧困的現象。若依馬尔塞斯底主張專門限制下层階級，不承认貧民有生

存权；那么，中国式的上流阶级——即富贵游惰分子——渐渐增加，贫苦的劳动的生产分子渐渐减少，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一种什么社会？

所以我主张要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应该并行下列的几个方法：

(1)发展生产事业 劳动方面，大都市底工厂里，每天工值两三角做十二点钟的工，大家还惟恐谋不到手；人口稠密的农村里，因为租地竞争，地主除收租外还有种种不法的需索，佃户终年辛苦还不能饱暖；农家底帮工，每年工价不过十余元；这都是人口过多，工价过低到这样地步。但是我们中国不但矿业，工业，交通事业，都还有无穹的发展；就是已经发达的农业，不但东北西北底边地，就是内地各省底荒地荒山也不知有多少；拿这一样就可消纳无穹的人口。

(2)发展交通事业 此事对于人口问题有两种效果：(一)增加能生产的人口；(二)利用有余以补不足，等于增加生活资料。

(3)发达科学 此时欧美各国底物质文明虽是进步，将来科学越发达，衣食住各种生活资料，还要随着无限的增加，至于我们科学还未萌芽的中国更是不用说的了。

(4)发达生产技术 无论农产工产品，技术越发进步，生活资料增加底速度越发增加。

(5)增加劳力底数量 土地劳力在生产要素上应该居首要地位，在我们“游惰神圣”的国里，不但劳动底人数过少，劳动底力量也不充分，一般劳动者做工底时虽多，大半等于西洋的怠工。现在要增加生活资料，应该在社会制度上经济组织上取消那“游惰的上流阶级”和“游惰神圣”的风尚，使劳力底数量充分增加。

(6)分配平均 现在军阀集中资本，人民已经是受不了，财阀倘再来集中一下，将来恐怕只有极少数的人生活余裕，那最大多数最大痛苦的人，连一班拥护资本主义大罵社会主义

的學者自己或是他的子孫，都要變成沒有生活資料的貧民，都要被馬爾塞斯取消他們的生存權了。在財產私有社會里，似乎不可因為有許多窮人生活資料不足，便馬上斷定是人口過剩，便馬上斷定人口常有在生活資料以上增加的傾向，因為若將全社會合攏起來平均分配，不見得生活資料真是不足，恐怕是一班強盜太有餘了，別人便當然不足呵。所以若要討論社會上究竟是不是人口過剩，究竟生活資料足不足，候實行分配平均後再談，似乎才能夠得到真相。縱然大家說平均分配是一種不能實現的空想，那就請大家狠狠心腸拿出一部分剩餘價值（他們說是什麼紅利）來，辦幾個貧兒公育院，這總是做得到的罷。這種分配底法子固然離平均還差得遠，但是也可以救濟人口問題一部分的危急。

（7）限制人口 在以上幾種方法沒有收效以前，用限制人口的法子減輕社會上一部分生活困難，也可使的。但限制底方面應該注重在游惰的上流社會，不限於貧苦的勞動者，這却和馬爾塞斯底主張有點不同。

（原載《新青年》，7卷4號，1920年3月1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劳动者底觉悟

——在上海<sup>船务
棧房</sup>工界联合会演说——

陈 独 秀

世界上是些什么人最有用最貴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貴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貴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

这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吃的粮食，是那种田的人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穿的衣服，是裁缝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住的房屋，是木匠瓦匠小工做的，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做的；我们坐的各种车船，都是木匠铁匠漆匠做的；还有许多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才能把我们的货物和我们自己送到远方，这都不是皇帝总统做官的读书的人底功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种田的，裁缝，木匠，瓦匠，小工，铁匠，漆匠，机器匠，驾船工人，掌车工人，水手，搬运工人等，我们便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屋住，没有车坐，没有船坐。可见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岂不是要倒塌吗？我所以说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

但是现在人的思想，都不是这样，他们总觉得做工的人最无用，最下贱；反是那不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我们现在一方面盼望不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无用的下贱；一方面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

世界劳动者的觉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現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經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

在表面上看起来，欧美日本的劳动者，都在那里大吹大擂的运动；其实日本劳动者底觉悟和欧美大不相同。因为他们觉悟后所要求的，有第一步第二步的分別。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資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价，改良卫生，保險教育等事）第二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要求做工的人自身站在国家資本家地位，是要求做工的人自己起来管理政治，軍事，产业，和第一步觉悟时仅仅要求不做工的人对于做工的人待遇改良大不相同。第一步要求还是討飯吃，必須到了自己有飯吃的时候，油盐柴米菜蔬鍋灶碗碟等，都拿在自己手里，做工的人底权利，才算稳固。否則無論如何待遇改良，終是仰仗別人底恩惠，賞飯。

中国古人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現在我們要将这句话倒轉过來說：“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

各国劳动者第二步觉悟，第二步要求，并没有别的奢望，不过是要要求做工的劳力者管理政治，軍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劳心者居于治于人的地位。

我們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第一步觉悟还没有，怎說得到第二步呢？不过我望我們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曉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曉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滿意，便不去运动。

（原載《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轉选自《独秀文存》卷〔一〕）

談 政 治

陳 獨 秀

(一)

本志社員中有多數人向來主張絕口不談政治，我偶然發點關於政治的議論，他們都不以為然。但我終不肯取消我的意見，所以常常勸慰蔡一涵兩先生做關於政治的文章。在他一方面，外邊對於本志的批評，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我對於這個批評也不能十分滿足，曾在“我的解決中國政治方針”演說中回答道：“我們不是忽略了政治問題，是因為十八世紀以來的政制已經破產，我們正要站在社會的基礎上造成新的政治；我們不是不要憲法，是要在社會上造成自然需要新憲法底實質，凭空討論形式的條文，是一件無益的事。”因此，可以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一方面固然不以絕口不談政治為然，一方面也不願意和一班拿行政或做官弄錢當作政治的先生們談政治。換句話說，就是：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着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政治底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勾當可以冒牌的。

以上的說話，雖然可表明我對於政治底態度，但是過於簡單，沒有說出充分的理由，而且不曾包含我最近對於政治的見解，所以現在要詳細談一下。

(二)

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

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前兩派主張不談政治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是相对的不是絕對的；因为他們所以不談政治，是受了爭权夺利的冒牌的政治底刺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政治。后一派是从根本上絕對主張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組織，他們不但反对君主的貴族的政治和爭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

我对于这三派的批評，在消极的方面，我固然很有以他們为然的地方；在积极的方面，我就有点异議了。

前兩派只有消极沒有积极的缺点，最近胡适之先生等“爭自由的宣言”中已經道破了。这篇文章开口便說：“我們本不愿意談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沒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們。”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

后一派反对政治，从消极的方面說起来，也有一大部分真理。他們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論自成一系統，到沒有普通人一面承认政治，法律，国家，一面反对强权的矛盾見解。强权是少数人的或多数人的，广狹虽然不同，但若是沒有强权便沒有法律，沒有法律还有什么政治国家呢？因此我們應該明白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无政府党人一律反对，理論到算是一貫。古代的社会契約(Social contract)和中世紀的自治都市(Commune)，不但不是普遍的，而且是人类政治組織沒有进化到近代国家的状态。近代国家是怎样？Franz Oppenheimer說：国家底唯一目的，就是征服者支配被征服者底主权，并且防御内部的叛乱及外部的侵襲。这主权底目的，也就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經濟的掠夺。(詳見Christensen's Politics and Crowd Morality P.72所引。)Christensen說：国家是掠夺別人并防止別人来掠夺的工具；他的目的并不是制止每人和每人間底战争，乃是使这战争坚固而更有效力。(見前书七三、七四頁。)罗素說：国家底骨子，就是公民集合力底仓库。这力量有兩個形式：一是对内部的，一是对外部的。对内部的形式是法律及警察；对外部的形式是战斗力所表現的陆海軍。国

家是一定区域内全住民底集合体依政府指揮用他們联合力所組織起来的。国家底权力，对内仅限于叛乱的恐怖，对外仅限于战败的恐怖；所以他阻止这两样是绝对的。在实际上他能够用租税名义夺人家底财产，决定結婚和继承底法律，惩罚他所反对的意见发表，因为要把一种人民所住的地方划归别国他能置人于死地，并且他想着要打战便命令一切强健男子到战场去赌生命。在许多事件上，違反了国家底目的和意见，就是犯罪。（見Russell's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P. 45, 46, 47）过去及现在的国家底作用实在是如此，我所以說无政府党反对国家，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强权，也有一大部分真理。

从消极方面說起来，无政府党否认国家政治，我們固然贊同；从积极方面說起来，我們以为过去的现在的国家和政治，过去的現在的資本阶级的国家和政治，固然建筑在經濟的掠夺上面；但是将来的国家和政治，将来的劳动阶级的国家和政治，何人能够断定他仍旧黑暗绝对沒有进步的希望呢？反对国家的人，說他是掠夺机关；反对政治的人，說他是官僚底巢穴；反对法律的人，說他是資本家私有财产底护符；照他們这样說法，不过是反对过去及現在掠夺的国家，官僚的政治，保护資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並沒有指出可以使国家政治法律根本搖动的理由；因为他們所反对的，不曾将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廢止資本家财产私有的法律，包含在內。

或者有人說：就是将来的禁止掠夺的国家，排除官僚的政治，廢止資本家私有财产的法律，仍然离不掉强权，所以不从根本上绝对廢除国家，政治，法律，这几种强权，实现自由組織的社会，不能算彻底的改革。

我們对于这种意見，可以分开理論和事实兩方面的討論：

从理論上說起来，第一我們應該要問：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沒有底，我們从何处起？所以懂得进化論的人，不應該有彻底不彻底的觀念。第二我們應該要問：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

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轉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見得可惡了。由此可以看出强权所以可惡，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我們人类文明最大的效果，是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例如水火都可以杀人，利用水便得了行船，洗濯灌溉底效用；利用火便得了燒飯菜，照亮，溫暖身体底效用；炸药和雷电伤人更是可怕，利用他們便得了开山治病及种种工业上的效用；人类底强权也算是一种自然力，利用他也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底效用。因此我觉得不問强权底用法如何，閉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廢食的办法，实在是籠統的武断的，决不是科学的。若有人不問讀書底目的如何，但只为讀書而讀書，不問革命底內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現在若不問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贊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的謬誤。

从事实上說起来，第一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階級压在資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銀劳动等制度廢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强力，不主張階級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会出現；那班資產階級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机会。法国底工团派，在世界劳动团体中总算是很有力量的了；但是他們不热心階級战争，是要离开政治的，而政治却不肯离开他們，欧战中被資產階級拿政权强迫他們牺牲了，今年“五一节”后又强迫他們屈服了，他們的自由在那里？所以資產階級所恐怖的，不是自由社会的学說，是階級战争的学說；資產階級所欢迎的，不是劳动階級要国家政权法律，是劳动階級不

要国家政权法律。劳动者自来沒有国家沒有政权，正因为过去及現在的国家，政权，都在資產階級底手里，所以他們才能够施行他們的生产和分配方法来压迫劳动階級；若劳动階級自己宣言永远不要国家不要政权，資產階級自然不胜感謝之至；你看現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維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們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緣故。

第二我們要明白各国底資產階級，都有了数千年或数百年底基础，站在优胜的地位，他們的知識經驗都比劳动階級高明得多；劳动階級要想征服他們固然很难，征服后想永久制服他們不至死灰复燃更是不易。这时候利用政治的强权，防止他們的阴谋活动；利用法律的强权，防止他們的懶惰，掠夺，矯正他們的习惯，思想，都很是必要的方法。这时候若反对强权的压迫，若主張不要政治，法律，若提倡自由組織的社会，便不啻对資產階級下了一道大赦底恩詔；因為他們随时得着自由，随时就要恢复原有的势力地位。所以各国共和革命后，民主派若失了充分压服旧党底强力，馬上便有复辟底运动。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魯巴特金的自由組織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馬上不但資產階級要恢复势力，連帝政复兴也必不免。克魯巴特金《国家論》中所称贊的中世自治都市是何以失敗的，他所指責的近代資本主义的国家是何以发达起来的？这主要的原因，不用說一方面是自治都市里既不是以劳动階級为主体，又沒有強固的政治組織，因此让君主貴族們垄断了政权；一方面是新兴的資本家利用自由主义，大家自由貿易起来，自由办起实业来，自由虐待劳动者，自由把社会的資本集中到少数私人手里，于是漸漸自由造成了自由的資本階級，漸漸自由造成了近代資本主义自由的国家。我們明明白白曉得中世自治都市是放弃政权失敗的，是放任那不法的自由(Unconscionable Freedom)失敗的，劳动階級底枷鎖鏢鏢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帶上的；現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睜着眼睛走錯路嗎？我因此相信許多人所深恶痛絕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

用他为善；許多人所歌頌贊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万万不可一概而論，因为凡强权主义皆善，凡自由主义皆恶，像这种籠统的大前提，已經由历史底事实証明他在邏輯上的謬誤了。

第三我們要明白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鏟除的；就是社会制度——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劳动制度——所造成的人类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这恶性馬上就跟着消灭的。工銀劳动制度实在不应该保存，但同时若不强迫劳动，这时候从前不劳动的人，自然不会忽然高兴要去做工；从前受慣了經濟的刺激（Economic Stimulus）才去劳动的工人，現在解除了刺激，又加上从前疲劳底反动，一定会懶惰下来；如此一时社会的工作效率必然銳减。少数人懶惰而衣食，已經酿成社会上的不平等；若由少数增至多数，这社会底生活資料如何維持呢？人类誠然有劳动的天性，有时也自然不須强迫；美术化的劳动和創造的劳动，更不是强迫所能成的，自来就不是經濟的刺激能够令他进步的；所以工銀制度在人类文化的劳动上只有損而无益。至于人类基本生活的劳动，至少像那不洁的劳动，很苦的劳动，既然沒有經濟的刺激，又沒有法律的强迫，說是人們自然会情愿去做，真是自欺欺人的話；凡有真誠的态度討論社会問題的人，不应该說出这样沒有征驗的話来。制度变了，制度所造成的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断然不易消灭；倘然沒有法律裁制这种傾向，专制的帝王貴族就会发生在自由組織的社会里；若要預防他将来发生，抵抗他已經发生，都免不了利用政治的法律的强权了。更有一件事，就是人类底性欲本能和永續占有冲动合起来发生的男女問題；这問題是人生問題中最神秘不可思議的部分，不但社会制度革命不能解决他，并且因为解除了經濟的政治的压迫和誘惑，真的純粹的男女問題更要露骨的发生。这时候的男女問題內，并不夾杂着政治的經濟的影响和罪恶；倘由这种問題发生了侵犯个人及損害社会安宁的罪恶，也应该有点法律的裁制才好。

据以上的理論和事实討論起来，无政府党所詛咒的資產階級

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們也应该诅咒的；但是劳动阶级据以铲除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我們是不应该诅咒的；若是诅咒他，到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换句话说，就是我們把国家，政治，法律，看做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工具不好，只可改造他，不必将他抛弃不用。

(三)

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兩派：一是旧派，他們眼中的国家，就是“我国家数百年深仁厚泽”的国家，学生这样嚣张还成个什么国家”的国家；他們眼中的政治，就是“吳佩孚只是一个师长不配参与政治”的政治；他們眼中的法律，就是“王法”“国法”“大清律”的法律；这派底意見，我們放不着批評。一是新派，他們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威权，他們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們为然；但是他們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設新的事业，这是我不大不贊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說，就是所謂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說真有这派人，不过頗有这种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們唯一的敌人。

他們不主張直接行动，不主張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們仍主張議會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結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还要施行压迫劳动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政策。現在英法德底政府当局那个不是如此？像这样与虎謀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我們應該当做前車之鉴。

他們主張的国家社会主义，名为社会民主党，其实并不要求社会的民主主义，也不要求产业的民主化，只主張把生产工具集中在現存的国家——現存的资产阶级底軍閥官僚盘踞为恶的国家——

手里。Wilhelm Liebknecht批評这种国家社会主义道：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实在說起来只可叫做国家資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取其貌似投时所好来冒牌騙人罢了。德国底国家社会主义，严格說起来就是普魯士底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就是軍国的，地主的！警察的国家，他所最厌恶的就是民主主义。（見 Wilhelm Liebknecht,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 15）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劳动階級底奴隶状态不但不減輕而且更要加重；因为国家成了公的唯一的資本家，比私的数多的資本家更要垄断得多。这种国家里面，国家的权力过大了，过于集中了統一了，由消灭天才的創造力上論起来，恐怕比私产制度还要坏。这种国家里面，不但无政府党所詛咒的国家，政治，法律底罪恶不能鏟除，而且更要加甚；因为資產階級底軍閥官僚从前只有政治的权力，現在又假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把經濟的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这种专橫而且腐敗的階級，权力加多罪恶便自然加甚了。若是把这名义与权力送給世界上第一个貪污不法的中国軍閥官僚，那更是造孽不淺。

他們反对馬格斯底階級战争說很激烈，他們反对劳动专政，拿德謨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階級底特权。他們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劳动者和資產階級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組成一个階級，而且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領权力階級的地位，用那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但是同时階級对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扫除的；因此劳动階級本身底权势也是要去掉的。（見《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之末。）他們又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法国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底著作，到德国就全然失了精义了；并且階級爭斗底意义从此在德国人手中抹去，他們还自己以为免了法国人的偏見……他們自以为不单是代表无产階級利害的，是代表人类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类利害的；这种人类不屬於何种階級，算不得实际的存在，只有哲学空想的云雾中是他存在的地方。（見前书第三章）。他們只有眼睛看見劳动階級底特权不合乎德謨克拉西，他們却沒眼睛看見戴著德謨克拉西假面的資產階級底特权是怎

样。他們天天跪在資產階級特權專政腳下歌功頌德，一聽說勞動階級專政，馬上就抬出德謨克拉西來抵制，德謨克拉西到成了資產階級底護身符了。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修正派社會主義底格言，就是：“從革命去到普通選舉！從勞動專政去到議會政治！”他們自以為這是“進化的社會主義”，殊不知 Bebel 死后德國底社會民主黨正因此墮落了！

(四)

我的結論是：

我承認人類不能夠脫離政治，但不承認行政及做官爭地盤攘奪私的權利這等勾當可以冒充政治；

我承認國家只能做工具不能做主義，古代以奴隸為財產的市民國家，中世以農奴為財產的封建諸侯國家，近代以勞動者為財產的資本家國家，都是所有者的國家，這種國家底政治法律，都是掠奪底工具，但我承認這工具有改造進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廢棄他，因為所有者的國家固必然造成罪惡，而所有者以外的國却有成立的可能性；

我雖然承認不必從根本上廢棄國家，政治，法律，這個工具，却不承認現存的資產階級（即掠奪階級）的國家，政治，法律，有掃除社會罪惡的可能性；

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後事如何，就不是我們所應該所能夠包辦的了。

（選自《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出版）

关于社会主义的討論

陈 独 秀

（一）东蓀先生《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見都是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話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內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相同。我此次旅行了几个地方，虽未深入腹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貧乏。中国真穹到极点了，罗素先生观察各地情形以后，他也說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我觉得这句话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舒新城君常对我說：“中国現在沒有談論甚么主义的資格，沒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我也觉得这句话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沉痛。現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筑山君自美来信，他說美国农夫比中国人中等人家还要好得多，可見得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之滋味。我們苟不把大多数人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談主义必定是无結果。或則我們也可以說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現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这个教訓我以为是很切实的，好高务远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二）《正报》記者爱世先生《人的生活》

某报記者說，游历內地所得的教訓，就是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

人的生活，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振兴实业一途，此外一切主义，现在的中国都不配讲。我們游历内地也不止一次，某报記者所得的教訓，我們未尝无同感：中国多数人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句话确是不错；要使中国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上着手，这句话更是不错。但是只顧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物质文明的幸福，結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垄断，多数人仍旧得不到人的生活；要用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某报記者从前主張現在却自己說不配主張的社会主义。所謂人的生活，就狭义的說，总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够充分享用，不至于缺乏；就广义的說，如个性的伸張，美感的滿足，艺术的享乐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範圍內。現时中国多数人欲求狭义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說不到广义的生活上去，所以最紧要的在使多数人得着狭义的生活。这个問題决非简单的开发物质文明所能解决，譬如开灤煤矿、京奉鐵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灤煤矿，京奉鐵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燒死工人几百名，鉄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沒有开灤煤矿，京奉鐵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慘死；可見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人的生活。現今官僚的豪华，武人的纵侈，紳士土豪的驕奢淫佚，多数人所以得不着人的生活，都是吃了他們的亏。假如再听他們包办实业，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官僚武人紳士土豪的幸福越发增加，多数人的幸福越发无望，多数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紳士土豪的奴隶牛馬外，別无生活門徑，恐怕还有求为奴隶牛馬而不得的。中国官僚武人与紳士土豪互相結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純粹資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人的生活得不着，到底仍然免不了社会革命。若說中国人不配讲社会主义，倒不如向资本主义底下去討生活，正如有人說中国民智不够共和还是复辟的好。某报記者虽不明言崇拜资本主义，其实所謂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結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因为在

现代社会里头求实业发达，离了资本主义是不行的。资本主义决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要使多人得着人的生活，还应该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

（三）望道先生《评东蓀君底〈又一教训〉》

昨天《时事新报》第二張上，載着东蓀君《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个时評，他开头就說：

“有一部分人住在通商口岸，眼所見都是西洋物质文明工业状态，于是觉得西方人所攻击西方物质文明的話，都可移到东方来而忘了內地的状态和欧洲大不同。”

我們看了他这段話，极想問他，——你东蓀是不是这一部分里的一个人？如果說不是，那末，《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七号《我們为什么讲社会主义》底下，为什么写着“东蓀”两个字？

《我們为什么讲社会主义》这篇文，固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他有許多地方很显明的表示出他的态度。譬如第六段里，有

“……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觀与世界觀——而 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觀与世界觀。”

第七段又說：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 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

“……凡是改造人生而合于社会主义的原则的，社会主义无不把他綜合起来。……”

这样看来，可見东蓀君认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一切方法底总名了。既然认社会主义四个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便只可說，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为什么时評上却說：

“……苟不把大多数，使他得着人的生活而空譚主义必定无結果。”

这話怎讲？

东蓀君！你現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謂“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嗎？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嗎？你同情于舒君底話，說“中国現在沒有談論甚么主义的資格”，又說“現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得着人的生活”，你难道以为必須处处都成通商口岸与都会，才可得着人的生活，才有談論主义的資格嗎？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来改造“文明”嗎？东蓀！你曾說“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現在你既然旅行过一番，曉得了“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为甚么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体生活”的“社会主义”再行贊美，鼓吹，——反而忍心詛咒呢？

东蓀！你旅行了一番，看見社会沉靜，有些灰心，你想要走旧路了嗎？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該过于責备“賢者”；但假使我們都如此，社会将来更要沉靜下去，使你灰心底机会，不是更多了嗎？

我怕东蓀君轉向，社会更沉靜；又怕东蓀君这时評就是轉向的宣言！

（四）力子先生再評《东蓀君底〈又一教訓〉》

前天东蓀君底《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已有望道，江春兩君批評过。兩君有一相同之点，即都根据东蓀君平日主張社会主义的論文，施以反詰，并非凭空揶揄。我不知东蓀君何以自解？或者东蓀君要說：“我那个題目，写得明白，是由內地旅行而得的；我从前住在通商口岸，不知道內地情形，所以主張社会主义；現在我到了內地旅行了一趟，受了教訓，所以我又說空談主义必定是无結果。”照这样說，便只可算是东蓀君受了教訓而忏悔了。但我有兩层意思要請問东蓀君：

一 作新聞記者的人要有怎样的常識？对于社会有所主張，应当先有怎样的审察。

新聞記者，負有指导社会的天职。不但全国底情形应当处处留意，就是全世界底大势也沒有的一处可以疏忽。所以新聞記者虽然坐

在編輯室里，而眼光直須注射到世界全部分，即使各種詳細的情形不能盡知，而大体總應該了如指掌。東蓀君既為新聞記者，雖然“住在通商口岸”而對於“內地的狀態”，總不應全無審察。我在東蓀君這個時評里面，細心尋覓他敘述旅行內地所得的狀態，只有兩句話：一，“中國人穹到極點了”；二，“中國人大多數都未經歷過人的生活之滋味”。單講這兩句話，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東蓀君從前竟全沒知道？難道住在通商口岸時候，眼光只注射到高大的洋房，宏敞的商店；而對於民穹財盡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內地以後方才明白么，其次：我在東蓀君底時評里面，細心尋覓他旅行內地所得教訓的本身，也只有兩句話：一，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這兩句話實在只是一句，是一般小學生作文時搖筆即來的陳言，更是一般通商口岸富商大賈人人常說的門面話，東蓀君竟非到了內地旅行以後全不覺得么？東蓀君果真如此，便來作新聞記者，便毅然對於社會有所主張，東蓀君真胆大了！我不相信東蓀君如此，所以我也不能相信東蓀君現在是真感動到內地底貧乏，才有這樣一個時評。

二 中國貧乏的原因在那里，談論甚么社會主義等是否足為開發實業的障礙？

這一層的討論最關重要。因為“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在談論社會主義的人，不但從來沒有反對過，並且也認為必要；不但認為救現在的中國應當如此，並且認為謀人類的幸福本須如此。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麼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而不在應否增加富力開發實業的問題。現在社會主義者，都能預想到社會主義實行以後工業怎樣普遍發展的情形，並且深信要在社會主義下面的開發實業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這幾句話確可以代表社會主義的神髓。貨不棄于地，力盡出于身，富力還愁不增加么？實業還愁不開發么？社會主義，只反對“貨藏于己……”的資本主義，所以資本主義者當然不免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

兽，硬說要开发实业便不能談社会主义。这不是資本的愚昧，便是資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說法；东蓀君难道也认定談了社会主义便不能开发实业么？中国穷到极点，原因在那里，是由于談了社会主义的緣果么？振兴实业的話，也不知說了多少年，东蓀君不去推求所以至今貧乏的原因，偏要归罪于一二年来談論主义的人么？中国除了开发实业以外无以自立，这是小学生也知道的，用不着引用罗素先生底話。罗素先生最要紧的教訓，是中国必須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必不可再蹈欧美資本主义的复轍。东蓀君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話呵！舒君新城底話，很足代表現在一般企业家底思想；但我們即使让步，也承认“中国現在沒有談論甚么主义的資格”，但到了实业开发以后，中国有沒有这資格呢？罗素先生教訓我們不要再蹈欧美資本主义的复轍，正是恐怕“有了这資格”以后已是焦头爛額感受十分痛苦；那么，現在談論社会主义，至少也可算得“曲突徙薪”怎能說是“必定无結果”呢？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人的生活”底方法；現在中国穷到极点，和談論社会主义毫不相干，談論社会主义者也正急欲救穷；这种很淺显的道理，我敢断定东蓀君也是很清楚的。所以东蓀君即使真是到了内地才觉得开发实业的必要，也不必牽連到社会主义說是必无結果。

以上兩层意思，假使东蓀君无法解釋，那么，他这个时評底真正动机究竟在哪里呢？

还有一句話，要請教东蓀君。“人的生活”四个字究竟怎样解釋？

我以为“人的生活”底严格解釋，一定要兼顧到精神和物质兩方面。东蓀似乎专注重在物质一方，其实，那些“飽煖思淫欲”的人，何尝能得着“人的生活”？东蓀君說：“現在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絕不能知道这少数得着“人的生活”者究竟在那里？如果单讲丰衣足食，难道乡村間就沒有这种人么？通商口岸与都会中有多少貧民窟。东蓀君也知道

么？陈独秀先生說日本賀川丰彦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他曾来上海調查貧民窟……东蓀君也能发一发良心么？内地底农夫固然很苦，通商口岸的工人何尝不苦？东蓀君区别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拿是否通商口岸与都会作标准，东蓀君真太迷信“西洋物质文明的工业状态”了。开发实业，不用社会主义作基础，我敢断言都会底表面愈发达而内幕愈愁惨，得着东蓀君所謂“人的生活”者愈是少数，而腹地也愈要穷到极点。在资本主义下面，都会实是罪恶底渊藪。吸收乡村間的血汗，来装点都会底文明；被掠夺的人因物质上的貧乏，固然要陷于牛馬似的境遇，即掠夺阶级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尝不成了逸居无教的禽兽！所以我承认現在的中國人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我却不承认通商口岸和内地有分別——而要使中國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明知中國人現在未得着“人的生活”而又要阻斷中國人将来能得着“人的生活”的途徑，这未免太忍心呵？請东蓀君仔細想想！

（五）东蓀先生《大家須切記罗素先生 給我們的忠告》

罗素先生的人格，我觉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于数天中靜察他的言行，觉得他不单有真學問而有真性情，我方明白必定有真學問乃能有真性情。他到中国以后零星講演虽有好几次，他对于不十分研究的东西决不乱讲。他不愿住闊旅館，他怕应酬，他不說敷衍話，他每天非讀書不可，所以他此次在京所讲都是他最近研究有得的科目。他不愿拿常識来对付中國人。他在俄国很受劳农政府的优待，但是他为真理的緣故，他仍旧說劳农政府的办法是不合理的。他真是個学者，真是個有良心的学者。

因他不說敷衍話，所以報載他讲学会的答辭我觉得很像他的話。他好像是說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識的有知識，使有知識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防迟迟。我以为罗素先生观察中国虽沒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訣

窍，区区的这几句話就非常中肯。我对于教育与实业兩层自然是完全贊同，至于劳农主义，我以为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故很以罗素先的話为然。但这种卑之无甚高論的主張就貴在实行，若不实行則和高論又有何区别呢？所以大家須切記罗素先生的这番話而要去切实的实行呵。

（六）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

罗素先生：

中国人底知識方面物质方面都这样不发达，所以有心改造中国之人都早已感觉着发展教育及工业是頂重要的事，这是不待討論的；但是有一件要討論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資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我个人的意見，以为資本主义虽然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大战争及将来的經濟大革命都是資本主义之产物，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們中国此时才創造教育工业在資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錯路。但是近来中国有些資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贊你主張：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們不知道这話真是你說的，还是別人弄錯了？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針很重要，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貽悞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七）东蓀君先生《答高踐四書》

（前略）至于中国今日之所急者乃在救貧，以中国除少数区域外，本物产不丰，在鎖国时代犹足自給，近則每况愈下。弟尝究其貧乏之由来，以为有二大原因：第一为远因，曰物产未开发，而物产未开发之原因則由于資本缺少与不能集中，而資本缺少与不能集中則有数因，曰民力本不甚丰，曰向有不愿以財產充資本之习惯，而

其最大之原因莫甚于企业者之不道德。工商业之經理人即所謂企业者也，而中国之企业者于一方面虐待劳工，于他方面則侵吞股本，故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苟非資本家自兼經理人，則未有不失本者也。以此之故，視投資为危途則資本自不能集中。加以連年兵禍，百业俱停，致实业无法发展。第二为近因，曰外貨之压迫，夫外貨挾資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势而来，自不可抗。盖自近世資本主义兴，欧洲各国遂为資本之階級国家。此种資本家利用国力以征服弱种。俾达其商战上营利之目的。中国经济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国力之弱，遂尽为其所蚕食。中国至今日所以愈加貧困者，尤在近因。弟尝言欧美之資本主义不倒，則中国永无翻身之日。至于中国現有一二資本家，虽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謂为真正之資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債，或中外合办，次則买外国机器，用外国資料，盖在此种外国資本主义大力之压迫下，中国資本家极不易产生。我儕对于此种非純正之中国資本家止能认为拾外国資本家之余剩，补外国資本力之空隙，設有人攻击中国資本家，弟則以为彼輩所处之地位已极可怜。而尚欲攻击。实为不忍。須知即使尽打倒中国資本家，亦不过如在烈日下熄二三盞电灯耳，其結果則外国資本势力更为侵入。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义。况外国資本势力已占优势，更进一层，易如反掌。一般貧民但求得目前之生活，論遑将来之利害。故我知中国資本家倒后外国資本立即侵入，則一般貧民必欢迎之不暇也。可知問題不在中国資本家，苟中国物力不发展，外国資本主义不倒，則中国前途必不堪問。然二者互为因果，即外国資本主义不倒，則中国物力不易发达，中国物力不发达，則无絲毫抵抗外国資本主义之力。弟以为联络各国社会党謀顛复世界的資本主义固为上策。然我民能力甚微，能补助于人者究有若干，未敢自信，則于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国資本势力下乘其空隙以开发实业耳。特吾之开发实业非欲造成强厚之資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以与外国对抗，吾人固知資本主义与国家主义絕對不能造成，不过吾人之意在培养民力使稍有抵抗

之能而已。吳稚暉先生言，人類只有兩種，一種坐轎的，一種抬轎的，吾以為中國階級果能如此，則社會主義宜可興矣。顧中國現狀猶未到此，乃尚有多數人求為抬轎的而不得者在焉，弟以為第一步當使社會上無此種求生不得之人，則始有抵抗能力。他日盡歸類于資本勞動之兩階級，而有階級戰爭，則進一步矣。須知使求生不得之貧民為勞工，乃進步之現象也。夫在未演成資本勞動之兩大階級之社會，易言之，即在未發生之階級戰爭之社會（或稍稍發生而不成形），社會主義之說決不能入人耳而動其心。可以日本之例証之，日本之有社會主義數十年矣，當時如界利彥等恒為社會所輕視，今則此輩偶出一書，輒風行全國，獲利頗厚，此無他，實因日本利用歐戰期間大擴充實業，實業大發達之結果演成兩極端之階級，同時因教育之普及，受教育者亦降為勞工，勞動階級遂自覺矣。工人能讀此類書籍，故銷行乃廣。若夫中國不但雖價廉至一文，工人亦無錢買，且學生教員之購買力亦有限。近來因雜誌書籍之漸漸增加，而學生之家庭亦多有負擔不起者，則中國一般人民之貧困可想見也，即以馬克思而論，彼之著述不過預料資本主義自身之必倒，然資本主義若未至推車撞壁，恐亦未能即倒。今日歐洲資本主義已至推車撞壁，故始呈此末路之現象。以此之故，弟確信中國將來必演成資本與勞動之兩大階級。弟嘗見日人所辦之某雜誌，有調查中國勞動狀態一篇，其結論曰，中國所要求者，非改良勞動，乃創造勞動也，其言殊當。蓋中國資本家不出，外國資本家必入而取代，故弟認中國資本家之有無不成問題。惟中國貧困至此，對於一切皆無力抵抗為可憂耳。故為救急起見，宜設法養成抵抗能力，則莫急於開發實業以增加物產，先救濟物質生活。而開實業之法不外私人企業（即資本家）與共同企業（即協社Cooperative society）。弟以為對於私人企業可不加妨礙，對於共同企業宜設法創造，而不必拘於理論，當以地方情勢為衡。弟以為近來鼓吹之諸新說，止協社於現在之中國有實現之可能性，其餘概為空談。弟向傾心於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近則以為人類原理普汎言之固屬最善。而在中國則不知須

俟何年何月始能实行。即以劳农而言，决不能实现。第一，以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若举全国而奉行一种主义，势所不能，则惟有各地自决，各地自决必于劳农主义有妨碍。第二，纵各地可以自决，然以人民之狃于历史上无政府思想之惯习，亦决不能借政权以贯彻主义，势必听社会自动，社会自动则与劳动主义之贫民专制相冲突矣。弟默察中国近十年间之趋势必为地方自决与社会自动二者，故真正之劳农主义决不能实行，所可虑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际，将有一种伪过激主义出现。弟觉今之青年中大多数以感情上之刺激与经济上之压迫，已倾向于此主义，纵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种空气。若此种空气渐渐流入兵界则祸必发作。现在国内遍地皆兵，而无一人有裁兵之权，兵一日不安顿则祸一日潜伏。彼时所呈现状必非有吾人所能料者。此种观察或弟之神经过敏亦未可知。惟弟即见到此，即不愿自欺欺人。此后有教育事业可办，则拟专心于教育。否则读书著书，专研究一二门哲学，决不为政论，亦不为社会运动，颇思静观世变也，未识兄何以教之？东蓀顿首。

（八）东蓀先生《长期的忍耐》

頌华兄鉴：来函论旨颇有可商榷处，请为公陈之；须知现在中国之内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设劳动者阶级的国家，现国内以缺少真正之劳动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阶级的国家，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此乃事实，愿公特别注意者也。至谓保障平民之政治与法律，则现在一班人民不求政治与法律，但求得食与得衣。其故有二：一曰不知衣食与政法有关，二曰饥寒交迫，实无暇远虑，彼野蛮人之无高远观念者非不为也，实来不及也。公谓有二问题曰开发实业是否采集产主义。曰应否暂时采用 Dictatorship。我以为两问题即一问题，盖所谓集产机关归诸公共管辖之下。而所谓公共管辖即为政权之行使。欲以政权行使于经济方面，则政治方面必有强有力之组织与组织的分子。故肯定第一问题，即同时肯定第二问题。惟中国目前之情形则与第二问题大相矛盾。夫做 Dictator

不难，而难于得其拥护者。中国之老实的百姓决不知何为拥护，即拥护焉亦无丝毫之力。然则以兵为拥护者乎？果尔则非Dictator乃傀儡耳。今中国无人有Dictator之资格，固亦难矣，而况决无拥护者。正犹军队，不在有帅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帅，则第二问题不能成立也明矣。第二问题不能肯定，则第一问题必随之而倒。公谓开发实业必借外债，将来人民受两重乃至三重之压迫，与吾所见相同。惟吾以为此乃无可幸免，公谓社会革命将莫由兴，吾则以为不然。惟其如此，方有社会革命。第一，社会革命必起于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于富之一班的缺乏。概贫乏太甚，则一切举动皆不能实行。譬如直接行动之罢工等，决非十分贫乏之工人所能为。第二，贫乏之可患甚于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于短时间内救正之，而贫乏则非短时期所能救济。俄劳农政府之办法对于不均固完全解决矣，而对于贫乏则尚在试办。罗素所不满于彼者或亦在此。盖两相异之问题，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为之解决。故吾敢预言中国真正社会主义之起，必在由贫乏而进于不均之时代。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予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公此行宜以国内情形时时徘徊于脑际，于是乃能以国内情形与彼土情形相较，又与彼辈主义及政策相较，若将本土情形完全忘却，则纵考察得彼中办法与主义，亦止适于彼地而已，未必遽能移用于我也。匆匆敬复。

东 蓀上

（九）东蓀先生《再答颂华兄》

颂华吾兄惠鉴：昨上一缄，所述犹有未尽，今再续陈。兄读室伏高信论列宁之《乌托邦》一文，当知列宁之思想为梯阶之三段。曰贵族国家至中产国家，曰由中产国家至无产国家。曰无产国家至无国家。又曰原始经济至资本主义，曰资本主义至共产主义，曰共产主

义至无产主义。其是非姑不論，若以中国言，則Bourgeois之政治迄今未成，資本主义之經濟迄今未成，比者自治运动开始，謂Bourgeois方在发端可也。近来始有二三实业組織，謂資本主义方在萌芽可也。宜我輩居今日之中国欲建立劳动者专政而无患劳动者也。今日中国之大患，一曰无知(Ignorance)二曰貧乏(Poverty)。内地大多数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較原始人类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即以此次旱灾而論，平日不知植树，荒已經年不知呼救，且数百年来难得間年不荒而絕不思絲毫之挽回，对于关系生命之食粮問題尚不动念如此，則此种但知伸手取食之人民何事可为。須知无知与貧乏互相因果，即因无知而致貧乏，又因貧乏而愈无知，二者双軌并行，竟陷吾民于求生不得之境，可悲也已。罗素先生观察中国未久，即已洞見症結。其言曰，中国目下之所急者止在教育，次則实业。弟向以为救中国不在轟轟烈烈之事业，而在坚忍冷靜之事业，意亦在此。特教育与实业有关，盖人之精神生活必待其物质生活在最小限度以上而始能維持，衣布衣者与衣綢衣者可同等發揮其精神生活，而不得衣者則不能焉，何也，超过最小限度以下故也。管子云：衣食足知礼义，即此之謂矣。今中国人大多数所以不能發揮其精神生活者实由于物质生活之太不堪。故教育所以救济精神生活，而实业所以救济其物质生活，要在巧为聯絡以各尽其利。今当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則惟有約少数同志自办，而前有学校之工厂化一篇，即本此旨也。惲君代英撰《未来之夢》一篇，述其一生之志，在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而于实业之兴办則采資本主义之方法以貫徹社会主义之精神，可謂独具隻眼。弟以为苟此种人士而能多，各分头进行，即不問中央政治，复不問地方政治，亦不談何种主义，行之数年以后，再謀大同盟，以商定一种具体之主义，不为迟也。此时吾輩若为出风头計，为将来卷土重来計，未尝不可自标为劳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究其实不过个人之招牌，于中国之实际絲毫无关也，弟已看破此层，以为世人之目吾为社会主义者与否乃另一問題。若以为社会主义是新潮也吾安可不使人以此目我，此乃好名之事，吾

輩不屑為。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則他日設有反社会主义出，必又為反社会主义者矣，為個人計誠得，其奈事實何。弟自信對於經濟學無甚研究，惟對於Guila Socialism則信之甚篤，以其兼掇Aarchism之長處故也。此種新制度彼先進民族尚未實行，況論我國。故此制之在中國，我輩子孫能否見之尚屬問題。弟之所信既在辽遠，則於現在不能不籌有事業可辦，夫我輩既誓不為資本家，不助資本家，不侑於資本家，則實業一途斷矣，唯有從事於教育而已。實業之興辦雖不限于資本主義，然不以資本主義之方法決不能竟存於現在經濟制度之下，現在經濟制度既無法顛復，即顛復亦與民生無利，故止有協社為可行。蓋協社即以資本主義之方法而貫徹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惜吾輩亦無此種才能。弟日昨致函君勸虞裳，謂弟以前常覺有制定一種吾輩所托命之主義之必要，近來覺此必要實不甚急迫；蓋吾輩所必要者乃尋常之事業而非新奇之主張，主張愈新奇其去實際愈遠。鴈冰君謂抄近路或許可能，弟則以為抄近路絕不可能，吾人當萬分無賴之時，必擇一種主義而信為靈藥，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弟向為詹姆士所說之硬心腸人，絕不愿持絕對論以自慰，須知此乃環境太壞之一種反動，此太壞之環境實為問題之根，吾輩當硬着心腸以向此問題之根而求逐漸改造也。于此之際，苟目睹資本主義興焉，Bourgeois興焉，皆當認為當然之階級，與其拒之不如希其速來。人謂中國之問題即世界之問題，此言是也。此謂世界自解決其問題而能致影響於中國問題之解決，而非謂中國自解決其問題而能致影響於世界。曩者吾等以為中國與俄聯盟、建立勞農國家，以兩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資本主義今則知其夢想矣。蓋我國於十年內決無建立真正勞農國之可能，若夫偽勞農國則三五年內或將出現。意在造真而竟成偽，此計必仍歸泡影。至于十年以後則歐美之資本主義或即自倒，亦未可知。故曰欲以中國問題而解決世界問題必無是處。至于偽勞農國之危險，兄可以想像得之。羅素謂俄國政界第二流人物皆為旧日帝政時之官吏，令人可厭。兄試思今中國之主張勞農化者，其不与旧日党派有關能有幾人。書至

此已覺太長，不復縷述。總之，弟之意在靜觀世變，先築基礎，而兄之職在平情研究，以拓將來，二者實相待相成也。

東 蓀上言

（十）東蓀先生《他們與我們》

我讀了《繼軍閥而起者誰？》一篇，使我冥想了好幾天，我覺得這種觀察真是透徹。

須知人民愈不聊生，而對於財閥的興起必愈以好感迎之。我今天罵財閥，人民將罵我們太搗亂了。平心論之，我們果真有搗亂的能力倒也罷了，無奈我們實在沒有搗亂的能力。須知現在搗亂的乃是軍閥，碍撓資本主義的發生乃是武力主義。將來必有一天資本主義與武力主義大鬥法，而武力主義又必敗在資本主義手里。至於我們卻沒有絲毫的本領，我們罵軍閥提倡自治，這班紳閥而要做財閥的便借了來大吹大擂，得其所哉。我們罵資本主義，一班丘八先生也會借了實行他們的“搶產主義”。可憐呵；我們說來說去是供人們傀儡罷了。不過我們知丘八先生的搶產主義，不問他假借何種名義，總是要實現一次的。而紳閥的資本主義挾了外国的力量在其後面，也是不問如何總是要成功的。所以我們要睜開眼睛自己認一條安身立命的路去慢慢的走。

但我們的走，須得是做事。若專是發言，便無辦法。

我個人在这种預測中看出一條路來，就是覓一個基礎事業而不供雙方利用的，忽着寂寞而實地去干。

（十一）楊端六先生《與羅素的談話》

（前略）他對於資本制度，我問他要反對呢？還是提倡呢？要反對又應怎樣反對呢？並且我還問他，要如何方能把社會弄好，不致有大危險。他說：“只有發展實業”。但是他又說要有三個辦法：一，由資本家發展實業。二，由國家發展實業。三，由勞動階級自身發展實業。他還說這三個法子，最好由國家來發展。因為資本制度會演

出歐美今日的危險，已是不好了。若歸勞動階級，又恐怕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結果。但我接着告知他道，中國政府如此腐敗，只有破壞的能力，沒有建設的思想，天天在那里添招軍隊，爭權位，還爭不清，那有閑工來發展實業呢？他說這樣看來國家既靠不住，結果仍歸到資本家。看你贊成中國的資本家，還是贊成外國的資本家？不過將來要想平均經濟，外國資本家很難處置，中國的還容易商量，我又說：資本制度總之都不好。他說：那末，可輸入外國勞動階級。但中國工業程度又如此低下，亦必須中國資本組合起來，才能容納。

我可以參一句話，無論用資本制度或勞動階級，還是要從教育下手。要使人人都明了這種道理，將來才可以處置一切。

但又有人說：與其實業發達之後，勞動階級與資本家必生猜忌，弄出亂子來，不如不發展實業，還可以過安全日子咧。但我可有兩個答案：

一，發達實業，才有收入，才有經費可辦其他各事業。比于湖南現在倘若實業發達了，收入必充足，必不致創辦一種事，都沒有錢。

二，如布尔什維黨在俄國失敗的原因，就是俄國實業不發達，一旦外人封鎖，不供給貨物，就難支持。并且中國地大物博，東西洋的原料漸漸不夠用了。中國人自己不趕快把實業開發，別人須來開發，那是阻不住的。

這樣講來，資本家必定要經過的。世界上並沒有不經過此階級而能达到社會主義的，如俄國未經過資本階級，所以很難成功。中國若想社會主義實現，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資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資本來，因此我就問及羅素，新銀團對於我國投資的事情。他說這是些資本家的野心，想壟斷中國政權，束縛中國生死，真是將來不好辦的一件事。（後略）

（十二）東蓀先生致獨秀先生底信

獨秀先生：得你的質問，具答如下：

我以為現在中國貧窮到極點了，第一個急務就是增加富力。至於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資本主義，不妨各據當地的情勢而定。在這種現狀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省與縣）絕對不會變成強有力；政府而不能強有力，則勞農主義永遠不能實行。所以我們不能拿歐洲何種現成的主義來無條件的應用。

至於說不是抬轎的人即是坐轎的人，以現狀論，抬轎的人不以為苦，而反以不得抬轎為憂，則其窮苦可知。今我們執抬轎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為迂了。而此種窮困實為一般物力缺乏的結果，換言之，即國民經濟全般的不足，而非僅由資本家的榨壓。所以我們的注眼處宜廣及經濟界全體。總之，我的意見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廣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國，能實行一種主義。我以為中國以後總不外乎地方自決。

二，勿論地方如何自決，而以中國民族的根性與時代的趨勢，決不會產生強有力的地方政府。無強有力的政府，則勞農主義不能全部實行。

三，中國物力太匱乏，而匱乏的原因不是純由於資本主義。故救匱乏也不當專在打破資本主義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國的資本主義是致中國貧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國資本主義是必要的。若以倒國內資本主義而為倒外國資本主義之手段，其間是否有密切的關係，我尚未敢斷言。

東 蓀上

（十三）獨秀先生復東蓀先生底信

東蓀先生：前次質問先生底信有兩個要點：（一）社會的工業有沒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謂在通商口岸與都會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這班人屬何階級，他們是否掠奪他人之勞力而得比較好的生活？先生來信對於我質問的這兩要點沒有回答一字，卻把論點移到地方自決，物力匱乏，外國資本主義上去，我實在有點失望。

我見了几篇駁先生底文章，我以为是多事，就是我这封信也算是画蛇添足。何以呢？因为先生新受洗礼的資本主义已被先生自己所說的三句話打得片甲无存，正不必旁人攻击了。这三句話是什么？就是：

（一）我們也可以說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未过过人的生活“都”得着人的生活。

（二）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資本主义。

（三）我深信外国的資本主义是致中国貧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国資本主义是必要的。

通觀先生前后几篇文章，先生所謂人的生活，自然是专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費。按資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財富，一面却增加貧乏，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的。欧洲机器初兴資本初发达的时候，失业者众多的恐慌，这种历史的事实，无人能够否认的。就是現在有名的倫敦神戶的貧民窟，正是資本生产制的必然現象。即以此时中国而論，都会中新富豪拿資本到乡間购买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农民失去地权受掠夺压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資本在通商口岸与都会办工厂，机器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且因資本生产制造成物价昂貴的結果，中产社会漸漸都淪为无产者而且是失业者。因为資本家兼并土地和資本家利用机器（由外国資本家用机器制造的輸入商品包含在內）打倒手工业的原故，社会上困苦的失业者已普遍都会与乡間了。这种現象是資本主义生产制下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时必然发生的，因此可以說資本主义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却也增加貧乏。先生所謂中国人除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这正是因为机器用在資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結果；就是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真是先生所謂除少数外都未得着人的生活，所謂少数就是掠夺階級的資本家（含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夺的劳动者实在未得着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閘北或营盤口貧民窟里去看看那些劳动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內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訓。这种多

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若说中国穷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仅由资本家压榨，我便有两个质问：（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与都会少数人过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奢华的生活”，是从那里来的？当真他们的命运比多数得不着人的生活的好些吗？（二）中国对欧美比较一般的贫乏是什么缘故？这一般的贫乏能否逃出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打倒手工业时必然造成多数失业及物价昂贵的公例？即让一步说中国一般的贫乏是完全由外国资本主义制下机器工业造成的，于中国资本家丝毫无涉（其实国内资本主义底掠夺方法同外来的是一样，不过是程度上的区别）；但是我们所谓资本主义不应该分别内外，若果资本主义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抬轿为苦，反以不得抬轿为忧，便是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应该欢迎的；若果资本主义不能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国资本家，造成一班中国资本家，也不过使中国人中之少数人免于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所以先生所主张的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因资本主义生产制下，无论资本家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决不能够使多数人“都”得着人的生活。

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资本和资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曾在《星期评论》一段短评上说的很清楚，兹录如下；

教不变的蠢才，无论怎样蠢的小孩子，教他识字，总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着读，惟有一班新第一阶级和旧日好男不当的东西，真是不容易教变。五日报载松滬护军史的布告上说：“国家实业之发达，全赖资本与劳动力的调剂，资本家与劳动家须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对抗之态度”。到今天还是持这种

态度，真可謂教不变的蠢才。等着！我再教你們一次。“要发达实业，非有資本与劳动不可，但是并不是非有資本家不可。資本是資本，資本家是資本家。劳动力是生在劳动者身上的，是拆不开的；資本不是长在資本家身上的，是拆得开的。惟是中国的实业不振兴，所以我們要求資本，惟是中国眼前沒有很多的大資本家，所以更不应该制造資本家。（后略）

以先生底知識当然能分別資本与資本家不是一物，但資本与資本家既非一物，即不应因为开发实业需要資本便牽連到需要資本家并資本主义。先生自己也說实业之兴办虽不限于資本主义，可見別的主义也有开发实业底可能性，实业开发了，照先生底意見自然能救一般的貧乏！那么，何以因緣，先生到了一趟湖南，便看出救济中国的貧穷非欢迎資本主义不可？

楊端六先生“与罗素先生的談話”中，也說資本制度会演出欧美今日的危險，已是不好了。又說資本制度总之都不好。但楊端六先生罗素先生虽然不相信資本主义完全是好，同时又觉得政府及劳动階級都不可靠，結果仍归到資本家，仍只有希望資本家来开发实业，好补救国民的一般的貧困；而且不經過資本主义的階級，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先生底意見也是如此。我对于这种意見有三个质问：（一）同是中国人，何以政府及劳动階級都不可靠，只有資本家可靠呢？資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劳动階級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以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廢除了。諸君何以不想想注重努力改造政府或訓練劳动階級来施行新的生产制，而馬上便主張仍旧归到資本家呢？改造事业是要經過万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像政客猎官利用权門不費事便可得現成的。民国以来，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創作改造，专想利用权門得現成的，这种人实在可鄙，真的改造家應該不应该作此苟且的思想。（二）由資本主义漸漸发展国民的經濟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經开发政治經濟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

族，外面政治的及經濟的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 Revolution，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的 Evoluton 呢？（三）諸君既不贊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資本來，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制，而楊端六先生所謂“中國的資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資本來”。先生也說“向有不願以財產充資本之習慣”。“最大原因莫甚於企業者之不道德，……視投資為危途，則資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來，先生等所迷信的資本主義，仍是一個空中樓閣；而先生等又不歡迎外國資本主義，將以何法來開發中國底實業呢？

資本主義果然是好的，無論中外都應該歡迎；若是壞的，無論中外都應該反對。我們急于要排斥資本主義，本來不限於中國人，大部分還是因為外國資本主義壓迫我們一天緊迫似一天，真是羅素先生所謂“束縛中國生死”了。

中國勞動者沒有組織，沒有階級的覺悟，不能作階級的爭鬥來抵抗資本家，所以生活極苦而工價極賤，造成外國資本家群來掠奪底好機會；他們始而是經濟的掠奪，接着就是政治的掠奪，漸漸就快作中國底主人翁了。按諸產業競爭的原理，手工業遇着機器工業必然要失敗的，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遇着大規模的也是要失敗的；以組織力薄弱的中國資本家遇着組織力偉大的歐美資本家，那能夠不失敗，將來那能夠不降入勞動階級。所以我曾說過，我們中國人別輕視勞動者，不久我們都是外國資本家底勞動者；我又說過，那時革中國資本家命的，不是可憐的中國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國穆耦初虞洽卿先生們。這種狀態，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所謂中國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是外國資本家底買辦；只能夠幫着外國資本家來掠奪中國人，只望他們發達起來能夠抵制外國資本家，能夠保全中國獨立，再過一兩世紀也沒有希望。

前文所論三項，雖然不過是就先生底立論添點蛇足，却是我們

重要的爭点。此外还有几句枝叶上的話也要請教于先生：

中国底貧困在先生办《解放与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听了罗素观察未久几句主觀的說話，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国現在沒有談論甚么主义的資格，沒有采取甚么主义的余地”。这种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談而特談甚么“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主义”甚么协社主义甚么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甚么資本主义呢？

先生屢說不贊成采用欧美現成的主义，但不知先生所欢迎的資本主义是不是欧美現成的？

先生說：“中国无坐食利息之股东”。請先生去問問招商局，开灤矿务局，大生恒丰厚生德大等紗厂，商务印书館，他們的股票是否都归經理人所有？

先生說中国資本家可怜，請問死在开灤矿洞的几百人可怜不可怜？

馬克思固預料在果上資本主义必倒，但未尝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車撞壁的必倒狀況，先生即然觉得資本家可怜，何必更教他們推車撞壁，而不教他們曲突徙薪呢？

先生說中国地域如此之广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一主义，請問俄国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变的嗎？

先生既主張“惟有各地自决”，又主張“不妨各据当地的情势而定”，則全中国大的工业都陷于无政府的生产狀況，岂不和先生倒外国資本主义底主張相冲突嗎？

先生預料十年內不能实行劳农主义，便取不贊成态度，不知先生所謂“我輩不主張社会主义則已，若主張之，則当有极长期之耐性”，作何解說？

先生一方面預断伪过激主义必然发生，一方面又主張并宣傳事业亦可少做，請問既是必然发生，宣傳还有何坏处呢？先生所反对我們所贊成兩方所爭論都是指那真的，于伪的有什么相干呢？果然如先生所料伪的必然发生，只有赶快努力宣傳那真的来糾正他，

豈是顛覆官僚的閉關政策所能了事的嗎？

先生說：“現國內以缺少真正之勞動者故止能建立兵匪階級的国家而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国家。”又說：“宜我輩居今日之中國欲建立勞動者專政而患無勞動者也。”我以為先生若欲在理論上擁護非勞動者的先生們專政，反對建設勞動者的国家，還可說彼此各有一是非；至於顯然的事實卻不可以任意顛倒，請問怎樣才是真正之勞動者？請問中國若無勞動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車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辦的報，是何人排印出來的。

先生以為近來始有二三實業組織，資本主義方在萌芽，應該先經過 Bourgeois 的政治及資本主義的經濟，然後才說得到社會主義，然這樣完全聽着自然的 Evolution 而不加人力之 Revolution，馬上在中國成立的 Bourgeois 階級的是不是中國人？

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底余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痴人說夢？既然還沒有何種主義的區別，全中國人就是一个大同盟，另外謀什麼大同盟呢？

先生說：“若但求我名常在新之方面，則他日設有反社會主義出，必又為反社會主義者矣，為個人計誠得，其奈事實何！”，這話說得真痛快，但請先生自省已否犯了這個毛病？

在外国得一博士還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十年內決無建立真正勞農國之可能，使明白宣布拋棄從前“中國與俄聯盟，建立勞農国家，以兩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資本主義”底主張，是不是太想得現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學生的速成思想也傳染給先生了呢？

先生說：“今中國之主張勞農化者，其不與舊日黨派有關能有幾人”？我要請問先生；今中國之主張資本主義者，其不與舊日黨派有關能有幾人？同是舊日黨派，究竟那一個是進步的？

我們總問先生幾句話：現在的社會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會是要跟着社會現狀走，還是要打破現狀？打破現狀是不是要自己努

力，是不是可以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現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說“中国无人有 Dictator 之資格，……正犹軍隊，不在有帥而在有兵，今既无兵而又无帥”。請問先生只望何人來做出現成的 Dictator 做出現成的兵和帥，好供給先生解决中国底問題？

通觀先生底論，是不是处处都犯了“只望利用他人做出現成的”和“速成无望便要改变方針”兩大毛病？

（选自《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出版）

社会主义批評

在广州公立政法学校演讲

陈 独 秀

(一) 为什么要講社会主义？

古代所讲的社会主义，都是理想的；其学說都建設在倫理上面，他們眼見得穹人底苦惱是由貧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底貧富弄得絕对的平均或相等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貧富，都是理想，不曾建設在社会底經濟的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因为已成的社会都有他已成的經濟的事实在那种做改革进化底障碍，我們固然不應該跟着他維持現狀，然而也断乎不能够妄想把社会当做米粉团子由我們任意改造。近代所讲的社会主义，便不同了；其宗旨固然也是救济无产階級底苦惱，但是他的方法却不是理想的簡單的均富論，乃是由科学的方法証明出来現社会不安底原因，完全是社会經濟制度——即生产和分配方法——发生了自然的危机，要救济他的危机，先要認明社会底經濟的事实（譬如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拿从前人口稀少农业时代的理想来改造現代人口发达的工业社会，便是未曾認明現社会底經濟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面，来設法改造生产和分配底方法。因此可以說馬格斯以后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客觀的是建設在經濟上面的，和馬格斯以前建設在倫理上面的空想的主觀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

現代生产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現代生产方法有二大缺点不得不急图改造的：(一)是資本私有。現在大工业时代和从前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不同，不是簡單生产工具可以生产的

了；資本既然是私有，結果有資本的人才有工具做工生产，沒有資本的人便无工可做，只能卖劳力給有資本的人替他做工生产。其結果生产事业越发达，雇人的游惰階級和被雇的劳苦階級底分离越发显著。(二)是生产过剩。自从自由派的經濟學說得势以来，現代产业界完全放任資本家自由竞争，陷于无政府状态，关于生产品底种类額量，不受国家之統計調节，資本家乘时投資，爭加产額，一旦供过于求，遂至生产过剩发生經濟界之危机。救济这二大缺点，只有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資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底机会，社会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誰也不能据为己有，誰也不能租給他人收取利益，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一个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額及交換都由公的机关統計調节或直接經營，务使供求相应，不許私人投机营业，这样才可以救济第二个缺点。

現代分配方法底缺点在那里？为什么要改造？缺点就是剩余价值，工人血汗所生产所应得的，被資本家用紅利底名义掠夺去了。例如前年上海有一家紡紗厂，資本一百萬元，一年賺了淨利一百萬元，用工人二千，平均每个工人每月工錢八元，一年工价全額不过十九万二千元，再加上总理以下各職員底薪水至多不过十萬元，再就算上資本家底官利二分二十萬元，共总只有四十九万二千元，其余的五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資本家底财产了。这个紡紗厂底二千工人和一班職員劳力所做的生产品底全价值是一百萬元，是應該归他們全收的；但他們只收得生产品之一小部分价值二十九万二千元，其余一大部分七十万零八千元，都变了資本家荷包里的剩余价值。像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法，是社会主义时代所不許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纵然不能馬上完全撤廢工銀制度，終要取消私人营业的利息制度，对于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不是直接使劳动者全收，也是由国家收取一部分仍間接的用在劳动者身上，决不会变为資本家底私有财产。

总之：在生产方面廢除了資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廢

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

(二) 为什么能讲社会主义？

我们无论主张什么，第一步是问要不要，第二步是问能不能。若是不能，那“要”仍然是一个空想。若问现在能不能讲社会主义，是要研究现在能不能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关于研究这个问题，先要明白资本主义底来历，进而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底危机，然后才达到结论。

资本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土地，矿山，机器，房屋等一切生产底工具，无工具不能生产，犹之无本不能生利，所以叫做资本；纸币是金钱底代表，金钱是资本底代表，都不是资本底本身。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一定劳动，利用自己占有的资本雇用别人劳动而生产而得利益。资本是社会的劳动力所积而成，是社会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反对资本的，我们所反对的乃是个人占有这资本利用这资本增加他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底历史很早，远在渔猎时代，倘若那时雇人渔猎，或借器具给人渔猎而分得利益，都和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相同；到了农业时代，雇人耕种或买奴隶耕种，这时资本主义更是显然了；近来工商业时代的资本主义，性质虽与古代相同，而程度之差算是天渊之别了。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最大原因有二：（一）由于交换方法之进步 古代物物交换，资本不易积聚，由资本而得的利益，譬如一万担谷或十万张牛皮，便不易于转移堆积了；后来发明了以金钱代表实物，小小的一块银可以代表几担谷几十张牛皮，交换方法进了步，资本主义也跟着进步；后来又发明了以纸币代表金钱，薄薄的一小张纸可以代表一千元一万元，交换方法更进一步，资本主义也跟着更进一步；到了银行制度发达起来，交换方法充分便利，无论多大数目的资本转移，只要银行记一笔账出一张票子便得，这种便利的交换方法，比起古代拿多少担谷换多少张牛皮真是天渊之别，所以近代资本底

积聚和資本主义底发达，比起古代来也有天淵之別。(二)由于机器盛行。在手工业时代，有一把斧头一个墨斗便可以做木匠，有一套网便可以打魚，有一架紡綫車便可以紡紗，有一架織布机便可以織布，有一把刀便可以刻字印书，人人都很容易得着这等简单的生产工具做一个独立生产者，所以在手工业时代，那雇人的資本阶级和被雇的劳动阶级是不大分明的；在这时代就是資本家自备工具雇人做工，那掠夺剩余价值来增加他們私有财产的速度也是很慢，例如每人用一机，每日織布一丈，价格一元，除去原料房屋等六角，人工二角，資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不过二角，一百架机用一百工人做工，資本家所掠夺的剩余价值，每日也不过二十元；若用蒸汽机，一百人做的工五个人就够了，資本家只付工价一元，其余九十五个人工价十九元都被資本家掠夺去了，这时一日的剩余价值由二十元增至三十九元，这时工人与資本家所得乃一与三十九之比，推而至于五十人做工，資本家所获剩余价值乃至三百九十元，五百人做工，剩余价值乃至三千九百元，五千人做工，資本家一日掠夺的剩余价值乃有三万九千元之多。近代資本之所以如此集中，資本主义之所以如此发达，資本家之所以如此强有力，都是机器帮忙替資本家造成剩余价值漸次积聚起来的。机器积聚剩余价值既这样的迅速，交換方法又这样的便利，所以近代資本主义之发达，迥非手工业时代所夢想得到的了。

一方面資本主义随着机器工业发达，机器工业复随着資本主义扩张，互为因果，一天一天的兴旺起来；一方面因为机器工业底生产产品成本輕貨色又好，他所到的地方，手工业之破坏好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这时候的劳动者所得工資只能糊口，那里还有錢买机器，无机器不能做工，不做工不能生活，所以世世子孙只有卖力給資本家做劳动者；資本家占有了机器土地及其他生产工具，所以世世子孙都是資本家；因此自近代資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資兩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資本阶级底势力日見雄厚，劳动阶级日見压迫，除忍受安命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

資本主義既這樣強盛，壓迫得勞動界無路可走，何以還說能講社會主義呢？不然不然。正因為剩餘價值替資本階級造到這樣強盛的地位，而資本階級必然崩潰不可救的危機也正含在這剩餘價值里面。馬格斯說：“有產階級鍛煉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正指資本階級是剩餘價值造成的，將來破壞資本階級的也就是剩餘價值。一定有人說：資本家占了剩餘價值，資本無限增加，機器無限增多，生產品無限產出，豈不是很好的現象嗎？豈不深合生眾食寡為急用舒的孔門經濟學說嗎？殊不知在共產社會里生眾食寡為急用舒或者是好現象，在資本制度之下可就不然了。在資本制度之下生產品增多，剩餘價值也隨着增多，此種無限增加的剩餘價值復變為資本，不能為社會公共增加福利，乃為少數的資本家所私有，於是乃由剩餘價值造成生產過剩，由生產過剩造成經濟恐慌（Crisis），所以說生眾食寡為急用舒在資本制度之下不一定是好現象。

上面的話或近于抽象了，再詳細說一下：在理論上看起來，社會上最怕的是貧乏，生產品多多益善，生產過剩是生產額超過了需要額許多許多，本算是好現象；但這種生產過剩的好現象，在資本制度之下反變成了社會底危機，乃是因為生產額超過了需要額，這就叫做供過於求，這便發生銷路底困難，過剩的額越大，發生的困難也越大；例如社會上需要的布只一千匹，現在產出一千五百匹還不大緊要；若是產出到二千匹或至三四千匹，生產過剩額到了這步，社會上必然發生經濟恐慌。因為資本制度之下的產業狀況是極端自由的，是無政府的，無論何項產業資本家都可以自由聯合自由投資增加生產品，不加以法律限制的；生產品賣出的大部分利益，又被資本家自由收為自己的剩餘價值，勞動者所得僅足糊口，生產較需要過剩了几倍，資本家雖然可以奢侈些，也斷不能把同樣的消費品陡然增加几倍，例如平常需布千匹，因資本階級底奢侈，需要至多增至一千五百匹，勞動界因購買力不增加，不能多銷，那生產過剩的二三千匹布，乃至發生滯銷，跌價，停工，社會的經濟恐慌，這是必然的現象。這種必然的現象總括說起來，乃是資本制度之經

济的自然結果，因为資本制度的生产方法是无政府的，是自由增加不加以法律限制的，所以才有生产过剩的事发生；因为資本制度的分配方法是太过不均的，是承认資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資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则劳动界底购买力便无从增加，劳动界购买力不增加則社会上消費量便不能和生产量同等增加，生产量和消費量不同等，所以生产过剩反要发生經濟恐慌。

一定又有人說：資本制度既然是自身造成了必然崩潰的危机如馬格斯所指示，而馬格斯身后数十年資本階級何以不但未曾崩潰并且日見强盛呢？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殖民政策一时的救济，并不是馬格斯學說失了效驗。各国資本家拼命占据了剩余价值，拼命推广制造业，拼命寻求殖民地將所有的剩余生产送去銷售了，才能够弥縫一时表面上沒有十分現出危机来。所以近百年来，甲国与乙国战争，或者直接征服殖民地，消費了许多生命財產，結果所求得的不过是几条通商条約。因此資本主义便不得不和軍国主义結了不解之緣，因为鎮压殖民地或与他資本国爭奪商場都非有强大的海陸軍不可。名为自卫，或是爱国，或是民族的向外发展，这都是騙人的話，其实都不外銷納剩余的生產品，好免国内的經濟危机，好維持資本階級底权利；試看前几年欧洲大战，美其名曰民治与强权底战争，其实只是英国利用各国打倒德国，为保全他的世界海运权及亚非兩洲底商权罢了，这完全和日本硬用武力擴張在中国朝鮮底商場，还美其名曰保存东亚和平是一样。

有许多人一面反对軍国主义而一面却贊成資本主义，这真算糊涂极了，資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法一天不廢，侵略的軍国主义如何能够廢掉。美国威尔遜總統十四条大言是怎样失敗的呢？正因为他不懂得資本制度是国际侵略及战争底根本原因，不变因，求变果，岂有不失敗底道理。当日巴黎和会席上的英法当局，并不是良心特別比威尔遜坏些，乃因为他們的国家組織都立在資本主义上面，若是放弃了侵略主义軍国主义，他們国里的大批剩余生产如何銷納，如何救济經濟危机，如何維持他們資本階級底地位呢？威尔

遜總統不過說得好聽點，如果他美國當真拋棄了軍國主義，他美國在國外底殖民地和商場拋棄不拋棄？如果拋棄了，國內底剩餘生產怎麼樣？所以威爾遜總統主張不但在巴黎和會失敗了，並且此時美國底海陸軍備仍然是有加無已。日本鑑於美國底情勢，恐怕失了太平洋西岸商業底威權，也不能不竭力增稅擴張海陸軍備到現狀一倍以上，日本當局非不知這稅太重了全國底工人農民小學教員下級軍官底困苦和不平是可恐的危機，但是他們更知道沒有充分的武力保護商業不能輸出剩餘生產乃是更大的危機，所以明知道擴張軍備是毒藥也不得不吃，明知道擴張軍備是陷阱也不得不從上面走過去。資本制度一天不倒，各資本制度的國家保護商業的軍備擴張也一天不能停止，相互競爭擴張軍備是無限的，相互爭得的殖民地或商場是有限的；我相信生產過剩的弊害資本家終是沒法救濟，非弄到破裂不止，我更相信軍備無限的擴張是資本階級殺人適以自杀的利器；我相信當初資本階級是拿殖民政策或國外商場救濟了國內生產過剩的危機，我更相信將來資本階級正因為互相爭奪殖民地或商場，釀成國際資本階級大傾覆的更大危機；我相信歐戰底結果，國際資本階級底基礎已經大大的動搖，我更相信將來再經過一二次美日或英美戰爭，便到了資本階級底末日，即國際的崩潰。因此我們可以斷定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不良，已到了自身不能救濟自身底危機必然崩潰的運命，代他而起的自然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分配方法，才能免剩餘價值，剩餘生產等弊，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能講社會主義。

一定又有人說：資本主義在歐美是要崩潰的了，是可以講社會主義了；我們中國資本制度並不甚發達，更沒有到崩潰的地步，如何能講社會主義呢？像這種似是而非的話，恐怕很有許多人相信；其實他最大的缺點，是忘記了現代人類底經濟關係乃國際的而非國別的了。如果他斷定歐美資本制度要崩潰能講社會主義，他便不應該說中國不能講社會主義仍要採用資本制度。因為交通便利，需要複雜底緣故，有許多事都漸漸逃不了國際化，經濟制度更是顯

著；各国資本制度都要崩潰，中国那能够拿国民性和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到是各国資本制度底崩潰还未现实以前，中国单独完全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恐怕免不了資本主义各国經濟上政治上的压迫，这层事实上的困难，我們到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們确有几个理由可以說明努力打破这层困难底必要及可能；（一）是救济中国断不能不发展实业，但采用在欧美已經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資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謀了；（二）中国全民族对于欧美各国是站在劳动的地位，只有劳动階級胜利，才能救济中国底危急及不独立；（三）是现代国际化的力量固然很大，但是制度底改变，必先由于国别的提倡，冒着困难使新制度渐渐现实，渐渐成为国际化，那时新的制度便确立了；（四）是欧战以来，資本制度已經大大动摇了，我們正應該联络各国底同志作国际的改造运动；（五）是在不完全破坏外資相当的利益范围以内，由国家立在資本家的地位經營国内产业及对外贸易，也未必不能免绝对的干涉。

据这五个理由，此时我們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底必要。

（三）应講何种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既然有讲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他的派别分歧，我們應該擇定一派，若派别不分明，只是一个渾朴的趋向，这种趋向会趋向到資本主义去；若觉得各派都好，自以为兼容并包，这种胸无定見无信仰的人也不配談什么主义。除了“廢止資本私有”为各派社会主义共通之点以外，从来学說不一，至今尚留存的，有力量的，可分为五派：

- 一，无政府主义
- 二，共产主义
- 三，国家社会主义
- 四，工团主义

五，行会社会主义

上述五派之中，工团主义算不得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乃是由馬格斯和无政府兩派合演出来的。工团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張階級战争，是出于馬格斯；二，不要国家及政权，是出于无政府。他的缺点正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幻想的病；劳动者本来沒有国家沒有政权，何待你不要，你尽管不要，資本階級他是要的，他是要拿国家及政权来压制劳动的；工团主义者以为国家政治总会侵害工人底自由，試問呻吟于資本家政权之下的法国工团他們的自由在那里呢？

行会社会主义，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也非一种特别独立的学说，他一方面主張經濟組織由行会管理，是受了工团主义工业自治的影响，然失了工团主义階級战争底精神，一方面主張政治組織由国家管理，是受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国家存在的影响，然失了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干涉生产事业底作用。行会社会主义者自以为他的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圓滿最穩当的了，他以为拿行会代表生产者底权利，以国家代表消費者底权利，这样公平的調和，可以免得剧烈的革命了。这种調和的理想是英国人的特性：其实他有兩個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陸軍警察完全交給資本階級了；（二）政治事业和經濟事业有許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貿易之类是也。

所以我要注意的是前三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也算有点萌芽，北京上海四川广东都有一小小部分青年相信。但我以为相信一种主义，不應該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如果指不出他的精髓，就不配說信什么主义，也不配批評什么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也分为几派，我以为各派共通的精髓所在，就是尊重个人或小团体底絕對自由。这种偏重自由的精神，最好是应用于艺术道德方面；因为艺术离开了物质社会的关系，沒有个体自由底冲突，所以他的自由是能够絕對的，而且艺术必須有絕對的自由，脫离了一切束縛，天才方可以发

展；道德重在自律自动，和法律的作用完全不同，不自由的道德很少有价值。若論到政治經濟方面，无政府主义便完全不适用了。

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 后 天 的 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經濟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們只應該漸漸改良政治經濟制度，使人性漸趋于善教育漸能普及；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問，那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的把药廢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先就經濟而言：現代工业发达，一个工厂往往有数千数万人；而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絕對自由，不許少数压多数，也不許多数压少数，九十九人贊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試問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可以人人同意，如不同意，岂不糟极了么？而且个人或小团体絕對自由，則生产額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因为没有統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調节，自然会发生生产过剩或不足的弊端。但无政府主义者必定說：我們可以自由联合，公議生产事业，断不至有这样过剩或不足的情形发生；那知一面贊成絕對自由，一面又贊成联合，是不对的，也不能成功的，我常說要絕對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絕對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因为各个生产团体各个利害不同，若是沒有一个統一机关用强制力去干涉調节，各个生产团体主張各个的絕對自由，这样能联合不能？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沒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經濟問題，試問怎么能够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怎么能够調节生产只使不至过剩或不足？怎么能够制裁各生产团体使不至互相冲突？怎么能够轉变手工业为机器工业？怎么能够統一管理全国交通机关？再就政治方面而言，他主張人不干涉人，要根本廢除法律，这件事也是很錯的。因为我們固然不滿意现在的法律，但将来只可以把他修改，不能絕對的廢除，如果絕對的廢除，便发生困难。凡有社会組織，必有一种社会制度，随之亦必有一种法律保护这种制度，不許有人背叛，就在无政府时代也必須是如此。发癲的人，任何时代都是有的，我想

不会有人主張放任发癲的人去杀人放火，倘若干涉他，把他拘管起来，便是压制他的自由。不过发癲是極端的現象，由发癲以至最輕的精神病者或強漢，都應該受法律之制裁。又如兩性戀愛，以兩男戀一女，或二女戀一男，彼此便会发生冲突，冲突劇烈的时候，又怎样裁判呢？再从事实上着想，像中国人賭錢吸鴉片烟这等惡习，是不是應該有法律禁止呢？社会制度初变更的时候，应受教育的人而不肯受教育，有劳动能力的人而不肯劳动，要不要加以法律的干涉呢？監守公物而自盜，強力迫胁不悅己的妇女，这种人無論到何时代恐怕都有，应不应加以法律的制裁呢？所以我敢說，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經濟兩方面，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額裂不可，这是何苦呢？

五派中的一四五已經略略批評过，再进而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比較的討論一下。这两派原来都出于馬格斯，馬格斯主义在德国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他的精神他的实质都是社会民主党，所以也叫做社会民主主义，因为他主張利用有产階級底議會来行社会主义，所以也叫做議會派，內中無論是柯祖基底正統派或是柏倫斯泰因底修正派，都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在俄国才还了馬格斯底本来面目叫做共产主义，其初在俄国也叫做社会民主党，随后党中分为急进溫和兩派：溫和的是少数派，叫做敏什維克党；急进的是多数派，叫做布尔什維克党；其后多数派革命成功，改称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虽同出于馬格斯，而兩派的主張彼此却正相反对如下表：

共产主义底主張	{	階級战争	国家社会主义底主張	{	劳資携手
		直接行动			會議政策
		无产阶级专政			民主政治
		国际运动			国家主义

第一，德国底社会民主党在理論上虽未曾明白的标榜劳資携手，而在实际上已令劳动者从事选举运动，已利用資本階級底政府国会采用社会政策改善劳动底地位，已实行与一切資本階級的政

党提携，已反对无产阶级共同团结了。反之俄国底共产党是主張絕對的階級戰爭的，是不獨反对与資本階級妥協而且是反对与一切不主張階級戰爭的溫和派提携的。馬格斯底《共产党宣言》自第一頁到最末頁都是解釋階級戰爭历史及必要的讲义，可惜自称为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記了！

第二，不贊成階級戰爭的人自然要向議會討生活；但我們要知道議會制度本是資產階級专为供給及監督他們的政府底財政而設立的，要拿他来幫助劳动者，来廢除資本私有制度，豈不是与虎謀皮嗎？选举底怪現象各国都差不多，就是实行普通选举，劳动界能得多少議員，有多大效果呢？所以馬格斯底著作无一不是主張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階級取革命的行動，沒有一句主張采用議會政策的，可惜自称为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記了！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許有产階級得到政权的意思，这种制度乃是由完成階級戰爭消灭有产階級做到廢除一切階級所必經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問俄国共产党：有产階級的人也是国民，何以单单主張无产者一階級专政？俄国人答道：你們何以不主張全国国民都加入无产阶级？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問道：一階級专政豈非不合民主制度？俄国人答道：你們所謂民主政治底內容是不是有产者一階級专政呢？柯祖基著书大攻击俄国底无产阶级专政，說不合乎民主政治，說不是馬格斯主义；其实馬格斯在《哥塔綱領批判》中明白的說：“在資本主义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底中間，有一个由这面推移到那面的革命的变形时期。而这个时期，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就为必要。这个政治上的过渡时代，不外是无产阶级底革命的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宣言》上更是大声疾呼的說：“（一）糾合无产者团成一个階級，（二）顛复有产階級底权势，（三）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又說：“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步是在使他們跑上权力階級的地位……既达第一步，劳动家就用他的政权漸次夺取資本階級的一切資本，将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是集中在組織权力階級的劳动者手里”。可見无产阶级专政明明是馬格斯底主張，可

惜自称为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記了！

第四，俄国底共产党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虽然同一不反对国家組織，是他們不同之点有三：（一）生产机关集中到国家手里，在共产党是最初的手段，在社会民主党是最終的目的；（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带着很濃的德意志国家主义的色采，俄国共产党还未統一国内，便努力第三国际的运动；（三）社会民主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有产階級的国家，共产党所依据的国家是无产階級的国家。所以有人說馬格斯当初所主張的俄国現在所实行的都算是国家社会主义，这话是不对的。《共产党宣言》中，虽主張将一切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信用机关都集中在国家手里，这不过是社会革命时最初的手段，所以同时又說：“无产階級都沒有絲毫国民的特性存在，‘各国无产階級在他們国里爭斗的时候，共产党一定脫出一切国家的界限，替无产階級全体指示共通的利害。’‘劳动階級如果握得政权，那些东西（指国民的差別和国家的对抗）都要消灭得更快，因为各国底联合政策，是劳动階級解放底一种首要条件。’”《共产党宣言》最后的名言正是：“世界劳动者团結起来呵！”馬格斯所主張的国际运动的色采是何等濃厚，可惜自称为馬格斯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忘記了！

由以上四点看起来，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記了馬格斯底學說，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馬格斯派的招牌，而世界上一般心盲的人，也往往拿德国社会民主党底主張代表馬格斯派社会主义，这真是世界上一件不可解的怪事。

我們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應該采用那一种呢？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諱飾的了；国内的資本階級虽尚幼稚，而国外資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知道的，因此階級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應該发达的了；再睜开眼睛看看我們有产階級的政治家政客底腐敗而且无能和代議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議會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

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給腐敗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

（选自《新青年》，第9卷第3号，1921年7月1日出版）

造 国 論

独 秀

以真正国民軍

創造真正民国

我們中国此时在名义上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比南洋馬來群島會長割据的英荷殖民地高明不多，那里算得是一个独立的国！在經濟方面：国家重要的权利大部分抵押給外国了，外国貨充滿了全国，全中国人都是外国生产国家的消費者，全国金融大权都直接或间接操諸外人之手。在政治方面：大小會長分据了中央及地方，这班大小會長之发号施令又惟公使团之意旨是从。南洋英屬荷屬殖民地的政治經濟狀況完全是这样如何能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这样殖民地狀況之下，有何国会可言！有何法統可言！有何宪法可言！有何政治可言！所以我們以为中国还在“造国”时代，还在政治战争时代，什么恢复法統，什么速制宪法，什么地方分权，什么整理財政，什么澄清选举，对于时局真正的要求，不是文不对題，便是隔靴搔痒。时局真正的要求，是在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創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

这个問題倘然决定了，接着第二个問題就是用什么方法来造国？

我們的答案是：組織真正的国民軍創造真正的中华民国。

这个国民軍，是應該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階級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階級觉悟的大群众組織而成。在这創造国家的大事业中，自然少不得許多有力的領袖，但英雄时代賢人政治时代都快过去了，这种新势力若不建立在大群众的需要与同情的力量上面，不是难以持久，便是造成新的軍閥。在

中国的产业状况看来，这种大群众决不是那一个阶级的群众在短期内能够壮大到单独创造国家的程度。商人说，在商言商不与闻政治，教育家主张不谈政治，至今没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发生，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壮大的表征；在私产制度之下，资产阶级未壮大，无产阶级也自然不能壮大；因此，我们敢说，中国产业之发达还没有到使阶级壮大而显然分裂的程度，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尚未成熟，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各阶级大群众联合的国民革命军如果成立了，国民的革命如果成功了，压迫我们的内外恶势力如果解除了，民主的全国（指中国本部而言）统一政府如果实现了，这时候才有宪法才有政治之可言，这时候中华民国政治上的创造才算成功，而真正的中华民国还只创造了一半，其他一半，乃是中华民国经济上的创造；因为民国必须建设在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上面，人民的幸福又以经济的生活为最切要，经济的生活不进步，所谓人民的幸福，仍只是一句空话。

用什么方法来创造经济？我们的答案是：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由中央或地方（省及市）政府创造大的工业商业农业，一直到私产自然消灭而后已。

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要开发实业，只有私人资本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用私人资本主义开发实业，在理论上我们不能赞成，因为他在欧美日本所造成的罪恶已是不能掩饰的了；在事实上，以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断然不能在短期发展发展到能够应付中国急于开发实业的需要，而且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国内军阀的扰乱未解除以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很难得着发展的机会，到了国民革命能够解除国外的侵略和国内的扰乱以后，无产阶级所尽的力量所造成的地位，未必不大过资产阶级，以现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倾向大过资产阶级便可以推知，那时资产阶级决难坚持独厚

于自己階級的經濟制度，所以我們敢說，采用国家社会主义来开发实业，是国民革命成功后不能免的境界。

政治的創造及經濟的創造都能成功，那时国民軍創造真正中华民国的工作才算完結。

总括起来說：我們造国的程序是：

第一步組織国民軍；

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一切压迫；

第三步建設民主的全国統一政府；

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选自《向导》，第一集第 2 期，1922 年 9 月 20 日出版）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

陳 獨 秀

人類社會組織之歷史的進化，觀過去現在以察將來，其最大的變更，是由游牧酋長時代而封建時代，而資產階級時代，而無產階級時代而無階級時代；這些時代之必然的推進，即所謂時代潮流，他若到來，是不可以人力抵抗的。在空間上各民族以環境所演的機會不同，雖至進化之迅速大相懸絕（例如非洲南洋之游牧酋長社會，東方之封建軍閥社會，西歐南北美之資產階級社會，俄國之無產階級社會，同存於今世），而在時間上，進化的歷程恒次第不爽，這是因為人類治生方法，次第變更發展，由簡單而複雜，造成次第不同的經濟組織而為社會一切組織進化基礎的緣故。

中華民族以地大物博易于停頓在家庭農業手工業自足的經濟制度之下，及與治生方法進化較速的西歐民族隔絕這兩個原因，封建軍閥時代遂至久延生命，由秦漢以至今日，社會的政治的現象，都是一方面封建勢力已瀕於復滅，一方面又回向封建，這種封建勢力垂滅不滅的現象，乃是因為封建宗法社會舊有的家庭農業手工業已充分發展而有更進一步的傾向，但新生的經濟勢力（即資本主義的大工業）過於微弱，還不能取而代之的緣故。

明代西力東漸，這是中國民族思想制度發生空前大變化的最初種子；清代鴉片戰爭，這是西歐資本帝國主義向長城內封建的老大帝國開始發展，也就是沉睡在長城內老大帝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開始大崩潰；甲午、庚子兩次戰爭，這幾乎是中國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後的崩潰，也就是資本民主革命運動最初的開始。近代資本主義的工商業，在西歐征服了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

制度，进化到世界的資本帝国主义，世界各国的銅牆鐵壁都被他打开，封鎖不住了，老大帝国之万里长城那里还封鎖得住？所以中国自甲午、庚子兩次战争以来，已由内部产业之发展遇着外部国际資本帝国主义之压迫，驅入封建宗法主义与資本民主主义之轉变时代，“富强”“維新”“自强”“变法”的呼声遍滿全国，便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自此以后，无论几多老少昏蛋天天讲什么人心道德，什么礼教綱常，什么东方文化，什么精神生活，凭他們喉嚨叫得多少响亮，可怜終于被机器算盘的声音掩住了；这种历史进化的必然現象，就是封建宗法主义进化到資本民主主义的現象，或者也很可憤恨，很可鄙厌，然而我們主觀的憤恨鄙厌心理，終于敌不过客觀的历史进化历程之必然性，因此这班老少昏蛋的咨嗟太息終于无用，因此清西后及剛毅輩无论有何威权終于失敗。

辛亥革命，已由和平的資本民主运动进步到革命的資本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帝制变化到資本民主之剧烈的开始表現。所以单以滿汉民族冲突解釋辛亥革命之原因，那便只是皮相的觀察，忘了經濟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因为辛亥以前，已經有了十七年以上的富强維新运动，辛亥革命，正是封建派压迫資本民主派富强維新运动之反动，所以“非革新不能自强，非推倒滿清不能革新”，是当时革命派反对立宪派之重要的理論。当时革命与立宪兩派的方法虽然不同，而兩派之目的同是革新自强，換句話說，就同是“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这三个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資產階級民主运动的口号，那能說是滿汉民族之爭。

辛亥革命所以失敗的原因（此次革命表面上虽說成功，实质上可說是完全失敗），也正以当时幼稚的中国資產階級，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階級截然分化的程度，未曾发达到自己階級势力集中而有階級的觉悟与革命的需要，他們大部分只看見目前的損失，不懂得民主革命是他們将来的利益，更不懂得民主的革命党之胜利就是他們資產階級之胜利，所以革命事业犹在中途，他們便現出小資產階級和平苟安的根性，反对繼續战争，而且反对革命党，遂使

全国的武装及政权完全归諸帝政余孽北洋軍閥之手。帝国主义的英、美、日本等国知道中国資本民主革命成功是他們的不利，极力援助北洋派压迫革命党，于是革命党失败逃亡，以至帝制兩次复活，革命党屡战屡败，一直到現在还是孤苦奋斗，唯一的原因就是：全国資產階級之多数缺乏階級間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終依賴他們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視或更至嫉視他們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

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质，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非民族革命，更非其他階級的革命，这是如上文所述在經濟的历史的觀察上及革命的前因后果上可以充分說明的。但以革命运动中主要分子而論，却大部分不出于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墮落下来非階級化之士的社会；这种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亲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来革命困难不易完成的原因，不能以此說明他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将来革命事业完全成功时，社会階級分化究竟至何程度，那时对于革命的性质究竟如何解釋，我們現在还不知道，現在也沒求其知道的必要；可是觀察过去及現在的革命运动，确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且我們也应该希望他能成功一实实在在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为依世界的政治狀況及中国的經濟文化狀況和在国际的地位，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正負着历史的使命，这是毫无疑义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狀況既然需要一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須取得資產階級充分的援助；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沒有階級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沒有階級意义和社会基础的革命，在革命运动中虽有一二偉大的人物主持，其結果只能造成这一二偉大人物的奇迹，必不能使社会組織变更，必沒有一个階級代替他一个階級的力量，即或能够打倒現在統治階級(北洋軍閥)，而沒有真实力量牢固的站住他的地位，被打倒的階級时时都有恢复故物之可能。因此，我們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負了中国历史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在这

革命运动中，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傾的觀念，我們對於這種左傾的觀念，自然十分感佩，但是在目前革命事業上，這種浪漫的左傾，實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每個階級的革命，都要建設在每個階級的力量上面，決不是浪漫的左傾觀念可以濟事的。

同時我們對於右傾的觀念，也不得不加以警告。原來在各階級的革命當中，實際參與的只是該階級中一部分最覺悟的革命分子，挺身出來為全階級的利益奮鬥，決不是全階級的動作與意識，並且全階級中一定還有許多失了階級性的分子同時出來依附敵對的階級，來做不利於自己階級之反革命的行動，這是歷史上現社會上常見不足為奇的事。因此，我們雖然主張中國國民黨不可有拒絕資產階級之左的觀念，同時也不主張國民黨有極力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協之右傾的觀念。在產業幼稚資產階級勢力不集中的社會，尤其是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社會，資產階級每每有分為三部分的現象：（一）是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妨礙大規模的工商業發展而贊成革命，如中國海外僑商及長江新興的工商業家之一部分。（二）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素來是依靠外人的恩惠及利用國家財政機關與軍閥官僚勢力，造成了畸形的商業資本，專以賣國行為增加他們貨幣的富，他們自然而然要依附軍閥官僚及帝國主義的列強而反對革命，他們也可以叫做官僚的資產階級，如中國新舊交通系之類；自盛宣懷以至張弧、王克敏，乃是他們代表的人物。（三）是非革命的資產階級，他們因為所營的工商業規模極小，沒有擴大的企圖，沒有在政治上直接的需要，所以對於民主革命恒取消極的中立態度，這種小工商業家，在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社會居最大多數。中國國民黨應該一方面容納革命的資產階級，為他們打倒妨礙工商業發展的一切軍閥，並且為他們排除援助軍閥而又壓迫中國工商業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因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深受外資競爭和協定關稅及種種不平等的條約之痛苦，非排除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成為完全自主的國家，實行保護政策，決不能完成資本民主

革命，所以中国資本民主运动自始便以維新自强抵御强邻外患为惟一的动因；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資產階級，引导他們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至于那班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实是中国真正資產階級发展之障碍，絕對不可和他們妥协。他們为做官抓錢計，有时也鬼混到革命政府做事，一到了困难艰險的时候，他們是絲毫不負責任的；就是在沒有困难艰險时，他們也有使勇敢純洁的革命党变成官僚化的能力。他們始終是靠帝国主义的列强及国内的軍閥而生存，他們始終是阻撓革命运动，他們当中最优秀分子，也不过一足立在軍閥階級，一足立在資產階級，調和兩方面革命冲突，結果必然造成封建的資產階級，封建的資產階級是帝国主义者及軍閥的工具，可以永远阻住本国的資產階級自由发展及国家独立自主。所以国民党要想完成資本民主革命的使命，万不可和反革命的官僚資產階級妥协，因为中国此时的危机，“軍資妥协”更險恶于“劳資妥协”，官僚的資產階級正是軍閥与資產階級妥协之媒介物，也就是資產階級中卖階級之蠹賊，和欧美劳动运动中鼓吹“劳資妥协”来卖无階級之改良派（如社会民主党）等是同样的奸恶。

我們也知道中国資產階級势力微弱，尙不足克服封建軍閥及国际帝国主义，所以使革命党易于采用右傾的妥协政策；但是要知道現有一条活路橫在我們的眼前，就是与革命的无階級携手，打倒我們共同的敌人。中国的經濟現狀，軍閥階級已与資產階級显然分开，而資產階級与无階級之分化，尙未到截然分离的程度；所以革命的資產階級应该和革命的无階級妥协，打倒共同敌对的軍閥階級，不应该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妥协；因为劳动群众本来具有革命的实力，应在革命运动中占重要部分，而且此时和革命的資產階級共同敌对的目标相同，可以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綫；官僚資產階級所处的环境，使他不得不站在軍閥和国际帝国主义者那一方面，决不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联成一个战綫，这是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的。无階級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誠然是資

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也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

总括起来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可是要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全实现，在革命运动中，革命的资产阶级断然不可忘记了两件大事：（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势力而脱其羁绊；（二）是承认无产阶级的势力而与之携手进行。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决没有在国外资本帝国主义政治或经济的侵略之下能够发展的希望，幼稚的资产阶级也很难以单独的力量完成革命事业，所以“反抗帝国主义”及“联络无产阶级”这两个原则，是全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特有的共通原则。

（选自《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出版）

中国农民問題

陈 独 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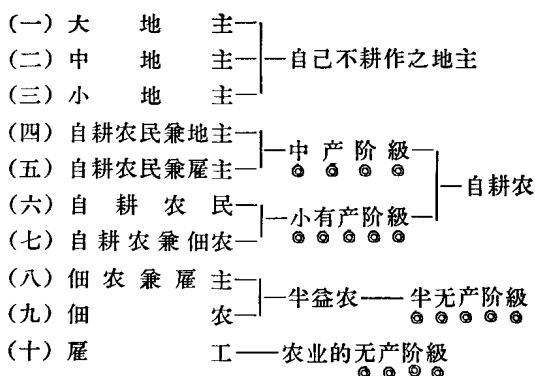
(一)

在經濟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农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数，其国民經濟之真正基础，还是农业；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視了农民的力量。有些自耕农居多数而且是小农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中国），农民所受地主的压迫，不像地主强大的国家（如旧俄罗斯，印度）或資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各国）那样利害，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然所受外貨侵入生活困难及貪官劣紳軍閥灾荒之痛苦，往往也能激起他們的群众运动；这种农民的大群众，在目前已是国民革命之一种偉大的潜势力，所以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軍閥官僚）中，不可漠視农民問題。

(二)

中国人口約六千余万户，而农民有四千万戶以上，是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俄国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日本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即此人数上看起来，我們应感其重要。此农民大群众，其經濟生活程度虽非相差甚远，而經濟地位則有几多复杂之区别，茲将地主与农民略分为十等如下表：（見下頁上表）

有地过万亩之大地主，在全中国每省不过十人左右，此等大地主少数是前清貴族，大多数是旧官僚或新軍閥，他們对于佃农有很大的威权；股分公司居极少数，因为旧法耕地之利潤远不及工商业，故城市的資本家多不肯投資經營农业。



有地过千亩之中等地主，全国至少在二三万以上，他们半居乡村，半居城市，有的是在城市兼营小工商业者，有的是官僚后裔之无职者，专恃收取地租维持生活。其居乡村者，或为绅董把持乡村之政权，或为高利营业盘剥贫农。

有地过百亩之小地主，其数至少十倍于中等地主，他们大多数居住乡村，其职业或在乡镇经营小商业，或在乡村为绅董。

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据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如下：

农户总数	43,935,478
自耕户数	23,381,200
佃农户数	11,307,432
自耕兼佃	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相差极微。

自耕农民中有兼为地主者，是一家族人少而地多，除自耕外尚有余地租给别人耕种，一方面是自耕的农民，一方面又是收租的地主，此种农民为数不多。自耕农民中有兼为雇主者，是一家族自耕自地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此种农民为数甚多。此二种农

民，不独占有地土权，无向地主繳納地租之义务，而且得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掠夺他人之剩余劳动，其生产物不仅供給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并且，至少在丰年时可以获得盈余，变成初步积累的资本，是以此种农民应屬之中产階級。

純粹自耕自地之农民，为数亦不少，其所种之地則甚少。其自耕兼佃农，則因一家族人多而地少，除自地自耕外，又不得不向地主租地耕种，此种农民为数不多。此二种农民，虽非半益农，得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而无掠夺他人劳动力之机会，虽丰年亦难有多量之盈余以为积累；只以完全占有地土所有权，生产工具及生产物所有权，应屬之小有产階級。

佃农兼雇主，是向地主，租地耕种而劳动力不足，雇用别人帮忙者；純粹佃农，乃由一家族任工作不雇用他人者。此二种农民人数略相等，其中又分二等：（一）純粹无地权者，地主随时可向佃农收回其租出之耕地，（二）半有地权者，佃农曾出等于当时地价半值之金額向地主租得耕地，其后能以同等金額或較少之金額輾轉租給別人耕种，原地主只能向現時耕地之佃农收取地租，除出資购回此半佃权外，不能自由收回耕地另給別人耕种。佃农們租地时，須向地主繳納押租金（或名羈庄，退租时可以收回）每亩約一元左右；耕种时須自备生产工具（牛农具食粮等）；所得生产物須繳納一部分与地主，繳納之方法，或預約一定之額租（或名鉄租），無論收成丰歉不得短少，或每年按收成丰歉临时議租；繳納之数量，至少須在收获物三分之一以上。佃农住屋多随地租得，退租时須退还地主。地主对于佃农甚尊严，大地主尤甚，有“东佃如父子”之諺。此等农民既不能掠夺他人，又为地主所掠夺，不能全收其劳动所得之利益，丰年尙可勉强供給一家生活及农作上的需要，荒歉时則衣食且不足，又加以地主追繳租課，不胜其困苦，因此每年秋收时，各地佃农罢租訟案往往占各种訟案平均百分之三十以上。但此种半益农，虽不占有地权或只占有半地权，然仍占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之一部分生产物，故应屬之半无产階級。

雇工是各种农民出一定工資雇用他們做工者，此种雇工分成人及童工兩类，和长工及短工兩種办法；长工以年計，每年工資由二十元至四十元不等，短工以下种或收获时短期間計算，工資略高；童工专事牧牛及零碎輕工作，每年工資不过数元；惟各种雇工的火食均由雇主供給，且間有供給衣服者，长工多給以住所，短工則不然。此种雇工，倘不失业，其生活費反較佃农稳固；惟其不但无地权，而且沒有生产工具及收得并管理其劳动所得生产物之权，純粹是被雇者，各种农民中，只有他們是无产階級。

以上七种农民中，后三种(佃农兼雇主，佃农，雇工，)都是无地的农民，在全国农民总数中約占百分之四十，人数当在九千万以上；因为自耕农民虽多过佃农一倍，而加上雇工，无地者人数纵不能与有地者相等，当亦不至相差甚远。

各种农民所占地均甚少，此时不但无集中的傾向，而且有分小的傾向，据农商部之統計，农民耕地多寡別，民国六年七年比較如下表：

		十亩未滿者	十亩以上者
民	六	17,805,125	13,248,474
民	七	17,914,231	11,303,570

三十亩以上者	五十亩以上者	百亩以上者
10,122,214	5,348,314	2,835,464
6,712,366	4,137,136	2,278,355

(三)

中国农民之痛苦計如下諸端：

(一)一般农民之痛苦

a. 外貨輸入之結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

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改业往城市为苦力，沿海者则移住海外，多数则流为兵匪，此为目前兵祸匪祸之一大原因。

- b. 政治不良之结果，军阀战争及水旱灾荒，也都是使农民困苦失业流为兵匪之一大原因。

合上列二个原因，农民失业者之日渐增多，可以农商部各项统计证明之：

1. 耕地减少畝数

民	三	1,578,347,925
民	七	1,314,472,190

2. 被災畝数

民	三	653,475,445
民	七	61,717,113

以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为最。

3. 荒地增加畝数

民	三	358,235,867
民	七	848,935,748

其中增加最巨者，第一是黑龙江省，由民国三年一万六千六百余万亩，民国七年增至六万八千七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二是广西省，由民三四百余万亩，民七增至一千四百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三是奉天省，由八百九十余万亩，增至一千七百余万亩，多属官有地；第四是湖北省，由四十八万余亩，增至三百八十余万亩，多属私有地；第五是山西省，由二百廿余万增至四百五十余万亩，多属私

有地。

4. 农户减少数

民	三	59,402,315
民	七	43,935,478

据此表，民国三年至民国七年，四年之间，全国农民减少了一千五百万户以上，其中失业之农民必有可惊之数！其中减少最巨者为湖南陕西二省，此为战乱之影响；其次则为浙江山西江苏等省，苏浙为都市工业发达之结果，独山西省工业既未发达，又无战乱灾荒之影响，农户何以减小，岂是模范省缘故？

- c. 农民文化过低，又无组织之结果，地主绅董们，把持乡村政权，鱼肉贫农，两者时生冲突。

(二) 自耕农之痛苦

官吏舞弊额外需索及预征钱粮使地稅无形增加，荒歉时自耕农无力缴纳地稅，极感痛苦，往往有聚众“抗粮”“闹堂”之举，农民暴动几全属此数。

(三) 佃农及雇工之痛苦

- a. 兵匪扰乱及水旱灾荒使农民大为移动，所移住地外来农民之增加超过需要时，同业间发生竞争，遂使地主雇主们对于佃农雇工所要求之条件日益苛刻。
- b. 因城市物价及生活费日益增高，地主们对于佃农之需索随之日益加紧。
- c. 以上述种种压迫之结果，农民因衣食不足及农作上的需要，尤其是春夏间青黄不接时，不得不出于借贷，于是高利盘剥者或地主，乃乘机以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百的利息，吸取贫农之血汗，此项痛苦以无地之佃农为最普遍而且特甚。

(四)

欲解除此等痛苦，且引导其加入国民运动，应依各地情狀采用下列方法：

(一)教育及宣傳 教育以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注音字母的傳布）及世界大势。宣傳以“排斥外力”“打倒軍閥”“限田”“限租”“推翻貪官劣紳”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迴讲演）。

(二)組織及实际运动 組織有四种：

- a. 农会 小农中国之农民，他們各階級間无显明的分化，此时全乡村各种农民（自耕农，佃农，雇工）可就其共同利害之点，联合为一个組織。各地旧有农会虽有法律的地位，而組織之分子多非农民，今应鼓吹真正农民改造之，以反对橫征暴斂之官吏，压迫佃农之大地主及魚肉貧农包办选举之劣紳为对象；以“組織消費协社”“組織农民借貸机关”“組織谷价公議机关”等为实际运动。
- b. 乡自治公所 此亦系旧有的地方政治組織，南方各省尤正在进行，在此組織中应以組織乡团抵御兵匪，改良水利，要求“县长民选”为主要运动。
- c. 佃农协会 以向政府要求“限田”（限制私有地权在若干亩以內，即以此等大地主中地主等限外之地权分給耕种該地之佃农。）“限租”（每年应納地主之租額，由各农村佃农协会按收成丰歉自定之。）为佃农特有之运动。
- d. 雇农协会 以協議工資及介紹工作为主要任务。

（选自《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出版）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陈 独 秀

(一)

人类经济政治大改造的革命有二种：一是宗法封建社会崩坏时，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是资产阶级崩坏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此外又有一种特殊形式的革命，乃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

殖民地的经济权政治权都完全操在宗主国之手，全民族之各阶级都在宗主国压迫之下，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这是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半殖民地的经济权大部分操诸外人之手，政治权形式上大部分尚操诸本国贵族军阀之手，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

殖民地革命的对象是宗主国，固然无所谓民主革命；即在半殖民地，一方面因为工商业受外力之阻碍不能充分发展，资产阶级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因为贵族军阀受外力之羽翼而存在，所以也不能形成一个纯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国民革命的性质虽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他的胜利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革命运动中的形式及要求却只是一个国民革命，这种特殊形式的革命，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所自然演成的。

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勢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說了。

(二)

半殖民地的中国自然也沒有例外。領土广大交通不便經濟組織还是地方的社会組織还是家庭的文字組織还是半象形的中国，連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断然不可怀絲毫速成的妄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可以說自甲午战敗起，过去历史已将近三十年，此三十年中，第一期是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第二期是辛亥革命运动，第三期是“五四”以来学生及工人运动。这三期运动之成績虽然都很微末，而加入运动的各階級都以次扩大，这是不能否认的。第四期运动是什么？我們虽未能預断，而距运动成功的时期仍然甚长，及資產階級漸漸明确的感觉国民运动的必要并显著的加入此种运动，这两件事是可以推知的。

(三)

經濟落后文化幼稚的中国，各階級还都紧紧的束縛在宗法社会的旧壳內，幼稚的資產階級，至今沒有有力的政党，便是它幼稚之征驗，他还未脱离利用敌人(列强及軍閥)勢力发展他自己階級勢力的时期，所以他时常表現出来爱和平怕革命的心理，这也是他勢力薄弱之自然結果；若依据他目前心理之表現，遂一口武断中国資產階級永远是不革命的，那便未免短視了。

商业工业資產階級而外，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每每还有一种官僚資產階級。他的勢力原来是依賴外国勢力(卖国)及本国貴族軍閥政府，利用国家机关(盗国)而存在而发展的，他不但是不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他不但不是真正資產階級，而且是真正資產階級——工商階級发展之障碍；中国的新旧交通系即屬此类。直皖奉直兩次战争，固然是軍閥間的战争，而因此打倒了安福部及梁士詒內閣，却算是扫除中国資產階級发展路程上的荆棘，所以那时揚

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对于吳佩孚頗表同情；有人說吳佩孚打倒梁內閣是軍閥階級的胜利资产階級的失敗，这完全是夢話。

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階級，他的懦弱心理，自然不容易贊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規模超越了地方的而漸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軍閥扰乱之阻碍或外貨外資之竞争，經濟的要求自然会促起他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所以资产階級究竟革命不革命，当視其經濟的历史的发展决定之，不当以其初步积累时懦弱心理决定其全階級終身命运。例如在欧洲前，全印度除了小资产階級的知識者外，找不出半点革命傾向，反之，与大英帝国妥协的空气却充滿了全印度的资产階級；然而欧战后印度的工业得了发展的机会，有了外貨外資之竞争，印度的资产階級便漸漸有了經濟政治独立运动的觉悟。中国辛亥革命时，有几个資本家听了革命二字不伸舌搖頭，有几个資本家不安心信任北洋派軍閥統治中国；然而欧战以来，揚子江下游新兴的工商业家得了一点自由发财的机会，便馬上改变从前小視自身的态度，不再說什么“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了，好像乡下土財主，子弟得了几层功名，便胆大起来不怕官府了；同时因为他們的开始发展，便遇着軍閥扰乱及关税厘金外貨輸入原料輸出等妨碍他們的发财自由，他們更不老实起来，公然出来做修改稅則廢止厘金廢督裁兵理財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組織民治委员会，反对軍閥为总统，否认代表軍閥階級的現国会，上海长沙之商联会更进而加入群众的国民示威运动，即此可以証明中国的资产階級，已經由非政治的态度，发展到和平的政治运动态度，最近发展到革命的政治运动傾向了。

他們以前非政治的态度，現在半和平半革命的态度，将来更趋向革命的态度，都不是他們主觀上的意識决定的，乃是他們客觀上的經濟条件决定的。社会上每个階級都有他階級的利己心，他階級的力量长养到非革命不能除去他发展之障碍时，他必然出于革命，愿意革命不愿意，始終沒有这回事。

有人反对上海的民治委员会，說是希图組織商人政府，又說这

是发达資本主义有害于中国社会。唱这种高調的人，他不明白他素所崇拜的美国正是商人政府；他不明白商人政府虽非极則，比起軍閥政府是进化的；他不明白資本主义在欧美虽功过参半，而經濟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資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資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他一面唱鄙薄商人政府与資本主义的高調，却一面拥护軍閥，这种人全然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在先进国純粹的資產阶级的革命，虽以資產阶级为主力軍，也不能不借助于他阶级的力量以扑当时的暴君及貴族，所以当时革命的口号往往冒称全民利益，不便公然宣告为他們阶级的利益而革命。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力量幼稚的資產阶级，阶级分化本尚未鮮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阶级更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攏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資產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輕視了資產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錯誤观念。

(四)

殖民地半殖民地一部分向上发展的大資產阶级固然可以趋向革命，而一部分向下崩坏的小資產阶级(手工工业家及小商人)亦可趋向革命。小資產阶级固不及大資產阶级势力集中，然其企业因竞争而崩坏，生活不安，也足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

小資產阶级的知識阶级，他本沒有經濟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搖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

小資產阶级的中国，知識阶级特別发达，所謂居四民(士农工商)之首的士，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他介在貴族与平民(农工商)間，

恒依附貴族而操縱政權，所以有布衣卿相之說，其仕宦久而門閥高者，自身且成為貴族。他們在歷史上操縱政權尤其自壟斷教權的優越地位，比歐洲中世僧侶階級有過之無不及。即以近事論，在壞的方面：議員政客們都屬士的階級，沒有強大的資產階級來吸收他們，只得附屬軍閥作惡；在好的方面：戊戌前后的變法自強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以來國民運動，幾乎都是士的階級獨占之舞台。因西方文化輸入之故，旧的士的階級固然日漸退潰，而新的士的階級却已代之而興；現在及將來的國民運動，商人工人農民固然漸變為革命之主要動力，而知識階級（即士的階級）中之革命分子，在各階級間連鎖的作用，仍然有不可輕視的地位；而且在無產階級實行革命和他們階級的利益當真衝突以前，他們是羞於放棄革命態度的。最近全國學生大會，不但議決了許多國民革命的議案，並且議決了幾件為工人階級利益奮鬥的議案，這便是個明顯的例證。正因為知識階級沒有特殊的經濟基礎，遂沒有堅固不搖的階級性，所以他主觀上浪漫的革命思想，往往一时有超越階級的幻象，這正是知識階級和純粹資產階級所不同的地方，也就是知識階級有时比資產階級易于傾向革命的緣故。就是一班非革命的分，他們提出所謂“不合作”“農村立國”“東方文化”“新村”“無政府”“基督教救國”“教育救國”等迴避革命的口號，固然是小資產階級欲在自己腦中改造社會的幻想，然而他們對於現社會之不安不滿足，也可以說是間接促成革命的一種動力。

（五）

農民占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于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于遷徙被難苟安，這三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益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却有驅農民加入革命

之可能。历年以来，各处农民小規模的抗稅罢租运动是很普遍的，若一旦有了組織，便无人敢說連国民革命他們也一定不能加入。

有人見农民之疾苦而人数又如此众多，未曾看清这只是国民革命的一大动力，以为馬上便可在农民間做共产的社会革命运动，这种观察实在未免太粗忽了。共产的社会革命固然要得着农民的同情与协助，然必須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軍，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的爭斗并拥护此种革命的势力建設此种革命的事业，因为只有强大的无产阶级，才有大規模的共同生产共同生活之需要与可能，独立生产之手工业者及农民都不需此。尤其是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在中国，約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說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們的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們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轉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們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屬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須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国内产业勃兴，然后普遍的农业資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間才有真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使目前即作此决不能实现的幻想，則所号召者不适于多数农民之实际的要求，便无法使农民群众加入实际的运动，便使目前所急需的国民革命受最大的損失。

(六)

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农民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即在純粹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工人阶级一旦觉得这种革命与自身亦有利益时，往往成为急进的先锋，况在国民革命，工人阶级更是重要的分子了。

但同时我們要知道：工人階級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說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階級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此时中国工人階級的理想，略分三类：第一，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家族亲属地方观念还非常之重，这是因为不但多数手工业工人仍然在独立生产者的环境，有許多目前虽是近代产业工人，而他过去未来的生活，并未能与独立生产者（小手艺小商人小农等）的环境絕緣，不感政治的需要，并不脫神权帝王之迷信，产业之发达又多未成全国化，所以工人階級的运动，犹多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經濟运动而非国家的政治运动，工人階級的理想，犹是宗法社会的而非国家的，这也是当然的現象。第二，只有少数有了国家的觉悟，有了政治的要求，这种觉悟，这种要求，只在最进步的海員及鐵路工人罢工中才表現出来，其余多数罢工都不出日常生活的經濟爭斗。第三，真有階級觉悟并且感觉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党的工人，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极少数純粹无产階級分子，固然是将来无产階級革命的唯一种子，即在各階級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最勇敢的先鋒队，这是拿今年京汉路罢工事件可以証明的。这极少数最有觉悟的工人，在质量上虽然很好，但数量上实在太少，其余的工人更是质量上数量上都还幼稚，所以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連一般的政治爭斗之需要甚至連自己階級的經濟爭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我們还应该知道：在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工人自己階級的單純經濟爭斗，沒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大部分产业管理权，不在外人手里便在軍閥政府手里，工人經濟爭斗之对象，不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便是軍閥，所以經濟爭斗稍稍剧烈一点，便是一个政治爭斗。我們更应该知道：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爭斗，只是

一般的政治爭斗，即全国各階級共同要求政治上自由的爭斗，不是工人們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因为掌握政权者直接的是軍閥，間接的是帝国主义的外国，不是本国的資產階級。所以中国的工人階級，在目前环境的需要上，在目前自身力量的可能上，都必須参加各階級合作的国民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意义，就是对外要求民族之經濟的政治的独立，对内要求一般国民在政治上的自由。这种一般国民之政治自由，如集会結社罢工等自由，正是中国工人階級目前至急的需要。

工人階級若不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其結果是：（一）工人階級在此革命成功时失去了地位；（二）工人階級在此革命的爭斗过程中，失去了自己階級战斗力发展的机会；（三）不参加实际的行动，無論工人階級有任何急进的主張，都不过是一个主張，实际还是站着一动不动；（四）自己階級的政治爭斗目前既不可能，又不参加联合战綫，結果必是脫离了政治爭斗的战綫，躲到經濟爭斗的空招牌底下去睡觉。这种脫离政治的經濟爭斗，必然是支节零碎的，地方的，改良的，使工人階級萎靡下去的；而不是根本的，統一的，革命的，使工人階級强壯起来的。

或者有人以为工人階級加入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綫，便易于发生紊乱階級和改良妥协的傾向，是一种危險的政策。其实这个想头未免有些幼稚懦弱了。工人階級的階級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階級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也不是人力的否认可以紊乱可以消灭的。工人階級的战斗，只有開門出去参加复杂的爭斗可以养成，决不是关起門来取寡妇女式的防閑政策便可以免得危險。工人階級只要有了独立的組織以后，只要知道一时期政治爭斗的动作联合和經濟爭斗的主义妥协不同，勇敢的参加国民革命这种复杂的爭斗，于工人階級只有利益而决无危險。反之，关起門来不参加目前所需要而且可能的政治爭斗之联合战綫，到有上文所說的危險呵！

(七)

中国社会各階級都处在国际資本帝国主义及本国軍閥兩层严酷的压迫之下，而各階級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可能。

敗坏困苦的中国，須有各階級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創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統一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只有在全国大群众革命的狂热中，全国的制度文物思想习惯都受了革命的洗礼，才能够实现，决不是单靠軍事行动可以侥幸得来的，更不是个人的暗杀可以成功的。暗杀只是封建时代义烈的行为，其結果不过报仇泄憤，决不能依此方法可以推倒統治階級。单靠軍事行动取得政权，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軍事投机，决不是法兰西式俄罗斯式的革命事业。

产业幼稚交通不便的中国，尚未完全达到以整理国家为一个經濟单位的程度，地方的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革命，也是我們應該贊成的；因为这种地方的革命行动丰富起来，也自然要汇合成功一个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但是非革命的省宪运动，簡直是見鬼；因为沒有革命的大群众所拥护之宪法，無論是国家的或是地方的，都等于廢紙。

同时，我們也須明白产业幼稚文化落后的中国，目前也只有这各階級群起的国民革命是可能的。若是貪图超越可能的空想，实际上不能使革命的行动丰富起来，以应目前的需要，不但在本国的革命事业上是怠工，而且阻碍了世界革命之机运。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事实上是世界的革命之一部分，而且是重大的一部分。因为压制世界全人类的国际資本帝国主义，乃建設在剝削本国工人階級及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上面，制他們死命的，也正是他們本国工人階級的社会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經濟狀況，又只是国民革命是可能的，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党人，万不可輕

視了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

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許有新的变化，工人階級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階級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皇室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階級在一九〇五年之革命及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資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瀕于破产，自救不遑，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組織。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們沒有預計的可能，也並沒有預計的必要，現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陷于半殖民地而且瀕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及軍閥之重重奴辱，別的話都无从說起！

（选自《前鋒》，第2号，1923年12月1日出版）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問題

独 秀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的策略上，目前应否停止軍事行动及放弃广州政府，乃是一个重要的根本問題。我希望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对于这个根本問題，都有就理論上事实上仔細研究并发表意見的必要，慎勿固执“主張停止軍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便是破坏国民党”的偏見，硬閉起眼睛不理！

反对停止軍事行动放弃广州政府的人，他們所持最有力的理論是：革命党須有軍事行动，也須有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傳。这种理論，仅仅是一些抽象的原則和形式的邏輯，至于国民党本身狀況及其在中国所遭遇的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第一，現在已不是揭竿斬木时代，画符念咒又怕恐不济事，除了乞求帝国主义者的援助，我們有何方法能得着和軍閥对抗的武器？姑且不說全軍閥階級的軍事力量，即以直系而論，想用广州政府現有的軍力打倒他，不待軍事专家，即稍有常識的人也不应作此奇想。

第二，广州政府現有的軍隊內容又是怎样？完全是以利結合的雇佣軍隊，我敢說沒有一連一排是可靠的革命軍隊，并且也還沒有相当数量质量的革命党人能在这些軍隊中宣傳活动，能左右这些軍隊的群众；建立在这些軍隊力量上的軍事行动，只能攻取若干北方或其他軍閥力量所不到的地方，向平民擄掠搜刮，連陈炯明赵恒惕也不會打倒，而說可以用他們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軍閥，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話。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此时絕對沒有做革命的軍事行动之

可能，現在的所謂軍事行動（北伐包含在內）若不停止，和反動的滇軍妥協，和反動的西南將領妥協，和反動的段系奉張妥協，都成了必需的政策。孫中山先生未嘗不知道因滇軍勾結商團而妥協是國民黨的恥辱，然而因為要做軍事行動，便不得不容忍這班反動的軍隊；孫中山先生未嘗不知道反動的西南將領不可與之革命，然而因為要增加國民黨軍事行動的實力，便不得不和他們聯和；孫中山先生未嘗不知道段系奉張都是革命黨所應討伐的軍閥，然而因為要增加國民黨軍事行動的聲勢，便不得不稱他們為友軍；這些恥辱的行動，這些錯誤的政策，都是軍事行動所必然產生的，因為此時的國民黨除了採用這些政策，本來沒有北伐或其他軍事行動之可能。然而採用這些政策來做軍事行動，不但這些軍事行動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因為滇軍西南將領段系奉張自身便都是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工具。這樣的軍事行動，且可以使國民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宣傳完全無效。

應否放棄廣州政府，和應否停止軍事行動，是兩件事不可分開的一個問題，因為要保持政府所在的一塊領土，便不能停止軍事行動。

在理論上，應該先有了強大的革命黨，然後才能有革命軍隊；有了革命軍隊，然後才能有革命政府。而實際上廣州革命政府並不是照着這個理論成立的，支持這個政府的既沒有革命的軍隊，又沒有強大的革命黨；因此，在名義上在極少數政府首領的願望上，是一個革命政府，實際上，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軍隊反革命的官僚及反革命的商人階級之力量上面，這反革命的軍隊官僚與商人，不但是支持政府的力量，並且是國民黨右派的反動勢力之大本營。因此，政府中極少數首領僅僅是有革命的願望，並沒有實權能支配所屬的軍力財政用在革命的意義上；並沒有實權能制止革命政府所萬不應做萬不忍做的事；開賭，拉夫；並沒有實權能制止軍隊警察商團壓迫工人農民；並沒有實權能制止軍隊官吏和帝國主義者的爪牙商團勾結妥協；這些都是廣州政府在客觀上不可

避免的事实。

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若仍要保持广州政府，对内，不但上述各种可痛的状况必然继续下去，而且反革命的军人官僚和反革命的商人之混合政府也必然要实现；对外，永远不能抛弃和西南将领及北方一部分军阀妥协的政策。如此，国民党的实际行动，将使国民党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在全国民众中丧失信用，不生效力。而且因为要保持革命政府所在的一块领土，国民党的力量与注意，事实上必然集中到关于保持这块领土的一切应付，没有余力可以计及全国的革命运动及宣传；即在领土内，亦以军警官吏之横暴，取消了党的宣传效力。本以为有一根据地更便于一切革命的运动及宣传，而结果实得其反。

总而言之：在原则上，我们不但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一个革命党做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并且极热忱的希望中国国民党早日进展到能做革命的军事行动能建设革命政府之一日。但在实际情形上，我们一方面观察得国民党的内容，还没有进展到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的时期，勉强假用种种反革命的力量来做革命的军事行动及建设革命政府，实在是此路不通！一方面我们观察得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力量及国内军阀的力量，要想占据一隅之地，养数万军队，来打倒他们，那更是此路不通！

现在有一条虽较远而可通的路给我们走，就是只有全国工人农民兵士之联合的大暴动，才可以破坏全军阀阶级的军事势力；才可以惊醒帝国主义者条约神圣的迷梦，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在华不法的权利；才可以击碎商人绅士勾结帝国主义者及军阀的奸谋；才可以实现革命的军事行动；才可以轟起全国革命的高潮及热忱，扫荡旧污，建设新国。

因此，我们希望国民党毅然决然改走这条新路；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毅然决然断绝一部分有名无实的政权之留恋，回到革命同盟会的时代；毅然决然下全党动员令“到民间去”，在一切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

傳，組織工人農民兵士的大民眾，不斷的為這些大民眾之自身利益而奮鬥，使這些大民眾都認識國民党的確是為民眾利益而革命的黨，的確和軍閥派及其他官僚的政黨不同；如此，中國国民党才有軍事行動及建設革命政府的真實力量。

這樣本是国民党在國民革命的策略上一大變動，反動的右派，在他們自身的利害上當然要反對這種變動；即畏難苟安的中派分子，亦未必有贊成這變動之勇氣與決心；然而這個變動確是中國革命運動所需要的，革命的領袖們若是看清了這個需要的事實，便應該拿出革命的責任心克服他們那游移不定的意志！

如果大家的頭腦，都被軍閥戰爭及局部政情之瑣屑應付的具體問題占領了，沒有考慮全國革命所需要的事實之余地，誠然是国民党的不幸；然而我們相信終有大家回過頭來考慮這個事實之一日，如此，我們只好改日再談。

（選自《向導》，第85期，1924年10月1日出版）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独 秀

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临了末运，所以現在全世界之资产阶级都站在被革命的地位而反动了。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原則上，他被压迫在帝国主义及国内軍閥兩重势力之下，应该有革命的要求；然而在实际上，他已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部分，他所有应有的革命要求，很容易被他阶级的反动性消灭下去。

五卅运动起时，我們絕不死守成見，我們頗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在事实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們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証实了。

在全国的工人学生流血奋斗正热烈中，而全国商人竟一致反对排貨，天津汉口青島的商会竟反对工人学生之爱国运动，向軍閥告密。上海资产阶级的九家大报，竟絲毫不肯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时报》竟为工部局删改上海市民大会的电报，新申兩报竟为工部局登載“誠言”。资产阶级的学者名流，即所謂高等华人梁启超丁文江等，竟宣言要“友誼的磋商”与“双方諒解”，竟公然說：此次惨案发生的責任究竟誰屬，現犹不能断定，中外当局应先从事調查，真相明白然后始可言解决，現在之罢工罢市罢課的緊張局面，首先应設法使之和緩(宣言大意如此)。

上海是帝国主义者在华势力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资产阶级最发达的地方，五卅事变恰恰发生在上海；因此，上海资产阶级对于此事变之态度，可以說是代表全中国资产阶级之态度。他的态度

可分为四个时期略略述之：(甲)罢市之初为第一时期；(乙)从罢市到开市为第二时期；(丙)从开市到总工会被封为第三时期；(丁)从总工会被封到现在为第四时期。

五卅运动一开始，上海资产阶级即带反动倾向，其表现之事实是：一、经学生工人群众胁迫而哀求，总商会始肯宣布罢市；二、当时一般群众的呼声是反对外国人惨杀同胞，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而商会在全市商店门窗所揭罢市要求，只是取消码头捐；三、罢市后总工会学生会提議組織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为全市运动指挥总机关，各马路商联总会赞成加入合作，而总商会则坚不肯加入；四、自六月一日罢市起至十日五卅委员会成立止，这十天当中，总商会都站在调人地位。在此时期中，上海资产阶级之妥协性及鄙弃民众的心理，已充分表现出来了。

在这时期中，资产阶级所表现的最反动事实，即是不顾民众的要求单独向帝国主义者提出条件问题。因为商联总会之牵制，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十七条件，已为民众所不满，总商会更蔑视民众的意见，迎合军阀政府委员的意旨，别自单独提出十三条，这十三条中，竟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及“取消领事裁判权”这十二三条完全撤销了，第六条优待工人当中，他们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之自由”这一句也去掉了。他们这样的妥协，颇受帝国主义者的嘉奖，当时《大陆报》说：“总商会的人是老成持重的，他们都是上海的大商家，大银行家，有体面负责任的人，他们是决不急进的”。他们的十三条并未为六国委员会所容纳，上海谈判决裂，总商会不但不坚决的作更进一步的示威反抗，反而并不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协商而单独议决开市。

开市之宣言，本来說还要抵制英日货物及援助停业工人，然而实际事实上是怎样呢？开市后，所谓抵制英日货，不但是一句空话，而且因为学生会严厉的檢查英日货，和总商会及商联会起了不断的糾紛与冲突，尤其是总商会以檢查五卅以前存貨之名为推銷英日货方便法門，和学生冲突甚烈。所谓援助停业工人，总商会和商

联总会始終只是經收全国各处捐款，他們自己原来是一毛不拔的，开市后他們一致鼓吹单独对英，尤其是总商会更是勾串奉軍戒严司令及交涉員压迫总工会令日厂罢工工人几等于无条件的上工；日厂上了工，工部局停止供給各厂电力，总商会不努力抵抗工部局，而又勾串軍閥官僚压迫总工会令工部局电气处工人上工；总商会又主張碼頭工人上工兩星期，专为中国商人运出存儲英日堆棧的貨物，議定在此項存貨物价三千余万元中提捐百分之一，約三十余万元，作为五万余碼頭工人一个月的救济費，此办法由总商會議定，此业务由总商会管理，其結果三千余万元的貨物如期运尽，而繳納的捐款只有三万余元，总商会簡直不負責任，碼頭工人因此遂即不能繼續罢工了。大部分罢工工人既已上工，总商会遂进而勾串奉軍戒严司令部封閉总工会。总工会既已被封，所有英厂罢工工人，遂被迫而陸續上工了；至此，資產階級所謂抵制英日貨，所謂援助停业工人，所謂单独对英，都成了公然的騙局！在此第三时期中，資產階級已經是不掩飾的反动起来了。

奉軍司令部的人說：封閉总工会是事前得了总商会同意的。虞和德对工人代表会的人說：你們代表会就是总工会的变相，断然不能存在，你們若能承认李征五去主持，我們可以帮助你們公开的存在。霍守华对人說：总工会不應該和总商会冲突，老实說，总工会被封的时候，总商会若肯出來說几句话，司令部是不能不顧忌的。照上述之种种說話，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感激上海总商会的盛意了！总商会不但要和总工会过不去，近来并且指揮他的武装队（保卫团）和他的爪牙（警察厅长江政卿）幫同軍閥摧殘所有的工会及工人学校，查禁学生或工人的集会。在此第四期中，資產階級的反动更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商人的商联总会，以前和总商会是对抗的，比总商会是急进的，現在事事依附总商会，不敢自作主張了。他們跟着总商会反对学生工人，跟着总商会不参加一切民众运动，稟承总商会的意旨，公然宣告沒有恢复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之必要。最可笑的是：学生会邀請商联总会共同发起各团体代表大会，主張关

稅自主，他們竟會說出“關稅已經自主不須開會”的夢話來！

中國資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的態度既是如此，那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要靠那些階級的力量才能成功呢？在民族運動中，是否應該反對階級爭鬥呢？這些問題，我們希望戴季陶主義者及國家主義者有一個忠實的解答。

（選自《向導》，第196期，1925年11月21日出版）

中国革命势力統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独 秀

此次反奉战争之失败，其根本原因固然是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力助奉直軍閥，而中国革命势力不統一也是一个很大原因。中国的反动軍隊如奉張如直吳如李景林如張宗昌，都在日本帝国主义指导强迫之下統一起来，向国民軍进攻；而在反奉方面，国民軍与广州国民政府至少在軍事方面未能联合作战，国民軍内部，一二三軍又未能切实合作，甚至于长江方面反吳的軍事势力也未能联合一致；如此反奉战争安得不失败。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反动的軍閥——还很强大，今后所有中国的革命势力非統一起来，不但不能得着胜利，并且各部分都很难存在。可是不幸最近广州的事变恰恰和这个“革命势力統一政策”相反！

国民党內的一般右派及国民党外的一般右派，一向号召反俄反赤反共，这是实行帝国主义者分离中国革命势力的根本政策；广州事变之根本原因，仍旧是这个政策之应用。他們宣傳此次事变是由于共产党阴谋推倒蔣介石，改建工农政府。我們現在可以回答他們：第一、照全中国的政治环境，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瘋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設工农政府；第二、蔣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統一的政策；第三、汪精卫譚延闓朱培德李济程潜都不是瘋子，共产党如果忽然发瘋想建設工农政府，单单推倒蔣介石是不够的。共产党的政策，恰恰和右派所宣傳的相反，不但主張广东革命的势力不可分裂，并且希望全中国的革命势力都要

統一，不然无对敌作战之可能。在此时中国政治軍事的环境，誰破坏革命势力統一，誰便是反革命！我們的政策是統一，右派的政策是分裂，他們在广东想分裂革命势力，同时在北京在上海想分裂学生会。右派說共产党有倒蔣阴謀，然而事实上，兩星期前上海右派最高党部某領袖，即預言广州将有大的政变，試問这是誰的阴謀？这阴謀若繼續发展下去，广东的革命势力，必然由分裂而全部傾复，胜利的只有香港帝国主义者（此时香港及上海的英文各报对广州現在的事变已經表示异常高兴），右派所得恐怕很少，甚至一点也得不着，試想当年进步党是如何拼命为袁世凱反对国民党，袁世凱胜利后，进步党所得着的是些什么？

我們鉴于北方国民軍之失敗及南方广州事变，凡是中国的革命分子，應該一齐高声喊出“中国革命势力統一”的口号，扑灭分裂革命势力的一切阴謀！

（选自《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出版）

給蔣介石的一封信

獨 秀

介石先生：

現在我看見一種印刷物，題名《校長宴會全體黨代表訓話對中山艦案有關係的經過之事實》，內中所載，倘都和先生所口說的一樣，沒有什麼印刷上的錯誤，則我們在對於中國革命的責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會有几句聲明的說話。並且在聲明的說話之前，還要總聲明一句：我們的聲明只關於中國共產黨方面，別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這個印刷物上，有兩個要義：前一段是先生聲述關於三月二十日事變之苦衷，後一段是先生改正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態度之意見。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說：“我要講也不能講。”“因為這種內容太離奇太複雜了，萬萬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現出來。”“我因為全部經過的事情，決不能統統講出來，且不忍講的。”“還有很多說不出的痛苦，還是不能任意的說明，要請各位原諒。”“今天還有我不忍說的話，我只有我個人知道。”先生這些不忍說出的事，若和中國共產黨無關，我們自然沒有要求先生說出的權利；如果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事，請儘管痛痛快快的說出，絲毫也不必掩藏。因為先生說出後，若證明是中國共產黨黨的錯誤，則社會自有公評，共產黨決不應該是一個文過護短的黨；若證明是黨員個人的錯誤，這個人便應該受兩黨的懲戒。在革命的責任上是應該如此的。

先生說：“當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誣陷我，

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

所以對於黨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懷疑了，所以他們軍官有要求共產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實，並且由他自衛心而起監視的舉動。”這個事實，不能證明共產黨有倒蔣陰謀，而是證明孫文主義學會的軍官有排除共產分子之意志。何以見得呢？對各軍官說共產分子如何如何，當然不像共產黨自己的口氣，說土耳其殺共產黨這段話，我未曾聽見共產黨人說過，只傳聞孫文主義學會中人向汪精衛先生攻擊共產分子時，精衛先生說過這樣話，其實否尚不可知，即令精衛先生有這段話，只足以證明孫會中人是何等反對共產分子，而絕對不能證明共產分子擬如何倒蔣；並且精衛先生是說要殺共產黨，不是說要殺孫會中人，照情理只有共產分子听了精衛先生這話而恐怖不安，為什麼反是孫會的軍官听了這些話引起恐怖與自衛的心思，並要監視共產分子全部退出呢？並且先生還說，“如果當時我校長不在的時候，當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劇烈，也未可知的。”這話誠然，如果先生當時不在廣州，孫會中人會當真大殺共產黨；而且我們還聽說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歐陽格、吳鐵城輩還要徹底干下去，這些事實正足證明精衛先生即令有那樣的話，却非神經過敏，更不是有意“激動風潮”。先生要知道當時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國大會，和廣東孫會互相策應，聲勢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們已得意揚言廣州即有大變發生，先生試想他們要做什么？

先生所舉各種陰謀之第二個事實是：“現在廣東統統有六軍，廣西兩軍，廣東是一二三四五六各軍，照次序排下去，廣西自然是第七八軍了，但是第七軍的名稱，偏偏攔起來，留在後面不發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離了我，推倒了我，然後拿第二師第二十師編成第七軍，即以第七軍軍長來報酬我部下反叛的代價。”無論何人有這樣的主張我們都以為要不得。不過只有國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軍事委員會，才有权決定這種軍隊的編制與名稱，政府委員及軍委中都沒有中國共產黨分子，無論此事內幕如何，當然和我們無關。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點關係，我現在索性老實告訴先生，當第二師長王懋功免職時，我們以為右派又有什么反動發生，所以政

府有此处置，但报載內情甚复杂，我們便函詢广州同志，他們的回信說：“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頗不滿，孙会則乘机大造其謠言，說王懋功是C.P.，此次蔣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聞王氏之被逐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陰謀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語罕，……彰明較著說我們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們早已聞有此說，曾函詢广东的同志，他們回信說：“語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軍校也太急切，因此語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們的段祺瑞’之說，絕對沒有，乃翻譯之誤，語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誤会。”語罕来此，我亦当面詰責过，他亦力辯無此事，我曾告訴他，如果無此事，你应詳細向介石先生說明，以免誤会。語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謬的見解，望先生再詳細調查一下。如果語罕真这样說，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軍事工作中理論的錯誤（詳見《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軍閥？》），是我們應該糾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陰謀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問題，竟至根本推翻。”关于這一問題，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見，他們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們是主張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輕于冒險尝试；我以为要乘吳佩孚勢力尚未穩固时，加以打击，否則他将南伐，广东便沒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給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給先生詳陈此計；兩方对于北伐主張，只有緩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惡意，也似乎說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負責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說：“謝英伯这班人太不負責任，譚平山又太負責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撥离間，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

們，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够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們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說我們有反革命的陰謀，即倒蔣陰謀，則我們不能承認。中國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們敵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們的革命工作，好像撐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還來不及，豈有自毀桅舵之理！我們對馮玉祥尚且要愛護，何況蔣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較進步分子，只要他們不贊成以區區一萬一千萬元出賣革命的根據地——廣東于英國，我們都不拒絕和他們合作，何況蔣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說：“大家曉得國民黨是以三民主義來做基礎的。”又說：“國民黨的領袖，只有總理一人，不能認有二個領袖。”這兩句話沒有人能夠反對，凡是有一點常識的人都不能反對。在原則，我們不能反對黨中有個領袖，且必須有個領袖；可是在中國國民黨自孫總理去世後，不但無名義上的總理，也並未產出能够使全黨公認之事實上的領袖，因此國民黨的唯一領袖仍舊是孫總理，即使將來能有名義上的總理工作上的領袖，而理論上的領袖精神上的領袖，仍舊是中山先生，這是毫無疑義的事，我不懂得先生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我不相信國民黨中任何人（共產分子當然在內）承認國民黨有孫總理同樣的兩個領袖，非是不應該如此，而實是無人配如此。若說國民黨中共產分子有污蔑總理人格抹殺總理歷史的事，這問題很容易解決，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國民黨員，國民黨中的共產分子，並不是不受制裁的黃帶子。國民黨往往因共產分子個人的錯誤，便發生兩黨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問題，這真是一個極大危險的習慣。中山先生在世時不許黨員討論這政策的根本問題，就是反對這習慣；今後糾正這個習慣，是要將分子制裁和黨的合作政策這兩個問題，嚴格的分開。譬如國民黨中有些人發行許多印刷物，污蔑抹殺得共產黨簡直不成話說，然而共產黨從未因此發生和國民黨合作的政策問題。

中國國民黨和別國的國民黨不同，因為它有具體的三民主義的歷史與特性，任何黨員（共產分子當然在內）都要信仰三民主義，

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說：“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論，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見，已詳見給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閱此信，現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見。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張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階級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階級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階級的“别信”，也就是各階級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階級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吳稚暉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屬国民党黨員，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許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許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

至于先生說：“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話，我們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說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現在又这样說，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現在的中国，有多少是純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嗎？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綱，也說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組織，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嗎？国民党既許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張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見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責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說：“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說：“我认为

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說：“所以我說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說来，兩主义并不冲突，他們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說不上什么招牌的話，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諸希賜教！

陈 独 秀

（选自《向导》，第157期，1926年6月9日出版）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獨 秀

北伐的意義，是南方的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在此時北伐聲中，我們若不懂得這個意義，便會發生許多錯誤的觀念及行動。

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是各階級革命的民眾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軍閥自求解放；全民族經濟解放，尤其是解除一般農工平民迫切的困苦。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還說不上是和帝國主義者直接的武裝衝突。這種軍事行動，對於推翻軍閥確是一種重要方法，然亦僅僅是一種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無二的方法；在軍閥統治之下的民眾，若誤認北伐是推翻軍閥解放人民之唯一無二的希望，遂至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自己不努力進行革命工作，這便是大錯。這便和前代人民仰望弔民伐罪的王師是一樣，完全失了近代革命的意義。再論到北伐軍之本身，必須他真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只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至於因北伐增籌戰費，而搜刮及于平民，因北伐而剝奪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犧牲了革命之目的，連弔民伐罪的意義都沒有了。

現在廣州國民政府之北伐是怎樣呢？在第一點，他自然還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武裝衝突。在第二點，廣東以外的各省人民，確有坐待北伐軍到來之幻想。在第三點，我們敢肯定的說，現在國民政府之北伐還不是由於革命力量膨脹而向外發展，乃是因為吳佩孚進攻湖南，國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以自衛。在第四點，國

民政府之北伐战費，應該发行軍事公債，向紳富籌募，如果因北伐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向农工平民搜刮，不但当年中山先生不曾因北伐搜刮平民，即現時唐生智在湘南，軍費并不比广东寬裕，他只发行股实公債，而未向农民誅求，国民政府对农民政策总不应该比唐生智不如。国民二軍之潰敗，对农民政策之失策乃是最重要的原因；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經使农民怀疑，若再因北伐战費而預征錢糧和抽收賭捐，若更进而剝夺广东革命的民众从护法政府以来所获得的些少自由，反而給予反革命的买办土豪貪官奸商以充分的自由，則我們在野党應該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須北伐与民众利益双方兼顧，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

在上述情形之下，所謂革命軍事行动的北伐，現在尚未成問題；因为在国民政府內部的政治狀況上，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所屬軍隊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識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現在的實際問題，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吳佩孚之南伐，防御反赤軍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內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

帝国主义者早已下定了吳張分途討灭南北二赤的計劃，如此英吳日張分据南北，才能和緩他們当中的冲突；現在英吳对日張在北方既不能不大大让步，則吳佩孚南下进攻广东，無論对国民軍作战胜敗，都必得張作霖之援助而实行。吳佩孚一回汉口，必以全力取湖南，再由湖南进攻广西，屆时动摇不定的小軍閥如贛邓閩周，都必然决定态度，奉吳令一致向广东进攻；不但如此，还有香港帝国主义者封鎖于外，陈林魏邦平旧部，勾結土匪土豪官僚买办，扰乱于內；如果竟至如此，国民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問題。并不是我們神經過敏，这样危險的局势，实已迫在目前，絲毫不容我們忽視。

所以現時国民政府的职任，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广东民众的口号，也已經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已經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东”！

将陷于四面圍攻的国民政府，他的領袖們，應該和衷共济，尤其要尊重人民的自由与权利（革命軍正为此和軍閥战争，也就是革命軍和軍閥不同之一点）。使人民心悅誠服的和国民政府合作，以战胜此困难，使此困难不但不能复灭国民政府，轉而能够鍛炼国民政府領袖及其軍隊和一切民众的革命意志与战斗力，然后再汇合全国民众革命的势力，进而北伐，才能够以革命的北伐力量完成国民革命。

（选自《向导》第161期，1926年7月7日出版）

革命与武力

独 秀

反对“革命要有武力”，这种人不是糊涂蛋便是反革命者。任何国家任何性质的革命，都非有武力不成；因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

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众的势力还未充分组织起来，需要军事行动更多一点；并且很难从军阀的武力时代马上跳到民众的武力时代，中间会要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那个愿意这样办，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高压政策特别严重，革命的民众不容易得着武装；在另一方面，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民众的革命运动潮流高涨到相当程度，国中军事领袖当中，有些和当时的统治阶级利害不一致的部分，在民众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便会走向民众方面，与民众合作。现在的中国就是这样。具体说起来，南方的北伐军和北方的国民军，都确已走上了武力与民众合作的道路。

可是在现时武力与民众合作之中途，我们还未可过于乐观，而忽视了可能的危险。危险是什么呢？就是现时所有与民众合作的武力，都能够合作到底，并且还能够进一步变成民众的武力；或者是合作不能到底，有些仍旧要站到反民众利益的阶级（军阀买办地主士绅）那边去。

要免除这个危险，民众和革命旗帜下的军人，两方面都要注意。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这是民众方面所应深刻注意的事！

在軍人方面，单是口头上說自己是革命的，即或志愿上自己的确是要革命，这样都还是不够；真正革命的軍人，必須有兩個条件：（一）須懂得在中国的政治經濟狀況中，革命的軍人和反革命的軍人在实质上究竟是怎样的不同？（二）須能够服从民众的和党的制裁。

中国的政治經濟現狀是怎样呢？一方是被剝削压迫階級的民众——工人农民商人等要求民主政治；一方是剝削压迫階級的帝国主义者軍閥买办地主士紳等，要維持封建的軍事独裁政治；代表后一階級利益的軍事势力当然是反革命派，革命的軍人應該站在前一階級利益上面。帝国主义者利用軍閥买办掌着中国城市政权，做他們剝削压迫中国民众的工具，复利用买办勾結乡村的士紳地主掠夺中国的矿山，吸收中国的賤价原料；軍閥利用买办（商会領袖及銀行家）在城市剝削工人商人，利用地主士紳在乡村剝削农民，以供給他們的軍餉；因此，可以說軍閥、买办、地主士紳，同样是帝国主义者剝削压迫中国民众的三个工具。革命旗帜下的軍人，若只知道反对帝国主义与軍閥，在实际行动上，不能力助工人商人反抗大商买办之剝削与垄断，不能力助农民反抗地主士紳之剝削与乡村政权，則不但依然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且保护了軍閥势力在城市和乡村的基础，这样如何算得是革命的軍人？这样如何算得是武力与民众合作？

每个有兵权在手里的人，若不能够受民众的或党的任何制裁，都有变成軍閥和形成軍事独裁政治之可能，此吳稚暉先生所以有“有軍必閥”之叹。我們或者可以承认現時方与民众合作的軍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軍事独裁的局面，他們的軍事独裁比北洋軍閥的軍事独裁总要开明一点。可是这种較开明的軍事独裁，只多只能造成統一的中国，决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并且在任何軍事独裁的局面之下，都有培养貪官污吏之必然性；这是因为軍事独裁局面之軍事首領，不受民众或党的任何制裁，拥有无上威权，因此以“反对派”三字杜絕一切聞过之路，于是左右一班宵小与夫乡党故旧得乘

机以小人之爱捧此軍事首領，只需蒙蔽此首領一人之耳目，便不妨放胆的貪脏枉法，无所忌憚，非至激成众怒危害此首領不止。在这样貪官污吏横行无忌和民怨沸騰的局面之下，还說得上什么民主，什么革命！？然而不受民众的或党的制裁之軍事独裁，其結果必至如此，这是无可避免的公例！

我們还記得辛亥革命时，有“軍人出头”的呼声，并且把軍字写作“軍”，許多官厅公文中都是如此，其結果怎样呢？我們又記得国民党在广东驅逐陆荣廷莫荣新的势力后，洪兆麟在陈炯明宴孙中山唐紹仪伍廷芳席上，乘醉伏在桌旁东倒西歪的說：“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广东是老子打来的！”其結果又是怎样呢？現在我們虽然未曾听见“湖南是老子打来的，湖北是老子打来的，江西是老子打来的”，这等怪話，却有了“軍人革命論”这样的不祥之声！并且有些青年軍人时常拿武力万能的觀念，干涉一切社会事件，虽然是善意的。这样不祥之声，这种武力万能的觀念，都足以促成軍事独裁的局面之开展。

真正有觉悟的革命軍人，如果想想軍事独裁对于民主革命的危險，如果愿意考查已否因此使革命根据地貪官污吏化，便應該放弃軍事独裁的野心，誠意的与民众合作，尊重民众的意見而受其制裁；至少也要受党的制裁，以免流为个人的軍事独裁。每个革命党的軍人，都不可单看自己是一个軍人，必須看自己是一个有武装的党人，虽統率十万大軍的总司令也應該如此。每个革命党的軍人，都應該尊重党的威权在軍隊的威权之上。如果主張“以党治国”，便不應該主張“以軍治党”；因为以軍以党，則以党治国便毫无意义，不如直接老实主張“以軍治国”了。我們反对以軍治党，并不是說軍人党員不能过問党事，也不是說軍人党員不能同时主持党事，乃是說每个軍人党員乃至軍事首領，都应尊重党的集体意見，服从党的集体制裁，如果挾軍事势力，使党的集体意見以軍事首領的意見为从違，使党的一切决定都要仰軍事首領的鼻息，使党众的意見不敢和軍事首領的意見不同，使軍事首領即党之化身，使党内党外群众

都只知有軍事首領而不知有黨，則這樣一個黨，便等於聾子的耳朵，瞎子的眼鏡，則所謂黨的威權，黨的決定，黨的制裁，黨的命令，都由“強姦黨意”而來，等於無物。這樣沒有黨的制裁之軍事勢力，要想免于軍事獨裁的危險，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們的結論是：革命是不能沒有武力的；可是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須與民眾合作，必須受民眾的和黨的制裁，才能夠免除形成軍事獨裁走到反民眾利益那邊去的危險。

（選自《向導》第179期，1926年10月25日出版）

革命与民众

独 秀

邓演达君說：“此时只是軍事的胜利，尚未达到政治的胜利。”孙科君說：“从前的軍隊不能够与民众結合，不能够为民众的武力，所以会失敗。……革命的势力就是民众，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看来，須要使农工及其他各界的民众完全了解革命的意义，然后国民革命才有成功之望。”这些真是革命領袖的說話！

怎样才是政治的胜利？必須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們有利的，革命的胜利就是他們的胜利，起而拥护此胜利，帮助革命党革命軍推翻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拥护此革命政权，这才是革命党之政治的胜利；并不是单靠軍事的胜利，赶走敌人，占住政治机关，革命党做了官，便算政治的胜利。

怎样才能够使民众了解革命是于他們有利的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决不是什么空口宣傳主义可以收效的。民众所認識的是事实，所感觉的是切身問題，离开他們的切身問題，离开事实的主义，不会真能使他們相信；反之不兌現支票式的宣傳，会使他們发生反感。只有由革命而給他們以切身的利益，他們才真能了解革命于他們有利益，他們才真能自动的为拥护他們自己的利益而拥护革命，不是为革命而拥护革命，更不是为革命党而拥护革命。

革命党是革命的民众之最急进的先鋒，有时自不得指导民众，革命的民众也自然有受革命党指导的必要，也自然有为革命而牺牲自身利益的必要；可是如若我們革命党侈然自大的向民众說：尔等民众須受本党的指揮，由本党管理，尔等民众須为我們的革命牺牲你們的利益，則民众将不明白我們想干什么。拿这样的态度对待

民众，如何能够得到民众！

至于有一班人，終日坐在书齋里，永远不肯屈尊到民众中去而与民众为伍，不懂得民众的疾苦是些什么，反而大喊“工会是流氓”“农会里有土匪”“我們党人是坐轎的农民是抬轎的”这类怪話。这样的大人先生們如果想得到民众，更是等于想坐火車到日本去。

就是能够屈尊接近民众的人們，若是用得着时便极力拉攏民众，用不着时便說一声再会；或者是以为对民众的态度在朝时应和在野的不同；这种人虽然能欺騙民众于一时，到了他們的真面目显露于民众之前，自然要失去民众，并且永远失去民众，因为民众只能够被欺騙一次。

真正的革命主义者，对于实际所許可的固然不肯輕让一步，同时对于实际所不許可的也不愿意乱进一步，民众若有时超过实际可能的幻想，領導民众的革命党便應該努力向民众解釋，領導他們从幻想的迷途与危險陣地到能够实际爭斗的戰場，民众所需要的是这样知己知彼知进知退能爭善战的先鋒，而不是跟着民众后面乱跑的尾巴主义者。因此，凡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不分在野在朝，对民众應該取这样真誠的态度，并不是在野时便可以故意向左一点，任意发出些不負責任的支票以取悅民众；一旦在朝便向右轉，另摆出一副面孔，以前发出的支票一概不兌現或者大打其折扣。所以革命党應該始終以民众的真实利益为前提，万分不應該以自己在朝在野为前提，致前后易其态度，或者是一个党分在朝在野兩样态度，一个党前后兩样态度或同时兩样态度，无非都是欺騙民众，欺騙民众者終于不能得到民众。

古代帝王欲得民心尚須行点什么仁政，況在現今民主主义时代，想得到民众，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須屈尊到民众中去（不可坐在书齋里罵工会是流氓农民是土匪）；第二須与民众为伍利害与共（不可疑惧民众运动的高潮会危害他的政权）；第三須始終一致为民众利益奋斗（不可取在朝在野不同的态度）。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自然不得不需要現成的武力；可是現

成的武力若不與民眾結合，不得到民眾的擁護，也不能夠成功一種革命的武力，並且這種離開民眾的武力，很容易走到反革命，不會成就革命，即或勉強一時獲得軍事的勝利，也終於不能保此勝利。所以，“武力與民眾結合”真是中山先生留給我們不可磨滅的革命鐵律！

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國民軍的軍隊實力強過北伐軍，然而前者因為是單獨的軍事行動在北方失敗了，後者因有南方廣大的民眾運動為聲援，帝國主義者至今不敢輕于直接壓迫。一九一一年（辛亥年）中國的十月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在軍事上都算是革命成功，然而俄國的革命給了工人農民的政權，給了工人農民的土地與自由，因此得了工农廣大的民眾之擁護與援助，克服了一切反革命的勢力，不但得了軍事的勝利，而且達到了政治的勝利，因此才能夠保住了革命的勝利以至於今。反之中國的辛亥革命，固然未曾想到工人農民這群下等人在革命中會有什麼作用，即當時全國上等紳商所奔走呼號的權利收回（鐵路礦山等），革命黨人亦以苟安在“不侵犯外人權利以免多自樹敵”的理論之下忽視了，中山先生提了一提“平均地權”，右派黨人便群起堵住他的嘴，說他發瘋了；因此，以袁世凱為中心的一切反革命勢力，看清了孤軍獨戰的革命黨沒有一點民眾的後援，他們才敢於乘虛進攻，一面拿金錢官位軟化了一批又一批革命黨中所謂穩健分子所謂溫和派，一面以“和平”“統一”等口號束縛了革命黨一切活動，以“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根本取消革命黨的組織，其結果革命軍隊和國民黨一概被袁世凱解散了，辛亥革命的軍事勝利成了南柯一夢！

現在革命軍和民眾的關係是怎樣？北伐軍確是遵守中山先生“武力與民眾結合”的教訓而獲得勝利了。可是革命勝利以後，尤其是九江南昌的軍事勝利以後，革命軍和民眾的關係漸漸有了一點危險傾向。

我們還未曾聽到革命政府有正式壓迫民眾的舉動，除了廣東；我們並且知道革命政府現在還做了些幫助民眾運動的事，尤其是

在湖南湖北。可是同时，反工农运动之声，到处都可以听到，尤其是在一些军事当局中和财政当局中。在右派分子中更不用说，因为反工农运动本是他们的三大政纲之一。工农本是最受压迫的民众，现在虽然稍稍动了一动，并未曾翻过身来，更说不上抬起头来，便有人大喊“工农运动太过火了”。并且有人以为现在的工人农民是强者，资本家地主是弱者；又说什么工农是压迫阶级，资本家地主是被压迫阶级。这好像外国人可以任意屠杀中国人，中国人动了外国人一根毫毛，便有人大喊野蛮；又好像满洲皇帝屠杀过无数汉人和革命党，革命党人杀几个满洲人或者是取消几条优待清室条件，便有人大喊暴民专制；都同样是世上不平的事！

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我们的兵士也要学步了，我们也要代兵士说话了；有人说：工农运动开罪于资本家地主，我们的财政因此陷于困难；更有人说：工人这样罢工，民众这样做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使我们外交陷于困难。这都是反革命的倾向！

在广东，民团劣绅和县长驻防军勾结起来摧残农会屠杀农民的事，近来更加厉害（参看一八三期本报广州通讯）；在解决工商纠纷条例中，居然有了“仲裁委员会之判决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的规定，实质上即是绝对禁止罢工；甚至于农工商学联合会也阴受阻碍，连汉案对英示威大会也被明令制止了！

在湖北，“革命军可敬，革命党可杀”“工人运动太放任了，非管理不可”这类怪话都放出来了！

同时，在帝国主义和奉天军阀方面，“可与国民党中的稳健分子温和派合作”的空气，也放出来了！

情形颇和辛亥革命胜利后相似，这是何等的危险倾向！

欲援救此断送革命之右倾的危险，欲保持革命的胜利，欲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只有继续遵守中山先生所留下的革命铁律：“武力与民众结合”。

（选自《向导》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出版）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1927年4月5日——

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們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們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們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們的胜利，所以我們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無論如何錯誤，也不至于主張打倒自己的友党，主張打倒我們敌人（帝国主义与軍閥）素所反对之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使敌人称快。无产阶级独裁制，本是各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政綱之一，在俄国虽然实现了，照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治經濟的环境，由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否是一定死板的經過同样形式的同样階級（段？），还是一个問題，何况依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之趋势，現在固然不发生这样問題，即将来也不至发生。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階級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兩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兩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問題，方不違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論，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現在国民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根据地上海，警醒了国内外一切反革命者，造謠中伤离間，无所不用其极！甲則曰：共产党組織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貽害北伐軍，将打倒国民党。乙則曰：国民党領袖将驅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糾察队。这类謠言，不审自何而起。国民党最高

党部全体會議之議決，已昭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党摧殘工会之事。上海軍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見与誤会，亦未必終不可釋解。在共产党方面，爱护地方安宁秩序，未必敢后于他人；对于国民政府不以武力收回上海租界政策，亦示贊同，总工会亦已发表不单独入租界之宣言；对于市政府，亦贊同各階級合作政策；事实俱在，更无造謠之余地。国共兩党同志們，我們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們，并且想以流言离間我們，以达其以赤制赤之計。我們應該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間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謠言，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誠进行，政見即不尽同，根本必須一致。兩党同志果能开誠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間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瀝陈詞，万希各省自察！勿致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則中国革命幸甚！兩党幸甚！

汪精卫、陈独秀

（选自1927年4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

关于中東路問題給中央的三封信

陈 独 秀

一、1929年7月28日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們：

現在关于时局之當面的危机，无过于中東路問題，这一問題不是简单的中俄兩國間的糾紛，而是国际糾紛問題之导火綫。由这导火綫而至爆发战争，也許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輕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間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現在誰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經過一些曲綫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東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糾紛是要繼續发展的。

这种糾紛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終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間必然因在夺中東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無論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爾維亞，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躪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東路的宣傳，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騙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許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騙，或者在受了欺騙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別持异議。这种情形不用說是于我們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們如何宣傳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讓我們閉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們的宣傳方法，似乎不能像別国的兄弟党

那样简单，即是說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們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沒有正确的解釋（“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沒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一个有力的軍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語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詳細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須向他們解釋清楚，使他們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們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們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綫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說教式的单调宣傳，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誤会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簡單明了的把他們“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們“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說：“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許会演成事实，但我們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傳，使同志們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結論：“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們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因此，我們主張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計現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

大家的誤会与惴測，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問題，都想有点意見貢獻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見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此 致

革命的敬礼

独 秀 1929年7月28日

二、1929年8月5日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敗，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这个錯誤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階級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敗資產階級胜利之前提。我們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輾轉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詞，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會議以后，仅仅是籠統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敗及資產階級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敗后，我們分明是失敗了，当时應該馬上取得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的战斗力，既是我們从戰場上退出来，整理我們的队伍，积聚我們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还正在一直高潮，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尙在进行湘鄂贛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們整个的階級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階級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繼續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喪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到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至有錯誤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諱的信給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們所估計那样快的崩潰，群众的革命情緒也不像你們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們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計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緒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敗的結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們，甚至于怨恨我們而接受反动派的宣傳。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見，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話到处宣傳。听說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說：“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說出不同的意見”。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們，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見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維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維克的正确路綫，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殘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順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矯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錯誤之根由系統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現在的禍胎。

二、現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經改正了这些錯誤呢？我以为一点也沒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終不認識資產階級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險，始終不認識統治階級即国民党政权之階級性，始終不認識革命失敗与資產階級之胜利，始終不認識現在是列宁所謂“革命二个波間过渡期”，則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錯誤。政治上有了一錯誤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唯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謨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見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偏狹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証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說”

（这是造謠，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見，參閱中央通告第33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原編者）及盲动路綫之正确。有許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組織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錯誤；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問題，而是有系統的一貫的总的路綫之錯誤。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綫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又只得不避忌諱，向你們詳細說明一下：

三、你們对于蔣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階級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險性，不了解統治階級即国民党政权的階級性，这种傳統的錯誤这种整个的錯誤觀念所表現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階級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階級的政党，这本是我們党傳統的錯誤；由这傳統的錯誤觀念做出发点，所以你們才把蔣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階級（封建階級与资产階級）利益矛盾之爆发。（你們把蔣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鐘，尚坚决的預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錯誤决不是偶然的，代他們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們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殘余，經過了商业資本长期的侵蝕，自国际資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資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經濟构造，都为商品經濟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經濟支配城市，封建階級和资产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領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农民早已成了它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积累）財政上的（維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稅）共同必要；至于說资产階級企图发达市場，列宁曾經告訴我們，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階級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第一，为生产手段創造市場，即是由富农把他們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轉化为資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較强的农民消費扩大，以創造市場”。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連

工人也包含在內)購買能力,則非資本主義生產力終於不能有高度發展的中國資產階級所需要與可能(國民黨政府絲毫也沒有想到怎樣解決土地問題,正因為現在沒有這個需要與可能)。此外,這兩個階級之“階級的經濟利益”根本矛盾,還有什麼呢?而且,中國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它確已開始了中國歷史上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便是社會階級關係之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它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余在這一大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打擊,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對立地位之過程中,變成殘余勢力之殘余;它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他們所以現在尚能殘存,乃因為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吓,不但不願意消滅封建勢力,並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協,來形成以自己為中心為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

你們忽視了這些很明顯的事實,遂至今還是過分估量封建勢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負責同志目前和我辯論關於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比重的問題時,竟說:“此時中國的經濟還是農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謠,中央只是說中國是農業落後國,農業生產還超過城市生產。在發展方向上,當然是城市支配農村,這裡沒有爭論,但農村總是比較城市落後,絕不能將中國農村看得如上海漢口一樣——原編者)。像這樣不正確的觀察,自然會幻想中國尚有這兩個對立的根本階級(封建與資本)戰爭之可能,自然會產生“每個戰爭都是階級戰爭”(這是曲解,中央在反對向導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時候,指出每個戰爭每個政治事變都有他的經濟的背景與階級的意義。參閱中央通告第15號,34號等——原編者)的理論。馬克思主義者,只可說每個戰爭都有經濟的背景,在階級的社會里,便有階級的意義

(这里所謂階級的意义,如就階級內部战争說,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階級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階級战争,必須是兩個对立的根本階級之革命战争),不能說每个战争都是階級战争——兩個对立的根本階級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階級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階級的社会里,各階級內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軍閥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蔣桂战争真是兩個对立的根本階級战争,蔣介石討伐桂系,如果真如你們所說是“为资产階級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們所謂“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蔣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階級,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們便不應該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謂:“同志中有以为‘蔣桂战争是资产階級反对买办地主階級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傾的危險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蔣介石的战綫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蔣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說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傾的危險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錯誤的分析之必然的結論,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們又解釋到:“階級战争不一定是革命的”(許多同志都說中央有这样的解釋), (中央只說中国的軍閥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階級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沒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原編者);如果真是这样,則馬克思主义及无产階級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台!“每个战争都是階級战争”及“階級战争不一定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論,都是对于馬克思主义加了聞所未聞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錯誤。

四、蔣桂战争的性質究竟是什么呢?我們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

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它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它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党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

这样說，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因为不曾洞察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不曾看出資產階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險性，我們党在土地革命政綱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說：“农民社会之分解，是資本主义創造国内市場。”“农村資產階級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創造市場。”（“富农中农及农业无產階級”）富农即农村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資產階級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資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賣于市場；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貸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經走进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下层群众（貧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經過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貸，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絲毫犹豫的。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給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間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多。所以若是始終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終想和資產階級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者。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問題，中国的地主階級中，根本就沒有像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領主那一特权等級。商业資產階級，不但直接剝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資產階級，并且許多衰弱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資產階級及富农的兩種榨取，更要加紧剝削农民以自存。在壟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階級，使农民經濟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較多的土地剝削雇农；高利貸所剝削的，不用說多数是貧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額，当然比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从中取利。所以商业資產階級，买办階級及富农和地主階級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最令人不解的，你們不但在階級比重上把封建勢力看做和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或者更強固些，最後更進一步否認了中國資產階級之存在。你們從前肯定的說桂系和馮玉祥都不代表資產階級，隨後又說：“蔣介石並不等於資產階級”（三十四號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號“紅旗”）；那麼現在中國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及其領導勢力是什麼呢？國民黨政權和他一般政策之中心意義所表現的是什麼呢？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是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說有，既非桂系，又非馮蔣，那麼究竟是誰呢？如說沒有，那末，以前所謂“階級聯盟”，及所謂“資產階級背叛革命”都成了彌天大謊，豈非滑稽之至！大約是你們看見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並未能排斥帝國主義，並未能改良農民生活，並且它戰勝了桂系反而馬上取消了已實行的二五減租，你們對他很失望，所以說他並不等於資產階級。你們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說：“假如馮玉祥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勢力，必須解放農民等等。”如此說來所謂中國資產階級之存在，並不是現在實有的這些冒牌的假的資產階級，只有幻想着在你們頭腦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才算是中國老牌的真正資產階級。你們對於中國資產階級這樣的觀察，分明不是依照辯證法，在一些現象流變生長過程中，抓住現在實有的資產階級，而是依照形式邏輯，虛構一個超時間性的一定模型的資產階級。國際說你們“夸大資產階級”，正確點說乃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

這樣的幻想，決不能夠領導群眾向當面的資產階級鬥爭，而是領導群眾去尋找你們心目中的資產階級。在事實上你們心目中如此這般的資產階級，帶有革命性的資產階級，只有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現在不但在中國尋找不着，即歐美各國也都已尋找不着了。各國革命史已教訓我們；資產階級一抬頭，一看見下層階級有獨立的行動，馬上開始反動，毫不猶疑的和封建的舊勢力妥協，什麼無耻的反革命舉動都會做出來；這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是歷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資產階級都是如此，經濟文化落後國度的中國資產階級更沒有例外。所以我們不能除開現有的反動的資

产阶级，即是除开馮蔣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們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們欺騙群众。

七、不錯，你們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傳，可是你們說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話，都被你們的幻想与錯誤的分析打銷了。这是因为你們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們对于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之錯誤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視綫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們反問；誠然應該反对资产阶级；但是蔣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馮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閻錫山、張学良更不用說；那么，我們反对誰呢？我們的階級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們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說：你們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說：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势力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領導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認識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許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們？党内同志因为你們的幻想与錯誤的分析，也会复活他們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階級尚有这样的坚固基础，遂至推論到階級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論上現時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論的根据，莫非真是譚平山所謂“超时代的政策”。諸如此类的右傾思想，都会跟着你們的幻想与錯誤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們應該肯定的告訴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張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領導的政权，已經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

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阁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入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〇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雷泽曼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以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

經过去，后一个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現在还是两个高潮間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們的政策我們的工作路綫，便應該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所說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們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鏟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設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說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經濟斗争到政治斗争，我們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應該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們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應該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們的工作，應該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綫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綫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們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們輕視日常瑣細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下，为发展我們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謂“不帶何等热血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內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現一下，或者喊几声我們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問題，我們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們領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証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說絕對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們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須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

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像是盲行大海中，絲毫也不見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沒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絕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坚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預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沒有到来，这种“打嗎啡針”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認識革命前途，其結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緒。

九、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 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認識社会阶级关系的轉变，不認識統治者的阶级性之轉变，以为現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統治阶级将因之崩潰；不認識現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間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的高昂，虽然經過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說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漲，只好說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后索性更进一步，換一句更确定的話說：“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烈起来”。現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錯誤的政治認識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應該“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現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認識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維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綫。

你們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計，是統治阶级动摇，然而經過蔣桂及蔣馮冲突后，他动摇了沒有？又說是改良派的势力縮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縮小沒有？又說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們还要

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紗厂去强自关車呢？你們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貫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經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現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会的話），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說：“中央罵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罵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罵支部不革命，支部去罵誰呢？只得罵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現象，現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員因为工厂罢工罢不到，遂逼着下級党部下命令罢工，說：“在原则上必須罢工。”这是什么話？！你們忘記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識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遺教了嗎？你們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緒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緒与意志。

“五卅”运动應該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績無論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們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給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謬評。

在客觀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論，我們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們和群众的关系也能够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級党部同志們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狀況之下令同志們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德謨克拉西，是各階級为求得多数意見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階級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敗，墮落，营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

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謨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縮

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們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見一概不許開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問題，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傳達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順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毀坏了党的組織与力量何！倘若現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謨克拉西势必縮小到連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連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談起，党内的基础組織便已經不存在了，还說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說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說他們的觀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們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綫若有小小的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則是否需要“自我批評呢”？

列宁說过：“我們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爭論，宁可說，为了說明現存之意見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爭論諸問題的全面討論，为了討論諸种見解之代表者等，陷于偏狹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識的劳动者面前公然爭論，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見解，而缺乏公然的爭論，把关于真實問題之不同的意見隱秘的擱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說过：“一切团体成員，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爭論題目，都有陈述意見的必要，民主的組織之党也沒有例外，征求所有黨員的意見，不能視為原則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重大的場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規模的杯葛（Boycott）特于政治的行动”（“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說过：“中央委員會知道黨員大众之意識的意見，从而不是盲从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說过：“在我們的報紙上，努力給关于理論問題的論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慫恿同志們对于爭点无忌憚的發揮”（我們的綱領）。

同志間关于理論上政策上意見不同的爭論，是党的进步的現象，決不是坏現象；反之，大家都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現，爭辯之結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錯誤的意見，一經公开的被大众批駁下去，以后才不至隱藏在党内，

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維克党的理論，就是长期这样的爭辯中生长出来的，我們同志政治水平綫一般低，也只有不同意見的相互爭辯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話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謠，中央只說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觀上无产階級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縮小的——原編者）的理由，以为必須他們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賜”他們发表意見的理由，你們主張；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黨員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黨員政治水平低便应縮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們老实固执你們的偏狹性，而不顧及党内德謨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見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壟壘的造成你們意見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見，禁止討論，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們有不同意見，不管他的內容如何，便簡單的用“小資產階級觀念”、“非无產階級意識”、“觀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沒有內容的抽象名詞来排斥他；更或者給他戴上一頂帽子，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某某派”等，来鎮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見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止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論爭辯尚未被容許开始，你們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階級联盟政策及經濟主义取消主义，一直的推翻了馬克思主义无产階級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領導的統治，資產階級还是革命的，仍主張什么“四个階級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資產階級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顧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錯誤，我們可以用教育及爭辯方法来矯正，用不着小題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團結党内爭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說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說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見，未知孰是？）至于同志們沒有任何錯誤，只是“和中央意見不同”便是錯誤，而且是很严重的錯誤，便要拿“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

对付他們，这更是天大的笑話，同志無論在理論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場和党的立場，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見，而公然出来爭辯，都是党内德謨克拉西所容許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謨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評仍須是德謨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現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說他們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許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見，而不敢說出来，我曾很誠懇的指出他們的錯誤；有意見應該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討論，不应只在个人閑談。他們都很慘痛的回答說：“你的話在原則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偵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調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内滾出去；我們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說怎么办？現在有許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煩悶着沒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談国事’的教訓，敷衍的做着工作再說，而沒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給敌人杀了完結，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現象，然而沒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謠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話——原編者）。

听說布哈林曾責备特立說：“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見而不敢說出来！”列宁常常說过：“无产階級的战士，應該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黨員，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馬，不是要成純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机器不同”，照你們現在的办法，你們偏狹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黨員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潑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綜合上述的說明，可以看出你們有系統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組織上一貫的錯誤路綫。为改正这些錯誤之总的路綫，我現在提

議几个要点：

(一)在政治上对于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問題，对于革命高潮問題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問題，对于富农政策問題，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

(二)在組織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謨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党部开会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党报上发表。

(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問題：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的政策并未充分討論，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問題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見，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陸續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見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綫，必如是才能統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喚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最后我还要告訴你們：因为我不忍眼見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綫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結論，写这封信貢獻于你們，希望你們稍稍抑制自己的偏狹性，平心靜气的把我的意見詳細审查一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諸全党討論。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 秀 1929.8.5

(文中几个完全造謠的地方，略加短注。——原編者)

三、1929年8月11日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們：

讀了你們八月四日对于我論中东路問題宣傳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們对于我的意見根本不會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

傳策略之重要問題，不得不再向你們剴切的重复說明一下，這是我對於黨的責任。

我們要懂得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複雜的錯綜的全部理論與政策，首先要懂得辯證法的時間與空間之變化性；資產階級的學者不懂得這個，所以往往拿他們自己的形式邏輯之“不容間位律”來攻擊馬克思和列寧，說他們是詭辯派；有些幼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因為不懂得這個，才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討論黨的一般宣傳問題，而是專指對於中東路這一特殊問題的宣傳方法；並且還不是替黨起草關於這一問題的全部宣傳大綱，也不是討論中央對於這一問題的宣傳原則，而是特別指出其中關於宣傳方法的缺點；此外你們已有的話，當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贅詞了。你們對於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許多是由于這一點。

原則是一定不變的，此所以謂之原則；至於策略戰略，則因有複雜的時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時時事事都必須照着原則機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點變化性；有時因為在時空性上有需要經過曲綫方能達到革命之目的，竟可採用和原則形式不同的策略。我們若不懂得這一點，就會責備列寧布勒斯特和約的政策，是“包含了很嚴重的原則問題”，是“因為原則的錯誤，所以發生策略上的不同”；因為布勒斯特和約這一政策，在形式上顯然違背了“不和資本帝國主義妥協”的原則。像這一類的“矛盾”政策，充滿了列寧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動；此所以列寧被稱為“政策上的辯證論者”，此所以列寧罵反對布勒斯特和約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個鷄尚能跳出人畫的白粉圈”。我們若只拿幾個原則甚至幾個名詞，以為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這未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布爾塞維克主義看得太淺薄了，我們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們的來信把策略和原則混為一談，這不是偶然的錯誤，乃是“你們的原則”之錯誤。你們的原則，是原則和策略不分，以為策略必須是原則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傳上工作上，

都只是拿几个原則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問題有時間空間性不同的話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們簡單化和純任主觀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現。

在原則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階級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傳；反之，我却以为我們以前宣傳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夾有民族問題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爭取广大群众計，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說对群众解釋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險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說必須对中东路問題本身有了正确的詳細的解析，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們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說：“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問題沒有正确的解析，‘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員群众的中心口号”則“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階級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員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許多群众还在小資产階級民族偏見和国民党的欺騙迷惑之下，沒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們以为我們是无产階級的党，不是“資产階級的左派”，对于中东路問題，只要站在无产階級的階級利益上向群众宣傳，对于其中夾杂的民族問題，不需要我們有什么正确的詳細的解釋，使群众的观点模糊了；并且你們很肯定的說：“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經驗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們完全忘記了列宁曾經說過：“落后国家的小农經濟，族长制度，爱乡的觀念，根深蒂固，小資产階級的偏見，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見，必須先进国之資本主义根絕了，后进国之經濟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見，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階級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間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見，应予以特別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的提案）这是你們還沒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階級革命，必須有自己

階級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們說：“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識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見也并不是主張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識跑，去跟着他們說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們这边来，在我們口号之下，在我們領導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們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傳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爭取群众，而是脱离群众。一个布尔塞維克，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紙面上的布尔塞維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見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騙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見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間的战争，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下层群众为上层階級爭权利的战争，我們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論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义。若慮同时反对兩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兩個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則当然應該如你們所說：“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內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們須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訴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兩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誤会呢？并且，我还要問：“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說“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說“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否已經明白表示对兩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和“反对英美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詳細宣傳，何至使群众誤会？

单就資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說，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析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析的話再向中央解析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說話，目的是在說明由中东路問題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糾紛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說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說明各种可能的糾紛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問題的发生原因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像你們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滿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們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間尤其是英美两国領袖的帝国主义之間，由于他們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們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那一种先行实现，誰也不能机械的肯定像你們肯定蔣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問題的时空性而論，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訴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間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訴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們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們不是感觉到我們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騙了他們，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沒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認識，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說），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証。

你們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誤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

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及“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到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見，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倫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廢”。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傳，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誣蔑他是降低口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說“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騙同志，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騙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騙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騙，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

你們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錯誤的責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們主观上的理

論，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加以正確的詳細的解析及打碎國民黨的假面具，能够使群眾減少民族偏見，不至為國民黨所欺騙而接受我們的宣傳的領導。

(二)“只是”擁護蘇聯這一口號與宣傳，在事實上只能動員無產階級最覺悟分子，而未能在此實際利害上激動無產階級以外廣大的群眾，尤其是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把這些廣大群眾放在鬥爭戰綫之外了。

我為什麼要提出這兩點，因為我們的黨應該是實際鬥爭的黨，不能忽視下列的各實際問題：

一、每個原則是否都可以機械的應用，不許有策略上的變化？

二、中國此時是否有許多群眾還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偏見和國民黨的欺騙宣傳之下，沒有解放出來？

三、在反對國民黨的宣傳上（關於中東路問題的），除了它勾結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外，是否還要說到它這樣反革命的政策，對於中國有怎樣的結果？

四、中國的廣大群眾是否都已認識蘇聯是中國解放的朋友？

五、對於中東路問題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確的詳細的非我們主觀的而是群眾所能親切了解的解析？

六、無產階級以外的廣大群眾，是否都能够無條件的接受我們階級的口號？

七、對於比較意識落後的群眾，我們是否應一概不要？

八、除階級的口號外，是否還應該用其他廣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號，能够喚起廣大群眾，參加反對進攻蘇聯的鬥爭？

我希望這封信和前幾天論黨內各種問題的那封長信，都能早日在“紅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敬禮

獨 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以上三封信均選自《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一書）

陈独秀供詞(摘录)

檢察官宣告后，首傳陈独秀审讯，彭述之等九人退至待审室。陈兩鬢已斑，鬚長寸許，面色紅潤，已无病容，四圍瞻顧，态度自若。审判长先問姓名年岁籍貫后，(問)以前做什么事？(答)在教育界做事。(問)在何处？(答)在北京。(問)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問)在民国几年？(答)記不清，大約在民国五六年。(問)当教授以前做什么事？(答)无何事，讀書。(問)做教授几年？(答)大約三四年。(問)退职后往何处？(答)到上海。(問)做什么事？(答)未做事，閑住。(問)在民国几年？(答)大約在民国九年十年。(問)在上海住几年？(答)在上海住兩年。(問)以后往何处？(答)到广东。(問)何时到广东？(答)大約民国十年以后。(問)在广东做什么事？(答)做教育厅长一年。(問)做厅长后又往何处？(答)回上海。(問)在上海做什么事？(答)无事。(問)民国几年回上海？(答)大約民国十一二年。(問)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揮？(答)是。(問)一九二七年清共，住何处？(答)还住上海。(問)先在何处？(答)在武汉。(問)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滿意？(答)无所谓滿意不滿意。(問)共党書記是否則总秘书长？(答)是。(問)何时被开除？(答)記不清，大約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問)为何被开除？(答)因意見不同。(問)被开除后做什么事？(答)未做事。(問)共党分几派？(答)分托罗斯基与史他林兩派。(問)托罗斯基現在何处？(答)現在情形不知。(問)共党内常委几人？(答)五人，然五人中，并无宋逢春，因宋于被捕时方出獄一周余，宋在獄中何能当选常委。又濮一凡为一三十余岁面黑之人，頃見者乃一漂亮小孩子。(問)彭述之曾供濮一凡为常委？(答)不对。濮非常委，恐因語音不同而有舛誤。——时章士釗起

立称：檢察官記錄，并未見過，恐有錯誤，請发下一看。檢察官答称：待将来整理后当宣讀。（問）对于紅軍主張如何？（答）紅軍为特別組，要先組織苏維埃政府，照現在狀況尙用不着紅軍。共党理論，先要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有軍隊。（問）在“火花”第一卷第十一期中有“如何救中国”一文，主張平民革命，建設苏維埃政府，是否为与彭述之合著之作品？（答）記不清，意思是如此。（問）又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当共党欲实行暴动，曾有信去指說現在尙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尙不能崩潰，徒使党离开民众，应請改变政策等語。是否是你作的？（答）是有的。（問）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終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問）“斧”在何处发行？（答）在华北发行。（問）书中有召集不具名會議，是何意思？（答）国民党不召集时，由共党召集，共党不能召集时，即在国民党势力参加之。（問）与皖湘閩贛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問）党内教育界学生方面有人参加否？（答）当然有，工人比較多，其余各界均有。（問）是否常开会？（答）不一定。（問）几时生病的？（答）去年八月間。（問）未生病前开会是否常到？（答）开常会常到。（問）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資格，不能詳細报告，作政府偵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問）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簡單說明之：（1）現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黨員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則。（2）中国人已穷至极点，軍閥官僚只知集中金錢，存放于帝国主义銀行，人民則困苦到无飯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現象。（3）全国人民主張抗日，政府則步步退让。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謂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終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違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时十一时三十五分，陈退。

（原載《陈独秀案开庭記》）

（选自《国聞周报》，第10卷第17期，1933年5月1日出版）

中国的一日

陈 独 秀

朋友囑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說几句话吧！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掩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害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及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的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选自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第2编，1936年9月出版）

給陈其昌等的信

仲

璠昌霽諸兄鑒：璠兄十月十四十七兩信早已收到。十六日信并猴子的信与做书計劃，亦早收到（廿日的信也收到）他所拟做的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現在能这样耐心的做书，真使我不敢不贊一詞，因为我是一个外行。我回他这样的話，未免使他扫兴，然而实在无可回答也。璠兄的婚事，我聞之且喜且忧，喜的是得着意外的良緣，忧的是他将来的生活。圖兄来此已一星期，日內或將到湖南去教书。我不愿在此久居，亦不能久居，去处尚未能定，因天下老鴉一样黑也。我不懂得什么理論，我决計不顧忌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厌弃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話，我愿意說极正确的話，也愿意說极錯誤的話，絕不愿說不錯又不对的話。你們都是史大林主义者，都是老彭的朋友，和我非永久的伴侶。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們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們乱罵史国，尤其是罵史，虽然不是原則上的錯誤，政策上則是非常的錯誤。如此錯誤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璠兄說別人是宗教徒，現在大概也受了宗教的傳染而不自觉了！霽兄信十一月二日收到，璠霽和俊昌意見或微有不同，根本仍是一样，即是不懂得此次战争的意义，超林則走得更远，根本和你們仍是相同的，即是把上次帝国主义間大战的理論，完全应用到今天，真是牛头不对馬嘴。我对昌俊还有点幻想，并不是他們关于最近局势的見解和我接近，而是因为他倆的工作精神比較积极，如果能在群众中积极工作的人，終会抓住现实。我对于史合作，在原則上是可以的，可是現在談不上，合作必須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同一工作的对象

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謠臭罵，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关于老彭和长子，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本意见相差很远。香兄来信亦收到。昌兄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三日的信及英文信均收到，是事无法可設，我也不愿設法，恐怕出力不討好，前次罗君就是一个殷鉴，报館所記自多失实，“申报”訪問記，我未見着，能寄我一看嗎？此种事太多了，无从預防，也无法更正，只好听其自然，好在将来有我自己写的文章书物为証。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論，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見，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将来誰是朋友，現在完全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此祝健康。

弟

仲 手启

1937.11.21

（选自《陈独秀的最后論文和書信》，單行本）

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陈 独 秀

一切幻想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见了太阳，战争，尤其是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件最实际最严肃的事情，如果把它寄托在幻想上面，这是多么危险呀！

自对抗战以来，我们全国上下，拿各种各样幻想的宣传，特别对于国际的幻想，代替了实际的努力。这不独减少了实际斗争力，而且撒下了幻想落空时使一般人失望消沉的种子。所谓苏俄出兵，英日战争，英美舰队联合，国联制裁，九国公约制裁等等幻想，事实上已经随着第一期战争失败，而杳无踪影的过去了。倘吾人若不平心静气毫无成见的洞察国际形势，难免不从旧幻想的根蒂上，再生长出新的幻想来，以造成第二期作战之不幸，这是我们万万不容忽视的，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帝国在全世界各地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联的国策；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

以上便是目前形势之骨干。

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的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各国預想的軍备尚未完成，还是其次又其次的原因。他們之間都互相知道彼此的軍备同样不充分，只要兩個对立的集团形成，是不妨一战的。在此环境中，中国对日抗战，除了向各別国购得軍火外，不能有別的幻想，不能幻想国际有某一集团，或某一国家和我們共同对日作战。

人們所謂德意日侵略陣綫，或法西斯陣綫，乃是似是而非的說法。因为德意日侵略陣綫这一名詞，在外延上不合邏輯。德意日固然是侵略的国家，如果說英法美不是侵略的国家便等于說他們不是帝国主义者；德意日三国有了反共协定，虽然是一个国际政治集团，而还未成为决定对于另一集团的軍事同盟，特别是意大利的眼光四射，动摇不定，最近它因为奥国問題和德国暗斗，开始了和英国的談判。德国虽承认了“滿洲国”，这并非等于宣布今后对于中日战争取消中立。軍閥政治的日本还不是法西斯特国家，这乃鉄一般的事实。前年法西斯特派政变失敗后，受到广田內閣严重的打击，眼前以政友会和民政党为主力的議會，正在金融托拉斯資助之下，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右派各团体，还在向政府要求釋放二月十七日防共护国团包围政民兩党总部之法西斯特領袖；世界上有这样的法西斯特的国家嗎？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能容許別的政党盘据議會，公开的进行反法西斯特的斗争呢？那一个法西斯特掌握政权的国家，法西斯党会因侵犯別党总部而被捕，而向他們自己的政府要求釋放他們自己領袖呢？如果以为凡是有了法西斯特运动的国家，便是法西斯特国家，那么全世界能找到几个非法西斯特国家呢？在法国法西斯特的运动和力量都强大过日本，难道法国也是法西斯特国家嗎？所以德意日法西斯陣綫这一說法，也不能成立。

至于英法美苏民主陣綫，或和平陣綫，这更是虛烏之談。苏联的政制是独裁而非民主，它和英国始終是貌合神离，英国始終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場，表示对苏俄与德意的斗争都不参加；英法美虽然同是民主国家，而美国固守着孤立政策以免陷入欧洲糾紛的漩渦，

更談不上和歐洲任何國家的聯合陣綫。和平嗎？在帝國主義制度未傾復以前，和平是不可想像的事。尤其是克里姆宮的人們，應該懂得這個，因為他們現在還自稱為列寧的門徒。不錯，英法美蘇是一致避免戰爭希望和平；然而他們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後面承認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實，以避免戰爭，這是對於侵略者的和平，他們對於國內人民的反對派（如蘇聯）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如英法）却是不很和平的。自九一八以來，我們已經飽受他們這種和平政策的苦教訓了；現在中日關係，我們若企圖避免戰爭，而希望和平，我們能得到什麼呢？所能得到的只有屈膝後暫時的和平而已！希特勒說：“如果某些強國不援助日本的對方，遠東的和平當已成立了”。如此則和平便是侵略者的勝利，被侵略者屈服之另一說法。在呼呼和平避免戰爭的各國，或者將來也會認為這是合理的解決，它們或者更會進一步壓迫中國，犧牲中國，跟在日本後面承認現成事實，以維持他們之間的和平。如此則中國便在全世界和平聲中斷送了！嗚呼！和平！和平！天下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國聯派所號召的集體安全制度，在倫敦政府心目中的飛鴻，與其說是英法美蘇的什麼陣綫，不如說是英法德意四強協定。這樣模糊不定的集體安全制度，經過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事變，又以“不決戰不妥協”的態度處之，所謂集體安全制度遂至擱淺。於是包爾溫不得不繼霍爾下台，繼霍爾的艾登仍舊繼續“不決戰不妥協”的政策，張伯倫內閣依然走頭無路，直到最近中日戰爭出乎意料之外的发展，日見英國在遠東的特權與利益朝不夕保，迫得張伯倫不得不於決戰或妥協二途選擇一個；依避免戰爭的國策，張伯倫只有選擇後者，於是艾登不得不辭職，集體安全制度隨由張伯倫宣告破產。所謂民主陣綫，和平陣綫，更是由海市蜃樓而幻滅了。照現時國際緊張的局面，“不決戰不妥協”的政策，本來是最無出路的如意算盤，依英帝國主義的立場，比包爾溫及艾登自較為合理，所以張伯倫以宣稱“國聯不能為任何國家保持集體安全，吾人再不應作國際

仍能保护弱小国家抵抗侵略之想”，和平夢想家所召集的国际反侵略大会，昨天还轟动倫敦，今天便如泥牛入海，蹤影全無了！这般夢想家受过1914年的大教訓还不够，現在又受到一个小教訓，如果还不觉悟，將終于是一个教不醒的蠢材，艾登辞职的消息初傳到中国时，我們的夢想家，还认为張伯倫的外交轉变政策不会为內閣及国会所通过，会因此引起政潮；不料事实上，反对派工党在国会上提出的譴責政府案，已为張伯倫的长篇激昂的演說所駁倒，結果下院卒以320票对168票而否决。这是因为張伯倫在演說中所提出的“汝究欲汝祖国卷入战争漩涡內乎”一問題，不独阿特里、格林、伍德艾登等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即在我們夢想家所謂“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热烈反对侵略运动的英国劳苦人民”也只能回答一个“否”字；因为他们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与張伯倫同調的；剩下的所謂“热烈反对侵略运动”只是一句空話而矣，除了战争，空話是不能损伤侵略者毫发的。英国的劳工运动，本来是在和平空气中生长起来的，又加以第三国际近几年来和平主义的強調宣傳，更是为張伯倫現行政策鋪平了道路。

張伯倫的現行政策，不但要拿和德意妥协来避免欧洲战争，并且还会和日本妥协来停止远东战争。張伯倫的这一政策应该是受人譴責的，然而克里姆宮的人們却不配譴責他們。張伯倫虽然是一个沒有理想的人物，而却是一个实际政治家，至少不像克里姆宮的蠢材，会幻想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能够制止战争，会幻想喊喊反侵略口号，开开反侵略大会，宣傳宣傳，就能够不动干戈吓退德意日本。希特勒說：“日本的胜利是比布尔什維克胜利的危險要少些”。希特勒可以这样說，英法美也还可以这样說，苏联也可以拿这一理由来呼吁和平避免对日战争嗎？照英法美苏所力行的維持和平避免战争的政策，只有让德意日本日益坐大，会造成全世界一个黑暗时期，在这一点，中国放弃和平，对日抗战，不但有民族的意义，而且有世界的意义；如世界上还有一个革命的国家，如果它專門計較自国的利害，在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口号掩护之下，眼前中国失敗而袖

手旁觀，這便是革命之背叛者！

英意英德的談判，如果在犧牲弱小的條件之下順利的成功，英法德意聯合干涉遠東戰爭局面，便會到來。我們萬萬不可因這一局面又引起新的幻想，認為他們會武裝制裁日本，這不獨非德意所願，亦非英法所願；它們干涉的壓力，三分用在日本，七分還用在中國，使中國向日本屈服，日本向歐洲讓步，以阻止日本勢力一直南下，完全獨佔了中國，完全掃蕩了英國在中國南方的特權與利益。

如果我們不願被迫而接受屈服甚至亡國的條件，只有努力支持長期抗戰之一途，也只有我們有力量能夠支持抗戰，不再敗退，才能夠多少轉變張伯倫的政策。此時中日兩方面都發出了長期戰爭的呼聲，其實日本財政雖然比我們充裕，也支持不了二年以上的戰爭。它的赤字公債，戰前已超過一百萬萬元，二年戰爭又需用一百萬萬元，如果不能從中國攫取大量金錢，到了明年夏秋間，甚至明年春天，日元一先令二便士的匯兌率便難以維持了。財政一露破綻，無論日本軍閥如何橫蠻，也不能不認真考慮戰爭應否繼續的問題。所以他們已經事先準備拿集會出版之自由向國民讓步，來建立國民總動員的計劃，以應付杉山所謂“較目前形勢更惡劣之局面。”我們中國怎樣呢？

我們的財政，我們的國民經濟，自然更脆弱於日本。我們不能寄托幻想於國際，我們只有依靠自己，我們更應該拿改良政治向國民讓步，來動員全國的財力和人力，再困苦支撐一年以上的戰爭，以期待敵人的財政先我而崩潰。尤其要建立對各級政府的人民監督制度，才能夠肅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苛捐雜稅，以掃落這些破壞國民經濟基礎（農業，手工業，商業）的最大因素。國民經濟之崩潰，對於戰爭的影響，比吃敗仗更加致命傷。並且改良政治的實惠，如果真能廣及於人民，風聲所播，還能以挽回敵人佔領地已失將失之人心，使之內向，使之自動的拒絕日貨日鈔，以加速敵人財政之崩潰。這不是目前迫不容緩的事嗎？

在懷疑民主政治的人們，或者會反駁我這一提議也是幻想；那

么,外来的力量既不可靠,求之于自己政治改良又是幻想,我們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不能改良政治来动員財力人力,和安定国民經濟,不独战无可战,即忍痛言和,而战后經濟上的政治上的百孔千瘡,又用什么方法来补救呢?乐观夸大自慰的宣傳,經不得事实的打击;“人民愈穷苦愈革命”更是道地的胡說!

(选自《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1938年4月

联东图书馆发行)

抗战中的党派問題

陈 独 秀

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日，全中国不分在朝在野各党各派，如果认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无可犹疑的应该避免无关于抗战胜负之根本政策的争论，而以全力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

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这一联合，在数月抗战中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可是同时两党磨擦的暗潮，日渐浮于表面，这是众人皆知，无可讳言的事。因此，国人颇为惴惴，深恐此种磨擦如果发展下去，或至影响抗战前途，并且这一问题日渐成为私人谈论时局的中心，这一忧虑不是毫无理由的。

其实这种磨擦，除了根本原则不计外，其种子已含藏于联合之最初时期，即两党对于联合之方式，都未免鲁莽：一方面国民党未能抛弃招降的态度；一方面共产党在政治上事事牵就允诺，未能坦白的坚持自己抗战的政治主张，因此事后在政治态度上及宣传上引起了国民党对共产党有言行不符的疑虑。一切磨擦便自然的日渐发生了。

此种磨擦如果双方都感觉有停止的必要，下列办法或者可以收相当的效果：

(一)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招降的态度；并且不防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

(二)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

权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作一谈。

在原則上，政治上的爭論，有可能推动政治进步，直接間接有利于抗战。非政府党党员在政府附屬机关担任工作，这本与政权无关。政府对于所屬机关之用人，应取人材主义，不必一党包办，在野党亦应避免政府附屬机关中地位之竞争；非政治的斗争即地位的斗争，有百害而无一利，各党各派如果把民族利益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这种斗争是应该停止的。党派间以至一党中小派别之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地位斗争，只有为敌人开辟道路！

（选自《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1938年4月
亚东图书馆发行）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答“抗战行动旬刊”征集抗战集体意见问题之一）

陈 独 秀

一国中为什么有党同伐异的各党派存在，这不是根据人们愿意不愿意，而是根据社会各阶层客观利害不同形成思想不同所结合的共同意志，不能够由人们在主观上任意令它发生，令它消灭。

为什么利害不同思想不同意志不同的各党派能够合力抗日，这是由于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共同意志；也只是因为有形成这一共同意志之可能，我们才有理由提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問題，此以上的合作团结，只是人们的幻想而已，没有共同的利害，便没有共同的意志，便谈不上合作，团结。

不幸得很，竟有人在各党派合作抗战中，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問題，这未免太过幻想了，而且对于各党派合作抗日是一种有毒害的幻想！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诚然，人们提思想信仰统一問題，正因为企图实现一国一党消灭其余别的党派之理，其实党派是相对的名詞，如果别党消灭了，科学的說来，任何一党也就不能存在，因为那时各党派所代表的各部分人民不同的利害都消灭了，一切党派也自然消灭。这样的社会还很遥远，现时俄、德、意所謂一国一党的办法，即令政权的阶级性不同，都不过是一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正因为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招来国内不断的紛爭，将来还会成为崩溃之一因素。

现在的中国，無論政府党或在野党，都更不应该利用抗战的机会，效法这种人为的外表形式来消灭异己！能够使各党派合作团结

的口号，只有一个，即“抗日救亡”。这就是說，無論各党各派在思想信仰上如何不同，而对于抗日救亡的行动，必須一致，这便是所謂“对立的統一”；“对立的統一”本是全宇宙普遍的規律，政治也不能例外。若企图統一思想信仰来抗日救亡，那便不知道要等待到何年何月了。譬如宗教上有儒、釋、道、耶、回之分，哲学上有唯物唯心之别，政治上有集权分权之爭，如此等等，何时才能够統一呢？我們能够要求他們为抗日救亡而放弃他們的思想信仰嗎？如果定要拿思想信仰之統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內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对于党派的問題，只是分散而不是團結，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如果顧虑到战后之經濟的政治的制度紛爭問題，这乃最后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經濟政治之发展，而非决定于思想信仰。

統一思想信仰，根本是一个荒唐无稽的幻想。在欧洲中世紀，全欧洲的文化几乎都在公教会手中，宗教法庭用过无数次燒杀酷刑，也消灭不了异教徒，也沒有把思想信仰統一起来，反而公教会本身倒分了无数的派別；凡是一个集团，对外走向統一，同时对內即走向分裂，倒是对外竞争，往往加紧了內部的團結，这是一个公例。在中国古时，汉武帝和董仲舒，他們君臣曾热心拿尊孔来統一思想信仰，然而汉朝的宮廷中，始終完不了儒法黃老的斗爭，即董仲舒本人的思想信仰，就是一个儒道兩宗的混血儿，后汉諸帝也曾严厉的拿識緯来統一思想信仰，然而終于降服不了桓譚、王充的党徒。

历史的教訓是很严酷的，我奉劝主張統一思想信仰的人們，多做点抗日救亡工作，少发点幻想罢！幻想一旦碰到实际，便如霜雪見了太阳！

（选自《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5集，1938年4月
亚东图書館发行）

民 族 野 心

陈 独 秀

通常說到野心二字，人們便有点厌恶，其实無論个人或民族，野心用在占有欲固然不免令人厌恶，倘能用在創造欲上，便是偉大，向上，有志气等同义的名詞。

我們民族現在种种不长进，受人侮辱，正因为缺少野心。为什么缺少野心？有人說，因为民族衰老了，羅馬人之后会有意大利，为什么我們却衰老了？有人說，因为孔孟老庄佛教宋儒等礼让退嬰的学說，衰老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血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敗坏民族精神上血液的学說？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經济的原因了。

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資本主义社会有它的而且是更高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这两个社会过渡时期，即前資本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业造成社会的蒙昧无知和散漫，商业造成社会的奸詐和苟偷，于是它的生产力、武力、道德、文化，都一般的衰落。

欧洲羅馬衰亡后数百年，便踏进了資本主义社会。日本德川幕府一傾复，紧接着便是明治維新，两个社会的过渡时期为时不久或几等于零。中国自晚周封建崩潰以至清代鴉片战争，前資本主义社会延长了二千年，第一是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是因为海岸綫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海岸对外貿易的都市；第三是因为缺少纵深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的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市場，迅速的集累原始資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滿清）破坏了中国經济繼續进

展，以此种种，遂至延长了中国前资本主义时期，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中国和欧洲日本强弱盛衰之历史原因。

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既然没有资本主义的工业，自然也没有集中的前进的产业工人。这时代的原始农业，各家族占有或使用一块土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他們最高理想。只要风調雨順，便可靠天吃飯；只要家畜和子孙繁殖，使家道兴隆，便是无上幸运；薄稅輕刑，是最好的政治，此外用不着人民的組織，用不着国家的保护，用不着政治革命，用不着对外战争。前资本主义的商业，是商业支配工业，而不是工业支配商业，国内市場已足供迴旋，商人将本求利，固无擇于本国制品或外国制品，即令是仇貨走私，也一样发财，用不着民族斗争，便談不上爱国，更厌恶革命战争；他們和农民一样，根本不会有民族野心。农民的特性是守旧，散漫和无知；（手工业工人不占重要地位，其特性亦近于农民，乡村的手工业，有許多就是农民的副业。）商人的特性是奸詐和无耻；这两种落后的特性合并起来，便形成了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无知而又无耻，中国二千年来长期停滯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虽然多次治乱循环，多次更換王朝，而統治权终于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和商业上面，在朝在野扮演重要角色的，也终于是一般代表农民和商人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能产生孔孟老庄宋儒發揮佛教道礼让退嬰学說的，还算是其中优秀份子，这正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农业与商业的反映；在这样落后的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們固有的武力，固有的道德与文化，即所謂东方文化与文明。

一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那便万象一新了。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它需要从全世界取得原料，它需要国家保护，它需要扫蕩封建旧势力的国内战争，它需要对外竞争的民族战争，于是它的民族野心自然日漸高昂。资本主义的工业虽然要造成滔天罪恶，同时却創造了較高的生产力，較高的道德与文化，扫蕩了整个旧社会的落后性，奠定了将来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是

人类进化途中一次大飞跃。

經濟长久停滯的中国，也因鴉片战争之后，又經過欧洲大战，資本主义的工业有了初步的生长，民族野心已开始萌芽，于是才会有戊戌維新、辛亥革命、“五四”“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此次抗日战争发生。然而已因为經濟长久停滯在前資本主义的緣故，旧社会的抵抗力过于强大，資本主义的工业与文化不易侵入，民族资产階級昏懦可怜，双料落后的士大夫群仍然充塞了朝野，这便是历次革新运动中途夭折和此次抗日不易成功的根本原因。

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商人大做其經濟的汉奸，买办和銀行家（中国現在的銀行、仍旧是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出身的官僚，利用国家机关，来投机外汇，或垄断国产，阻碍出口貿易，以大饱私囊；士大夫土豪劣紳紛紛充当汉奸；为抗战而尽力而牺牲的，只是一部分有民族意識的工业家、工人、軍人或受过資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洗礼的青年；所謂“全民抗战”，不过是一句宣傳口号。因工业不发展而民族野心不高昂，影响到抗战如此之大，至于軍器軍事技术和交通工具之貧乏，更是鉄一般的事实摆在我們的眼前。这都吃了我們崇拜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而輕視西方物质文明的大亏！

如果經過鴉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至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車，还不能喚醒我們的痴人迷夢，还死守着前資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以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論”，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們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軍’便要发抖的法螺”；或者承襲着張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半吊子的見解，反对全部欧化，一方面主張采用現代生产制与軍器，一方面主張保存固有的道德与文化，高唱东方的精神文化胜过西欧的物质文明；如此則中国永不会欧化，即是近代資本主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永远不会走进中国来；永远死守着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中国永远还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永远沒

有什么民族野心。如果这样永远糊塗下去，我們对待起子孙嗎？！

（七月十六日）

（选自《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1938年8月
亞东图书馆发行）

資本主义在中国

(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陈 独 秀

人类进化有两种形式：一是循序的进化，一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之真实性，除了进化論的反对者，已为众人所周知，現在无庸多讲了；至于跳跃的进化，則往往为人們所忽視。

每个民族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力量，固然能够使循序的进化比較的加速，而跳跃的进化則大半由于外界的影响；例如：在古代社会史上，北朝鮮及日本有些地方，跳过繩紋陶器时代，由无繩紋陶器直接走到銅器时代，甚至走到鉄器时代，这是因为受了中国輸入銅鉄器之影响。又如近代史上，俄国因为西欧的影响，由封建的农业国，很快的經過了甚至可以說跳过了西欧手工工厂时代，一跃为近代工业并且踏近了产业托拉斯边沿的国家；在中国，一面繼續前資本主义的生产狀況，一面采用了本世紀三十年代最新的紡織机器，跳过了英国数世紀的循序进化，所以在上海馬路上往往可以看見独輪車和无軌電車及最新式的汽車并行，馬拖的公共街車时代則未經過。一部分資本主义的工业之所以在中国有些跳跃的进化，也和俄国及其他落后国家一样，是受了資本主义先进国的外来影响，而不是由于内部力量的以循序进化的。

說到資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問題，又会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爭論。过去的爭論，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則认为中国已經是資本主义的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經濟，各种

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繼續并存着，尤其在落后国家；因此，我們观察各国的經濟，要估計是那一种經濟成份居领导地位，来确定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經濟成分，遂以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銀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經濟，間接支配了小城市經濟，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貨幣普及了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絲茶，烟草，桐油等，其擴張或縮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場，且听命于国际市場；这当然是資本主义經濟居领导地位。則是資本主义在中国，一方面由先进国的資本主义的影响而发生跳跃，一方面也由它(資本帝国主义)的阻碍而未有高度的发展，因此龐大的商业資本，还未完全工业化，农业之工业化則更加談不上，統一的国内市場还未形成，生产工业生产工具的工业，几乎还没有，比起資本主义先进国来，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資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資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

由于資本主义制度自身之缺点，其发展也，可怕的罪恶，亦随之而来；然而它毕竟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能够增加社会的生产力带来它所需要的民主政制，以清除旧的封建生产制的缺点与罪恶；在目前过渡时期，我們宁可忍受資本主义的罪恶，来代替封建軍閥的罪恶。

人們或以为資本主义制度既然含有缺点与罪恶，我們何不取法乎上，再大的跳跃一下，采用生产力更高的社会主义呢？誠然，社会主义生产制，比資本主义生产制有更高度的发展，也能以清除資本主义的罪恶，已經是資本主义初期之中国，便不能够說沒有跳跃进化之可能；可是，我們所相信之社会主义，而是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廢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和固执私有及均产的小资产階級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若是循序进化的路，必須以内部經濟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則必須以外部的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不像小资产階級的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革命的，而却是幻想的，在經濟上則是反动的；資本主义比起小资产階級的社会主义还是

革命的，因为前者使生产力增高，后者使生产力停滞甚至萎缩。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自然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及其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上政治的成熟，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时期，而我们的经济建设却不能等待。

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

一九三八年七月

（选自《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1938年8月
亚东图书馆发行）

抗 战 一 年

独 秀

此次对日全面抗战，虽然开始于八一三上海之战，而历史上的意义，当以七月七日蘆沟桥事变始，至今恰好一周年了。

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过去对外战争，对方都是些文化較低的民族，此次对日战争，对方乃是文化較高的民族，可以说虽败犹荣。

此时战争还未停止，最后胜利究竟属谁，姑且不论，根据这一年的事实，我们算得是胜利了。敌人的武器，军事技术人才和经济力都强过我们，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实。他们军事上的胜利，本有科学的必然性，这是不必諱言的；然而经过一年的战争，以一个大力士竟不能击倒一个病夫，使他不敢还手，全世界人士都眼见这位大力士的本领不过如此，这位病夫也不是人们以前所想像的那样容易驯服的民族，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一点。敌人虽然占领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工商城市，而政治上仍然毫无办法，不但未得着一个张弘范、洪承畴，在民族意识压迫之下，并没有一个稍负时望的人肯认真为他效劳，因此，敌人对于一般汉奸，很少敢于信任，一年以来，未曾出现一个有力的汉奸，这是敌人之失败的第二点。敌人对我民族污蔑的宣传，曾经普遍地深入了全世界，然而在此次战争中，我民族抵抗强者的人格提高了不少，同时敌人野蛮无赖的面目，在全世界文明人士面前无隐藏的暴露出来，这是敌人失败之第三点。敌人对我之侵略战争，尤其是长期战，并非真是全国一致的，最热衷战争的，只有少壮派军人和军事工业家；工农劳苦大众甚至小商

人，根本反对战争，輕工业家和元老重臣甚至老成持重的軍人，对于长期战争，也都有各种程度的怀疑，尤其是有头脑的政治家和經濟学者，都眼見对华长期战争减弱了对英美俄国防的力量，感觉得是他們国家致命的危机，各种程度的反战情緒，将随对华战争延长而增加，如果进攻武汉曠日持久，得不着效果，受軍事压迫的各种反战分子，会日漸抬头，这是敌人失敗之第四点。

敌人的失敗就是我們的胜利。

我們自己怎样呢？我們的政治、軍事、工业、經濟、文化，事事不如人，吃敗战是当然的；所幸在这一年抗战中，我們的一切缺点都暴露出来了，只要不是痴子和騙子，都应该勇敢的承认，不应该自欺欺人。勇敢的承认缺点，认真的改去缺点，比輕浮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屬於我們”要有益万倍。最后胜利并非必然的，要努力改去缺点，才能接近胜利之路；倘輕浮的狂妄的高喊“最后胜利必屬於我們”，把我們的眼睛蒙住了，看不見自己的缺点，此乃失敗的道路。

說到改去缺点，是千头万緒，現在已經有点緩不济急。在战争第一的今天，只好从治标方面，擇其有利战争而不妨碍战争的几点着手，因为战敗亡了国，一切改革都无从談起。

第一，外交上坚决的擇用以本国现实利益为本位的政策，不但要从各与国获得大量的物資援助，特别是軍器，即令是魔鬼的国家，只要它有利于我国或者不利于敌人，我們應該尽量的利用；假如意大利能有助于我們，我們便不惜承认它兼并阿比西尼亚。什么陣綫，什么軍事同盟，什么某国出兵，諸如此类的幻想，都应该断然抛弃，打嗎啡針虽然能够暫时的兴奋，結果是有害的。在野党派外援以自重及利用外交来压迫政府，更是万分卑劣！

第二，民族垂危的今日，在野党派應該口心如一的研究政府抗战，获得胜利。不应该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我們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現代，在今日的中国，現政府如果失敗，別的党能够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繼續抗战；即使有某一国家軍器的援助也不能成为西班牙的局面，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作战，和德意援

助佛兰哥的形势不同,并且那时的国际局势会有利于日本。

第三,政府应该迅速决心解除人民的痛苦扶助各业人民的群众组织,改去过去一盘散沙的状态,使之有力量援助政府继续抗战;人民有了庞大的组织,募债和征兵的问题,便易于解决了。

第四,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战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人民侧目者,此种毫无心肝之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

以上四事,虽然卑之无甚高论,都是目前迫切应该力行之事。

如果力行此四事,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则今年七七纪念,比双十节还有价值,如此方不负抗战中军民的痛苦与牺牲!

(选自《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6集,1938年8月

亚东图书馆发行)

論 游 击 队

陈 独 秀

时論对于游击队或者都有点毀誉过分罢。我所得的材料，却是可以毀的多过可以譽的，然而現在还不能下一个最終的結論。可是我們对于游击队有兩点必須充分認識，方不至为时論所述。

第一，正当的游击队有兩種：一种是屬於正規軍指揮供給的別动队，一是民众自携武器粮食的武装队。这两种游击队，也都必与正規軍配合起来，才能起較大的作用。第三种便是在民众之外在民众之上向民众征发軍器粮食的游击队，辛亥革命以来有所謂“民軍”，即屬此类，在战争中，在战后，往往为社会国家之累；在此次抗战中，被人罵为“游而不击”，“抗日不足，扰民有余”，“亡国的游击队”的，正指此輩。

第二，即正当的游击队，虽有它的特殊作用，即战争中牽制和扰乱敌人，战争失敗后使敌人不容易安全統治，然而一离开正規軍，而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是天大的錯誤。就是正規軍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濫用。近代国家已經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們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們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們的軍隊和游击队鬧得天翻地复，他們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們懂得大城市是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們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謂“紅軍”及山上的“苏維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敗，也正因为軍器上，在經濟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

果我們執迷不悟，過分的估計游擊隊和游擊戰術，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擊隊布滿了全國的農村和小城市，甚至避開敵人的勢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阿比西利亞的農村中，至少尚有不少的游擊隊，不斷的襲擊意大利軍隊，我們能說阿比西利亞不曾亡國嗎？印度西北至今還有一些所謂“王國”，我們能說印度不是英國殖民地嗎？

我們必須充分在原則上認識這兩點，游擊隊運動在抗戰中始有利而無害！

一九三八年七月廿一日

（選自《陳獨秀先生抗戰文集》，第6集，1938年8月

亞東圖書館發行）

給托洛斯基的信

陈 独 秀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之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沒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簡直沒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軍事失敗，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在日軍手中，国民党政府的軍事防御綫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軍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領。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絕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爭的。中国的軍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潰，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貴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經濟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蔣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資的接济，連守住川、云、貴都沒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經過英法等国的調停，蔣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蔣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貴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蔣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內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的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龐大的占領地，統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經濟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从中国获得大量的現存資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場，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駐中国的必要軍隊，加以新式的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綫，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

沒有劇大的事變，中國是沒有力量趕它出去的。

中國初生的無產階級，經過上次革命之失敗和中共盲動政策所招致的屠殺，已大大的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戰爭中全國工廠及運輸機關大部被毀滅了。中國工人在數量上，在物質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狀況。

中共人數遠遠超過我們，然亦只是些知識分子和沒有一點工人基礎的武裝隊。我們在上海香港二處有組織的人共計不滿五十，其餘全國各地游離分子大約在百人以上。

我們當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戰爭中有很大的發展，然如果政策比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現在這樣衰萎。我們的集團，自始即有極左派的傾向。例如：有些人認為民主革命在中國已經完結；有些人認為下一次革命性質是單純社會主義的，沒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認為中國下次革命一開始便是社會主義的；有些人懷疑國民會議的口號，認為它沒有階級的意義，有些人認為國民會議是反動時代和平運動的口號，不能用於奪取政權的口號，無產階級只有在蘇維埃口號之下奪取政權；有些人認為民族民主鬥爭是資產階級的任务，無產階級雖然可以參加運動，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擊同志中主張中國無產階級應該把解決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雙肩上的人是左派資產階級的意識；有些人認為任何時期任何事件任何條件下，和其他階級的黨派協議對外國帝國主義或對國內獨裁者的共同的行動，都是機會主義；這些極左派的傾向，在組織內部的宣傳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決定了对中日戰爭的整個態度，沒有人能夠糾正，誰出來糾正，誰就是機會主義者。在戰爭中，這般極左派的人們，口里也說說參加抗戰，而同時却反對把抗日戰爭的意義解析得過高，他們的意思或者認為只有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戰爭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譏笑“愛國”這一名詞；甚至有人認為此次戰爭是蔣介石對日本天皇的戰爭；有人認為工人參加戰爭是替資產階級當炮灰；他們認為誰要企圖向共產黨國民黨談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誰便是墮落投降；群眾眼中

所看見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動，而是在每期機關報上滿紙攻擊痛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托派漢奸”的宣傳，在各階層中都得了回聲，即同情於我們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對者主要的究竟是誰。從開戰一直到今天，這樣狀況仍舊繼續着，不但無法獲得群眾，簡直無法和群眾見面，因此使他們的意識愈加窄狹，竟至有人造出一種理論說：一個革命黨員，社會關係越簡單越好。

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運動的障礙。

史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敗後中國新的局勢，因此做出許多錯誤；此次失敗後，中國局勢的變動更要大過多少倍，更加不能樂觀，在今天，我們若不能深刻了解未來可能的政治環境，和明白認識中國無產階級現實的力量及其政黨的狀況，而依次決定實際可能開步走的工作方針，則惟有睡在亭子間里自夸自慰而已。

漢口陷落後，大規模的戰爭是不會有的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各農村各小城市所領導的零碎的反日鬥爭，在相當時間還會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戰爭中，這只是一種余波，不能構成集中的力量，擊退敵人。如果國民黨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讓一大部分土地給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長江流域某些省份，在這一統治之下，回到反共的舊路是很可能的，這時不但我們，即共產黨不改組及變更黨名，連半公開的存在都會成為不可能。

我們不應該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復失地以後，應該立即準備在日本繼續占領的環境中，開始在当地狹小範圍內從頭做起，我們發展須等待一個時期，戰後工業開始恢復（無論在外國的或本國的統治之下）才是我們工作較順利之時。我們的工作較順利之時，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秘密或半公開的小團體，必然在好些地方發生，沒有大運動，沒有中心勢力，這些小團體是很難統一的。只有組織上獲得相當數量的工人群眾，政治宣傳行動上無保留的以百分之百

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組織上努力接近工人和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針，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針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說大話，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組織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閉起門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1939年×月

附一：托洛斯基給李福林的信

亲爱的同志：

我讀了你一月十九日从上海写来的信，以及收到四川方面寄来的意見（原編者按：即上面陈給托洛斯基的信）心里感到极大的兴趣。我們终于获得过去所缺乏的那种消息了。我非常欢喜，我們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旧是我們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現在我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度来判断这些可能的分歧。

当然，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見解来判断我們的同志們底政治意見，或判断他們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們老朋友方面对于他們严斥是否正确，然而他表示的意見，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經常合作。

我始終以为他最好是到美国来住一个时期，你认为这事可以做到嗎？倘若沒有最高当局之許可？

我不同意于他的乐观見解。即他认为現在没有什么危險对于他。不錯，在一个时期中，我們的中国同志，在一个小的限度內說，是受他們自身之无力所保护着的，然而我們在国际上一天比一天

强大起来。我們的党已經开始在美国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了。对于史大林派，这是一个可怕的警告，他們要努力阻止其他国家发生类此的危險。他們要向我們的运动中最知名的人物下手。

最热烈的敬礼和祝福

托洛斯基 1939年3月11日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附二：刘仁靜和李季的声明

“人民日报”編者按：这里发表的是曾經参加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叛徒組織的刘仁靜和李季二人的声明书。

托洛茨基叛徒集团原来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派別，后来墮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曾經在1937年3月“論党工作之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兩面分子及其他兩面分子的办法”的报告中作过如下的重要的說明：“过去，在七八年以前，托洛茨基主义曾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之一，固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因此也就是极端錯誤的政派，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派。……現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派，而是一伙无原則的、无思想的、暗害者、軍事破坏者、偵探間諜、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階級之死敌的匪帮，是外国偵探机关雇佣的奸細。”

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在一九二七年遭受失败以后，中国也出現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們与陈独秀等叛徒相結合，在一九二九年形成一个反革命的小組織。他們在反革命势力暂时胜利下丧魂失魄，武断地认为中国资产階級对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已經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統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經是所謂資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以所謂“国民會議”为中

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坚决地反对和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人民革命游击战争为所谓“流寇运动”。托洛茨基——陈独秀叛徒集团既然完全堕入这种反革命立场，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被人民所唾弃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虽然已经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一九二九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一九三七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一九四九年止他一直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字，一直到南京解放。

李季也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叛变革命而加入托派组织的。虽然他在一九三四年后退出这个组织，但是从那时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认识托派的严重罪恶，也没有与托派分子完全断绝关系。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及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刘仁静现改名为刘亦宇，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师，李季现在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

一、刘仁靜的声明

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了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动，一九三七年因意見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仍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認識党的路綫之正确。去年京滬解放以后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由于偉大的胜利的革命之助，我发现了我政治思想的錯誤有以下三个根源。

第一，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不接近群众，虽然主观上愿献身而且曾献身于革命，为人民服务，但总不能耐心的頑强的在群众中工作，担负起把馬列主义通俗化的任务。由于我不做群众工作，我的思想总倾向于把群众的力量估計很低，因此总批評党的路綫是冒險的，在这种路綫下革命必遭失敗。实际这只表示我的落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压力，并傳播这一思想的影响以阻止革命的前进。

第二，由于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劣根性，我自以为是，不肯服从組織的紀律，因此当我不同意党的路綫的时候便鬧分裂的派別活动，实际是削弱革命的力量，让反革命势力更容易巩固起来。布尔什維克党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即党员一面在日常工作中須执行党的政策，一面可向党的领导机关时时提出意見，以求达到这政策的改变。我在口头上是承认这原則的，实际是破坏了它。

第三，我的思想实质上是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常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幻想可以与反革命妥协，和在反革命的統治下进行改良，这是忘記了或否定了馬列主义的最簡單的真理，即是“工人阶级摆脱資本主义的压迫决不能經過緩慢变化，經過改良来实现……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便要执行不調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調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斯大林）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認識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

目，即是說我过去是一个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門什維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維克列宁主义者。小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門什維克的思想决不能領導革命达到胜利，只有在无情的批判門什維克思想的过程中，布尔什維克主义才能壯大起来完成革命的任务。

由于我的脫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紀律和代表上层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表現于对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諸問題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事实和經驗都証明我是完全錯誤。

关于中国革命問題，我以为在上次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国必須經過一个經濟恢复或資本主义相当发展的时期，共产党才能进行夺取政权，下次革命将为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扩大的再版。本此見解，我以为在以后的革命发生以前共产党应集中力量于城市，从事民主运动。不知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联合統治下的中国，經濟发展极微弱而跛行，不及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破坏作用。革命分子在城市中无法容身，工人的民主运动亦无法生长至夺取政权的程度。我的思想执着于俄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不可能有和平的合法的工会运动及議會运动。革命的斗争即武装的斗争。由于这一錯誤的思想体系，我于是怀疑在党领导下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能够胜利。在抗战胜利后，我更迷惑于美帝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前途，以为党应当放下武器，从事民主运动。不知党在政协时期，为爭取国家的和平发展，关于整軍問題不惜作最大让步。只因为代表豪紳地主的国民党，为維持其封建統治，必欲消灭共产党的实力，党才进行自卫的和解放的战争。由于我的錯誤思想的邏輯发展，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前的兩年，亦即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兩年，我竟站在国民党一方面，批評党的革命路綫。

关于国际革命問題，我过去接受托洛茨基的現成見解，不去考察事实內容。托洛茨基批評联共党内不民主，以为俄国革命将走法

国大革命失败的旧路。即由于执政党内部的分化而发生“德尔米多”式的政变，不知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可贵，即在于它能从过去失败的革命获得教训，避免重复它们的错误。托洛茨基的要求民主，用意在于动摇党的领导机关的稳定和威信，不知，在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忘我的劳动，从事艰巨的经济建设的时候，为了防止和打击一些小资产阶级离心的享乐的个人主义倾向，假借民主主义的名义复活，党的领导机关的稳定和威信正是绝对必须的。托洛茨基攻击联共背叛世界革命，事实是，苏联的存在和世界革命的利益不可分，不过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低落的时候，和资产阶级国家或敌对的政党成立一些临时的妥协，以保障革命的政权，为革命的战略所许可。由于苏联的继续存在及其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胜利，战后各国革命运动才能开展，并在中东欧及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是斯大林的坚决意志和天才领导保卫了苏联和保证了战后各国革命运动之发展。至于托洛茨基在这次战争以前则预言在战争中如果先进国家不发生革命，社会主义苏联一定会失败。

从托派形成的时候起，共产国际即指出它是以左倾的空谈、革命的词句掩盖其孟什维克主义、取消主义、悲观主义的实质，将来必然走到反革命的阵营。以后各国托派的发展都证实了这一预见之正确。

现在中国革命已胜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有能力和有威望的、廉洁的民主政府，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中国革命之能胜利，当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毛主席能把马列主义的理論融合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我过去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是观念主义的，缺乏革命的实践，所以失败是必然的。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重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二、李季的声明

中国自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一九二九年出現一个托陈派。我也是参加者之一，不过于一九三四年即行退出。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学月刊六卷一期批評胡适的一篇論文中，順便提及“十二、三年来，我不屬於任何党派，”就是指这事說的。

直至去年五月底止，我在上海度过十五年孤独的譯著生活，解放后，我公开了。現在对于过去这段历史，应该有所声明。

先就公的方面讲，中国是一个三千多年傳統的专制国家，至近百年又逐漸变成半殖民地。因此，中国人民是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兩重压迫。在农村是地主严重的剝削，农民得不到土地，不能解决最低限度的生活問題；在城市是官僚資本家勾結国际帝国主义，操纵我們的經濟命脉，扼杀我們的民族工业。要解放中国，本只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一条革命大道；而农民战争尤应为主力軍，一則針对了卖国政府武力不及广大农村的弱点，比較容易解决农民的土地問題；二則在农村中所培养的基本队伍，一經壯大，即能走向城市，推翻卖国政府，廓清帝国主义的勢力。

陈独秀派看不清这种局势，更分不出緩急輕重，一味以所謂“国民會議”为标榜，盲目反对中共的武装革命，甚至誣为“土匪”“流寇”的行动。这的确是取消革命，变成完全反革命的了。

这一派既不能把握现实，提出为一般人民所能接受的策略，便走入絕境。它的分子于是开始墮落，投入蔣匪帮底下，为其爪牙。直至日本投降，这一派的主要分子之一彭述之还在上海創辦兩種杂志，用尽“革命”的空話，攻击中共的每一行动，希图混淆是非，蠱惑青年。

至于我个人，因为长期秘密生活的关系，养成了一种偏于讀書譯著而絕少行动的习惯。我的知識大都是从书本上而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我之所以加入托陈派，原希望中国的工人运动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一样，于每次革命失敗之后，重新起来爭取基本权利，

参加以至领导民主运动，借以迎接将来的革命高潮。但我忽视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和农民斗争的巨大力量，以致取了一条相反的反动的道路。旋因事实的教训，和学说的印证，我才逐渐明了这种情形。同时，我深深感到托陈派局促城市中，自己不行动，专门攻击中共坚决艰苦的行动——这样去帮助敌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于是因一次最后的冲突，我于十六年前宣布退出。但我未能早就认识托陈派的反动性，在退出以后也未能公开宣布与之决裂，是错误的。追彭述之在一九四六年的“求真”创刊号化名鼓吹老子的学说，并准备将此学说与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他这样对人扬言）时，我便起来迎头痛击，至再而三，直到他压下我的反攻文字不登为止。

其次，当二十多年前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我曾认周代是封建社会，自秦汉至清是半封建社会。此后虽没有工夫再去研究中国历史，但直至三年前为止，也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因为文献通考的封建考明明说过：“立国曰封，分土曰建。”秦废封建为郡县，自汉至清，大都是分封而不建国的局面，故我称它为半封建。然两年前读西洋史，发见西方国家也常有有无封建之争，我开始注意到封建问题不能单凭字面，甚至也不能单凭一种政治制度去判断，应以社会结构中的实质为衡量。近半年来，我初次看到报纸上所暴露的许许多多农村、矿山、城市的压迫和剥削，还全是封建的，而非资本主义的（把头制度即是一例）。推而上之，秦汉至清自不能称为半封建社会。否则其余的一半是什么？从前总以为是商业资本主义。其实在这个长时期中，外患频仍，一治一乱，一切的一切，大都趋于停顿，商业并不普遍发达，尤其在农村中是如此。何况商业并不能单独构成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商业上所袭用的压迫和剥削手段，仍然是封建的，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故自秦汉至清仍然是封建社会。

举凡有关现实的大问题，常是极端复杂，需要正确的理论和实践配合，经过慎重和长期的考虑，才能决定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凭着青年人的一股勇气，和书本上的片面材料，即贸然加入托陈派，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这是错误的。可是看到了事实的证明，我愿

意虛心承认并改正我的錯誤。

托派認中国現阶段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由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主張是荒謬的。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所草“現阶段的民主主义”（登在翌年出版的“求真”創刊号）一文中，承认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应經過一个民主主义的阶段（即“現阶段”），在此时期中，农民应分配土地，工人应参加生产的管理等等。总之，我“所要求的民主，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經濟的，社会的。”我完全拥护毛主席所提出的先經過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轉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

現在全国解放将近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設正在开始，我愿誠懇地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領導之下，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最大的热忱，为祖国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于北京

（选自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第3版）

給西流等的三封信

陈 独 秀

一

第三国际过去反法西斯的口号並沒有錯，他錯在以不通的“人民陣綫”“反侵略陣綫”等口号，凭空做联合布尔政府的夢，而不是組織国际普罗反法西斯的联合陣綫，等到英法布尔政府和法西斯的希特勒政权开了火，他們却一面实际站到希特勒方面，一面宣布反对帝国主义大战，促使英法工人反对战争，法国共产党四十余人，因贊成对希特勒战争而被开除，这实际也是援助希特勒让他对英法得到胜利。在渝出版的“新华日报”，大大譯其列宁反对1914年大战的論文，天天高喊此次战争是上次大战的重演，即双方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为了维护其奴役本国人民和掠夺殖民地而战争。“动向月刊”竟做了他們的应声虫，在这一理論上，我竟看不出中国托派与史派之区别。列宁对1914年大战理論之正确，是由于他不肯抄襲馬恩对普法战争之現成的理論，而是自己腦子观察分析当时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与特质；其口号之收效，是由于帝国主义实际是战败国，而且俄国地大，德国对它不能加以布列斯特和約以上的迫害，十月革命才得以保全。現在呢？我們也不應該抄襲列宁对1914年大战之現存結論，也应该用自己的腦子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与特质，一切理論与口号都有其時間性与空間性，是不能随便抄襲的。对于像欧洲大战这样大的事变，不能观察其活的环境与特质，而視為历史重演，以背誦一大篇过去大战的經驗与理論了事，这样的馬克思主义理論家乃是抄襲陈文的入股家啊！历史不会重演，錯誤是会重演的，有人曾把列宁1914年大战的理論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

忘記了被壓迫民族的反帝特質，無論他唱如何左的高調，只能有助於日本；現在又有人把列寧當年的理論與口號應用於此次戰爭，而忽略了反法西斯的特質，無論他如何左的高調，只能有助於希特勒，英法雖不是被壓迫的普魯士，但希特勒却是橫行歐洲的拿破侖第三，而不是威廉第二；因此，不但在德國，即英法普羅政黨固不應採用“保衛祖國”的口號，卻應該採用“共同攻打法西斯的希特勒”的口號。今天的武器和交通和以前的大大的不同了，英法的國內戰爭即令能夠成功，倘在希特勒傾復以前，革命新政權的命運決不能像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那樣幸免了！吾兄來信也說：“如果法西斯勝利，人類將有淪於浩劫，因此應盡力阻止法西斯的勝利。”這話對極了。但怎樣阻止法西斯勝利呢？我認為只有希特勒對英法戰爭的失利，和以前拿破侖第三戰敗一樣，引起國內革命，才能阻止法西斯的勝利；若在英法取失敗主義，只有促成人類浩劫，勝利的自然是希特勒，固然不是英法政府，也不是英法和德國的無產階級。若謂交戰的雙方都是帝國主義者，工人都應該反對，這完全犯了以前把希特勒和白朗寧同樣看待，把國社黨與社會黨同樣看待一樣的錯誤，這樣不分輕重皂白的錯誤，以前因此幫助了希特勒在國內成功，現在又會因此幫助希特勒在國際成功，普羅固然要準備明天，可是今天應該做什麼？今天已經在戰爭啊！贊助希特勒或反對希特勒，事實上，理論上都不能含糊兩可，反對希特勒，便不應同時打倒希特勒的敵人，否則所謂反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勝利，都是一句空話。尊意如何？尚望詳示。

1940年3月2日

二

……前函意有未盡者，茲再陳述如下：弟有二信念：（一）在此次大戰結果之前，甚至戰後短時期中，大眾的民主革命無實現之可能。（二）現在德俄兩國社會主義及格伯烏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從地位，是現代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

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伯烏政治。因此，一切鬥爭（反帝鬥爭也包含在內）比起這個鬥爭都屬於次要又次要的地位，若是有害於這個鬥爭的鬥爭，更是反動的。我根據以上的見解，認為不但在英法美國內反對戰爭是反動的，即令印度獨立運動也是反動的，民族鬥爭一脫離世界鬥爭的利益，便不能不是反動的；而且事實上，印度一旦脫離了英國，必然轉入日本或俄國的統治，使希特勒對英取得決定的勝利，這不是反動是什麼？我這一意見，不但連根兄見之駭然，即兄等亦未必認為宜慎重考慮，因為和我們腦中以前所學習的公式太衝突了。此信亦望轉寄連根兄一閱，並前函一併抄給×兄，那便更好。……

四月廿四日

反國社主義及格伯烏政治的大鬥爭，不是由於民眾，而是由英法對德戰爭這一較好的形式，這是全世界革命者的恥辱，若再空談高調，使國社主義獲得勝利，那便是恥辱罪惡！又及。

三

……關於你對歐戰的意見，答复如下：你對於歐戰所持的意見，是根本把平日所持對於民主和蘇聯的意見推翻了，還免不了為現存的理論和公式所拘囚，即為列寧對於上次大戰的理論和公式所拘囚，未能用自己的腦子思索問題，即犯了上次寫給兄的兩點之第一點，列寧時代的帝國主義，馬恩未見着，所以列寧不能襲用馬恩對於普法戰爭之現成之理論；我們時代之法西斯主義及格伯烏政治，列寧未曾見着，我們也不能襲用他對於上次大戰的理論。上次大戰的結果無論英敗或德敗，人類命運無甚變化，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我們能認清法西斯的勝利，能加速大眾民主的實現嗎？如果這樣想，便是“死狗”在德國希特勒登台前之荒謬見解之重復，我們能假定此時能在英法號召國內革命來答复法西斯嗎？我看客觀上的條件沒有一點使我

們能够这样輕率的假定，这样的假定除了帮助希特勒和“死狗”以外，沒有別的效果。以前有許多人不要国民會議，只要苏維埃，我曾問他們，苏維埃誠然好过国民會議，但将怎样走向苏維埃？兄現在說：“我們不能忘記大众的民主”，我也要問你：“你只是不要忘記沒有用，将怎样走向大众的民主”？形式的局限的民主，于大众的民主斗争是有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格伯烏政治，是大众民众运动的制动机。即以中国問題而論，英法若是敗了，中国不外日俄兩國統治，若英法胜了，全世界法西斯运动破产，当然恢复东西旧秩序，其影响于中国国内政治，也可想而知，我們能做比此更好更美丽的夢嗎？以前，第三国际在国内的口号是“人民陣綫”，在国际的口号是“和平陣綫”；“民主陣綫”这一口号很少用，即各国党曾經用过，我不能承认那是不对的，因为根本苏联不民主，各民主国又未曾有和希特勒决战的表现，那时拿民主陣綫这一礼物，从事联欢英美政策，以为各民主国内民众斗争的制动机，这和現在各民主国向希特勒开炮时他們不采用民主陣綫政策，最后都是錯誤的。至于此次拥护民主，不能和上次大战中拥护民主相比，因为上次大战尚沒有法西斯的問題，上文已詳釋过了，余詳前次为此問題写的信，可以參看，此信和前写老×的信，均望寄××一閱，免弟重写，兄和我在數年前都已认为死狗是全世界罪恶之魁首，（这次不是O×兄所謂感情用事）誰来推翻它，我們都贊成，兄已忘了嗎？我現在說，老实說，誰打倒死狗和希特勒，我都向他叩头，我情愿做他奴隶……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給連根的信

陳 獨 秀

……你們的意見一致，我都見着了，不得不力疾簡單的復你數語：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上之真實價值（自列托以下都如此）把民主政治當着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是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狹廣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十月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今天有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跟着學話。現在你又拿這一空洞名詞做武器，來為希特勒攻打資產階級民主的英美。第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法美帝國主義者階級作用不同，（帝國主義是金融寡頭結合中產階級，只能容忍無產階級的組織宣傳至某種限度；法西斯則是金融寡頭結合流氓無產階級及右派急進小資產階級，根本鏟除無產階級組織與宣傳）不懂得法西斯的經濟制度比起英美帝國主義來，是由日漸國際化的局面，回轉到國家化，自給自足的封建化，而認為只是簡單的政治不同。政制是由它階級的經濟的推動，不是凭空產生的。即以政制的表現而論，德意俄的格伯烏政治和英美法的議會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嗎？第三是不懂得“中間鬥爭”的重要性，我們若一眼只望着

最后斗争，以为只有最后斗争才能消灭法西斯及其复活，才能够解决问题，则中间斗争若反法西斯运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等，都是无益之举，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了。再加上第四，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参看与××的信）以上四种根由之总根由，还是：“对实际的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自然科学的公式有时还可推翻，社会科学的公式更脆弱得多，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拿旧的公式当做万应丸，永久演说的用在现时日益变动的复杂的事件上，自然牛头不对马嘴。

大战开始以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声疾呼根据列宁上次大战的理论，指斥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虚伪，反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声称两边都是侵略的强盗；实际上词句之间却暗暗左袒希特勒，我细读你的信，不但在思想与死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进读“破晓”一小册子（破晓当然是根据托洛斯基的意见）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像这样为史大林希特勒做义务宣传，态度还不明白吗？还说什么对两边都不左袒呢？“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理应合并了。如此你们以后再反对斯大林，便是无政治原则私人权位之争了。除了斯大林手中所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构，谁能寻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你们的意见若无望改变，和死狗妥协，只是时间问题。而且如果依照你们的希望，（至少破晓的作者是如此）各民主国连美国也失败了，托洛斯基便不能在墨西哥居住，那时不与死狗妥协，还有何出路！

1940年7月31日

.....

我现在提出两个问题请兄答复：

（一）在纳粹威胁之下英法革命党，是用反纳粹口号能够集合力量，还是用反本国政府口号能够集合力量呢？

（二）假使现在德国内部有一种民主势力对纳粹起国内战争，

你們主張同时一齐打倒，还是联合納粹打倒民主派？或是如意因的主張同时冷淡呢？

及 白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給 Y 的 信

陈 独 秀

Y兄：

茲附上致HS二君函，望与彼等通信时轉去，…… H等希望我跳出馬克思主义圈子，(陶孟和也是如此)乃彼輩一向之偏見，不足为异，我輩最好与之討論实际問題(历史的及現狀的)使之无可逃遁，不必牽涉抽象的理論及主义的圈子，免得纏夾不清也，陶孟和不是不懂，仲純弄錯了。……即祝

健康

弟

独 秀 1月19日(1941年)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給 S 和 H 的信

陈 独 秀

HS二先生：

与H先生別三年矣，与S先生更廿余年不見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感叹！

頃見二位与Y兄书，于弟近作有所示教，感謝之至。自来之論，喜根据历史現在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談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論之前提，此种“圣言董”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張重新估計布尔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括在內)之价值，乃根据苏俄廿年余的教訓，非拟以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路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乎馬克思主义，又誰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于中国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見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說弟是一个“終身的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問其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为其陆稿荐出而嗜之，是迷信也；倘味道好，因其为陆稿荐出而弃之，此亦成見也；迷信与成見，均經不起事变之試驗及時間之淘汰，弟兩不取之。紙短話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討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倘有新作，自当奉上乞教。弟所欲言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即写出，虽油印也不易办到也。此祝

健康

弟

独 秀

1月19日(1941年)

(选自《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

我的根本意見

陈 独 秀

(一)不会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都有革命局势。最荒謬的是，把反动的局势，說成革命的局势；即把統治階級战胜后，开始走向稳定，說成是走向崩潰，把中間階級离开革命階級而徘徊动摇，說成开始离开統治階級而徘徊动摇，把革命階級打敗后的憤悶情緒，說成革命情緒高漲。我們必須駁斥“人民愈穷愈革命”的胡說。“压力愈大反动动力也愈大”这一物理現象，虽然也可以应用于社会，而必以被压迫者有足够奋起动力为条件。

(二)无产階級的群众，不会在任何時間都傾向革命，尤其是大斗争遭到失敗之后，或社会經濟大恐慌之时。

(三)无产階級沒有适合于其社会条件的充分数量，和別的居民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特别是十余年来苏俄官僚統治的經驗，中日战争及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經驗，使我們不能把現時各国无产階級力量估計过高，使我們不能輕率宣布“資本主义已到末日”。沒有震动全世界的力量之干涉，此次大战自然不是資本帝国主义之終結，而是它发展到第二阶段之开始，即是由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兼并成簡單的兩個对壘的帝国主义集团之开始。

(四)應該严格区别小資产階級“集中”“統一”的武断性，和无产階級“集中”“統一”的自然性之間的不同。

(五)應該严格区别急进而虛矯的小資产階級分子和坚决而坦率的无产階級分子之間的不同。

(六)現在并不是最后斗争时代，不但在落后国家，即在欧美先进国家，如果有人武断說：資产階級小資产階級已經沒有一点进步

作用，已經完全走到反动的营垒，这只是种下了将来資產階級表現進步作用時向之倉惶投降的後果。

(七)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廿余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于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問題。

(八)民主主義是自从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九)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社會主義，是相成而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階級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并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劑，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么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專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

(十)此次國際大戰，自然是兩帝國主義集團互爭世界霸權的戰爭。所謂“為民主自由而戰”自然是一種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認英美民主國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在那里，在野黨、工會、罷工之存在，是現貨而非支票，除了納粹第五縱隊的爪牙，是不能用任何詭辯來否認的，我們更未曾聽到美國用納粹對待猶太人的辦法來對待孤立派。希特勒的納粹黨徒，則企圖以其統治德國的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紀宗教法庭更野蠻黑暗的辦法統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許有它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不容任何異己之存在，并不容被它征服的國家中土著納粹及各種各

色的土著法西斯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窒息，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筋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筋无自由意志的牛馬器械，所以全世界各国中（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此次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他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甚么社会主义，甚么民主主义，甚么民族解放，一切无从谈起。

（十一）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之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例如英国人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若被革命推翻，其时的英国海陆空军势力必然分裂削弱，革命的新政权，又决不能在短时期内生长成强大力量，来抵抗纳粹军队侵入英伦（若说“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之失败无疑是较少祸害的”那么现在被纳粹征服的捷克人法国人真是幸运！）忽略了时间问题，真理会变成荒谬。人们有理由认为中日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然不能因此便主张在中国采取失败主义。重庆政府之毁灭，在今天除了帮助德意日加速胜利外，不能有别的幻想。我们也以同样理由，不主张在苏联采取失败主义，虽然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人类自由之命运上史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十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革命之基础准备，即群众结合，在有若干民主成份的政权之下，比在纳粹极权统治之下，更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纳粹胜利比起失败于德国革命运动更为有利，纳粹霸权在欧洲能支持好久，无人能为它算命，如果以纳粹胜利后必然崩溃，来做帮它胜利的口实，这样大的牺牲，这样滑稽的战略，和以前德国国内政变时，史大林宣布“让希特勒上台”“他上台不久就要失败”等说法，没有两样。并且现在的欧洲，也和中国战国时代及欧洲近代初期一样，在经济发展上要求统一，因为没有革命的统一，纳粹党反动的统一，也有客观条件使其能够实现

之可能。不过这种反动的統一，在經濟上不能够动摇資本制度对于生产力之束縛(私有财产制)像欧洲王权时期动摇封建制度对于生产力发展之束縛(农奴与行会)那样的进步作用。在政治上毁灭民主制，回复到中世紀的黑暗，即使不很长久，也是人类可怕的灾难和不可計算的损失。

(十三)战争与革命，只有在趋向进步的国家，是生产力发达的结果，又轉而造成生产力发展的原因；若在衰退的国家，則反而使生产力更加削弱，使国民品格更加墮落——夸誕、貪污、奢侈、苟且，使政治更加黑暗——軍事独裁化。

(十四)国际战争，只有在兩方武器和軍事技术相等的国家，才能把人数、民气和作战精神，看做决定勝負的因素；即在國內战争，十九世紀新武器之发明，使恩格斯不得不重新估計巷战之价值；廿世紀新式武器新战术之发明，将不得不更加减少民众暴动与巷战之可能性，如果統治营垒內部不崩裂。

(十五)帝国主义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为存在条件，犹之資本主义制度以私有财产为存在条件。我們不能幻想資本統治不崩潰可以取消私有财产，同时也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宗主国及宗主国的敌对国家)中的社会革命結合起来，会得到胜利。在今天——英美和德国兩大帝国主义互爭世界奴隶統治权的今天，孤立的民族战争，無論由何階級領導，不是完全失敗，便是更換主人，或者还是更換一个更凶恶的主人，即使更換一个較开明的奴役主人，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經濟之发展，而根本不能改变原来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奴役地位。

(1942年)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战后世界大势之輪廓

陈 独 秀

历史决不会重演，此次大战已使世界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或已发生巨大变化之萌芽，拿过去理論公式的表格来填写将来事变之发展，簡直不中用了。

此次大战不外三种結果：一是英美和德日不分勝負而議和；二是胜利屬於英美；三是胜利屬於德日。第一种結果之可能性最少，我們似不必加以推測，第二种和第三种以何者最大呢？以現狀觀之，自然是德日占优势。开战已經兩年多了，又因得到苏联出来支撑，英国全然休息了半年，此时以全力仍不能敌住德国在北非洲的少数部队，若說它能够于最近的将来战胜德国的大軍，这是很难想像的事。若认为英国在各戰場上的失敗，都由于陆空軍之寡不敌众，再过一年或至一年半，英美軍器生产大扩充之后，战局便会轉变；惟現時虽有人发出“全面改厂”的呼声，而鉴于过去直至現在，政府官吏之因循誤国及工厂主只顧私人的利益，将来軍器生产之竞赛，英美能否胜过德国本土及其可能利用之邻邦，确实大成問題。即假定将来可以胜过，又有何神密能够使希特勒及其伙伴，在此一年甚至一年半以內，按兵不动，靜候英美扩充軍备呢？德国的內部危机，誠然大过英美，然而对外战疲或潰敗前未必爆发。德国唯一的弱点是缺乏煤油，这也是它在始終无力夺取高加索和伊朗的条件下不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因素。基于各种情势，德国利于速战速决，英美則利于持久战，双方都以爭取時間为第一要着，所以迫在目前之德国的春季攻势，无论发生在地中海或欧洲大陆，馬尔他，直布罗陀，苏伊士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綫之胜敗，或莫斯科，高

加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以至新加坡，这一战綫之胜敗，都可以說是决定此次大战全局胜敗之最大关键。这一战綫之胜利若屬於德意日，英美是不能够长期支持下去的，自古至今，单是地大人众物博，并不是决定胜利的重要条件。

倘胜利屬於英美，德意日都完了，英美在和会中，或国际善后會議中，便开始形成对立的局面，战后英国收拾欧洲，北非洲，近东以至中东，已非易事，一时决无力量及于远东，远东以至南洋澳洲，自然会屬於美国的势力范围，那时苏俄将是兩方面拉攏的奇貨，英美的命运仍决定于下次大战。

胜利倘屬於希特勒，英国便完了，美国也只得暫時划南洋以自保。希特勒虽胜利，他的枪口仍然要向着西方，自烏拉山印度以东，則非他的軍事力量直接所能及，那时无論美日是否成立和議，日本将是美德兩方面拉攏的奇貨。美国固然未必繼續对日战争，希特勒在未征服美国以前，他也不会为了远东問題开罪日本，逼迫他所倚重的同盟者轉向美国，自断其兩洋夾攻美国之右臂。希特勒知道英国在远东的势力消灭后，他若威胁日本，日本有获得美国退出远东的条件而和美国妥协之可能。美德的命运仍决定于下次大战。

世界上还有几次大战，我們还不知道，所能知道的只是在战争的因未除去以前，战争的果是不能免的。并且胜利若屬於德国，下次战争必然来得更快。美德間固然无所谓和議，而实际战斗也必告一段落，德国固然需要一停战时期，建立他的新秩序以收胜利之果，更需要补充足够渡美的战艦及运输艦之时间，然一过此时期，德国对美国战争便会从南美洲开始。本来每次大战都不过是前次大战繼續延长，我們切不可为“永久和平”“民族自决”“民族平等”“資本制度消灭”，如此等等好听的宣傳所眩惑，夢想战后这些都会实现。

欧美人想就資本制度加以改良的企图，不自今日始；然而其結果乃是在股份公司，合作社的旁边，巍然起来了脫拉斯；在劳动立法普遍了半个世界之后，所謂“社会主义国家”还得恢复計件工資。

改良資本制度既非易事，消滅資本制度更不能夠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輕鬆。此次大戰後，不但英美，就是德意日的世界裡，也必然企圖改良資本制度，以適應他們的統治。希特勒一向非難資本主義，這並不能夠欺瞞任何人，只是他和他自己開玩笑。他們改良的企圖，不外拿關稅協定甚至經濟同盟，來減輕各集團圈內的關稅壁壘；拿物物交易來減少各集團內的貨幣作用；拿產業國有化，來代替某些私人企業。各集團圈內關稅壁壘即使能減輕，對於另一集團圈的關稅壁壘勢力還要加強；物物交易的辦法，不但不能全部施行，即其所能夠交易的，仍以貨幣計算，仍舊是商品交易，而非分工互助；某種產業國有，已經是前世紀所有的事，全部國有化，即實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理論上好像說得通，而事實上必不可能。占有生產工具的大集團，不經過革命的沒收，而自願把私有財產供獻於國家，這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有人幻想能有一個超然政府來和平沒收，這一所謂“超然政府”，上午企圖沒收別人的企業，他的政府下午即被別人沒收了。所以以上三種改良企圖，決不能動搖資本制度的基礎。資本制度這種東西，一旦開始發生，利與弊都勢必順着她自身發展的邏輯逐日增長，一切改良方法既不能動搖其基礎，節制之，更只有使整個的社會經濟趨於衰落，欲只得其利而免其弊的如意算盤，是不會成功的。私有財產制和商品生產制，是資本制度之基礎，亦即其弊害之根源。這一生產制，其目的，是為擁有生產工具者出賣商品，增加其私有財富而生產，不是為直接供給人民日用品而生產；其生產力愈益發展，依供求律愈益失去生產力與購買力之均衡，因之，而生產過剩，而物價低落，而工廠倒閉，而工人失業，而形成經濟恐慌；經過一時期，生產力削弱而恢復原狀，後又因生產力比以前更加強而走向更大的恐慌，如此循環而構成恐慌之周期律，自來救濟生產之策有二：一是自動的減少生產量甚至毀壞生產品這一愚蠢可笑的方法：一是爭奪殖民地及國外市場走向戰爭這一瘋狂可怖的方法。為了必須把國內生產過剩的商品向國外市場推銷，還必須阻止國外商品侵入國內市場，就不得不加高關稅

壁壘，擴張軍備，準備戰爭，以至實行戰爭。這一串因果相聯的現象，都是現代國家當局所必須採用的步驟。因為他們既不能消滅資本制度，便只得讓資本制度牽着鼻子走，否則只有失敗，這本是事實之必然，決不是什麼思想，甚么良心所能使之改變的。在全世界幾個強大國家必須爭奪市場，必須準備戰爭，必須實行戰爭的時代，大家盡力擴大其勢力範圍，他們彼此擠得水泄不通，怎樣談得上民族自決，民族解放呢？上次大戰之終了，威爾遜的十四條，未嘗不轟動全球，而隨即消聲匿跡者，並非路易喬治和克利蒙梭欺騙了威爾遜，乃是威爾遜欺騙了他自己。並且這一欺騙，亡了法國，害了英國和美國對日本喪失了強國的體面。此次大戰後，誰還要在資本制度世界標榜和平主義的幻想，在下次大戰中，誰就是失敗者。

此次大戰後，無論勝利屬於何方，帝國主義的統治都仍舊不變嗎？資本制度存在一天，由它所自然產生的帝國主義，當然不能自動根本放棄，但統治的形式必然有所改變，即是：由民族化到國際集團化這一形式之改變；這一改變並非帝國主義制度之終結，而它反走向擴大與加強。今後不但十九世紀以前的民族國家運動已隨着帝國主義發生而沒落，即廿世紀初期的七八個帝國主義列強對立也要完結。德意日都是由民族國家進而為帝國主義國家之較幼者，日本是最後一個，全世界殖民地及落後國的市場都已為他人捷足先得，這就是他們不得不冒着危險，瘋狂的以戰爭來改變帝國主義世界的舊秩序之唯一原因。戰爭的結果，真正獨立不受他人支配者，只能有兩個領導國之對立，美德之對立，其他民族國家都不得不在同盟或全面合作等名義之下，分別隸於這兩個領導國所領導的集團圈之內。日本和蘇俄，當然都有各自領導其集團圈之野心，然而生產力終於要決定他們的命運。其他殖民地及落後國，若企圖由民族鬥爭而產生新的國家，這樣時代已經過去了。在各集團圈內，依國力之強弱，其地位略分四等：第一等較有面子的所謂“同盟國”例如日本之于德國，蘇俄之于英美；第二等是半殖民地，例如意大利之于德國，荷蘭比之于德國，丹麥意大利之于英國，菲律賓之

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政治尤其是經濟，都多少要受領導国支配；第三等国是被保护国，例如法比之于德国，丹麦意大利之于英国，菲律宾之于美国，虽然有一个自己的政府，而不能有独立之外交；第四等是殖民地，連自治政府也沒有，統治权操諸領導国总督之手。比殖民地更次一等，自来是沒有的，有之便是种族日漸消灭之美洲澳洲之土人。各集团圈内的国家民族地位虽高低不同，而有一共同点，即是他們政治及經濟制度都必得或多或少的按領導国的模样改造，根本相反的制度是不能够存在的，德国所領導的集团圈内，多少要按納粹制度改造；英美所領導的集团圈内，多少也要按民主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呢？这要靠領導国的革命成功才能實現，才能够影响整个集团圈，依俄国革命的經驗，帝国主义世界中最弱的环之破碎，終於不能够使它全部瓦解。至于現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領導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有些欢喜做梦的人，当此次大战一开始，便夢想弱小民族独立的机会到了；其实亚洲殖民地，一脱离英美便入了日本的掌握；非洲的殖民地，脱离了英国便入了德意的掌握。有人甚至夢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們的美夢，已經不胜悲哀；如果再觉着今后連民族斗争都会受到限制，并且納粹党会支配半个地球，他們将感觉着由欢喜的天国墜落到悲哀的深淵，将感觉着命运要走下坡路了。其实人类进化史，它始終很冷靜的走着它前进的道路，此时它并未企走向天国，也不是走向毁灭墜落的深淵，对于人們由自己虛幻的希望欢喜而来之失望悲哀，它不負任何責任。此次大战，即使不幸得很，胜利果然屬於納粹，它竟支配了半个地球，这占人类半数的人民，在政治上将受到整个时期窒息的大灾难，而在經濟上和英美胜利一样，固然不能动摇資本制度对于生产力的束縛，而資本制度之范畴以内会有一大进步。例如由币制統一，減輕关税壁垒，物资集中等等，漸次减少世界上許多小的經濟单位，除去一部分經濟发展之障碍，将比战前的生产力要突飞猛

进,这是客观上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世界开辟宽广的道路,加强物质的基础,这本是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的惯例,只有眼光狭隘的教派之人,才看不出这一远景。人类历史和地球一样,无论在光明的白晝或黑暗的深夜,都是进行不息的。

正經的說来,认真的民族解放,只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实现。在資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何况在兩派帝国主义主腦,爭着以战争状况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今天,民族斗争会受限制。这句话,只有欢喜幻想的人听了才感觉惊异,如果由全世界经济由統一而进步的观点来看,民族斗争受到限制,不一定是坏事。无论全世界或一个国家内,沒有革命的統一,反革命的統一也有进步意义。例如吳佩孚統一比軍閥割据好,刘湘的統一比防区时代好。并且民族斗争受到限制这句话,并不是說被人领导的民族将馴羊似的一无所作,只是今后的民族斗争会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有此警觉才能够开始有效的步骤:(一)努力于自己政治民主化和民族工业之发展,以增高在集团圈内之地位,現在已經不是李鴻章时代,不应仍做富国强兵一跃而为十八十九世紀式民族独立国家及廿世紀式世界头等国家的好夢;(二)創造自己的实力(工业及民族的組織)以准备与领导国国内革命相应和斗争以达到自己民族的真正解放与进步。不应幻想关起門来,在一个国家内以一个民族的力量,能够排除帝国主义势力,以实现民族資本主义的国家独立;(三)对于国外斗争,无论是对于軸心国或非軸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以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个民族之最后鉄絲网,已經不是某一民族的問題,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問題,若仍旧由民族立場出发而斗争,印度眼前的敌人便是英国,中国将来也要再来一次抗美援朝;(四)我們應該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們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拒絕他的文化。拒絕外来文化的保守傾向,每每使自己民族的文化由停滯而走向衰落,中国文化誠然有它的优点,惟如果渲染

过当，便会使之高踞在形而上的地位，俯视一切，而形成偏畸的发展，竟把民生国防所依赖而应该特别重视的物质文明，排除在文化以外，还有人竟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光荣，印刷与火药之发明，也排除在文化以外，把文化缩小在文艺圈子里，这样误解文化的结果，遂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发生了万分不应该发生的两件事：一是把口里哼哼诗词，手里耍耍笔杆，应该称为“文人”的，无端改称为“文化人”，这和日本称中国为“文字国”同样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讽刺；一是继义和拳符咒能够抵抗枪炮的思想，企图用标语口号歌咏来抵挡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便是中国文化畸形发展之末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经害了我们半个世纪没有长进，我们不要高唱“本位文化”“东方文化”再来害后人吧！

或者有人认为此次大战是轴心和非轴心两派帝国主义各自扩大其势力圈之斗争，非民族解放之斗争，弱小民族之参加毫无意义。这一见解是由于他们不明白民族解放自然不能够依赖帝国主义帮助而成功，也不是弱小民族自己力量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中立”这一名词，现代战争史上将不会再见了。缅甸人如果说：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而不能和不认识的天使来往；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并不知道现在世界有什么天使，只知道你们所认识的魔鬼，比你们不认识的魔鬼，还要凶恶十倍！中国如果有人说：帮美国打日本，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我们应该告诉他们：美国胜利了，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为殖民地，连南京的傀儡政府不久都会滚蛋！

以上的说话，或者有人认为是低调，那只好让将来事实教训他。

一九四二年二月

（选自1942年3月21日重庆《大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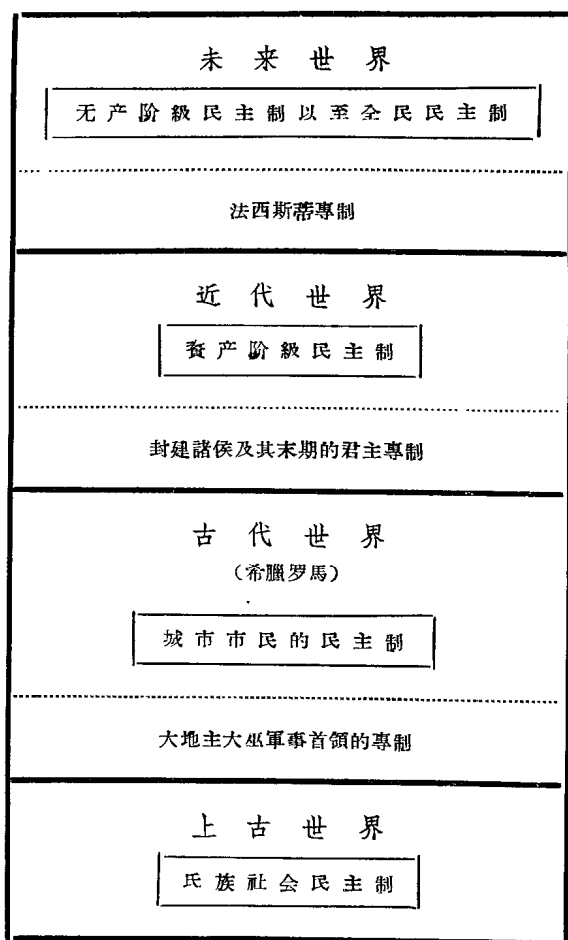
再論世界大勢

陳 獨 秀

有人說我在“战后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中所估計的国际形勢，將來只有帝国主义的天下，这未免太悲觀了。我以为評量客觀上的估計只应問其现实性如何，不必論其是否悲觀。現世界自前世紀之末以來，金融資本即已冲破了民族的界限，帝国主义的天下已經成为事实，不如此便不成其为帝国主义。这并不是将来的問題，將來不过是七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再火并為兩個帝国主义集团而已。一天沒有振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之干涉，这种狀況仍要繼續下去，而且会发展到比我們所估計的或者还要坏些，即是：此次大战如果胜利屬於希特勒，英国固然完了，罗斯福或也至倒台，美洲的希特勒将起而代之，下次世界大战亦即德美战争，将不是民主与納粹战争，而是兩派法西斯蒂集团之火并；如此則会真是如罗斯福所說，民主自由将喪失數百年才能恢复；如此則人类进化史将走入如下表的道路：（見下頁表）

照下表，則將來法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亦即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經過一专制黑暗时期；如果人們倘在幻想和乐观的安乐椅上，听任納粹在发展，我們沒有理由否认这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可能。

客觀上的估計和主觀上的努力虽然不能相差很远，而也不一定都走同一方向，譬如：我們估計此次战争德日胜利的可能較大，这不阻止我們主張在勝負未決定之前，力助英美获得最后胜利；同时也不能因为應該力爭民主同盟方面之胜利，遂盲目认为軸心国



家只有失敗。我們可以追求理想，而不可追求远离事实的幻想；只可认清非絕對不可能的理想，堅苦的前進，那怕較為辽远，却不可拿乐观的幻想以自慰。与其以乐观的估計构成海市蜃楼来自己安慰自己，以至松懈了事前的戒备；不如拿可能的悲觀的估計，以警策自己，以喚起別人，加紧事前之努力。如其閉着眼睛否认将来会有帝国主义的天下，不如睜开眼睛，看清可愁的趋势，承认将来还

有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險，因此加紧主观上之努力，在此次大战中，彻底击潰希特勒及其伙伴之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的巨大潮流，淹沒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能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別种形式而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經過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直接走向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青年，繼續努力縮短将来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我們所追求的理想如此而已；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轉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这即是我所以不顧旧日同路人的譏評，而始終贊成联合英美向納粹进攻之理由。最坏的是以客观上乐观的估計，来代替主观上的努力；假使在此次大战之前，張伯倫，伏罗西諾夫和諾斯克，不取輕浮的乐观态度，把敌人看得不值一击，而很慎重的以軍事准备，代替大言壯語，此时战局形势当然要好得多；因为現时的敌人，不像清朝的总理衙門可为外国人的大言壯語所吓倒，也不会为口头宣布的軍事扩充案或軍火生产激增的数字所欺騙，由恐吓欺騙而得到胜利的时代已經过去了！

三月十六日李維諾夫在紐約經濟俱乐部聚餐会演說中，有几句話說得很对：“余信時間之因素，为作战双方均不可持之詭詐盟友，吾人一方面从事持久之战争，另一方面准备軍需品与后备力至超过敌人之程度，固为得計；但此种計劃，必須敌人保証在該时期內无所事事，方克有济。但君等均悉吾人之敌方必不如是，彼等必将利用其現有之成功，繼續推进，繼續占領土地，囊括資料之新来源地，奴化千百万人民，甚至获取兴与国，敌方所获之此項利益，其結果势必較于我方在此种单方面之停战状态下所获得之軍备上优势，超过我方之成就而有余。”“吾人苟竟以吾人所战胜可能一类泛泛之論，互相告慰，則吾人之距离胜利之实际途徑，亦必愈远。此为吾人所常引以为惧者也。”这即对于美国人以及所有同盟国人

“最后胜利天然必属于我们”“德意日只有失败”这类轻浮的乐观，加以痛切之砭针。既往不咎了，时机不容我们一再放过，今后要想获得最后胜利，必须痛戒轻浮的乐观，我们试将哈里法克斯（此人是敦刻尔克战役后英国舆论所指摘(?)的张伯伦内阁中误国罪人之一。)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乐观的演说，和同时李维诺夫的说话(见上)对照一下，我们更应该根绝乐观态度，把他看作敌人，而严厉的注意下列几件事以代替乐观：

(一)英美两国必须对俄国不存疑忌之心，而以大部分力量协同俄国军队保住莫斯科，不可再像李维诺夫所指摘“把配备很好的军队放在没有战争的地方”；也不可相信某些人的胡吹：俄国在战争中已证明它的实力超过了英美，它可以击溃希特勒；更不可以为保住莫斯科只有利于俄国。军器生产之增加是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保证，而军器生产需要时间，哈里法克斯很乐观的说：“美国尚具有军事上与工业上之潜在力量”他忘记了我们不能用魔术使那些潜在力量很快的变成军器，希特勒把春季攻势推延到夏季，大约大的进攻目标还是莫斯科，只有保住莫斯科至一年，或是一年半，使希特勒无法抽调大军南下，美国 and 英国才能有够用时间，增加军器生产至超过敌人的程度；否则一旦莫斯科陷落，俄国军队精锐溃丧，这正中了希特勒各个击破的计划，乘战胜之威，移军南下高加索、伊朗、伊拉克，和日本会师苏伊士，以封锁地中海，此时英美军器生产之增加尚未成就，而大势已去矣！

(二)增加军器生产不是空喊所能收效的，求与敌人的军器不但相等，还要超过，现有的军器制造厂自然不够用，建设新厂时间来不及，唯一的办法只有“强迫改厂”尽可能使得别种工厂改造军器。没有超过敌人的军器，即没有最后胜利。说到这里恐怕又有人反对，说这是“唯武器论”。其实人类自发明石矢以来，战争的胜利即日渐依赖武器，到今日，几乎可以说战争是武器的竞赛，法军在绥丹，英军在敦刻尔克以及马来新加坡之英勇的惨败，都证明了这一真理；反对唯武器论者，他们自己向美国要求坦克车和飞机的呼

声，也并不弱于别人，其自身也证实了这一真理。

(三)以过去国际联盟的经验，要得到战争的胜利，要得到战后的集体安全，都须要组织有领导有相当强制力的经济与军事之国际集团，由民族化趋向国际集团化，这不独是今后势之所不免，而且是人类进步的要求，要求——我们应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联邦之过渡，至如尼赫鲁之主张除开英美的亚洲集团，说起来很漂亮，其实这样只有使亚洲落后延长，而且这和缅甸人“宁可和认识的魔鬼结交”的说法，同样是一种人种的偏见，同样会替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目，我们必须排斥这一有害的幻想！在唯力的现在，离开英美和德意日这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而蒼头特起，这不是幻想，便是騙子。尼赫鲁亚洲独立的主张，和苏巴斯鲍斯印度民族独立的呼号，虽然动机不同，而结果都只会帮助德国和日本。

(四)我们既然参加了民主国家兵工厂的英国所领导之反纳粹战争，我们既然参加了为保护全世界民主自由而战的同盟国集团，自然应该以民主自由为国人之中心思想使全国人同其视线同其标的以集中战斗意志；即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落后，又加以历史传统，而且在战争中，民主自由制一时不易达到理想程度，这自然是事实，然而起码也必须表示趋向民主自由这条道路的決心，不应该像有些人根本反对民主自由，痛骂民主自由是陈词腐调，指摘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时代错误；或者客气一点，拿中国特殊的所谓“民主自由”，来抵制世界各民主国通行的民主制之基本原则；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民主自由已不适用于现代国家，他们所谓现代国家，无可争辩的是德意日，或者还包含着俄国，而当然不是英美。这样是否会使全国进步分子不明白我们抗日战争扩大为反德意日战争到底为了什么？是否会使全国战斗意志分散；是否会帮助敌人譏笑美国“拿民主物资援助非民主国”这一毒辣的宣传；又或是否会使友邦怀疑到我们参加民主国同盟之忠实性；这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或者有人认为今后只有法西斯蒂的天下，并不只是一个时

期；民主自由将永死不能复生；这种沒有多少事实或历史依据的估計，只能說是一种思想，这也无所谓悲觀或乐观。

一九四二年三月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陈 独 秀

被压迫民族是資本帝国主义的产物，被压迫的劳动者为他生产商品，被压迫的落后民族为他推銷商品和生产原料，这是資本帝国主义的兩個支柱。

被压迫的民族反抗資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至走到战争，都是天經地义，无可非难，这样为民族自由而战的大斗争，無論为何人所领导，民族中一切进步分子都应该拥护；因为不但为资产階級所领导，即令是封建王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有打击資本帝国主义的进步意义。

但是这一斗争若是限制在民族范围以内，其前途如何呢？

第一，自国内言之，活的实际經驗告訴我們：战争对于民族落后性，不但不能减少，而且是增加，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因此向后轉且不論，单就經濟而言，在持久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封鎖及通貨膨脹，因为沒有社会制裁，政治上的組織又薄弱，很容易为貪官、奸商和地主造成囤积居奇大发其国难財之千載一时的机会，因此陷前方浴血抗战的将士和后方刻苦力作的平民受飢寒困苦，你若主張用不很和平的手段去掉这种現象，便有人大喊：这是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破坏了一致对外的民族陣綫；并且实际也真超出了民族斗争的范围，然而这种現象不去掉，正是民族战争的致命伤；而又不是宣傳劝告或政府一紙禁令所能去掉的，这便怎样办？

第二，自国际言之，在各派帝国主义互相爭夺殖民地及落后国市場極端尖銳化的今天，甘地认为一民族不能依賴强国的帮助而得到自由，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可是沒有别的强国的帮助，也不

能脱离眼前的强国之压迫；并且有些强国不管你依赖不依赖它会强来帮助；这也是百分之百的真理。于是尼赫鲁没有出路了，他和甘地或者微有不同，即不主张拒绝美国之帮助，美国势力如进了印度，我们知道它对于殖民地的态度，不但好过德意日，并且好过英国，菲律宾便是榜样；然而菲律宾并不算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印度人以民族独立的理由（这理当然十分正当）排去英国势力，另换一个新主人日本，那便更糟了；甘地和尼赫鲁无论如何强调宣言印度受外人压迫时代已经过去；然而他们内心也未必认为他们自己的力量真能够赶走英国，同时又击退日本和德国；结果不过是照旧屈服在新主人的统治之下，继续执行不合作运动而已。这又怎样办？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对于我这一见解，或者有人提出两种驳论：一是说，落后民族如何谈得上社会主义，又如何能够和别国的劳动者及别的弱小民族结合在一起？一是说，社会主义是否包含民族解放问题？

提出第一种驳论的人，是被旧的民族观点蒙住了眼睛，看不出将来国际化的新趋势，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如何发展也谈不上。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家不可，只要不是民族夸大狂的人，便能够认识这种命运；近百年来，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已经打破了各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此次大战后，各派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将由殖民政策，转化为更集中的更有机性的国际集团，所谓大西洋宪法，所谓太平洋宪章，如此等等，便是这一集团运动之开始。如果有一个领导国际集团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于纳

粹失敗後的德國，先進國和落後國不久便會融成一個社會主義的聯邦；即在資本帝國主義領導的國際集團之內，落後國將被吸引着強迫着和領導國全面合作，即此不平等的合作，也能給集團圈內的各落後民族和領導國的勞動人民互相結合的機會，這便是帝國主義強盜自己造成推翻自己的被壓迫者大結合，沒有任何民族主義的英雄能夠阻止這一國際集團化的新趨勢；而且被壓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適應這一國際新趨勢，將來才有前途。

提出第二種駁論的人，是被第二國際的理論弄迷惑了，第二國際只企圖在資本統制之下，從事改良運動，所以不曾計及被壓迫民族解放問題，因為它是資本帝國主義支柱之一，真正社會主義運動，是要根本推翻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統制，所以自第一國際以來，“解放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和“解放被壓迫的民族”是這一運動的兩面大旗。社會主義革命一成功，只要不中途變質，他是不能日久和商品貨幣制度及國家制度並立的，到此時还有什么被壓迫民族存在呢？這不僅僅是一種理論，而且有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十月革命是全俄絕大多數人民集合在共產黨“解放勞動者”“解放農民”“解放小民族”三大旗幟之下成功的；革命勝利後，三樣都一一實現了，並非是俄國共產黨的空頭支票，並且對外國把帝俄時代被壓迫國的不平等條約自動的宣告廢除，把它在被壓迫國家的特殊權利如租界，領事裁判權等，一一宣告放棄了。所以當時全世界勞動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壓迫者的燈塔，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參謀部。如果有人根據近來蘇聯對於日本戰爭及此次大戰之初對於波蘭及希特勒之政策，而懷疑到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被壓迫民族解放鬥爭的態度；這乃是他自己不明瞭！有班人詆毀我們所擁護的前期蘇聯，和有班人所吹拍我們所痛惜的後期蘇聯，大大不同，前期蘇聯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場，後期蘇聯則站在俄國民族利益的立場。自蘇俄領導者，因為西歐革命之頓挫，乃中途變節，放棄了以世界革命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國民族利益為中心的政策；各國頭腦清醒的人，乃日漸由懷疑而失

望，直到現在，人們對於蘇聯雖然內心還懷着若干希望，而在實際上只得認為它是世界列強之一而已，若要硬說它是社會主義國家，便未免糟塌了社會主義！假使俄國仍舊堅苦的守着當年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中日戰爭一開始，它便應該以全力援助中國，這就是說，不應該和英美同樣站事外援助中國，而應該以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為它自己的責任，並且應該出兵參加戰爭，拚着蘇聯和中華民族共存亡，這才是國際社會主義的態度，這才是領導國的態度！如果是這樣，日本便沒有那麼容易占領上海和南京；至遲在張鼓峯事變發生時它不再和日本妥協，武漢也決不會陷落，中俄一直共同抗戰到今天，日本便無力橫行西南，蹂躪菲律賓、馬來、爪哇、緬甸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當納粹軍隊進攻波蘭時，蘇聯仍舊站在國際社會主義的立場，便不會和希特勒妥協，便不會把代表民主主義，領導被壓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進攻這一偉大事業，說成為他人火中取栗，更不會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蘭，這時英法比聯軍還未崩潰，希特勒並未認為能夠在東西兩戰場同時得到勝利，孤立的波蘭失敗後，東戰場沒有問題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击败英法比聯軍，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蘭、丹麥、南斯拉夫、希臘，這一大群小國！

單就俄國前後立場不同其結果也不同這一串歷史故事，已足夠說明國際社會主義和被壓迫民族的关系了！

俄國在歐洲，畢竟也是一個比較落后的民族，它的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它為俄國安全計，以向法西斯蒂妥協代替了向法西斯蒂進攻；其結果俄德戰爭不開始於希特勒在歐洲孤立之時，而開始於希特勒击败了歐洲各國之後，俄國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協之代價半個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仍為希特勒所有，連歐洲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淪陷於法西斯軍隊之手；若沒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它為俄國安全計，始終避免和日本開戰，連中國共產黨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擊”的惡名；其結果，明天日本仍會協同希特勒夾攻俄國，陷俄國民族於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時將不能得到中國有力的聲援，因為它已坐視中國被日本削弱了。所以任何落

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沒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能例外。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給 Y 的 信

Y 兄：

返校后来示敬悉，××帶給你的江津日报，望寄給我，弟不愿送文章在該报登載，而×××已快走了。××已赴印度，前函已告兄，諒已收到了。茲送上一文（原編者按：——即“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可以說是前三文（原編者按：——即“我的根本意見、战后世界大势之輪廓、再論世界大势”。）的結論，更是画龙点睛了。給二位老寡妇看后，可与×××一看，愿抄与否，由他們自便。需否抄一份給××××諸君看看，由兄决之。倘需抄一份給他們看，可寄給×××。抄寄他人，可以不必，因請人抄写不易，寄去他們也不会理解和同意，第三文（“再論世界大势”）弟处已无存稿，望将原稿寄下。此祝

健康

弟

独 秀 五月十三日（一九四二年）

（选自《陈独秀最后論文和書信》一書）

附 录

一、陈独秀著译、演讲、通信等目录

时间	文章名称	署 名	文章出处
1913年			
冬	字义类例	陈独秀	亚东图书馆 1923年出版
1914年			
8.10	詩七首		
	1. 杭州酷暑寄怀刘二沈三	陈 仲	《甲寅》杂志1卷3号
	2. 咏鹤	陈 仲	同上
	3. 游虎跑二首	陈 仲	同上
	4. 灵隐寺前	陈 仲	同上
	5. 游韬光	陈 仲	同上
	6. 雪中偕友登吴山	陈 仲	同上
11.10	自觉心与爱国心	陈独秀	同上4号
1915年			
5.10	哀述	陈 仲	同上5号
7.10	詩二首		
	1. 远游	陈 仲	同上7号
	2. 夜雨狂歌答沈二	陈 仲	同上
7.10	絳紗記叙	独 秀	同上
9.15	敬告青年	陈独秀	《新青年》1卷 1号
9.15	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	陈独秀	同上

9.15	妇人观 (譯文)	独 秀	同上
9.15	現代文明史 (譯文)	陈独秀	同上
9.15	复王庸工关于国体問題的信	記 者	同上
10.15	今日之教育方針	陈独秀	同上2号
10.15	贊歌 (譯文)	陈独秀	同上
10.15	亚美利加 (美国之歌) (譯文)	独 秀	同上
10.15	复李平敬学习法文事	記 者	同上
11.15	抵抗力	陈独秀	同上3号
11.15	現代欧洲文艺史譚	陈独秀	同上3、4号
11.15	欧洲七女杰	陈独秀	同上3号
11.15	与李太魁通信討論佛教問題	記 者	同上
11.15	为謝无量长律詩作的按語	記 者	同上
11.15	汉譯英文选 (单行本)	陈 仲	益群书社印行
12.15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	陈独秀	《新青年》1卷4号
12.15	复張永言关于中国所处的文艺时代的信	記 者	同上
1916年			
正月	一九一六年	陈独秀	同上 5 册 (正月号)
2.15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同上6号
2.15	与張永言通信討論文学及人口問題	記 者	同上
9.1	新青年	陈独秀	《新青年》2 卷第 1 号
9.1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陈独秀	同上1、2号
9.1	与汪叔潛通信討論政党政治問題	独 秀	同上 1 号
10.1	我之爱国主义	陈独秀	《新青年》2 卷2 号
10.1	駁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同上
10.1	現代文明史 (譯文)	陈独秀	同上
10.1	与胡适通信討論文学革命問題	独 秀	同上

10.1	答王醒农、毕云程信,承认自己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有 悲观語調	独 秀 同上
11.1	宪法与孔教	陈独秀 同上 3 号
11.1	答毕云程信,承认自己深陷 悲观是由于见到中国太落 后于欧美	独 秀 同上
11.1	答莫美卿信,說中国宜行独 身主义和禁止恶劣份子之 結婚	独 秀 同上
11.1	答一民与T.M.Cheng信	記 者 同上
12.1	孔子之道与現代生活	陈独秀 同上 4 号
12.1	袁世凱复活	陈独秀 同上
12.1	西文譯音私議	陈独秀 同上
12.1	答毕云程信	陈独秀 同上
12.1	与常乃惠通信討論古文 与孔教問題	独 秀 同上
12.1	与孔昭銘通信討論西学問題	独 秀 同上
1917年		
1.1	再論孔教問題	陈独秀 同上 5 号
1.1	答复李平信	独 秀 同上
1.1	与吳虞及皀通信討論孔教 問題	独 秀 同上
1.1	复褚葆衡信說社会主义在中国 可以緩于欧洲	記 者 同上
1.1	答顧克剛、孙斌信	独 秀 同上
1.1	答T.M.Cheng关于学习世界 語信	記 者 同上
1.1	与孔昭銘通信談独身主义 問題	独 秀 同上
2.1	文学革命論	陈独秀 同上 6 号
2.1	与程演生通信討論国学与	

	国文,主張国学、文学百			
	家平等	独	秀	同上
2.1	与叶挺通信討論人生問題	記	者	同上
2.1	与常乃惠通信討論古文			
	与孔教問題	独	秀	同上
2.1	与陈丹崖通信討論新文学問題	独	秀	同上
2.1	复錢玄同关于小說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3.1	对德外交	陈独秀		同上3卷1号
3.1	答錢玄同关于中国文学問題	独	秀	同上
3.1	复蔡元培《新青年》刊登其			
	演說有錯信	記	者	同上
3.1	答佩劍青年关于孔教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3.1	答傅桂馨关于孔教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3.1	复汪启疆信	独	秀	同上
3.1	复常乃惠关于孔教与家庭			
	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3.1	与淮山逸民通信討論			
	道德問題	記	者	同上
3.1	与莫芙卿通信討論青年			
	修养問題	独	秀	同上
3.1	与俞頌华通信討論宗教			
	与孔教問題	独	秀	同上
4.1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	陈独秀		同上2号
4.1	与常乃惠通信討論孔教問題	独	秀	同上
4.1	答張嵩年信	記	者	同上
4.1	答曾毅关于文学革命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5.1	旧思想与国体問題(北京神州			
	学会演讲)	陈独秀		同上3号
5.1	紀陈独秀君演讲辞(常乃惠			
	紀录)			同上
5.1	再复胡适关于文学革命信	独	秀	同上
5.1	与刘竞夫通信討論孔教問題	独	秀	同上

5.1	答余元濬《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前身	独 秀	同上
5.1	答俞頌华关于孔教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5.1	答錢玄同关于西文譯音及汉文横书等問題	独 秀	同上
5.1	答李亨嘉关于对德宣战問題	記 者	同上
5.1	答胡晉接（又名胡子承）关于思想革新問題	独 秀	同上
5.1	答××关于国語研究問題	独 秀	同上
5.1	答張护兰关于文学革命与道德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5.1	复李杰对于墨、庄、許与孔孟評價信	独 秀	同上
6.1	时局杂感	陈独秀	同上 4 号
6.1	复錢玄同关于世界語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6.1	复胡适对《聊斋志異》等书的看法	独 秀	同上
7.1	近代西洋教育(南开大学演讲)	陈独秀	同上 5 号
7.1	复李寅恭关于林园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7.1	复新青年愛讀者关于孔教問題信	記 者	同上
7.1	复吳虞关于孔教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7.1	复顧克剛关于政治思想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7.1	复卓魯什么叫做革命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7.1	复沈藻墀什么叫“辞章”与“古文”信	記 者	同上
7.1	复錢玄同关于应用文改良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8.1	复辟与尊孔	陈独秀	同上 6 号
8.1	科学与基督教	陈独秀	同上
8.1	复陶孟和（又名陶履恭）关于世界語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8.1	复錢玄同关于文字符号与 小說等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8.1	复馮維鈞关于文学进修問題	独 秀	同上
1918年			
1.15	科学与基督教	陈独秀	同上 4 卷 1 号
1.15	复刘延陵关于自由恋爱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2.15	人生真义	陈独秀	同上 2 号
3.15	駁康有为共和平議	陈独秀	同上 3 号
3.15	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	陈独秀	同上
4.15	随感录	独 秀	同上 4 号
	1. 学术与国粹		
	2. 国会		
	3. 元曲		
4.15	与錢玄同通信討論中国今后 文字問題	独 秀	同上
5.15	有鬼論质疑	陈独秀	同上 5 号
5.15	复湯尔和关于医学事	独 秀	同上
6.15	复張謇子关于中国旧戏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6 号
6.15	复南丰美以美基督徒对憚代英 指責信	独 秀	同上
6.15	复王敬軒崇敬者关于討論学理 之自由权問題	独 秀	同上
7.15	今日中国之政治問題	陈独秀	同上 5 卷 1 号
7.15	随感录	独 秀	同上
	1. 韓世昌		
	2. 自由正义与和平		
	3. 科学与神圣		
	4. 学术与独立		
	5. 阴阳家		
8.15	偶像破坏論	陈独秀	同上 5 卷 2 号
8.15	随感录	独 秀	同上
	1. 圣言与学术		

	2. 基督教与迷信鬼神			
	3. 社会裁制力			
	4. 伪善的基督国民			
	5. 信神与保存国粹			
8.15	对Esperanto在学术上价值的意見	独 秀	同上	
8.15	复孙国璋关于世界語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9.15	质問《东方杂志》記者	陈独秀	《新青年》5卷 3号	
10.15	与胡适联名复易宗夔关于《新 青年》之主張的信	陈独秀	同上4号	
11.15	克林德碑	陈独秀	同上5号	
12.15	复爱真关于“五毒”問題信	独 秀	同上6号	
12.15	复朱庸关于文字改革会与國語 報紙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12.15	复張寿朋关于文学改良与孔教 問題信	陈独秀	同上	
12.15	复莫等关于“鬼信”問題信	陈独秀	同上	
12.22	《每周評論》发刊詞	只 眼	《每周評論》1 号	
12.22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1. 兩团政治			
	2. 义和拳征服了洋人			
	3. 战争的責任者			
	4. 公僕变了家长			
12.29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只 眼	同上2号	
12.29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1. 大紅頂子紅纓帽			
	2. 異哉搭現問題			
	3. 野心			
	4. 倒軍閥			
1919年				
1.5	国防軍問題（告四国銀行团）	只 眼	同上3号	

1.5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1.又要制造民意了		
	2.軍民分治		
	3.到底是那一团利害?		
	4.得众养民		
	5.誰是匪		
1.12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4 号
	1.国防軍		
	2.軍人与官僚		
	3.武治与文治		
	4.尊孔与复辟		
	5.安徽小鬼		
1.15	本志罪案之答辯书	陈独秀	《新青年》6 卷 1 号
1.15	对于梁巨川先生自杀之感想	陈独秀	同上
1.15	复王隳雪关于摆脱奴隶性的信	陈独秀	同上
1.15	复黄介石关于修辞学的题目		
	的信	陈独秀	同上
1.15	复吕澂关于美术革命的信	陈独秀	同上
1.19	除三害	只 眼	《每周評論》5号
1.19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1.国民大会		
	2.鴉片与紙票		
1.26	燒烟土	只 眼	同上6号
1.26	請問蔣观云先生	只 眼	同上
2.2	我的国内和平意見	只 眼	同上7号
	1.先决問題		
2.2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1.嗚呼特別国情		
	2.公理战胜强权		
	3.揭开假面		
	4.誰的罪恶		

2.9	我的國內和平意見	只	眼	同上8号
	2. 廢督問題			
2.9	隨感錄	只	眼	同上
	1. 威大炮			
	2. 公理何在			
	3. 光明与黑暗			
	4. 特別国情	同	上	同 上
2.15	再問《東方杂志》記者	陳独秀		《新青年》6卷2号
2.16	我的國內和平意見	只	眼	《每周評論》9号
	3. 裁兵問題			
2.23	我的國內和平意見	只	眼	同上10号
	4. 国防軍問題			
2.23	隨感錄	只	眼	同上
	1. 司令部土多			
	2. 信實通商			
	3. 理想家那里去了			
	4. 第一次警告			
	5. 不准百姓点灯			
3.2	我的國內和平意見	只	眼	同上11号
	5. 国会問題			
3.2	隨感錄	只	眼	同上
	1. 旧党的罪恶			
	2. 中日亲善			
	3. 亡国与卖国			
	4. 鐵道管理問題			
3.9	人种差別待遇問題	只	眼	同上12号
3.9	隨感錄	只	眼	同上
	1. 亡国与亲善			
	2. 欢迎英美艦队			
	3. 陝西問題			
	4. 不忘日本的大恩			
	5. 日本人的信用			

	6. 日本人与曹汝霖			
	7. 国际管理与日本管理			
3.16	关于北京大学的謠言	独	秀	同上13号
3.16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
	1. 东局千零十三号			
	2. 参战軍			
	3. 亚洲的德意志			
	4. 爱尔兰与朝鮮			
3.23	朝鮮独立运动之感想	只	眼	同上14号
3.23	为什么要南北分立?	只	眼	同上
3.23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
	1. 你护的什么法?			
	2. 和平的根本障碍			
	3. 中国的李完用宋秉竣是誰?			
	4. 希望各国干涉			
	5. 莫做傀儡			
	6. 何人的命令?			
	7. 停止納稅			
3.30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15号
	1. 更加肉麻			
	2. 林紓的留声机器			
	3. 日本人可以在中国随便拿人嗎?			
4.6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16号
	1. 冤哉洪述祖			
	2. 南北一致			
	3. 綱常名教			
	4. 中国和平的障碍			
	5. 太监与纏足			
	6. 安徽省議會的笑話			
	7. 婢学夫人			
	8. 倪嗣冲的儿子			

- | | | |
|------|--------------------------|---------------|
| 4.13 | 随感录 | 只 眼 同上17号 |
| | 1. 衍圣公与張天师同声一哭 | |
| | 2. 不可思議的新旧思潮 | |
| | 3. 林琴南很可佩服 | |
| | 4. 关门會議 | |
| | 5. 国民参預政治外交的資格 | |
| | 6. 文治主义原来如此 | |
| | 7. 美国也有軍械借款嗎？ | |
| | 8. 形式的教育 | |
| | 9. 議長串通卖矿 | |
| | 10. 怪哉插徑班 | |
| | 11. 預定的計劃 | |
| 4.15 | 我們應該怎样？（录少年中国
学会会务报告） | 陈独秀 《新青年》6卷4号 |
| 4.20 | 我的国内和平意見 | 只 眼 《每周評論》18号 |
| | 6. 宪法問題 | |
| 4.20 | 随感录 | 只 眼 同上 |
| | 1. 廿世紀俄羅斯的革命 | |
| | 2. 多謝倪嗣冲張作霖 | |
| | 3. 伤寒病和楊梅毒 | |
| | 4. 土匪世界 | |
| | 5. 却沒有了自己 | |
| | 6. 四大金剛 | |
| | 7. 世界第一惡人 | |
| | 8. 毕竟南方軍人有良心 | |
| 4.27 | 貧民的哭声 | 只 眼 同上19号 |
| 4.27 | 随感录 | 只 眼 同上 |
| | 1. 苦了章宗祥的夫人 | |
| | 2. 怎么商团又要“罵曹”？ | |
| | 3. 陆宗輿到底是那国的人？ | |
| | 4. 再看江庸的戏 | |
| | 5. 法律是什么东西？ | |

	6.干政的軍人反对軍人干政			
	7.破坏約法的人維護約法			
	8.克倫斯基与列宁			
	9.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			
5.4	孔教研究	只	眼	同上20号
5.4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
	1.护法？丑！套狗索			
	2.护法嗎？要錢			
	3.发财的机会又到了，国民怎 么了			
	4.公同管理			
	5.我国			
	6.兩個和会都无用			
	7.何苦瞎打通电			
	8.梅兰芳			
5.11	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	只	眼	同上21号
5.18	为山东問題敬告各方面	只	眼	同上22号
5.18	山东問題与上海商会	只	眼	同上
5.26	山东問題与国民觉悟	只	眼	同上23号
5.26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
	1.卖国都有凭据嗎？			
	2.对外圓滿对内統一			
	3.只有叹气！			
	4.自家人不及外国人			
6.1	对于日使照会及段督办通电的 感言	只	眼	同上24号
6.1	随感录	只	眼	同上
	1.冤哉益世报			
	2.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同盟会与无政府党			
	4.日本人那有这种斗胆？			
	5.日本參謀部与謝米諾夫			

	6. 別得罪亲日派		
	7. 北京十大特色		
6.8	我們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只 眼	同上25号
6.8	隨感录	只 眼	同上
	1. 立宪政治与政党		
	2. 六月三日的北京		
	3. 吃飯問題		
	4. 爱情与痛苦		
	5. 护法总裁的名誉		
	6. 南北一致		
	7. 像煞有介事的鈕永建		
	8. 到底还是伍老头子有良心		
	9. 研究室与監獄		
	10. 章宗祥还不算頂坏的人		
	11. 可怜大折其本		
	12. 政学会与桂系		
	13. 西南簡直是反叛		
	14. 丑学生丑教育界		
12.1	实行民治的基础	陈独秀	《新青年》7卷1号
12.1	新青年宣言		同上
12.1	隨感录	陈独秀	同上
	1. “籠統”与“以耳代目”		
	2. 法律与言論自由		
	3. 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4. 調和論与旧道德		
	5. 留学生		
	6. 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		
1920年			
1.1	自杀論	陈独秀	同上7卷2号
1.1	答半农的D——詩	独 秀	同上
1.1	隨感录	独 秀	同上
	1. 《浙江新潮》——《少年》		

2.	新出版物		
3.	保守主义与侵略主义		
4.	裁兵？发财？		
5.	学生界应该排斥底日貨		
6.	鬧处办		
7.	青年体育問題		
8.	約法底罪恶		
9.	男系制与遗产制		
10.	解放		
1.5	欢迎湖南人底精神	陈独秀	《独秀文存》卷1
2.1	基督教与中国人	陈独秀	《新青年》7卷3号
2.1	复虞杏村关于教育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2.1	复林紓、臧玉海中学教育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2.1	复明慧妇女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3.1	馬尔塞斯人口論与中国人口問題	陈独秀	同上4号
4.1	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	同上5号
4.1	工讀互助团失敗底原因在那里？	独 秀	同上
4.5	工人应有之觉悟（在上海航务棧房工会理事会演說大略）	陈独秀	《觉悟》
4.5	中国人精神的堕落	独 秀	同上
4.12	劳工問題（在中华工业协会中国工商界协进会等全体会上讲演）	陈独秀	4月20日《时事新报》
5.1	劳动者底觉悟	陈独秀	《新青年》7卷6号
5.1	上海厚生紗厂湖南女工問題	陈独秀	同上
5.1	复知耻关于工人底時間与工資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5.1	复章积和关于工人教育与工作		

	時間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8.15	兩個工人的疑問	陈独秀	《劳动界》1册
8.22	霍乱和痢疾	独 秀	同上2册
8.22	老爷的卫生	独 秀	同上
8.22	真的工人团体	独 秀	同上
9.1	談政治	陈独秀	《新青年》8卷1号
9.1	对于时局的我見	陈独秀	同上
9.1	隨感录	陈独秀	同上
	1. 虛无主义		
	2. 俄国精神		
	3. 男女同学与議員		
	4. 上海社会		
	5. 比較上更实际的效果		
9.1	复費哲民关于妇女、青年、劳动		
	三个問題的信	独 秀	同上
9.1	复高錕关于哲学思想与化学工		
	业信	独 秀	同上
9.1	复楊重熙关于挽联、寿联、喜联		
	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9.1	复知耻关于劳动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9.5	此时中国劳动运动底意見	陈独秀	《劳动界》4册
9.5	閑談	独 秀	同上
	1. 穷人和富人热天生活的比較		
	2. 怕劳动		
	3. 貧民窟		
9.19	閑談	独 秀	同上6册
	1. 为什么不吃牛肉		
	2. 无理要求		
9.26	复仲渊等人关于《店員周刊》		
	进行事信	秀松、汉俊 独秀	同上7册
10.1	隨感录	陈独秀	《新青年》8卷2号
	1. 再論上海社会		

2. 学說与裝飾品

3. 懶惰的心理

10.1	复人社关于男女同校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10.1	复赵仁鑄关于大学教授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10.1	复知耻关于工人教育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10.10	《伙友》发刊詞		《伙友》創刊号
10.23	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	陈独秀	《劳动界》11册
10.×	新印紅樓夢叙	陈独秀	亚东图书馆印行
10.×	新印儒林外史叙	陈独秀	同上
10.×	新印水滸叙	陈独秀	同上
11.1	国庆紀念底价值	独 秀	《新青年》8卷3号
11.1	隨感录	独 秀	同上

1. 社会的工业及有良心的学者

2. 劳动者底知識从那里来?

3. 三論上海社会

11.1	复郑賢宗关于国家、政治、法律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11.1	复柯庆施关于劳动专政問題信	独 秀	同上
11.21	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	陈独秀	《劳动界》15册
12.1	关于社会主义的討論	陈独秀	《新青年》8卷4号
12.1	隨感录	陈独秀	同上

1. 华工

2. 四論上海社会

3. 劳工神圣与罢工

4. 主义与努力

5. 革命与作乱

6. 虛无的个人主义与任自然主义

7. 民主党与共产党

8. 提高与普及

9. 无意識的举动

12.16	給胡适信談《新青年杂志》問題	陈独秀	《現代出版史》
-------	----------------	-----	---------

1921年

- | | | | |
|------|-----------------------------|-----|------------|
| 2.14 | 婦女問題与社会主义（广东妇女联合会演說） | 陈独秀 | 《觉悟》 |
| 2.15 | 再給胡适信談《新青年杂志》問題 | 陈独秀 | 《現代出版史料》甲編 |
| 4.1 | 新教育是什么（一月二日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讲） | 陈独秀 | 《新青年》8卷6号 |
| 5.1 | 隨感录 | 独 秀 | 同上9卷1号 |
| | 1.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 | |
| | 2.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 | | |
| 6.1 | 隨感录 | 独 秀 | 同上2号 |
| | 1.下品的无政府党 | | |
| | 2.青年底誤会 | | |
| | 3.反抗輿論的勇气 | | |
| 6.1 | 复皆平广东——科学思想問題信 | 独 秀 | 同上 |
| 7.1 | 社会主义批評（一月廿八日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 | 陈独秀 | 同上3号 |
| 7.1 | 隨感录 | 陈独秀 | 同上 |
| | 1.过渡与造桥 | | |
| | 2.卑之无甚高論 | | |
| | 3.革命与制度 | | |
| | 4.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 | | |
| 7.1 | 复張申府（又名崧年）关于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問題的信 | 独 秀 | 同上 |
| 7.1 | 复朱謙之 关于 开明 专制 問題的信 | 独 秀 | 同上 |
| 8.1 | 討論无政府主义（三答区卢白书） | 陈独秀 | 同上4号 |

8.1	复何謙生关于同善社問題的信	独 秀	同上
8.1	复蔡和森关于馬克思学說与中 国无产阶级問題的信	独 秀	同上
9.1	太平洋會議与太平洋弱小民族	陈独秀	同上5号
11.18	工人与軍人	只 眼	《觉悟》(《国 民日报》副刊)
11.20	过激	只 眼	同上
1922年			
2.9	工人勿忘馬克思的教訓	只 眼	同上
2.10	宁波水手	只 眼	同上
3.5	平民教育	陈独秀	《独秀文存》卷 1
3.15	基督教与基督教会	陈独秀	《先驅》4号
4.22	社会主义与教育和妇女二方面 的关系	独 秀	《觉悟》(《国民日 报》副刊)
4.25	宗教問題	独 秀	《觉悟》(《国民日 报》副刊)
5.1	告做劳动运动的人	陈独秀	《先驅》7号
6.20	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 督教学生会同盟的警告	陈独秀	同上 9 号
7.1	馬克思学說	陈独秀	《新青年》9卷6号
7.1	复凌霜关于无产阶级專政問題 的信	独 秀	同上
9.13	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	独 秀	《向导》1期
9.20	造国論	独 秀	同上2期
9.20	国民党是什么	只 眼	同上
9.26	对中国政治之我見	独 秀	《国民日报》
10.4	英帝国主义者所謂退回威海卫	独 秀	《向导》4期
10.4	議員学者跑到美国帝国主义家 里討論宪法問題嗎?	只 眼	同上
10.4	請看国际帝国主义怎样宰割中 东路	只 眼	同上

1923年

1.18	革命与反革命	独	秀	同上16期
1.18	反动政局与各党派	独	秀	同上
1.24	反动政局下两个要案	独	秀	同上17期
1.24	評蔡校长宣言	独	秀	同上
1.24	最低問題	独	秀	同上
1.31	論暗杀、暴动及不合作	独	秀	同上18期
1.31	教育界能不問政治嗎？	独	秀	同上
2.7	为自由而战！	独	秀	同上19期
2.7	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 議員	独	秀	同上
2.7	再論不合作主义答北京晨报記 者	独	秀	同上
4.18	怎样打倒軍閥	独	秀	同上21期
4.25	沈鴻英叛乱与政学会	独	秀	同上22期
4.25	对等會議与孙曹携手	独	秀	同上
4.25	海軍态度	独	秀	同上
4.25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 阶级	独	秀	同上
5.2	外交問題与学生运动	独	秀	同上23期
5.9	陈家軍及北洋派支配下之粵軍 团结	独	秀	同上24期
5.9	楊森果为統一而战嗎？	独	秀	同上
5.9	可怜的伸手派	独	秀	同上
5.9	好个救国的妙計	独	秀	同上
5.9	复邓汉琼关于中国革命問題的 信	独	秀	同上
5.16	閩贛局势之新发展	独	秀	同上25期
5.16	段派之活动	独	秀	同上
5.16	吳佩孚与康有为	独	秀	同上
5.16	华洋人血肉价值的貴賤	独	秀	同上
5.16	国民党与交通安福	独	秀	同上

5.16	吳佩孚爪牙閻錫山第二——楊森	独秀	同上
5.23	临城擄案中之中国現象	独秀	同上26期
5.23	軍閥統治下之学生运动	独秀	同上
5.23	孙曹果然携手了?	独秀	同上
5.23	洋人势力下之宜昌学生与上海学生	独秀	同上
5.23	国会議員宣布張閻罪状与曹吳态度	独秀	同上
5.30	帝国主义的列强与軍閥	独秀	同上27期
5.30	吳佩孚的“匪力統一政策”	独秀	同上
5.30	黎元洪与曹張	独秀	同上
6.6	嗚呼! 外国政府下之商埠同盟!	独秀	同上28期
6.6	外国土匪也来了!	独秀	同上
6.6	美国不是外国, 馮玉祥不是軍閥?	独秀	同上
6.13	日本惨杀长沙同胞	独秀	同上29期
6.15	殖民地半殖民地职工运动問題之提要 (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大会之議决案)(譯文)	陈独秀	《新青年》季刊1期
6.20	儿戏之北京政府	独秀	《向导》30期
6.20	临城事件与长沙事件	独秀	同上
6.20	告上海納稅华人会	独秀	同上
7.1	中国农民問題	陈独秀	《前鋒》創刊号
7.11	北京政府与国民党	独秀	《向导》31、32期
7.11	北京政变与学生	独秀	同上
7.11	北京政变与軍人	独秀	同上
7.18	我們要何种势力管理中国	独秀	同上33期
8.1	欢迎民治周刊	独秀	同上34期
8.1	嗚呼! 北京学生联合会	独秀	同上

8.1	复李子芬关于农村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信	独	秀	同上
8.29	护路提案与美日	独	秀	同上38期
8.29	粤局与革命运动	独	秀	同上
8.29	江浙和平公約与商界	独	秀	同上
9.8	日本大災与中国	独	秀	同上39期
9.8	張作霖令駐京議員离京	独	秀	同上
9.8	章炳麟与民国	独	秀	同上
9.16	黎元洪南来	独	秀	同上40期
9.23	东鉄地亩問題	独	秀	同上41期
9.30	曹錕賄选与中国前途	独	秀	同上42期
10.17	賄选后国民所能取的态度	独	秀	同上43期
10.17	研究系与中国政治	独	秀	同上
10.17	临城案与侨日华工被杀案	独	秀	同上
10.20	青年应当怎么办	实	庵	《中国青年》1期
10.27	我們为什么欢迎泰谷儿	实	庵	同上2期
11.7	苏俄六周	独	秀	《觉悟》(《国民日报》副刊)
11.16	安徽学界之奋斗	独	秀	《向导》46期
11.27	陈炯明与政局	独	秀	同上47期
11.27	外币与主权	独	秀	同上
11.27	恢复华人領港权	独	秀	同上
12.1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独	秀	《前鋒》2期
12.1	寸鉄	独	秀	同上
	1.亡中国者留学生也			
	2.中华民国的新法律			
	3.皇帝与学术			
	4.辜鴻銘太新了			
	5.基督徒望基督徒成佛			
	6.孔圣人又要走运了			
12.12	赵恒惕陈炯明与联省自治派	独	秀	《向导》48期
12.12	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	独	秀	同上

12.19	联省自治与新西南主义	独 秀	同上49期
12.20	科学与人生观序	陈独秀	《新青年》季刊 2 期
12.29	关税主权与资产阶级	独 秀	《向导》50期
12.29	宾步程与工人	独 秀	同上

1924年

1.9	商界反对火车加价与和平运动	独 秀	《向导》51期
1.9	广东战争之意义	独 秀	同上
1.9	内战与军阀	独 秀	同上
1.9	研究系及小孙派	独 秀	同上
1.20	祝上海丝纱女工协会成功	独 秀	同上52期
1.20	日本政友会之分裂	独 秀	同上
1.×	国民党与共产主义者	陈实庵	《中国国民党演讲集》1 集
2.1	一九二三年列强对华之回顾	陈独秀	《前鋒》3期
2.1	寸铁	独 秀	同上
	1.精神生活东方文化		
	2.国学		
	3.夷场上的农村立国		
	4.圣人也得崇拜商品		
	实庵笔记	实 庵	同上
2.2	列宁之死	实 庵	《中国青年》16期
2.20	陕西农民的困苦	独 秀	《向导》53、54期
2.20	日本之政局	独 秀	同上
2.20	北洋军阀三种新借款	独 秀	同上55期
2.20	电报电话借款之秘密	独 秀	同上
2.20	新疆省之煤油矿	独 秀	同上
2.20	法国政党的新趋向	独 秀	同上
2.20	印度自治运动	独 秀	同上
2.20	捲烟特税问题	独 秀	同上
2.20	寸铁	独 秀	同上
	1.馬联甲为什么剷烟苗		

	2. 岑春煊派員投北			
	3. 圣道一門之王芝祥夫妇			
	4. 嗚呼旧历新年!			
	5. 外币禍			
	6. 兵嗎还是匪?			
	7. 縮減軍备嗎还是擴張?			
	8. 非进口的外貨			
	9. 嗚呼宪法运动!			
	10. 易卜圓光与北洋勢力			
	11. 列宁碑			
2.27	商界反对外人干涉中国內政第 二声	独	秀	同上56期
2.27	意械事件	独	秀	同上
2.27	土耳其放逐主教	独	秀	同上
2.27	国民党之模范的改造	独	秀	同上
2.27	荷兰与远东	独	秀	同上
2.27	合作社問題(譯文)	独	秀	同上
2.27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新聞記者与土匪軍閥			
	2. 联省自治的下場			
	3. “我們不問政治”			
	4. 中俄交涉与东交民巷			
	5. 陈炯明赵恒惕到底为什么反 对孙中山?			
3.19	上海織綢厂焚斃女工之責任者	独	秀	《向导》57期
3.19	工党政府下之英国工人罢工 运动	独	秀	同上
3.19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統一			
	2. 慎重与上当			
	3. 恐吓我們的唯一法宝			
	4. 无枪者連拍馬也不灵!			

3.26	中国工人运动之轉机	独 秀	同上58期
3.26	中俄會議之成敗	独 秀	同上
3.26	煤油战争	独 秀	同上
3.26	飞律宾之独立运动	独 秀	同上
3.26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华官与西人不睦便須更換!		
	2. 曹錕的妾舅与洋大人		
	3. 娼优		
	4. 利用国民党		
	5. 造謠中伤		
	6. 武力統一的榜样		
3.26	工界最近之惨剧	独 秀	同上59期
3.26	評中俄协定	独 秀	同上
3.26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国故党与复辟党		
	2. 拜寿的吃耳光		
	3. 老馬与小犬		
	4. 反动		
4.2	湖南废省宪运动	独 秀	同上60期
4.2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外交失利?		
	2. 嗚呼改大!		
4.16	上海租界三大問題	独 秀	同上61期
4.16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美国駐海軍		
	2. 部落主义与世界主义		
	3. 讀書时代不許干政		
	4. 帝国主义制馭殖民地的 公式		
	5. 誰叫他們不要皇帝!		
	6. 三位一体的国故孔教帝制		
4.18	泰戈尔与东方文化	实 庵	《中国青年》27期

4.23	导淮問題与政治	独 秀	《向导》62期
4.23	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	独 秀	同上
4.23	美国移民案与海軍案	独 秀	同上
4.23	寸鉄	实 庵	同上
	1. 外人—外交当局—中国报館		
	2. 冤大头!		
	3. 象的民族		
	4. 复辟預言		
	5. 天下沒有不吃飯的圣人		
	6. 馬蜂党与曹錕		
	7. 反对曹大总统?馬蜂桥四号!		
	8. 崇拜太戈尔的人主張派兵征服蒙古		
4.30	丧权辱国之无綫电密約	独 秀	同上63期
4.30	投降条件下之中国教育权	独 秀	同上
4.30	寸鉄	实 庵	同上
	1. 太戈尔与梁启超		
	2. 中国土匪軍閥之来源		
	3. 好个友爱无爭的詩圣		
	4. 洛桑議約与中俄协定		
5.7	英意人毆伤巡士稅吏	独 秀	同上64期
5.7	上海租界工部局能在华界行使职权嗎?	独 秀	同上
5.7	欢迎奉天东报复刊	独 秀	同上
5.7	欢迎广州上海兩学生会	独 秀	同上
5.7	寸鉄	实 庵	同上
	1. 太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		
	2. 无聊賴无意識的中国报界		
	3. 懲罰战		
5.21	工界厄运重重	独 秀	同上66期
5.21	汉口之党獄	独 秀	同上

5.21	世界的反动政象之轉机	独	秀	同上
5.21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中国的命运已在华盛顿會議 决定!			
	2. 热心收蒙的先生們那里去了?			
	3. 黎元洪又縮头了			
5.28	寸鉄			同上67期
	1. 太戈尔与北京	独	秀	
	2. 康有为的道德	独	秀	
	3. 巴尔达里尼与太戈尔	独	秀	
	4. 可怜想吃天鵝肉的中国人!	独	秀	
	5. 軍閥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又一証据	独	秀	
	6. 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	实	庵	
	7. 卖階級的工党政府	实	庵	
6.4	楊德甫等冤杀与国民党	独	秀	同上68期
6.4	中俄协定签字后之蒙古問題	独	秀	同上
6.4	外人对于商标之无理要求	独	秀	同上
6.4	厦門大学学生也有今日	独	秀	同上
6.4	寸鉄			同上
	1. 以伪乱真	实	庵	
	2. 詩人却不愛談詩	实	庵	
	3. 太戈尔与金錢主义	实	庵	
	4. 大同主义与弱小民族	独	秀	
	5. 亚洲民族联合与亚洲平民 联合	独	秀	
6.11	德国对华賠款問題	独	秀	同上69期
6.11	无政府工团主义与黑暗势力	独	秀	同上
6.11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反对太戈尔便是过激!			
	2. 准印度人的亡国奴何东!			
	3. 国民革命与反革命的財閥			

	4. 英政府何不枪斃罢工之铁路工人?			
	5. 法捕房何不拘捕过激派?			
6.18	法国政潮	独	秀	同上70期
6.18	上海絲厂女工大罢工	独	秀	同上71期
6.18	国民党与劳动运动	独	秀	同上
6.18	寸鉄			同上
	1. 研究系之丑表功	实	庵	
	2. 政客还不及軍閥有良心!	实	庵	
	3. 研究系不至如此下流!	实	庵	
	4. 为美国排日	独	秀	
	5. 还不問政治嗎?	独	秀	
	6. 一个弄錯帝国主义之意义的 新聞記者	独	秀	
	7. 石獅子也跑到王氏門前去了	独	秀	
	8. 仰面視仇的湖南劳工会	独	秀	
7.2	智利領判权与中国主权	独	秀	同上72期
7.2	內国銀行又供給軍閥一百万元	独	秀	同上
7.2	法西斯党与中国	独	秀	同上
7.2	美国侵略中国之又一形式—— 三K党	独	秀	同上
7.2	寸鉄			同上
	1. 华府會議議決到底有效无效?	独	秀	
	2. 自由舒服与革命	独	秀	
	3. 世界上竟有求軍民长官提倡 的社会党!	实	庵	
7.9	孙宝琦去职与金佛郎案	独	秀	同上73期
7.9	外人私运軍火与中国治安	独	秀	同上
7.9	英法兩國之对外政策	独	秀	同上
7.9	寸鉄			同上
	1. 顧維鈞不会不肯	实	庵	
	2. 奸商与劳工孰重?	实	庵	

	3. 恶人假借好名义	实	庵	
	4. 沈恩孚梁启超眼中的平民	独	秀	
	5. “七一”与“五一”	实	庵	
	6. 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	独	秀	
	7. 假革命党	独	秀	
	8. 玄学家言原来如此	独	秀	
	9. 外国的文化侵略与国民革命	独	秀	
	10. 老先生們歇歇吧!	独	秀	
	11. 北京的議員那里去了?	独	秀	
7.16	收回教育权	独	秀	同上74期
7.16	上海防盜問題	独	秀	同上
7.16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假革命党与反革命党			
	2. 精神生活与金錢			
7.23	美国侵略与蒙古独立	独	秀	同上75期
7.23	反帝国主义运动联盟	独	秀	同上
7.23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学校与监狱			
	2. 无政府党与研究系			
	3.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当中国船員			
	4. 收回教育权与中国学校			
	5. 神童与詩圣			
	6. 兩件不可解的事			
	7. 誰是革命分子?			
7.30	新銀行团与中国	独	秀	同上76期
7.30	帝国主义者援助軍閥之 又一証据	独	秀	同上
7.30	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	独	秀	同上
8.1	答張君勳及梁任公	独	秀	《新青年》 季刊3期
8.6	再論外人私运軍火与中国治安	独	秀	《向导》77期
8.6	大水災与賑灾附加捐	独	秀	同上

8.6	日本在华侵略之新计划	独	秀	同上
8.6	加哇的民族运动	独	秀	同上
8.6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光棍平民			
	2. 留美学生			
	3. 不要动气?			
	4. 帝国主义者对华一致行动			
	5. 洋人的汽车			
	6. 曹錕的兵			
8.13	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	独	秀	同上78期
8.20	美国人又以軍火供給北洋軍閥	独	秀	同上79期
8.20	反革命的广东商团軍	独	秀	同上
8.20	日本对华經濟侵略之最近表现	独	秀	同上
8.20	关税协定之外卖国政府又与外商协定紙烟稅	独	秀	同上
8.20	又是一个乐志华!	独	秀	同上
8.27	江浙战争	独	秀	同上80期
8.27	倫敦會議	独	秀	同上
8.27	寸鉄	独	秀	同上
	1. 恶政府碑			
	2. 大学工科与楊杏佛			
	3. 中俄协定与奉張			
	4. 佛化恶人			
	5. 第二犹太!			
	6. 革命党怎好希望敌人优容!			
	7. 国民党与中国革命			
	8. 革命党和农民第一次見面			
	9. “亡党”			
	10. 由猪一变而为狗			
9.3	我們对于义和团两个錯誤的觀念	独	秀	同上81期
9.17	我們的回答	独	秀	同上83期

9.24	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	独 秀	同上84期
10.1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独 秀	同上85期
10.8	辛亥革命与国民党	独 秀	同上86期
10.15	这是右派行动吗,还是反革命?	独 秀	同上87期
10.29	北京政变与中国人民	独 秀	同上89期
10.29	肃清内部	独 秀	同上
11.7	俄罗斯十月革命与中国最大多数人民	独 秀	同上90期
11.12	国民党的政治态度	独 秀	同上91期
12.3	国民会议及其预备会议	独 秀	同上93期
12.10	孙段合作与国民党之命运	独 秀	同上94期
12.17	国民会议促成会与中国政局	独 秀	同上95期
12.20	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 得教训	陈独秀	《新青年》季刊 4期
12.24	国民会议声中之民选省长	独 秀	《向导》96期
12.31	国民会议与商人贵族	独 秀	同上97期
1925年			
1.7	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辞	独 秀	同上98期
1.21	列宁与中国	独 秀	同上99期
1.28	我们应如何对付善后会议	独 秀	同上100期
2.7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 的力量	独 秀	同上101期
2.14	大家应该开始懂得善后会议 的价值了!	独 秀	同上102期
2.14	一封给章行严的信	独 秀	同上
2.21	愚弄国民的国民会议条例	独 秀	同上103期
2.21	被压迫的自由与赤化	独 秀	同上
2.21	寸铁	实 庵	同上
	1.国民党究竟应当和谁合作?		
	2.国际奴隶境遇!		
	3.善后会议与社会主义		

4. 共产和普选果足以亡国嗎？
5. 你們早已背叛了民党呵！
6. 只要臉厚什么事都好干！
- 3.7 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对付
中国国民运动之总策略 独 秀 《向导》105期
- 3.7 寸鉄 实 庵 同上
1. 精神文明东方文化与段祺瑞
2. 崇信外国
3. 陈炯明与辛亥同志俱乐部
4. 軍閥与国民会議
- 3.14 悼孙中山先生！ 独 秀 同上106期
- 3.14 寸鉄 实 庵 同上
1. 一朝天子一朝臣
2. 社会党与政府官吏
3. 废帝得志是何意义？
4. 高一涵應該知罪呵！
5. “过激”之第三个解釋
6. 靜候江亢虎在善后会議宣传
社会主义
7. “反……救亡会”
8. 护党呢还是叛党？
9. 工人运动与各国在华工业
- 3.21 評中山先生死后之各方面 独 秀 《向导》107期
- 4.5 統一与分立 独 秀 同上109期
- 4.5 寸鉄 实 庵 同上
1. 嗚呼孙段合作
2. 反段与降段
3. 好个不使劳动界反抗資本家
的劳工！
4. 究竟是誰荒謬！
5. 可惜了五十万元的民脂民膏！
6. 帝国主义下的难民与苏俄

	7.兩角同盟		
4.19	亡国的上海！	独 秀	同上111期
4.22	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	独 秀	《新青年》新版 1号
5.10	寸鉄	实 庵	《向导》114期
	1.卖国		
	2.你們当真外抗强权嗎？		
	3.班禅与張天師		
	4.今年“五一”的感想		
	5.圣經与鴉片		
	6.反共产与軍閥		
	7.过激主义与被压迫者		
	8.殖民地的资产階級与帝国主义		
	9.“五一”运动到底應該反对誰？		
	10.卖国賊与国民党右派		
	11.段祺瑞解散国民會議促成会的意义		
	12.赤化与軟化		
5.24	“反唐”与国民革命	独 秀	同上116期
6.6	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	独 秀	同上117期
6.6	日本紗厂工潮中之观察	独 秀	同上
6.20	此次爭斗的性质和我們应取的方法	独 秀	同上118期
7.2	我們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	独 秀	同上120期
7.16	广州战争之意义	独 秀	同上121期
8.10	寸鉄	实	同上123期
	1.我們認識江亢虎了		
	2.醒獅与誠言		
	3.孙宝琦与醒獅		
8.15	此次运动中之帝国主义与		

	軍閥	独 秀 同上124期
8.18	軍閥及資產階級在上海民众 运动中之影响	独 秀 同上125期
8.23	我們如何繼續反帝国主义的 斗争?	独 秀 同上126期
8.23	寸鉄	实 同上
	1. 江亢虎的人格	
	2. 江亢虎的宣传之道	
	3. 罢工与法律	
	4. 孙宗昉三出风头	
9.7	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観	独 秀 同上128期
9.11	給戴季陶的一封信	独 秀 同上129期
9.11	寸鉄	实 同上
	1. 加倫將軍的分身法	
	2. 戴季陶与反共产派运动	
	3. 可怜的段政府	
	4. 奉軍在北京之治外法权	
9.25	我們对于关税問題的意見	独 秀 同上131期
9.25	寸鉄	实 同上
	1. “赤化”与“过激”	
	2. 康有为与奉系軍閥	
	3. 康有为、章士釗、戴季陶	
	4. 段执政的《甲寅》	
	5. 資產階級的民生主义	
	6. 奉軍之大义灭亲	
	7. 帝国主义者不可无走狗	
	8. 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帮助反动軍 閥	
	9. 是誰的国家?	
10.12	今年双十节中之广州政府	独 秀 同上133期
10.30	反奉运动与法統問題	独 秀 同上134期
10.30	寸鉄	实 同上

	1.戴季陶之道不孤矣			
	2.究竟誰是不良分子?			
	3.孙传芳自己想想看!			
	4.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5.又是一个共产軍!			
11.7	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独 秀	同上	135期
11.21	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資產階級	独 秀	同上	136期
12.3	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	独 秀	同上	137期
12.10	寸鉄	实	同上	138期
	1.中国軍閥之左右派			
	2.說假話			
	3.工賊替安福派說話			
	4.联賊軍总司令部			
	5.預防赤化的国民党右派			
	6.以赤化为仇敌的奉天商会			
	7.时事新报太赤色了!			
12.20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傾向	独 秀	同上	139期
1926年				
3.17	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	独 秀	同上	146期
3.27	寸鉄	实	同上	147期
	1.紅派势力与外人势力及曹錕势力之消长			
	2.安格联为什么要听張作霖的电令?			
	3.孙文主义的信徒呢,还是馮自由主义的信徒?			
4.3	中国革命势力統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独 秀	同上	148期
4.3	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現在及将来	独 秀	同上	
4.3	寸鉄	实	同上	
	1.这就是戴季陶所謂“仁爱”之言			

	2. 国民党右派之光荣		
	3. 帝国主义者悬出重賞了		
4.13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軍閥？	独 秀	同上149期
4.13	寸鉄	实	同上
	1. 紳士們請看北京血案的司法調查！		
	2. 你們代表誰？		
	3. 一个不行动的党		
	4. 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		
	5. 反赤与苛政		
	6. 独立报对誰独立？		
4.23	国民軍与北方政局	独 秀	同上150期
4.23	国民党右派大会	独 秀	同上
5.1	第二次和第三次劳动大会之間		
	的中国劳动运动	独 秀	同上151期
5.1	寸鉄	实	同上
	1. 捷足射利的上海		
	2. 唐生智也赤化了嗎？		
	3. 討赤大元帅		
	4. 反赤的滋味		
	5. 各国公使为什么均有喜色		
	6. 国民外交原来如此！		
	7. 这是以党治国嗎？		
	8. 可怜的租界华人立宪运动		
	9. 白俄不是外力嗎？		
5.8	最近政局之觀察	独 秀	同上152期
5.8	我們要认清敌与友	独 秀	同上
5.8	寸鉄	实	同上
	1. 張作霖口供中之赤与反赤		
	2. 章炳麟与鎮威孚威		
	3. 向赤或反赤之路标		
	4. 奉軍胜利之教訓		

5.15	南方形势与国民党	独 秀	同上153期
5.15	宪法与贿选	独 秀	同上
5.15	英国大罢工与东方民族运动	独 秀	同上
5.15	寸鉄	实	同上
	1.張作霖吳佩孚的假慈悲		
	2.官民合作		
	3.不怪外人都說中国人自己不好		
	4.外交界是以平等的好感对誰?		
5.22	直奉冲突之迫近与各方应取的态 度	独 秀	同上154期
5.22	孙传芳最近的主張	独 秀	同上
5.22	寸鉄	实	同上
	1.过激主义也是国粹了?		
	2.民党敗类中之先知先觉		
	3.师生合作与学生会!		
	4.李景林張宗昌之共产		
	5.合肥段公与总统曹公		
	6.又是一个曾左!		
	7.吳佩孚已是事实上的大总统		
	8.孙宝琦語妙天下		
	9.你們还要反赤嗎?		
	10.是地痞还是警察?		
5.25	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是 不是国家主义	独 秀	《新青年》新 版4号
5.30	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獄”	独 秀	《向导》155期
5.30	寸鉄	实	同上
	1.全中国人都过激了嗎?		
	2.到底要怎样才不是过激?		
	3.亚細亚民族大会与謝米諾夫		
6.3	对于上海五卅紀念运动之感想	独 秀	同上156期
6.9	給蔣介石的一封信	独 秀	同上157期

6.16	紅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	独 秀	同上158期
6.16	寸鉄	实	同上
	1. 威林頓眼中的华人价值		
	2. 反赤軍惠及警察		
	3. 平民之不平		
	4. 人类之耻辱		
	5. 請看反赤軍閥之卫国救民!		
	6. 好个“为国家立了大功”!		
6.23	奉直对峙的混沌政局	独 秀	同上159期
6.23	寸鉄	实	同上
	1. 中日亲善声中之日本侵略		
	2. 好个經濟上的提携?		
	3. 平民的中日亲善		
	4. “友誼的态度来交涉”之結果!		
	5. 工人活命問題		
	6. 官綁票		
	7. 共产主义适合于国情		
	8. 徐錫麟孙宗昉你又来了!		
6.30	革命的上海	独 秀	同上160期
6.30	寸鉄	实	同上
	1. 国民党右派与赵恒惕		
	2. 刘蘆隐与張君勱（勸——? 林注）		
	3. 国民党右派与陈炯明		
	4. 雷殷犯了什么罪?		
	5. 美术家再往何处遁?		
	6. 左排赤党右討軍閥		
	7. 崇拜曾左罗江的国家主义者		
	8. 国家主义的政綱		
	9. 可以靠外力替我們革命嗎?		
7.7	論國民政府之北伐	独 秀	同上161期
7.7	寸鉄	实	同上

	1. 赤化过激都是国粹			
	2. 吳佩孚与国会			
	3. 顧維鈞的巨款从何而来？			
	4. 丁文江第二次“友誼的磋商” 之結果			
7.14	帝国主义者最近在上海之暴行	独 秀	同上162期	
7.25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	独 秀	《新青年》新版 5号	
9.20	复張人杰、符琇等关于北伐問 題信	独 秀	《向导》171期	
9.25	我們現在为什么爭斗？	独 秀	同上172期	
9.25	寸鉄	实	同上	
	1. 人民之軍隊！？			
	2. 好一个有弊而却公道的治外 法权！			
	3. 張宗昌的亲口供状			
	4. 南軍之行为			
	5. 这也是赤化运动嗎？			
	6. 国家主义者都那里去了？			
	7. ……政还諸……民			
	8. 丑哉和平运动			
	9. 师生合不作			
	10. 反赤的老民党原来如此！			
	11. 建設专家研究系			
10.10	帝国主义者对待中国人之态度	独 秀	同上173、174期	
10.12	我們現在怎样斗争？	独 秀	同上175期	
10.12	寸鉄	实	同上	
	1. 孙传芳章炳麟的双簧			
	2. 好一个有节操的章炳麟！			
	3. 妙哉孙传芳的三爱主义！			
	4. 好个中国和平之奥秘！			
	5. 研究系主張社会革命！？			

	6. “反国民革命者”的民权呼声		
	7. 以党治国与军事专政		
	8. 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		
	9. 请看治外法权所产生之公道！		
	10. 反赤派听者！		
	11. 章炳麟和康有为的财产不齐		
10.19	对于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希望	独 秀	同上176期
10.19	寸铁	实	同上
	1. 北京黑化了！		
	2. 避开革命的新方法		
	3. 讨赤特捐		
	4. 高叫拥护国旗的是什么人？		
	5. 丁文江与爱国行动		
	6. 傅筱庵的和平运动		
	7. 上海包庇私贩烟土者是誰？		
	8. 国家主义者曾琦与万县惨案		
	9. 那里有中华民国？		
11.4	对于国民军再起的希望	独 秀	同上177期
11.4	寸铁	实	同上
	1. 軍閥口中的赤化与苏俄		
	2. 到底是誰沒收人民财产？		
	3. 帝国主义者意中的反赤作用		
	4. 孙传芳丁文江是不是中国人？		
	5. 孙中山的北伐还是段祺瑞的北伐？		
	6. 以招商九輪报效孙传芳的是誰？		
	7. 请看研究系站在那一边？		
	8. 原来抗張吳就是乱华！		
	9. 比約与顧內閣		
	10. 爱国的顧內閣		
	11. 何以軍閥輩这样爱国？		

	12.此路不通的国家主义		
	13.国家主义者与研究系		
	14.苗民和蒙古的国家主义者		
11.15	十月革命与东方	独 秀	同上178期
11.15	寸鉄	实	同上
	1.研究系官运不亨通		
	2.研究系是只白虎		
	3.国家主义者对国民党党旗及北伐		
	4.国家主义派有了极闊的首領！		
	5.軍閥諱敗之詞令		
	6.和平代表自身的和平問題		
	7.为什么不要赤俄撤退駐华海陸軍？		
	8.又是一个为孙传芳保江山者！		
11.25	革命与武力	独 秀	同上179期
11.25	寸鉄	实	同上
	1.英国律师口中之帝国主义		
	2.花姑娘大老板与反赤运动		
	3.到底是誰强夺他人的财产妻女为已有？		
	4.自治呢还是由軍閥保境安民？		
	5.丁文江竟比軍警还要反动		
	6.国家主义派眼中的爱国軍隊及其五色旗		
	7.国家主义者眼中的赤化！		
	8.青天白日旗是共产党的嗎？		
12.5	孙传芳败后之东南	独 秀	同上180期
12.5	寸鉄	实	同上
	1.中国人都赤化了嗎？		
	2.向直魯軍乞援的是孙传芳还是董康呢？		

- 3.張作霖討赤不徹底！
- 4.国家主义者有了帮助了！
- 5.怪哉沒有資本家不要資本主义的資本制度社会！
- 6.江苏人快要受反赤运动之賜！

1927年

- | | | | |
|------|------------|-----|----------|
| 1.11 | 各国承认国民政府問題 | 独 秀 | 《向导》182期 |
| 1.17 | 誰杀了誰？ | 独 秀 | 同上183期 |
| 1.17 | 寸鉄 | 实 | 同上 |
- 1.張学良不怕赤化嗎？
 - 2.張宗昌八字韵語的宣传
 - 3.好忠厚实可怜的英国人！
 - 4.极端分子之志
 - 5.上海英租界不干涉任何政党嗎？
 - 6.張天师破产了！
 - 7.好狗政府
- | | | | |
|------|-----------------------|-----|--------|
| 1.21 | 列宁逝世三周年紀念中之中国
革命运动 | 独 秀 | 同上184期 |
| 1.27 | 英国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进攻
政策 | 独 秀 | 同上185期 |
| 1.27 | 誰踐踏了誰？ | 独 秀 | 同上 |
| 1.27 | 寸鉄 | 实 | 同上 |
- 1.帝国主义的走狗傅筱庵
 - 2.大学生眼中的农民
 - 3.嗚呼穩健分子！
 - 4.国民党的敌人是誰？
 - 5.去年今日的汉口与广州
 - 6.張宗昌的三不知
 - 7.放狗屁的《甲寅》
 - 8.优伶也赤化了嗎？
 - 9.妙哉圣道会！

1.31	革命与民众	独 秀	同上186期
1.31	寸鉄	实	同上
	1.无耻的九省联合会		
	2.稳健之孙文主义!		
	3.反革命者的国旗		
	4.英国雇用的奸細国民外交协会		
2.7	“二七”紀念日敬告鉄路工友	独 秀	同上187期
2.7	赤的运动与中国外交	独 秀	同上
2.7	寸鉄	实	同上
	1.讲容忍的国家主义者		
	2.曾琦与麦克唐納尔		
	3.国家主义者眼中的国家和政府之分		
	4.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与中华民国		
	5.究竟是誰无祖国?		
	6.令人肉麻的国家主义者!		
	7.怎見得我們不要国家?		
	8.梁启超也佩服英人之忍耐!		
	9.好高明的稳健派!		
	10.誰对誰的寬大政策?		
	11.北洋軍閥“安”的成績!		
	12.英国不是帝国主义?		
2.16	无产階級与民族运动	独 秀	同上188期
2.16	張作霖宣言之解剖	独 秀	同上
2.16	寸鉄	实	同上
	1.曾琦与何海鳴		
	2.何海鳴将到广东江西汉口宣讲反赤!		
	3.是誰愿与北方軍閥妥协?		
	4.中立呢还是共管?		

	5. 奉天居然想勾結蔣介石！		
	6. 青天白日旗下反青天白日旗的分子		
	7. 中英人之見解不同如此！		
	8. 日本的如意算盘		
2.28	寸鉄	实	同上189期
	1. 穩健分子悔禍投誠的机会到了！		
	2. 共产党造謠惑众！		
	3. 不受抬举的唐生智！		
	4. 宣讲呢，还是拍影戏？		
	5. 果然是共产党的梦囂与造謠嗎？		
	6. 戴天仇其奈日本人的一定范疇何！		
	7. 中国人能忘“五七”“五九”嗎？		
	8. 国家主义派又为張雨帥所尝識了！		
	9. 外看强权內儲国賊		
	10. 三民主义信徒的双包案		
3.6	我們目前的奋斗	独 秀	同上190期
3.6	国民党党内糾紛与中国革命	独 秀	同上
3.6	寸鉄	实	同上
	1. 西山會議派連资产階級还不如！		
	2. 党皇帝		
	3. 西山會議派打倒了嗎？		
	4. 反革命当然攻击革命		
	5. 西山會議派連安福派还不如！		
	6. 可为曾琦輩浮一大白！		
	7. 投机商人——国民党主席——蔣介石的左右		

8. 蔣介石能和張作霖政見相同嗎？
9. 嗚呼美國博士！
10. 蘇聯何嘗有什麼“黨化教育”！
11. 工友為什麼只反對聯軍不反對黨軍？
- 3.12 孫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中之悲憤 獨 秀 同上191期
- 3.12 寸鉄 實 同上
1. 溥泉溥泉，你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2. 軍閥為什麼怕糾葛？
3. 津漢情形的確不同
4. 個人的軍事獨裁之榜樣！
5. 全部黨軍都能夠接受張作霖吳佩孚的提議嗎？
6. 于中國實際政治有經驗者是誰？
7. 我即黨與朕即國家
8. 日本人污蔑中國革命領袖一至于此！
- 3.13 復符琇關於軍事行動與民眾運動問題的信 獨 秀 同上
- 3.13 復王純禮關於革命軍、革命黨等問題的信 獨 秀 同上
- 3.18 評蔣介石三月七日之演講 獨 秀 同上192期
- 3.18 寸鉄 實
1. 曾琦與薛大可
2. 畢庶澄與西山會議派就這樣紀念中山！
3. 西山會議派與英帝國主義者同樣的紀念中山！

	4. 我們冤枉了西山會議派！		
	5. 帝國主義者眼中之蔣介石		
	6. 中國國民革命的武器是些什麼？		
	7. 與帝國主義軍閥妥協想推翻國民黨的是誰？		
	8. 戴天仇願意出賣工人嗎？		
3.18	復蔣希曾關於政黨運動的信	獨 秀	同上
4.5	汪精衛、陳獨秀聯合宣言		上海《時事新報》
4.6	寸鉄	實	《向導》193期
	1. 誰敢再想做中國之爹亞士？		
	2. 英國帝國主義不怕蔣介石了嗎？		
	3. 穩健派原來如此！		
	4. 青天白日旗下之上海新聞界！		
	5. 張作霖已說出南北妥協的條件了！		
	6. 徐朗西做人難		
4.6	復沈賓祚、朱近赤關於國民革命歸趨問題的信	獨 秀	同上
6.15	蔣介石反動與中國革命	獨 秀	同上198期
6.25	湖南政變與討蔣	獨 秀	同上199期
7.8	中國國民黨之危機及其出路	獨 秀	同上200期
7.8	寸鉄	實	同上
	1. 請加入張作霖的黨去罷！		
	2. 可憐的山西各界代表！		
	3. 閻錫山的國民黨……的國民黨？		
	4. 張胡子真笨！		
	5. 山西省議會移交烟具		
	6. 急求南北妥協的是北張還是南蔣？		

7. 純正三民主义信徒的奉宁誓
联盟

8. 究竟什么是真正工农？

10.24

寸鉄

撒 翁 《布尔塞維克》

1期

1. 不进則退
2. 汪精卫的出路在那里？
3. 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
4. 馬寅初又来出博士的丑
5. 滑稽的禁令
6. 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
7. 閻錫山馮玉祥仍然是赤！
8. 張作霖的共和与国民党的
国民革命

10.31

寸鉄

撒 翁 同上2期

1. 国民党也可以为帝国主义鎮
压革命了！
2. 国民党也想求得帝国主义的
信任了！
3. 国民党也要“外崇国信”了！
4. 張作霖的遺囑
5. 国民党清党的效果
6. 所謂无政府党本来就是这样！
7. 速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吳稚暉
8. 資产阶级的民生主义
9. 孙中山无常識处
10. 不甚贊助捕房的法官之下
場！
11. 汪精卫是第五代反共者
12. 好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13. 一切反革命联合起来！
14. “杀尽中国共产党！”

- | | | |
|-------|-----------------|-------------------|
| 11.7 | 寸鉄 | 撒 翁 同上3期 |
| | 1.黃埔失敗第一个重大原因 | |
| | 2.團結三民主义信徒之結果 | |
| | 3.軍閥政客是那些人? | |
| 11.12 | 給中央关于农村暴动問題的信 | |
| 11.× | 給中央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問題的信 | |
| 11.14 | 寸鉄 | 撒 翁 《布尔塞維克》
4期 |
| | 1.还是吳稚暉說老实话! | |
| | 2.反共清党与收回租界 | |
| | 3.华官委托捕房越界捕人 | |
| | 4.为新軍閥造机会 | |
| | 5.提高党权? | |
| | 6.党治之下不談法治了! | |
| | 7.蔣介石是向田中求婚吧! | |
| | 8.国民党仍难团結嗎? | |
| | 9.江南二老 | |
| | 10.反共清党后的忠实黨員 | |
| | 11.双包案的清党运动 | |
| | 12.枪决大批共犯 | |
| | 13.替代 | |
| | 14.汪精卫行为不当 | |
| | 15.有趣煞的总理紀念周 | |
| | 16.作壁上觀的北伐 | |
| | 17.国民党眼中的革命成功 | |
| | 18.以国民党黨員为限 | |
| | 19.横逆变成了神圣 | |
| | 20.我真是害了你們了! | |
| 11.21 | 寸鉄 | 撒 翁 同上5期 |
| | 1.国民党之端庄剛毅 | |
| | 2.盛哉党化! | |

	3. 辽皇帝与党皇帝	
	4. 改組与糾正	
	5. 党国	
12.5	寸鉄	撒 翁 同上7期
	1. 聖誕	
	2. 好大胆的胡适之褚輔成	
	3. 资产階級独裁的上海市參事会	
	4. 吳稚暉的思想还不落后嗎?	
	5. 主义的流弊	
	6. 沈恩孚的教育目标	
	7. 反共清党后的两个印象	
	8. 数典忘祖	
	9. 駁馬克思不是容易的事呀!	
	10. 郭先生和自己开玩笑	
	11. 移步換形的驅木	
	12. 反共而不流入資本主义?	
	13. “杀其人而用其法”	
	14. 夸大狂	
	15. 同志之标准	
	16. 世界太左了!	
	17. 中国人的晦气!	
	18. 汪精卫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	
	19. 不同	
12.12	寸鉄	撒 翁 同上8期
	1. “第五层序”的革命	
	2. 反共产的国民革命	
	3. 下层轟动	
12.13	給中央关于广州暴动問題的信	
12.19	寸鉄	撒 翁 《布尔塞維克》 10期

1. 少一个皇帝
2. 共贼汪精卫
3. 反共的共产国际
4. 我們发现了国奉之不同了
5. 請看国民党的民族主义！
6. 李宗仁罵自己
7. 国民党死亡之正式訃告
8. 元洞主义
9. 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
10. 杀人的国民党
11. 小人党

12.26

寸鉄

撒 翁 同上11期

1. 吃人的血腥的道德文化
2. 究竟是誰惨杀？
3. 研究系称心了罢！
4. 共产党是搶劫的嗎？
5. 叶开鑫与汪精卫
6. 反共先生的下場

1928年

1.2

寸鉄

撒 翁 同上12期

1. 舅子政府
2. 真正国民党
3. 如此这般的反共清党
4. 白崇禧口中的清党大功
5. 分治合作与联省自治
6. 孙中山瞎了眼睛

1.16

寸鉄

撒 翁 同上14期

1. 容安与共信
2. 金箍棒
3. 蔣介石也是共产党
4. 武汉又多一个冤鬼！
5. 反共不彻底

- | | | |
|------|---------------------|-----------|
| | 6. 国民党根本不要民众 | |
| | 7. 一朝天子一朝臣 | |
| | 8. 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是救国救民的呀！ | |
| | 9. 可怜的胡汉民！ | |
| | 10. 忠实同志又多一个！ | |
| | 11. 蒋介石也谈什么土地问题 | |
| | 12. 吳稚暉識主 | |
| 1.30 | 寸鉄 | 撒 翁 同上15期 |
| | 1. 逼錢与打战 | |
| | 2. 杀穷人 | |
| | 3. 兩件肉麻的事 | |
| | 4. 国民党是一种什么党？ | |
| | 5. 国民党的劳工立法 | |
| | 6. 馮玉祥眼中的共产党与国民党 | |
| | 7. 新學閥 | |
| | 8. 反共始祖 | |
| | 9. 險象叢生的国民党 | |
| | 10. 請看中国的階級与爭斗！ | |
| | 11. 大元帅不是好作的呀！ | |
| 2.6 | 寸鉄 | 撒 翁 同上16期 |
| | 1. 反革命的階級 | |
| | 2. 鏟共还是鏟蔣？ | |
| | 3. 国民党本来不过尔尔 | |
| | 4. 拜金主义能救中国的穷嗎 | |
| | 5. 殖民地馴服的奴隶 | |
| | 6. 第三国际之野心？ | |
| | 7. 啊，原来你們是革心党！ | |
| | 8. 太好了！ | |
| 2.13 | 寸鉄 | 撒 翁 同上17期 |
| | 1. 欢迎改造博士 | |

	2.阿要难为情嘅		
	3.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观		
	4.三民主义者的阶级调协办法		
	5.三民主义者的交友与模楷		
	6.乱党		
	7.哈同花园与俄領館		
2.20	寸鉄	撒 翁	同上18期
	1.即是		
	2.忠实同志乎叛逆乎?		
	3.是誰从中播弄呢?		
	4.国民党还能欺騙民众嗎		
	5.达尔文和馬克思同时倒霉		
	6.运动民众与民众运动		
	7.国民党的理論与方法		
	8.誰是中国的国民革命者?		
	9.无頼与有頼		
	10.“党人可杀”		
2.27	寸鉄	撒 翁	同上19期
	1.上海工统会的飯碗快打破了		
	2.国民党人腐化的亲供		
	3.誰說国民党不要民众?		
1929年			
7.28	关于中东路問題給中央的第一封信		《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8.5	关于中东路問題給中央的第二封信	同上	
8.11	关于中东路問題給中央的第三封信	同上	
12.10	告全党同志书		
12.×	与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我們的政治意見书”		

1933年		
4.14	陈独秀供詞	《国聞周报》 10卷17期
4.15	陈独秀供詞	同上
4.20	陈独秀供詞	同上
1936年		
5.21	中国的一日	独 秀 茅盾主編： 《中国的一 日》第2編
1937年		
1.16	荀子韵表及考釋	独 秀 《东方杂志》 3卷2号
3.1	实庵字說	独 秀 同上5、6号
4.1	实庵字說	独 秀 同上7号
6.1	老子考略	独 秀 同上11号
7.1	实庵字說	独 秀 同上10、13号
10.10	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廿六个双十 节	独 秀 《抗战文选》
11.×	抗战的意义（中华大学讲演）	独 秀 同上
12.21	給陈其昌的信	仲 秀 《陈独秀最 后論文和 书信》
12.×	怎样才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 力	独 秀 单行本
12.×	打倒消极先生	独 秀 同上
12.×	“言和者即汉奸”	独 秀 同上
12.×	多謝敌人的飞机大炮	独 秀 同上
12.×	我对魯迅之認識	独 秀 同上
1938年		
3.×	实庵自传	独 秀 单行本
3.17	給《新华日报》的信	独 秀 《血路周刊》 12期

4. ×	从国际形势中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陈独秀	《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4. ×	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陈独秀	同上
4. ×	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陈独秀	同上
5.15	五四时代是否过去了	陈独秀	重庆《政治評論》1卷 10期
7.16	民族野心	独 秀	单行本
7. ×	資本主义在中国（在重庆民生公司讲演）	独 秀	同上
7.14	抗战中川軍之責任（伪“中央广播电台”演讲）	独 秀	同上
7.21	抗战一年	独 秀	同上
7.21	論游击队	独 秀	同上
1939年			
3. ×	給托洛斯基的信	独 秀	《陈独秀最后論文和书信》
1940年			
3.2	給西流等的信	独 秀	同上
3.24	对蔡元培逝世和感言	独 秀	重庆《中央日报》
4.24	給西流等的信	独 秀	《陈独秀最后論文和书信》
4. ×	給西流等的信	独 秀	同上
7.31	給連根的信	独 秀	同上
1941年			
1.9	給Y的信	独 秀	同上
1.9	給S和H的信	独 秀	同上
1942年			
3.21	战后世界大势之輪廓	独 秀	重庆《大公报》
3. ×	再論世界大势	独 秀	《陈独秀最后論文和书信》
5.13	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独 秀	同上

5.13	給Y的信	独 秀	同上
×.×	我的根本意見	独 秀	同上
	准备战敗后的对日作战	陈独秀	单行本
	我对于抗战的意見	陈独秀	同上
	我們断然有救	陈独秀	同上

(以上三篇发表的年月不詳)

〔編者注〕 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此后一段时期,他与中国的其它托派分子編过一些刊物,或在托派刊物上发表过的一些文章。这一部分文章尚未查全,这里沒有編入。

二、陈独秀曾用过的字、号、笔名

陈独秀用过好多笔名,一时不能查全,已見的有:陈独秀、独秀、独秀山民、山民、陈仲甫、仲、仲子、陈仲子、甌洲仲子、陈仲山、陈仲、仲甫、陈由己、由己、只眼、張次南、陈乾生,这些都是在1900年到1914年发表文章时所用的。1914年到1927年,除上述笔名中有些仍繼續使用外,又曾以实庵、实等笔名著文。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他又以撒翁笔名写些“寸鉄”之类短文在《布尔塞維克》杂志上发表。参加托派后又用頑石笔名在托派刊物《热潮》上发表文章。

三、解放前后有关評論陈独秀的 資料目录及索引

1.在党出版的書报杂志中的部分目录

文章名称	作 者	文章出处
論撒翁同志对中东路問題的 意見	韶 玉	《布尔塞維克》

2卷1期

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			
国革命取消取消派?	思 美	同上4卷3期	
論陈独秀主义	和 森	同上4卷5期	
托洛斯基派和国民党	秋 白	同上4卷6期	
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			
(有关部分)	范 亢	同上5卷1期	
滿洲事变中各反对派怎样拥护			
国民党统治的		《紅旗周报》23	
		期	
托洛斯基与国民会议	思 美	《实話》13期	
斥叶青張蔭非伍黎学稼諸托洛			
茨基派——日本警大人民公			
敌	亮 平	《解放周刊》13	
		期	
肃清托洛茨基主义——日寇侵略			
的别动队	高 烈	同上1期	
反对法西斯的走狗——托陈派的			
阴谋	平	同上8期	
肃清日寇走狗——托派	冰	同上9期	
一封公开信	刘炳生	同上11期	
剷除日寇偵探人民公敌托洛茨基			
匪徒	康 生	同上29、30期	
陈独秀先生何处去?	冰	同上24期	
評陈独秀的亡国論	陈伯达	同上60、61期	
汉奸托洛茨基分子破坏抗战的罪			
行	夏印、允中		
		同上121期	
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問題		1938年3月17	
		日《新华日	
		报》	
叶劍英、董必武、博古的信		1938年3月21日	

		《新华日报》
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的資 产階級先鋒隊	博 古	陈东晓：《陈独 秀評論》
斥陈独秀的投降理論	李清心	1942年5月8日 《解放日报》
好个“假如中国不抗战”？！	何学迟	1942年6月23日 《解放日报》
取消派內部关于政权問題的爭 論与我們的主張	思 美	《红旗周报》89 期
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陈独秀的 “經濟理論”	依 风	同上37、38合期
国民會議——国难會議—— 国民代表会	丁 九	同上39期
且看取消派向誰进攻	柯 夫	同上17期
滿洲事变中之取消派	石 硯	同上22期
陈独秀的“康庄大道”	史鉄儿	同上
机会主义者的中国經濟理論	史 琪	同上32期
《文学革命論》及其作者当年 的思想——兼論1917年“文学 革命”的本质	張毕来	1951年9月16日 《新中华》14、 16期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思想特征	張毕来	1955年6月7日 《光明日报》
“五四”前后的陈独秀思想	談 阳	《史学集刊》2 期
略論陈独秀的一生	陈善学	1958年2月《历史 教学問題》
李大釗与陈独秀思想	石 峻	《中国近代思想 史論集》上海

出版

評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綱中对陈

独秀初期思想的批判

李龙牧 1955年5月12日

《光明日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剖析

陈哲夫 《历史研究》

1960年1、2

期

五四运动时期的李大钊与陈独秀

思想

彭明 《历史研究》

1962年6期

此外,在解放后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党史、革命史、现代史、现代文学史、近代政治思想史等书中,均有专节或专题论述和批判陈独秀的材料。

2. 社会上一般论述(包括反动人物的论述)

A. 国内部分:

文章名称

作者 资料出处

陈独秀評論

陈东晓編

此书内包括有傅斯年、胡适、王造时、金玉振、楊鏡芙、靜、髡謾、老憨、汪錫予、仿魯、筱姪儿、赤光等各派人物所写的評論文章;还有《晨报》、《先锋报》、《社会生活》、《申江日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导报》、《世界日报》、《广州日报》、《大众評論》、《太平湖》等各派报刊的社評、社論等多篇。

陈独秀不是“托派汉奸”的申明

林庚白

等

1938年8月×日

《武汉日报》

林庚白声明

1938年8月16日

《新华日报》

張西曼声明

1938年8月18日

《新华日报》

陈独秀与所謂托派問題

尼司編 单行本

陈独秀与所謂“紅軍”

内外通

訊社編 单行本

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罗 汉	1938年4月25日 《汉口正报》
陈独秀等危害国民起诉书	伪江苏 检察院	
陈独秀等判决书	伪江苏 法院	
陈独秀先生评传	王森然	《近代廿家评传》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	静 尘	1942年7月《古今》5期
略案陈独秀的根本意见	牟离中	1947年1月《历史与文化》1期
革命叛徒陈独秀	林 带	《人物杂志》1950年第五年第二期

B. 国外部分:

文章名称	作 者	資料出处
支那一机构之人物	斋藤刚	东京“太阳月刊”社版
(此书132——134頁中有陈独秀传略)		
新支那論	范崎尔 孝	
(此书第4章有: 陈独秀の批評; 第5章有五四运动の意义, 85——96頁涉及到陈独秀; 第7章有陈独秀の没落, 陈独秀の揭破……)		
支那政治思想史		
(此书368——369頁有“馬克思の派社会主义”, 内中說到陈独秀的一些著作)		
支那問題辞典		
(此书518頁有“中国共产党”, 内中涉及到陈独秀)		
所謂国际兩大陣綫		独立出版社版
支那最近大事年表		
(此书の65頁有中国共产党成立談到陈独秀, 477、532、		

535頁中談到汪陳宣言、八七會議等都涉及到陳獨秀)
五四運動史 周策縱 1960年美國哈佛
大學出版社英
文版

(書中第42頁談到陳獨秀的傳略)
1924—1927斯大林在中國的
失敗 Conrad
Brandt 1958年哈佛大
學英文版

(書中第143頁談到陳獨秀在1927年曾派張國燾到南昌
阻止南昌起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陈独秀问题参考资料 第2版

作者=林茂生编辑

页数=347

SS号=11533771

DX号=

出版日期=1964.08

出版社=

书名

前言

目录

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陈独秀：敬告青年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只眼：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只眼：我的国内和平的意见

只眼：立宪政治与政党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

独秀：过激派与世界和平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陈独秀：马尔塞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

陈独秀：谈政治

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

独秀：造国论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独秀：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

陈独秀：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

独秀：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独秀：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独秀：革命与武力

独秀：革命与民众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

一、1929年7月28日的信

二、1929年8月5日的信

三、1929年8月11日的信

陈独秀供词(摘录)

陈独秀：中国的一日

仲：给陈其昌等的信

陈独秀：从国际形势观察中国抗战前途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陈独秀：各党派应如何巩固团结？

陈独秀：民族野心

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

独秀：抗战一年

陈独秀：论游击队

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

附一：托洛斯基给李福林的信

附二：刘仁静、李季的声明(附《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三封信

陈独秀：给连根的信

陈独秀：给Y的信

陈独秀：给S和H的信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

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

陈独秀：给Y的信

附录：

- 一、陈独秀著译、演讲、通信等目录
- 二、陈独秀曾用过的字、号、笔名
- 三、解放前后有关评论陈独秀的资料目录及索引